 美洲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8.2%，可分为北美洲、中美洲及南美洲。北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中美洲涵盖墨西哥、洪都拉斯、巴拿马、古巴等国；南美州则包括巴西、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等国家。

       这片位于西半球的土地是富裕的，也是贫穷的。工业科技在北方绽放异彩，美国和加拿大经济发达、社会文明，人们过着安逸的生活；南方的土地虽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大多深埋地下，不见天日。政治和社会的动荡，致使它的发展远不及北美。

       人们说，美洲是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地方，它像个大磁铁，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到这里来填温饱、寻美梦。华人为了摆脱饥饿与暴政，也扬帆来到这世界的另一端，与欧洲人、非洲黑人、印度人、犹太人、日本人等，相依在这片拥有9亿居民的土地上，打拼闯荡，创造奇迹。

       早期的华人移民，多数来自广东一带。他们为了生计，怀着刻苦耐劳、勇于冒险的精神，离乡背井到北美当苦力，首先在美国、加拿大淘金，随后参与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建造工程，对北美的建设，可说洒下了无数血汗。有人说，没有华人，就无法成就今天的北美。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北美排华气氛浓郁，华人入境、从事经济活动受限，许多家庭更因此长期分隔两地，无法团聚。然而，华人敢于梦想，不轻言放弃，许多华工存够了资本，就做起小生意，如开设中餐馆、外卖店、洗衣店、超市等。他们坚持把下一代培育成才，以期摆脱贫困与文盲。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批新移民如潮涌入，使北美华人人口激增。与早期不同的是，新移民来自各省各县，加上土生华人，华社结构更形复杂。目前，北美华人约有500万，他们从低下层晋升为中上层阶级，然后渐渐走入主流社会。新生代和年轻移民大多是白领或专业人士，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当地人来说，“华人”不再是令人厌恶的名词。

       19世纪中叶，中南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开始引进大批华南契约劳工，或从事甘蔗、棉花种植等工作，或到矿场采集鸟粪，或修筑铁路。恢复自由身的华工也经营小本生意，如开设洗衣店、杂货店、餐馆及酒馆等。鼎盛时期，华人人口有多达十几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为了吸引外资，对新移民大开国门，吸引了大批来自福建、浙江、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涌入。新移民财力雄厚，文化水平也较高，他们在各地投资设厂，或从事工业生产，或经营超级市场，或发展电子科技业。目前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要数巴西、秘鲁、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及阿根廷。

       华人在美洲的任何一个角落，既能安身，也能立命。他们在经济上与主流社会并驾齐驱，并且积极地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为了下一代，华人身体力行，以最直接的方式拥抱这片土地，在各个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美国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数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飘洋过海去寻找美国梦。人们相信在这自由公平的国度里，只要肯努力奋斗，必能达到理想生活。美国人总是骄傲地说：“在美国没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

       美国在工业和科技等领域走在世界最前端。在获得世界级的荣耀时，它也经历了不少挫败，如经济大萧条、战争、恐怖袭击等事件，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把人民的信念击垮，他们坚守民主政治制度，追求自由与正义。

       今天，美国仍是最受欢迎的移民国家，每一年超过100万人成为美国公民。移民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通过合法与非法管道进入美国。美国政府预测，随着拉丁美裔和亚裔人口不断增长，二三十年后，美国白人将变成少数族裔。

       不过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收紧了移民政策，再加上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移民人口增长突然放缓，移民发展趋势似乎又进入了新的局面。

       华人于160多年前就移民到美国，至今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仍不断涌入，而以中国大陆移民人数最多。华人在美国各领域的贡献和成就有目共睹，被誉为“模范少数民族”。

   华人在美国扎根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奋斗。

       1848年，美国西岸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东北传出发现金矿的消息之后，随即改写了美国的命运，也掀起一股华人移民潮。

       当时，华人一般都是以劳工身份入境美国，他们多数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多为四邑（新会、台山、恩平、开平）人。这些留着辫子，身穿简朴清服，只会讲家乡话的青年为了生计，贸然奔向旧金山（San Francisco）。“咸丰二年造金山，担起遥仙万分难，竹篙船撑过海，离妇别姐去求财。”一首流传到今天的台山金山歌，悠悠地唱出了他们离乡背井的无奈。

       大部分华工抵达旧金山之后，便转往内华达山脉（Siera Nevada）的金矿工作。1850年，共有1万5000名华工在美国淘金。那时，欧洲矿工抢劫华人矿工的事件频频发生，为了不与他们有任何正面冲突，华工一般只会到被欧人矿工遗弃的金矿去淘金。华工往往付出了双倍时间、耐力和劳力，始能有所斩获。

       除了华工之外，华商也到旧金山经营各类小生意。1850年，旧金山约有700名华商，华人餐馆、中医馆、洗衣店等也接二连三地出现，华人社区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50家华人店铺的“小广州”。1853年，当地报纸将华埠命名为“中国城（Chinatown）”，从此成了华埠的统称。华人本身则将旧金山华埠称作“大埠”，不少淘金失败的华工都到大埠的餐馆、洗衣店等华人商店打工，也有一些华人到白人家里当佣仆。

       在白人雇主的眼中，华工是最能吃苦、勤快以及廉价的劳动力，多数白人居民并不排斥华人，并且认为他们安静和平。但始终还是有一些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歧视华人，认为华人的文化、思想及体格皆低人一等，甚至要求政府禁止华人入境。

       在他们的叫嚣和影响下，反华法令开始逐步推行。加州（California）在1855年起便向华人征收每人50元的人头税，成了征收华人人头税的开山鼻祖。旧金山还立法禁止华人到市立医院就医，担任市政工作等，甚至定下反华示威日，进一步压缩华人的生存空间。

       1862年，美国政府决定修筑横跨美国大陆，连接东西部的铁路干线——中央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Central Pacific Railroad），基于华工刻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就连那些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也都同意雇佣华工来筑路。当时参与修建铁路的华工，占了所有修路工人的95%。

       筑路华工每个月的薪金为28美元，伙食自理，炊具及帐篷自备。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个月工作至少26天。不论是炎热夏日，还是冷冽寒冬，华工都须卖力地修筑铁路。华工刻苦耐劳以及敢于冒险的精神，使铁路的修建工程顺利进行。

       原本预计花14年才能完成的工程，最后，竟然7年就竣工了。1869年5月10日，沾满了华工血汗的太平洋铁路正式通车。尽管白人不得不承认华工是世上最好的筑路工人，然而，在铁路完工的庆祝会上，却连一名华工都不曾受邀出席。

       随着太平洋铁路正式横贯东西两地，大大地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也促使许多原本聚集于西部的华人，纷纷移居到美国东部和中部。

19世纪70年代，华人的商业发展迅速。在城市地区，除了洗衣业由华人垄断之外，雪茄业、制鞋业、烟草业、毛纺织业、制衣业等，都有华人参与。根据记载，那时旧金山的华商数量高达5000名，大多涉及农产品销售、石英采矿、烟草、劳工承包等行业，而他们所创办的厂内雇佣的也几乎全是华人员工。

       在最初30多年的自由移民时期，有30万左右的华人先后来到美国，他们大部分都坚持叶落归根，日夜期待着能衣锦还乡。即使不幸客死异乡，宗亲团体或会馆也会将死者的骨灰运送回家乡安葬。

       1876年，美国迎来建国100周年，工业发展如日中天，人人皆对未来充满着憧憬。但是，这时旧金山却爆发经济危机，股票崩盘，银行关闭，而冬季的干旱又毁掉小麦的收成。加州首次面对经济萧条，超过百万人面临失业的困境，金矿业、铁路建筑业、农牧业等劳动领域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许多中产阶级如小投资者、店员和小职员等也被波及，瞬间人人都从天堂坠入地狱。

       加州的白人工会开始将矛头指向华人，将经济不景气、失业等问题都归咎于华人，他们认为华工以极低廉的价格吸引雇主，因此抢走了白人的就业机会。白人工会和政客愤怒地呼喊“华人滚回去”，报纸上的漫画也把华人画成长着杏仁眼、留着长辫子、抢夺白人饭碗的妖魔。排华情绪经煽动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地演变成了一波波的排华暴行。

       华人的商店和住房被纵火焚毁，而那些雇用华工的白人雇主也开始接到恐吓信件，以致他们不得不解雇华人员工。最终，大部分华人唯有退避到华埠，被迫和主流社会隔离，并且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1882年，在一片争议声之中，排华法令（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正式于美国国会通过，这也象征了美国自由移民时代的终结。

       排华法令明文规定，在接着下来的十年之内，不许华人移民到美国，而那些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华人以及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一概不得入籍。华人当中，仅有外交官、旅游者、商人、教师和学生可以入境美国，其他华人一概不准入境，即使是那些美国境内华人的亲属，也被拒于门外。排华法令打击了美国华人社会，到了1920年，美国的华人仅剩下6万人。

在曼哈顿（Manhattern) 华埠设立的Chatnam Square, 主要纪念二战时为国捐躯的华裔少尉飞行员Benjamin Ralph Kimlau。

虽然不受欢迎，但是华人却多次参与美国重要的战争，并以美国之名出征，为美国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生华人刘成基获美国政府颁发英勇勋章。到了二战时期，全美国共有2万多名华人参军，他们英勇奋战，牺牲极大，为美国赢得了最后胜利。

       正是因为二战，使许多白人改变了对华人的看法，渐渐地，很多原本拒绝雇佣华人的行业开始雇佣华人，一直以来受尽委屈的华人社会，终于看到一线曙光。

       1943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宣布废除《排华法令》，并且允许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申请入籍。此外，通过《战时新娘法令》，华裔军人的妻子或者家属获准到美国来定居。随着华人妇女的增加，原本是“寡老型”的华人社会遂起了显著的变化，男女比例渐渐平衡，华人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

       二战结束之后，华人以为从此能过上一段安稳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冷战爆发，中美关系逐渐紧张，在美国境内大大小小的反共运动使美国华人寝食难安。他们担心在二战时期，那些日裔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厄运，将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70年代中叶，美国政府收容了大批来自印度支那的华人难民，而且之后又同意难民亲属可以通过“家庭团圆”的方式移居美国，导致美国华人人数激增。

       一般认为，于1965年之前抵达美国的华人移民都算是老移民。

       新移民法令在1965年通过，1968年开始实行之后，吸引了大批亚裔以及拉丁美裔移民涌入，也掀起第二波华人移民潮。

       在中美建交以前，美国允许每年有2万名华人移居美国，但并不包括中国大陆的移民。198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2 万个名额给台湾移民，在1987年，香港也获得5000个名额。

       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二战之后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已经融入了主流社会，也毅然投入政治及社会活动，拥抱美国价值观，积极地为自由公平而斗争，成了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受到主流社会肯定。但是，华人社会中仍然有很多不谙英语，并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早期移民，因此，华人的整体形象其实改变不大，华人仍被歧视。

       中美于1979年恢复建交之后，大陆移民遂如海水般一波波涌入，成了美国华人社会中最庞大的新移民群体。如今，在美华人总人数已突破350万，是最庞大的美国亚裔移民族群。

华裔美国退伍军人会主席梅本立（右）和美国退伍军人会主席黄宏达合影。

*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所引发的大火，将历史悠久的中国城烧成灰烬，美国政府储存居民身份资料的办公室也被烧毁。之后，美国政府让居民重新登记身份，有一些人便趁机用假身份取得美国国籍，这些人后来被称为“Paper Son”（冒名的家伙），其中包括不少华人。*

美国华人一次次证明了只要有决心、肯努力，绝对可以创造奇迹。许多华人身无分文来到美国，经过奋斗，最终虽不一定都能变成大富翁，但至少可以三餐无忧，安居乐业。而他们的下一代只要肯发愤图强，几乎都会成为专业人士或白领，走出华埠，融入主流。

       在大部分美国人的眼中，华人拥有统一的形象，比如来自大中华地区，拥有黑头发黄皮肤、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工作勤奋，善于规划未来等。然而在现实中，美国华人来自五湖四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南北美、欧洲等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差异极大。华人无奈地说：“华社的多元和复杂，恐怕永远只有华人本身才能了解。”

       美国东部因纽约（New York）这个大苹果而吸引了无数移民，遍地的机会，唤醒了人们追求梦想的热忱与野心，每年通过合法与非法管道涌入纽约的人不计其数，据统计，2000年纽约华人人数约37万人，但真正的人数始终是个谜。一般认为，纽约华人占全美华人总数16%左右。

       东部有纽约，西部则有加利福尼亚（简称加州）。加州气候暖和，全年阳光灿烂，洛杉矶（Los Angeles）和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era，简称湾区）是高科技和创意行业的重镇，亦是有为青年圆梦的地方，集中了大批华人科技界精英。加州华人社区面积庞大，覆盖几十个城市，人数占了全美华人总数的40%,是美国最重要的华人聚居区。

       其他拥有超过15万华人的城市有休斯顿（Houston）、达拉斯（Dallas）、芝加哥（Chicago）等。但在美国中南部小镇或穷乡僻壤，华人则很稀少。

       传统华埠已不再是华人安家首选，商机多、靠近名校、治安良好、生活方便，成了华人落脚和安家首要考量的条件。如今，在白人为主的高级住宅区里，都可找到华人的踪影。

       整体上，华人社会日益壮大，但两极分化现象已在经济、教育、文化、身份认同等领域出现，而且日益严重。

       经济方面，拥有高学历、从事高薪工作的白领和上班族，以及那些教育水平和收入偏低的中低下层，各占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一华人介于蓝领和白领之间，以自雇人士和小老板居多，一般从事华人传统行业如餐饮业、零售业等。

       文化方面，土生华人自幼受美国正统教育，思想和生活方式较西化，一部分能讲中文，但多数无法以中文书写，还有一些完全不懂中文，被称作外黄内白的“香蕉人”；成年新移民多数还与原居国保持密切联系，也无法放下对原居国的感情；而受过原居国和美国教育的移民，一般则游走于两种文化间，因能熟练掌握中英文，在竞争中有明显优势。

美国各州拥有各自的文化，多元丰富。有开放、追求自由的美国人，也有如清教徒似的保守美国人，分布各地的美国华人也各有特色。华人人口最多的纽约和加州，展现了最丰富和最全面的美国华社风貌。

虽说美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但“主流社会”仍以白人和西方文化为主。受过当地教育、精通英语的华人，一般都能在主流社会中生存，但教育程度低、收入偏低且不谙英语的新老移民，则较难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华埠（又称唐人街）就成了他们的生活和经济重心。

       华人笑言：“既然不能融入主流，那我们就在华埠打造自己的主流社会！”华埠发展完善，餐馆、商店、诊所、医院、银行、学校等一应俱全，而且几乎全由华人经营打理，服务人员都能说流利华语。一名华埠居民说：“在这里不用说英语，不用吃不合味的西餐，不用和白人打交道，完全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美国大大小小华埠约80多个，十大城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Boston）、费城（Philadelphia）、华盛顿、夏威夷（Hawail）、西雅图（Seattle）、萨克拉门托都拥有较大规模的华埠，其中又以曼哈顿唐人街和旧金山唐人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且历久不衰。两座唐人街各别坐落在东西两岸，因东西部文化差异而显得各有特色。

       曼哈顿唐人街位于纽约市的心脏地带，每天都是人潮汹涌，车水马龙，新老移民、游客、当地人等各路人马川流不息。

       旧金山唐人街同样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1906年大地震后的大火曾把它烧成废墟，灾后排华政客企图把唐人街从城市规划中删去，幸得华人努力争取方才保住。重建后它成为旧金山重要的历史地标和旅游景点，到访的观光客比到金门大桥的还多。

       乍看之下，曼哈顿唐人街和旧金山唐人街像孪生姐妹，大同小异。曼哈顿唐人街大厦林立，旧金山唐人街主要都是不超过6层的楼房。其他经典唐人街风景如醒目的“唐人街”大牌楼、砖楼、狭窄的小巷、密密麻麻的中文招牌、带有中国风味的建筑设计和装饰灯等，都完整无缺。

       一名旧金山华人居民笑言：“旧金山唐人街由白人建筑师策划设计，他们把对中国的想象都发挥到唐人街上。”如今，许多华人传统行业如餐饮业、食品和杂货批发业、理发业等依然是唐人街的经济命脉，但旅游业已成为唐人街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如今曼哈顿唐人街的广东老移民走的走，过世的过世，人数渐少，而大陆新移民人数则年年上升，尤以福建移民人数增长最为显著，东百老汇（East Broadway）街更成为福建新移民的地盘，街上开了很多福州小吃店，同乡们说着家乡话，热闹俨如“小福州”。近几年，唐人街已渐渐从一个广东方言为主的社区，变成一个普通话和福建方言通行的天地。

       与曼哈顿唐人街相比，旧金山唐人街则没有出现显著的大陆福建移民潮。尽管近几年说普通话的居民也增多了，但街头巷尾最常听见的依然是粤语或其他广东方言。

       两个唐人街如今依然是中下层华人的避风港和安乐窝，美国政府在唐人街推行的公共住宅计划，反应热烈，供不应求。

       1975年在曼哈顿唐人街落成的孔子大厦是其中一个公共住宅计划。孔子大厦高44层楼，共760个公寓单位，成为4000多名中低收入者的家园，其中90%为华人住户。这里租金便宜，交通方便，至今依然是华人的理想住处。

       旧金山唐人街老华人很多，如何安顿年迈居民成了唐人街的大挑战。当地的“单房旅馆”是许多老人的安身之地。它就像一般旅馆，由单人房组成，浴室、厕所、厨房和客厅则是共用空间。和一般旅馆不同的是，这里的住客一住就是好几年，而且年迈住户很多。

       其中一座“单房旅馆”经理说：“这里月租大概是206美元，比市价低很多。我们的住客多数是在唐人街生活了多年的老人，只有少数新移民。只是有一些旅馆缺乏维修和管理，卫生和设备都不是很理想。”

       不少年迈华人把“单房旅馆”当家，安享晚年。除一部分是孤苦无依的老人外，也有一部分老人子孙成群，但却不愿随下一代搬离唐人街。

孔子大厦是许多中下层华人的避风港。

许多老人在房内堆满食物、生活用品、儿孙送的礼物和家庭照片等等，筑起他们的小天地。旧金山华人策划协会下属的青年会，更安排青少年每星期到旅馆探望长辈，陪他们聊天游戏，让这群高龄居民不愁寂寞。

       曼哈顿唐人街店铺楼上和地下室住着很多大陆新移民。一位新移民抱怨：“市中心房地产价格一直在涨，一房单位月租金都要500美元以上，我们只能和人分租，有不少一房单位内住了七八个人呢。”在旧金山唐人街周边的小意大利和俄罗斯山（Russian Hill）店屋楼上的单位，也几乎被华人填满了。

       唐人街虽繁忙拥挤，但不少人仍感叹，与巅峰时期相比，今日的唐人街已冷清不少。曼哈顿唐人街与著名的金融区为邻，每天中午唐人街中餐馆都会变成金融精英和白领们的饭堂。气势磅礴的世贸大厦也曾是唐人街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一名老居民回忆：“2001年9月11日当天，在学校上课的小孩，看到窗外世贸大厦轰然倒下，冒出滚滚浓烟，全都吓哭了。”事发后市中心交通瘫痪，地下通道和地铁关闭，金融区损失惨重。曼哈顿唐人街也元气大伤。一名店主回忆：“那些来吃午饭的金融精英突然消失了，游客也不来了，唐人街一片冷清。”

       由于人流减少，生意转淡，有人便心灰意冷地搬离了唐人街，但不少居民仍留守当地。在各界的努力下，唐人街于2006年3月加入帝国区，曼哈顿下东城以及唐人街某些特定地区可以享受减税优惠，唐人街的经济终于逐步走出低谷，餐饮业、贸易、服务业等开始慢慢恢复元气，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繁华现象终于再现。

       谁知好景不长，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华埠失业人数激增，再次打击了曼哈顿唐人街经济。旧金山唐人街则更显冷清，旅游业是旧金山唐人街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名老板说：“全球经济不好，游客锐减，生意一落千丈。”

       旧金山唐人街经济缺乏活力也和人口老化有关。华埠的居民约一半是退休人士，要不就是中下层收入人士，换言之都属于低消费或不消费群体，市场缺乏生气。一名华人店主说：“要做他们的生意可不容易！”

       不少华人是近20年才抵达美国，他们没有学历、专业技术或资金，只能埋头苦干、省吃俭用，一分一毫累积财富，他们没有奢华的美国梦，许多人的理想只是“三餐温饱，拥有自己的房子，供子女念大学”。

旧金山华埠的花园角（Portmouth Square）是老人的社交角落，许多老人会聚在一起看电视或听讲座。

 20多年前安娜从广州来旧金山投靠亲友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只能靠做糕点的手艺维生，经过奋斗，如今已成为一家小餐厅的老板。她说：“在美国，没人会干涉你想做的事，人们更不会因为你的工作而看不起你。”顾客待她如朋友，在街上相遇，他们会热情唤她的名字。送外卖到办公大楼时，西装笔挺的白领会帮她开门、提东西，热情相助。她用自己的双手开创了事业，养大了孩子。

       纽约中华商会主席梅光达是土生华人，他的祖辈在曼哈顿唐人街落地生根，他在唐人街出生长大，像无数力争上游的华人一样，他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最终在保险界里脱颖而出，如今已是成功商人和华社侨领。他自信地说：“在这里，只要肯努力，要从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变成百万富翁也绝对有可能，美国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随着新移民人数不断增加，唐人街的人口结构也逐渐起了变化，新移民在人数方面最多，但老移民仍是华社的核心，他们创办的侨团、社会组织等，努力帮助新移民更快地在美国站稳脚跟。新老移民的团结与合作，给华社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每一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一波波涌到美国。换言之，一般通过合法签证入境、并取得合法居留身份的华人，平均素质都很高。

       近20多年来，不少华人先是到美国留学或工作，生活稳定后再把家人申请过来团聚。于是，许多青少年成了洋插队，他们通常在原居国受过小学教育，到美国后继续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他们大部分都能掌握中英双语，毕业后通常能顺利地在主流社会觅得好工作；不过，也有一些青少年因始终无法突破语言障碍，或不喜欢美国文化，只有留在华人圈中发展。

       美国的华人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60至70年代，台湾留学生人数遥遥领先；但现在，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已成为最大的华人留学生群体。

       来自台湾的魏宏利于1969年到美国留学，现在已在美国开枝散叶。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有学历也有能力，毕业后是否留下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大家开始是边做边看情况，后来，家庭、事业和朋友都在这里了，也就不再想离开。”

       对知识分子来说，美国拥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工作机会也比亚洲多，他们轻易就能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纽约第5大道是金融精英的大舞台，人群中不乏身穿名牌套装，一手捧着咖啡，一手拿着财报或公事包的华人上班族。他们看起来如此年轻、自信和容光焕发。在世界高科技重镇——矽谷（SiliconValley）,更是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科技人才。人们常开玩笑说，高科技公司产品的研发进度如何，就取决于公司的研发部门有多少华裔和印裔研发员。

       无论是新移民还是土生华人，他们在学术，特别是数理科的杰出表现已成公认的事实。从事金融、科技、医学等专业领域的华人众多，加强了“华人是数理天才”的形象。

       第一代移民通常还非常传统，未雨绸缪的观念很强。一名老移民说：“我们到美国后，一切从零开始，做任何决定都希望是能保障未来的。当子女择业时，我们会提醒他们兴趣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现实问题，比如收入、发展前景等等。”

金山唐人街上规模颇大的宝谦昌中药行第一代创办人钟北谦和女儿钟爱梅对唐人街感情深厚，他们都感叹唐人街已不如从前惹闹。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美国落地生根的时间越久，下一代的生活就越安逸，经济压力就越少。于是，不少士生华人，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人生观已从“未雨绸缪”变成“活在当下”，在择业时偏向以兴趣为主，许多人投身社会学、人文、艺术等领域，并取得了不俗成就。

       过美国教育的华人要晋身中产阶级或进入当地白人大企业工作并不难，但要在白人企业内有所突破，许多华人都认为会碰上“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玻璃天花板”指的是非白人在白人企业机构内，晋升到某个职位后便难以突破，如同被“玻璃天花板”狠狠压住。有人把它归咎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作祟。

一名从事金融业的纽约华人说：“金融业的高层极少看到非白人，基本上是白人男性的天下，连白人女性也很少见到，非白人要爬到管理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美国西部的高科技重镇——矽谷，却是一个更显开明和公平的天地。有人说，没有华人，就不会有矽谷。在矽谷开发初期，大批来自台湾和香港的高科技精英组成了强大的团队，创建了许多高科技公司，打造了矽谷在世界的盛名。1995年，杨致远创办的雅虎，更是创下了矽谷华人的神话。现在，矽谷每年评选出的“10大风云人物”，肯定少不了华人的身影。

       这些高学历、经济稳定的华人精英，一般都喜欢选择到郊区（Suburbs）或大城市（Metropolitan）居住，很多郊区原为白人社区，如今已被华人和亚裔一步步“占领”。华人解释说：“其实白人完全可以接受华人当邻居，只是如果大批华人或亚裔居民迁入的话，就会改变社区的形态，最明显的就是社区一定会繁忙热闹起来，华人商店餐馆也会越开越多，许多白人接受不了新环境便只好搬走。”今天，单一民族构成的社区在美国已很罕见，所谓的新兴“华埠”，一般都住着各族裔居民（以亚裔为主），只是华人居民占的比例最高而已。

       这几年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让有些华人精英萌起回流亚洲的念头，特别是近几年在美国毕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回流的意愿更加强烈。

       大陆留学生思璇在美国著名大学毕业后，即被纽约著名的金融公司录用，前途光明。不过，她却没有在美国定居的想法，她说：“虽然目前工作环境很好，公司也很用心裁培员工，但现在大陆也很不错，机会很多，发展空间更大，再加上父母都在那里，所以打算在这里累积经验后，就回国发展。”

       但也有一些华人持不同的看法，在矽谷工作的华人电脑工程师说：“亚洲的经济的确很有活力，但对喜欢研发的人来说，美国肯定是天堂，对只想赚钱的人来说，亚洲的吸引力或许会更强一些。”是走还是留，全看个人重视的是什么。

 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和身份是矛盾的，情感是复杂的。

       华人虽为少数族裔，但却不是弱势群体。他们在教育和经济上的成就与主流社会并驾齐驱，比非洲裔等少数民族优秀许多。

       对第一代移民来说，许多人虽然在法律上已成为美国公民，但情感上却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以及“华人”独特的身份。一名华人说：“虽然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在家乡还要长，但我还是很关心关于家乡和华人的课题。读新闻时总被‘华人或华裔’这个词吸引。我想，也许是华人常强调人情味，遇到来自各地的华人，都觉得是同胞，觉得大家都是血肉相连的。”

       但也有第一代移民对美国的认同很强烈，这一般都是在年幼的时候来到美国并在美国接受过完整教育的年轻人。一名年轻华人说：“我还不到十岁就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后来父母虽常带我们回乡探亲，但在家乡，人家看我的打扮，听我说话的口音，都把我当成游客，我自己也这么觉得，而每次飞回美国时，我却有一种‘终于回家’的感觉。”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及其后代，则能更自然地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这些土生华人的体型、气质、衣着打扮、语言、生活方式、思维、价值观、人生观，几乎已完全西化，但在文化传统上，仍保留着一些民族特性。一名华人说：“比如大部分华人都很务实、勤勉、能吃苦，追求有保障的生活，另一点就是华人家庭里依然注重孝道、长幼有序的传统精神。华人也很少会像白人那样直唤父母或长辈名字，还有，很多华人在结婚前和父母同住，也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

       旧金山华人文化协会曾在十多年前为华人青少年举办过“寻根之旅（In Search of Roots)”，让青少年回到祖辈的家乡，寻找家族的故事和根源。创办人麦礼谦和Philip Choy都是美国土生华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精通和热爱中西文化，贡献于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不忘宣扬中华文化。一名参与“寻根之旅”的中美混血儿说：“我知道我身上有一半华人血统，但一直觉得很虚无。直到我回到大陆，我才了解我的另一半，原来是与那片土地相连的。”

       尽管如此，在美国这个大熔炉环境下，华人除保留和发扬自身的文化传统外，在其他方面已越来越西化。虽然许多父母都怕孩子变成香蕉人，但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大环境影响，土生土长的下一代变为香蕉人几乎是大势所趋，时间越长，身上中华文化的元素也就越淡。值得欣慰的是，每年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为美国华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刘丽霞（Harriene Lu)和儿子Landon是地道的土生美国华人。刘丽霞的父亲刘显济是当年全美互助会主席，对华社贡献良多。如今已是祖母的刘丽霞鼓励自己的后辈们要学好中文，不能忘记华人的传统与文化

* *华人不只是为三餐劳碌，终日埋首苦干的小市民，也有许多华人勇于追求梦想，成为各领域的佼佼者。比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女作家汤亭亭、画家陈逸飞、钢琴家孔祥东、网球名将张德培、著名电视烹饪节目主持和中餐书籍作者甄文达等，都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优秀华人。*

  数百年来，华人总是属于较沉默、安分守己的族群。经历了漫长排华期后，大部分华人都全心全意搞经济，不问政治。

       华人真正开始投入政治活动，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开始的。当时许多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都是年轻有为的青年，他们受美国教育，英语流利，成立了政治、教育、文化、社工等组织，既为华人社区服务，也为华人争取权益，从而让整个华社逐步认识到，通过政治舞台发声，争取、改变华人在各领域的地位，可以为自身和下一代打造一个更公平和健康的发展空间。

       如果不是华人的积极争取，中文教育也不会发展得如此蓬勃。一名华人娓娓道出一段历史：“原本华人要学中文，只能到私人中文班去。1974年联邦高等法院裁定旧金山伽利略高中华人学生指控校方违宪，罔顾华人移民学生教育权利的起诉得胜，激起各地推动华文教育的热忱。”随后，美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中文教育发展得更全面和精彩。

       目前，全美学习中文的学生超过12万，有700多所大学和20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学习中文的学生中，三分之二是华人。

       2003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把中文列为大学选修课程（AP），一名家长说：“美国正努力培养具备流利中文能力的人才，以便提升美国在金融、商业、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如今已有超过7500人参加过中文选修课程考试，大多成绩良好。随着学习中文热潮的兴起，私人中文学校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已超过600所，学生来自各个族群。

       “中文热”不断升温，亚洲学会预计到2015年时，全美国将有75万名学生学习中文。一名教师说：“我们不怕没有学生，比较头疼的是教师严重短缺，目前共有将近10万个空缺，希望政府可以优先积极培训师资。”

       尽管中文教育的发展比起百年前进步了很多，但在全美9万多间公立学校中，提供中文教学的比例仍然很小。

   “中文热”也直接推动了中文媒体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中文报的数量和发行量都增加了三成以上。据统计，在华人人口密集的旧金山，有高达60%的华人每天阅读中文报。但也有华人说：“虽然中文媒体在这里发展不错，前景也好，但美国资讯发达，媒体超多，中文媒体在主流媒体圈中发出的声音依然还很微弱，还没能引起主流社会的重视。”

       美国宪法保障人人平等，但种族主义思想仍深藏在许多人心中。值得庆幸的是，美国社会对华人的认同和肯定，已大大提升。一名华人说：“以前好莱坞电影或美国电视剧中，华人多数演招待、厨师、派荷官等，要不就是功夫小子、神秘女郎。现在华裔角色也包括医生、律师、记者、高科技人员了，电影代表主流社会的观点，由此可见华人开始摆脱中低层形象了。”

       但华人受不平等对待的事件还时有所闻。譬如，在加省出生的美国华人关颖珊，在1996年及1998年均获得全美及世界溜冰赛冠军，但1997年泰拉立宾斯夺冠后，美国传媒MSNBC刊登的标题竟然是“美国人击败关颖珊！”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美国华人的感情。

       当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走马上任后，在美国的少数民族无不兴奋欢呼，而华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否会取得更大的突破呢？

       由奥巴马领导的新内阁，也是美国历史上拥有最多华人成员的一届政府，他们分别是商务部长骆家辉、能源部长朱棣文、白宫内阁秘书卢沛宁、白宫公共联络主任陈远美以及国家安全部法律总顾问提名人方富宇。

       其实从21世纪开始，华人已跻身内阁。2001年1月11日，在乔治布什总统提名下，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她是美国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人，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

       在200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华人又有了小突破。北加州有38名华裔候选人参选，余胤良当选为加州第一位华人参议员，马世云成为加州第一位女性华人众议员，而杨爱伦则成为纽约州议会的首位女性亚裔众议员。

       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何时华人才能当上总统呢？一名华人说：“有时候，华人的忠诚度总让人质疑，他们效忠的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许多华人仍保留传统思想文化，不像黑人，全情拥抱美国文化和精神，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的美国人，只有当华人真正把自己看成美国人，活得像美国人的时候，美国华社才会迈入另一段更精彩的旅程。”

* *1983年，美国华人终于等到了两位华人市长。陈李婉若从一名医院社工，成为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市长；黄锦波则从1978起担任美国喜瑞都市市议员，后成为该市市长。1996年，骆家辉在华盛顿州州长选举中击败共和党竞争对手，成为美国第一位华人州长。*

周敏教授是第一代大陆移民，现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系教授和亚裔研究学系首任系主任，出版多本著作，她说：“华人在美国不能说没受到歧视，但不必在意，一步一脚印去达到自己的理想最重要。”

     在排华时期抵达美国的华人，无不对“天使岛”（Angel Island）感到恐惧，它是移民局用来羁押亚裔移民的拘留所。从1910年到1940年间，共有17万5千名华人移民被羁押在此，短则两三星期，长则两年。

       华人在岛上数座简陋的木屋之中，等候检疫、盘问和审查。由于语言不通，沟通上经常引起误会，使华人深感委屈，仅能绝望地等待被释放的日子。

       这些失去了自由的华人在囚室内度日如年。由于囚室空间不大，拥挤脏乱，加上伙食不合胃口，令被囚的华人苦不堪言。有些华人选择自尽，有者精神崩溃，还有一部分人将悲愤的情绪化成诗歌，一刀刀刻在木墙上。

       在美国取消了《排华法令》之后，天使岛不再被用来收押亚裔移民，之后也逐渐被淡忘。

       1974年，在华人组织的争取之下，加州议会通过议案，成立“天使岛移民营历史公民委员会”。两年后，加州议会拨款25万美元进行遗址修缮。1998年，美国政府宣布天使岛为“国家级历史古迹”，并进一步进行保护和修复。

       今时今日，天使岛已经发展成一座风景如画的州立公园，吸引了大批美国人和游客在周末或假日前往参观，以了解历史。男囚室则被改建成博物馆，而墙上的诗歌也成最佳的历史遗迹。后来，华裔史学家麦礼谦更将这些诗歌译成英文，并附上解释，然后结集出版，使这一段华人移民辛酸史重见天日，广泛流传。

 布碌仑日落公园（Brooklyn Sunset Park）8大道是继曼哈顿唐人街和法拉盛（Flushing）唐人街后崛起的纽约第三大唐人街。华人说：“那里福州人多，超市多，物价便宜！”

       日落公园8大道华埠以8大道为中心，并在8大道两端，向3大道至13大道之间延伸。这个华埠占地不大，却住着超过10万华人，仅福州人就占了七成左右。一名居民说：“在这里，小小的地下室挤上10多名住客是很平常的事。”

       日落公园8大道华埠从无到有，充满传奇。19世纪50年代，它还是欧洲人的社区，因码头运输业而发展兴旺，60年代开始没落，居民陆续迁走，80年代时已如死城。90年代，由于此地房价非常便宜，又距离唐人街很近，许多在工厂打工的华人便开始陆续迁入，随着华人居民增加，华人商店越开越多，渐渐形成一个新的华埠。

广东人最早迁入，但现在已走得七七八八了，福建新移民已成为这里最主要的群体，人来人往，居民的流动量很大。

       这里也是纽约市出生率最高的地区，托儿服务总是供不应求。生小孩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小孩可取得美国国籍，第二是父母得到合法身份的机会更大，大人和小孩的未来都有保障。新移民一般把幼儿送回家乡让长辈照顾，小孩5岁左右再接回美国受教育。

       8大道华埠内有数十家超市，数不尽的餐馆、小吃店等，但只有约两成商店有盈利，余下的都在亏钱，不少商店经营了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但空置的店铺很快就出租成功。一名商家分析：“福州人爱创业，他们一般努力打工一两年，存够本钱就自资或和亲友合股搞小生意，自力更生。想开店的人不计其数，一家店倒下，转眼就冒出新的一家。”

       福建新移民重演了早期老移民的奋斗故事，虽无学历或特殊技能，但他们凭着吃苦耐劳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成功地在美国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早期到达美国的移民，都怀着黄金梦而来。今天，旧金山的金矿早已枯竭，美国许多城镇也并非遍地黄金，但向往美国生活的人，却仍源源不绝涌入美国，只因大家始终相信美国是一个可以圆梦的国度。

        美国是民主自由的象征，但当人们追求所向往的美国民主时，往往要付出许多代价，很多时候也离不开金钱和权力斗争。一位投身社区服务的华人说：「我每天仍看见许多不公平的事在发生，特别是发生在弱势群体、新移民身上。不过可喜的是，美国每天都在进步中，社会越来越文明，人民越来越包容和互相尊重。」

        在这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国度，华人正在满怀激情地追逐他们的梦想。

加拿大是一个美丽的国度，散发迷人的魅力，曾多次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

       到过加国的人，绝对无法忘记它那迷人的雪山、海滩、湖泊、枫叶等大自然美景。

       论国土面积，它仅排名在俄罗斯之后，为世界第二大国，但它毫无霸气，总是以谦卑温和的形象示人。它与美国毗邻，经济文化等都深受美国影响，但生活节奏却悠闲得多。加国三大城市——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Toronto）和温哥华（Vancouver），繁华文明，热闹却不喧嚣。

       加国地广人稀，70%的人民居住在毗邻美国的南部地区，其中又以东部和西部的人口最集中。每一年，不少青年才俊外流到美国深造或工作。

       加国在1967年推出“点记制度”（Point System），吸引高素质移民，但同时又提倡人道主义，对难民开放门户，是收留越南难民最多的国家。

       如今，加国每年平均吸纳25万移民，40多个民族中，英裔和法裔仍占多数，但中国已成为加国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据统计，温哥华的居民目前约过半数为少数族裔，预计到了2012年，多伦多的少数族裔也将超过该市总人口的半数。

       从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强烈的社会，发展成今日各族人民和谐生活的国度，加国人民谱写了骄人的故事。

加国总理在当日正式对曾向华人征收人头税一事作出道歉。

       当天，刚上任不久的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Steven Harper）在国会里用粤语郑重地说：“加拿大道歉”。语毕，全场登时掌声如雷，超过200名华人出席者情绪激动，并且感慨万分。

       委屈百年，努力斗争22年之后，华人终于等到了这迟来的道歉。

       由于“人头税道歉”事件，唤起了大家重新关注百年来华人对加国的贡献。很多华人新移民这才发现，他们今日的安逸生活来之不易，那是祖辈们用血和泪所换取的成果。

       中国与加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两国的贸易往来从1780年便已开始，比中美贸易还早了4年。当时加国出产的皮裘是北京官场中非常珍贵的服饰。

       1788年，一名英国船长带了一批华人木工来到加国后，据说其中一部分华人迁移到内陆去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不过，这一段历史始终缺乏详细可靠的记录。

       1858年，有人发现卑诗的弗勒泽尔河（Fraser River）中游一带有金矿，因而吸引了无数来自旧金山、夏威夷、澳洲和欧洲的淘金客，此事被称为“弗勒泽尔淘金狂潮”。

       华人淘金客自然也不落人后，许多原本在美国旧金山淘金的华人，很快地就乘船抵达加国。根据记载，从1859年到1860年之间，约有2000名华人由美国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和波特兰（Portland）登陆加国。

       1860年之后，有更大批的华人从香港和澳门乘船登岸，他们大多数来自珠江三角洲，主要是四邑（台山、开平、新会、恩平）人，到了高峰时期，全加境内的华人淘金客高达一万余人。

       因为大部分的华工都是单身汉，金矿地区的生活又苦闷不堪，导致许多矿工染上了赌博、抽鸦片及嫖娼的恶习。华人说，当年淘金未必会发达，反而是开赌摊或捞偏门的生意能够赚大钱。

       1880年，在加国建设横贯东西的铁路工程之中，有1500名曾经在美国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服务的华工被雇佣，他们从美国加州抵达加国后就即刻被编入测量队伍，成了开路先锋。整个筑路工程陆陆续续共雇佣了大约6500名华工，以泥水匠、石匠以及普通铺路工居多。

       华工经常被安排到最恶劣和最险峻的环境中工作。因坠崖、坠海、爆炸、积劳成疾等缘故而丧命的华工不少，至今仍然没有确凿的数据。据估计，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华工没有捱到铁路竣工的那一天。他们以本身的性命，为加拿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铁路于1885年竣工后，由于美国当时已经实施排华法案，那些来自旧金山的华工都无法返回美国。除了一些华工应招前往墨西哥继续修筑铁路外，大部分都留在加国。一些年轻力壮的华工涌往卡瑞布（Cariboo）金矿以采金为业，可惜当时采金业已经没落，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意，也有一部分华人在温哥华从事农耕或捕鱼工作。

1900年至1910年，温哥华华埠的上海巷和广东巷是华人活动的中心。后来该地段的建筑遭到拆除，繁华不再。1998年，中华会馆的安居楼、中侨互助会社会服务中心及温哥华华埠商会在广东巷旧址上兴建，重现昔日繁华。

 那段时期，整个加国共有约1万5000名华人。

       因当时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华人受到了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排斥。在这群人的煽动之下，联邦政府决定立法排华。

       政府先是通过《1885年华人移民法令》，试图用征收人头税的方式将华人拒于门外，在加拿大历史上，华人是唯一被规定必须缴纳人头税的少数民族。开始时，每名华人的税收是50加元，1900年，数额增加到每人100加元，而1903年则是每人500加元。华人所缴纳的人头税，总共为加拿大当时的国库增加了2300万加元的收入。

       到了1923年，加国又颁布新的华人移民法令，禁止华人入境。华人成为加国唯一拒绝接纳的族群。在接下来的25年中，加国政府接二连三地通过了其他排华法，例如限制华人从事的行业，剥夺华人的投票权，甚至禁止在当地出生的华人入籍等，沉重地打击了华人社会。

       由于受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挤，华人很自然地聚居在一起，结果就形成了华埠，也就是白人口中的“唐人街”或“中国城”。

       首个华埠出现在维多利亚（Victoria），接着在阿尔伯特（Alberta）、然后是在卡尔加里（Calgary）、埃德蒙顿（Edmonton）、里贾纳（Regina）、温尼伯（Winnipeg）、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地陆续诞生。华埠成了华人的生活以及经济中心，中餐馆、洗衣馆、社团、宗亲会馆等应有尽有，华人在这一个小圈子里自给自足，勤劳刻苦地过活。

       二战的一场浩劫，却成了华人在加国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华社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华人不该为加国出战；另外一派则视保卫加国为己任。最后，共有500多名华人参战，他们英勇的表现得到了加国的认同。

       二战结束之后，加国签署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7年正式废除排华法，不仅给了所有加国华人联邦大选的投票权，也同意让华人家眷以家庭团聚的形式移民加国，加拿大的华人终于迎来了春天。

       1967年，加拿大政府在重新检讨移民政策之后，实行了“点计制度”，一视同仁地对待各族裔申请者。公平透明的移民制度引来第二批华人移民浪潮，进一步改变了华人社会的风貌。在那段时期，移民至此人数最多的是香港人。

       60年代末，一些香港富豪带着丰厚的资产，以投资移民的身份登陆；70年代之际，香港掀起了留学潮，加国因为教育制度完善，生活费又比美国低，因而成了香港年轻人的留学天堂。当年的留学生如今多已成为专业人士或白领，当中有不少更在各领域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80年代中期，台湾移民也开始看上了加国这一块人间天堂，他们的移民高峰期则在90年代。

       当“97回归”的期限越来越近时，许多香港人患上了“97恐惧症”而选择移民，几乎是一夜之间，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变成了香港移民的天下。

       不过，如今人数最多的群体是中国大陆移民，他们虽然来得较晚，但是移民热情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2002年到2004年的颠峰期，每年都有3到4万名中国移民登陆加国，占加国接收移民总数的20%。这些中国移民大部分为技术移民，但随着中国经济起飞，目前中国投资移民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移民数量庞大，遍布于新旧华埠，由于立足时间短，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处于努力适应新环境，学习如何才能更快融入当地社会的阶段。相信假以时日，中国移民必将为未来的加拿大华社增添新的色彩。

* *1924年，为了反对拒绝华人入境的移民法的执行，华人商铺在加拿大国庆日——7月1日当天罢市，并称之为“羞辱日”。当天，华人社区禁止一切国庆庆祝活动，取而代之的是许多社团领袖以该法对加拿大华人的羞辱作为主题的公开演讲。*

李树德（左二）为多伦多展望青年领袖培训计划（Youth Vision)主席，他和一班理事都是70年代香港留学潮的一分子。

 目前，华人是加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主要分为四大群体——早期以劳工身份入境的第一代老移民及其后代；1967年后以投资移民、技术移民或留学生身份入境的香港移民和台湾移民；80年代后登陆加国的中国大陆移民；以及部分来自太平洋诸岛、印度、非洲、东南亚等地的华人。

       迈入21世纪，港台移民人数渐渐稳定下来，但中国大陆移民人数校然在每年持续增长，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大陆已成为加国目前最大的华人移民来源地。

       华人主要聚居在各大城市，其中70%的华人居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大多伦多地区（Greater Toronto）约有54万华人，居全国之冠，大温哥华地区（Greater Vancouver）也居住着约40万华人，此外，蒙特利尔、卡加利（Calgary）及爱明顿（Edmonton）等地也聚居着不少华人。行走在这些城市里，很容易让人有“华人多得无处不在”的感觉，其实，华人总数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4%。当地华人表示：“在离开城市两小时车程的郊区，就几乎见不到华人了。”

       80年代以前，华人主要经营餐馆、杂货店、洗衣店等小生意。80年代以后，华人逐步涉足房地产、石油、金融保险、旅游、国际贸易、通讯、能源及制造业等领域。土生华人及后期的年轻移民，多数拥有高学历和高技术，他们大都成为专业人士或在当地主流经济圈中就业。

       较之早期华人，如今华人的社会地位已明显提升，其影响力已渗透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领域。华语排在英语和法语两大官方语言之后，成为加国第三大语言。中华饮食为各族人民广泛接受，中华文化、传统习俗也得到了保留和发扬。

 广东老移民是早期加国华社的开路先锋，而香港移民则是现代移民的鼻祖。今天加国华人社会的生活模式，依然具有浓厚的香港痕迹。

       尽管关山远隔，香港移民在北美继续过着“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他们不止带来物质文明，连香港的文化和精神也一并打包过来，让香港饮食业、娱乐业、商业等在加国继续发扬光大。

       台湾人是中港台移民中最小的群体。台湾人向来移民美国多于加国，选择加国主要是为了家庭和子女。一个台湾妈妈说：“台湾流行办游学团，让家长和小孩趁假期来加国学英文，我们看到孩子学习愉快，又很喜欢这里的学校，最终在移民公司的游说下过来了。”另一名台湾移民说：“我希望带父亲一起移民，但听说美国不大接纳年迈老移民，而加国政策较宽松，所以我和父亲就来这里了。”

       台湾移民中，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人数差不多，多数拥有良好的经济实力，他们几乎一登陆就往大城市周边的高级住宅区定居。温哥华的素里（Surrey）已成了“小台北”，卡尔加里也出现了台湾移民聚居的住宅区。

       中国大陆移民来得最迟但人数最多，经济实力较薄弱的，多数会选择租金较低、华人人口较多的住宅区落脚；经济实力和语言能力强的，则倾向于在中上阶层住宅区安家，所以即使在台湾人和香港人聚居区，也有不少大陆移民。华人笑说：“现在左邻右舍和同事很多都是华人面孔，如果不说话，很难分得清到底来自何处。”

   受传统文化影响，华人对“家”的意识非常强烈，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买房子的冲动和憧憬。华人对房地产的热衷，直接推动了加国的经济发展。

       投资移民和经济实力强大的技术移民会大方花钱买房买地，许多经济实力一般的华人也会在出国前变卖原居国的产业，套换现金来加国置产。90年代，加国市场一度极为低迷，但华人移民面无惧色一波波涌入加国。华人资金的流入，带动了市场的购买力。一个房地产经纪说：“如果不是华人撑着，加拿大房地产早就崩溃了！”如今，在加国定居满3年的新移民，超过一半已购置房产，经济能力较好的，多数拥有几套房产供出租或转售。据统计，目前加国华人房东比例已高达75%。

       华人对房地产的偏爱使其成为华人投资额最大、增长最快的行业。目前，加拿大已有数百家华人房地产公司，香港富豪李嘉诚、郑裕彤、郭炳湘兄弟等都为大投资商，台湾的统一加拿大基金公司也在温哥华兴建了大量房屋。加拿大本地房地产开发商也非常关注华人市场，如加拿大顶级豪宅——香格里拉御庭，便把华人锁定为主要的消费对象。有人认为华人的投资促进了加国经济的增长，但也有人把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问题都怪罪到华人身上。无论是褒是贬，都足以证明华人在房地产业的影响力已引起社会关注。

       除去住宅房产，作为房地产业一个重要领域的商业地产，也得到华人的青睐。早在90年代，华人商场就一个个落成，如万锦市的太古广场、城市广场、列治文广场和时代广场等，内有数百家商店，已成为当地著名的购物天堂，投资商也获得了不菲的回报。

       在常年寒冷的多伦多市中心，街上人潮不多，商店显得冷清，但地下却另有精彩天地。市中心每个地铁站都附有地下商场，大小不一，华人注意到人流量很大，便或租或买了很多商铺，经营小生意。

       并不是每个华人都有创业的梦想，一般华人更愿意当上班族。土生华人或很小就在加国受教育的移民下一代，以及拥有高学历或专业技术的新移民，通常都能在主流经济领域中觅得一份优差。有人说，美国是逐梦者的天堂，而这里，则是安享生活的福地。

大陆移民以技术移民居多，尽管他们都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但很多人过不了加国在职场上设置的重重门槛。第一关是学历和专业资格，很多机构根本不承认大陆移民的中国学历和专业资格。第二关是语言能力。虽然大陆移民大都受过多年英语教育，但却未必能掌握工作领域中使用的“专业英语”。第三关最叫人头疼，就是加国经验。加国面试必问题——“你有本地工作经验吗？”对刚抵步的大陆移民来说，肯定是零分题。

       有人叹息：“能成功入境的都算是中国的优秀人才，但现在却像被抛上岸的鱼，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因此，入境后，新移民一般都要上英文为第二语言的培训课程（ESL），有些还要接受职业培训或专业技术培训。一名导师说：“两国国情不同，他们往往要从最基本的‘如何写求职信和履历表’开始学起！”

       由于加中两国职场文化差异太大，很多新移民初时都无法找到与专业相符的工作。为了生计，他们只能放下身段，从底层做起，甚至也有在中国当教授的，到加国只能从事劳力工作。在餐馆、面包店、工厂、商店等处，总是能看到新移民忙碌的身影。

       据估计，大约15%的大陆新移民长期处于失业状态，40%左右从事与原专业无关的工作，因此，许多人常会为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闷闷不乐。有的人打起了退堂鼓，回国发展，但更多的人展现了无比的毅力，坚持奋斗，相信自己的生活能最终得到改善。

       他们中以青年居多，部分已成家，子女都还很年幼。由于事业尚处起步阶段，全家都在加国的，一般会把子女送回家乡给父母照顾，但也有少数将父母接到加国一起生活和帮忙照顾小孩的。而最普遍的则是长期两地分居的，妻儿在加国生活，丈夫在大陆挣钱。

       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较高的一群，与主流社会接触和交流机会较多，周末时也会相约进行户外活动，如爬山、钓鱼等，但大部分人较封闭，通常只和背景相同的人往来，与主流社会及广东方言群体互动很少。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成立了许多同乡会或联谊会，通过一些定期活动如乒乓、羽毛球等运动联络感情，生活倒不寂寞。

       一年大苦、两年小苦，三年不苦。一般熬过3年，他们就能摆股“新移民”的身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价值观都会有很大的改变，也能更顺利地融入加国社会，好好地品尝加国的美好生活。

       “其实，每一个大陆新移民，无论过去背景多么显赫，在融入阶段，经历的过程都大致相同，差别只在于融入的时间长短而已。最重要的是如何去调适自己的心态，放下过去，珍惜现在、拥抱未来。”一名已适应新生活，在加国安逸生活的大陆移民说。

    加国是发达国家，生活富裕，但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却不及一些亚洲新兴地区。香港回归超过十年，繁华依旧，台湾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陆市场更成为人人想抢夺的大蛋糕。远在加国的华人移民，看着家乡越来越精彩，又怎会不心动呢？于是，便出现了“回流”和“太空人”现象。

       最近几年，“回流”一直是华人圈中的热门话题。吃饭聚餐，总会提到某人“回流”后生活如何，另一人又有“回流”打算等等。“回流”的多是正值黄金工作年龄阶段的男性，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或从事财经、金融的专业人才。

       保守估计，香港移民的“回流”人数目前已超过15万。在加国，香港移民的子女毕业后，要么就像当地年轻人一样，到美国发展，要么就在父母鼓励下，“回流”到香港找工作。很多年轻人原本就在香港出生，尽管在加国长大，但根还是在香港。他们常随父母回香港度假探亲，在他们眼中，那是一座活泼动感的城市，比加拿大更加充满活力，正适合押上一注青春去体验一番。“论生活，加国比香港舒服，但在加国要找到合意的工作并不容易，而且税收很高。趁年轻到香港闯几年，学习点经验，我想是值得的。”一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说。

       台湾移民“回流”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他们人数本来就不多，现在更显得有点冷清了。有些台湾移民回到台湾生活，有些则进军大陆市场。“一些朋友把房子都卖掉了，举家“回流”，走得干脆利落，不过加国国籍倒是还保留着，退休后还可以回来养老。”一名太太说。

       大陆移民虽然最迟抵步，很多依然还在努力扎根，但“回流”现象也出现了。随着大陆近几年经济腾飞，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收入大增，不少人决定回大陆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舒心过日子。甚至有一些移民尚未迈出国门，就早已做好了日后“回流”的打算，在他们看来，离开是为了日后能更好的回来，把学到的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现代管理经验等带回国去大展拳脚。另外，也有少部分独生子女，为了承担起奉养父母的责任，最终放弃移民身份，回乡团聚。

       也有些移民选择短期“回流”，他们认为生活还是要在加国，但赚钱则要到亚洲去，因此华人移民家庭里常出现“太空人爸爸”或“太空人丈夫”。一般是男性回亚洲打工或做生意，赚钱供养在加国的妻儿，女性则在加国当陪读妈妈，照顾孩子并打理家务。许多家庭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团聚一次。

       “太空人”现象带来了不少家庭问题，比如家人感情疏离、夫妻其中一方有外遇、孩子无法得到健全的爱等。一名移民说起他身边遇过的一个例子：“一名‘太空人爸爸’钱挣够了，几年后终于回来和妻儿一起生活。孩子竟然问为何这次爸爸住了这么久还不走？”不仅小孩无法理解为何父亲总是忙碌飞行，加国主流社会对华人一家分散生活的情景也觉得惊讶。

       华人移民笑说：“科技发达，只要走上飞机睡上一觉，就到老家了，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全部直航。”今天，中港台移民已不再把移民看作一条单程路了。

华人父母通常都为了下一代而选择移民。和亚洲高压的教育环境相比，华人子女在加国的学习更轻松，并且更能发挥所长。一名母亲说：“我孩子在台湾念书念得很吃力，所以我决定移民。来到加国后，一切好转。刚开始她英文不好，考试写不出就用画画作答，老师竟然接受，孩子信心大增，功课进步得很快。”

       加国的学校在每个学期结束时，都会贴出荣誉学生名单。留心一看，优秀生中一定有几个华人名字。加国不设大学入学考试，平日成绩最重要，到了中学12年级，分数优异者，大多在12年级第一学期就获得大学录取通知，毕业后直升大学，几乎每个华人家庭里都有一个大学生。

       华人子女不仅在学业上有骄人的成绩，在加国教育体系的长期熏陶下，他们最终也变成反对种族歧视、提倡公平民主、拥抱加拿大价值观的“色盲”新一代。

       坚持“多元文化和谐发展”是加国的一项基本国家政策，学校从小就教育各族学生尊重包容，和平相处。课堂如一个小型加国社会，各肤色小孩都有，所有人必须使用英语，以小组合作形式上课，每次都换拍档。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指定读本都以自由、民主、包容、反对歧视为主题。

       “我们的下一代都会成为‘色盲’的一群，他们对各族裔都一视同仁。异族通婚也会越来越普遍，所以到了第三、四代，不仅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会完全西化，外在的华人特征也会渐渐消失。”一名华人家长推测。

* *第一个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名叫温金有，他在1861年出生于卑诗省的格拉斯堡，并且在新西敏市长大，曾经当过劳工代理、之后学习法律。他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粤语、客家话及原住民方言。他曾为温哥华法庭担任传译员，也当过中华会馆的英文秘书。*

      华人家长总希望子女考上名牌大学里的热门科系，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无忧生活。一名华人笑说：“我们最爱的职业，总和‘师’字有关、像医师、药剂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律师等。”但也有不少年轻华人选择进入一些“非热门”领域，如学术研究、艺术、文化、非盈利组织等，把兴趣发展成自己的事业。

       第一代移民在加国落地，根却始终扎在家乡的土里。很多人即使完全适应了加国生活，但情感上的融入还是有落差的。有人这么形容：“即使已习惯了小声说话，任何地方保持一米间距排队，和洋人一样过长周末，但还是喜欢吃中餐，情急时最先吐出的还是家乡话，而不是英语。”

       而“色盲”的新一代，有些在加国出生，有些则在幼童或少年时期就随父母移民过来了。来得越早，对加国的认同就越强烈。有的在父母的熏陶下，对家乡略为了解，爱吃也会烧几道家乡菜，在家和父母说家乡话，与家人过传统节庆，走出家庭，他们就换上加拿大人的身份，在主流圈中游刃有余。

       有人说，这批人是边缘人，夹在中西文化间，身份矛盾；也有人说，这批人何其幸运，正好汲取了中西文化最优秀的部分。

       那些在当地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则“色盲”得更彻底，特别是来自已在这里落地生根好几代的家族成员。他们全心全意地拥抱加拿大社会，对中国的感情有点疏远，是多元文化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和当地人一样，逢周末就喜欢去户外活动，或当义工。

       他们被“讽刺”为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但是，正如一名土生华人所说：“其实我们觉得‘加拿大人’和‘华裔’的身份毫无冲突。虽然我不能读写中文，但并不妨碍我去理解家族历史和中华文化。在我们加拿大人眼中，各肤色的人都一样，我们都用英语沟通，都能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兼容并蓄，各民族一律平等。”

90年代，新登陆的港台移民对中文媒体非常依赖，不少人天天追看家乡新闻及发展动态，有港台背景的大型报刊集团如《星岛日报》等，便迅速抢滩加国市场，目前仍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中文报纸之一。2003年时，全加华文报刊已达50多家。后来，大陆新移民也加入办报行列，不少以广告资讯为重的免费报也加入战围。

       电视是小孩的成长良伴，不少华人移民家庭平日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视节目。当地的多元文化电视台（OMNI）设有少数民族移民频道（OMNI2），专门制作和播放中文节目。

       1993年，全加很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新时代传媒集团”成立了“新时代电视”，总部设在温哥华，另在多伦多和卡加利设有分部，通过有线电视和卫星传送，为华人提供精彩及时的电视节目。它网罗了亚洲最新和最受欢迎的剧集、资讯娱乐节目、时事节目，同时还制作本土华人节目，如举行“华裔小姐竞选”和“新秀歌唱比赛”等。许多土生土长的香港移民子女笑言，今日仍能说一口标准粤语，电视节目绝对居功不少。

       除了中文电视，华社每日的生活更有中文电台陪伴，如多伦多中文电台、多伦多第一台等。经过唐人街、新兴华埠或华人商店，总听到收音机传来熟悉的中文歌曲和资讯，如同置身亚洲。

       随着科技的发展，中文网上媒体也大行其道，深受年轻人欢迎。中文报章成立网站，中文网络电视、中文网络电台，中文网络论坛、电子报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甚至连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也开通了中文网页，为中文读者群提供最新的国内外新闻资讯。

       有人说，随着华人下一代的中文能力逐渐退化，还有第一代移民适应加国生活后，也趋向从英文主流媒体吸收资讯，中文媒体市场将会日渐萎靡。但是，也有人认为，只要每年依然有不断涌入的大陆移民，中文媒体就能始终拥有自己的生命力。

       一名社区义工也说：“华语已经成为加国的第三大语言，仅排在英语和法语之后。三四年前，我们办讲座，通常以英语和华语为主，现在只需用华语！”语言使用的转变，反映出华社结构的变化。大陆新移民作为最大且不断成长的华语使用群，将保证中文媒体始终有自己的稳定的支持者。

       虽然加国鼓励各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但是如何去推广传承，都要靠各自的努力和坚持。多伦多教育部教育委员谭润棣回忆：“70年代，多元文化政策刚开始实行时，华裔、非裔、葡萄牙裔和希腊裔家长一同要求教育部在公立学校设立不同族裔的语言课程。因为很多小孩去公立学校后，只说英语，回到家无法与父母沟通，严重影响了家庭关系。很多白人家长反对我们争取，认为各族裔语言的学习应该由各族裔私下筹办，不应该动用公费。”所幸各族裔家长团结一致，最后诉求成功。

       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公立学校都设有华语课程，一些省份还从幼儿园到12年级都为华人学生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目前全加选修华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人数已达数千人，其中也包括一部分非华裔学生。

       为了加强孩子的华语能力，不少家长都在课后或周末把孩子送到私人办的中文学校去进修。这些中文学校多数由中、港、台移民开办，在华人人口密集的温哥华和多伦多，华语教育发展较成熟，学校设备也较完善，教学也很认真。随着“汉语热”在全球的升温，前来学习华语的非华裔学生也逐渐增多。

一名老师说：“近几年，很多不会说华语的土生华人，也纷纷报读华语课程。现在，市场上说华语的顾客越来越多，许多服务行业都需要聘请能说华语的职员，就连主流社会中的不少律师、银行职员，都来抢着学华语呢！”

       在海外办华语教育的挑战，主要来自经费、师资和教材三方面。中文学校自给自足，大部分经费来自于学生的学费。大部分教师也在原居国有教学经验，到加后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近几年来，大陆、台湾等地出版的海外华语教科书越来越多，选择也比以往丰富，“不过，我们仍希望能出版一些针对加拿大华人的教材，这样，学生学习起来才不会觉得陌生而缺乏兴趣，也能把加国的华语教育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一名教育工作者说。

  加国生活舒适，福利完善，社会公平友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整体上对名利看得很淡，华人也深受影响。这让习惯为生活奔波的华人，学会放慢脚步，学会思考人生的价值，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虽然历史上曾发生过排华事件，种族隔阂还依然存在一些人的心底，但整个社会风气对来自各国的移民是欢迎的，人民也乐善好施，制度层面更加开明，对移民一视同仁。这样的环境，令许多华人深为感动，也就很自然的有了回馈社会的想法和行动。

       来自东南亚的华人难民，则更对加国充满感恩。加国是世界上收留难民最多的国家，它给许多绝望的人一个重生的机会。印尼华人移民温始庆夫妇感叹道，“每次到印尼探亲时，我们心里总会忐忑不安，但飞机飞临加拿大上空时，就会有一种‘回到家’的温暖感觉。”

       卑诗省本纳比（Burnaby）李灿明议员愉快地说：“在加生活38年，最大的收获是透过社区服务，丰富了自己的生活。”6年前他与本纳比志愿者一起创办了‘本纳比志愿者嘉年华’（Burnaby Festival of Volunteer），以嘉年华方式让非盈利组织设立展览摊位招募义工。他从不忘记自己参政的最大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华人还有很多，全加第一位华人督察源植勉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最值得欣慰的事，是他成功以警察部队的名义，创办了边缘少年基金，协助边缘少年走出困境，并让他们申请奖学金来求学。一直到今天，他仍常受邀到各大专学府给青少年开讲座。他强调：“华人一般对社会责任的概念比较模糊，尤其年轻人生活安逸，忘了要为社会出一份力，我希望我能灌输这个观念给年轻人——履行你的社会责任。”

   以前，市中心的唐人街一带是华人生活和活动重心。一名华人回忆：“90年代，唐人街很热闹，后来大家生活改善之后，都陆续搬走了。”今天，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老唐人街上经商和居住的主要是越南华人、经济实力一般的新移民以及一些年迈的老移民，其他华人也许只在唐人街举行庆祝活动或与亲友聚餐时，才到此一游。

       大部分华人都选择居住在环境清静或附近有好学校的中高级住宅区。因此，不少原只有白人居住的社区，华人住户也慢慢多了起来。而华人与白人最不同之处，就是华人除了对居住环境有所要求外，也希望起居饮食生活等方面都方便，所以，随着华人人口渐多，华人饮食店、中药行、杂货店等也逐步进驻社区。白人居民察觉居住环境有所改变后陆续搬离，于是，白人社区就慢慢地演变成了新华埠。

       随着登陆加国的华人新移民数量不断增加，类似情况不断循环复制，新兴华埠也就越增越多，如多伦多的万锦市（Markham）、斯卡布罗（Scaborough）、温哥华的列治文（Richmond）等，都是有名的新兴华埠。

       新兴华埠一个接一个冒起，一个比一个精彩繁盛。华人说，在那里行走，看着熟悉的方块字，听着亲切的乡音，会浑然忘了自己身在万里之遥的异乡，必须把视线调开放远，看到明湛湛的蓝天，宽阔的视野，才能告诉自己：我已站在北美的土地上！

       在新兴华埠的街道上，以港式、台式或大陆式命名的各类华人商店应有尽有，甚至还能看到日韩商店，以饮食店数量最多，且最能体现中港台三大群体不同的饮食特色。香港茶餐厅经济实惠，台湾珍珠奶茶餐馆情调佳且食物精致，而大陆移民办的小食店或餐厅，则充满了浓郁的家乡风味，物美价廉。

    在原居国被视为精英、人才，但移民后面对失业等困境，意志消沉而觉得自己是最失败的移民例子的，不仅仅是大陆移民，香港、台湾乃至各地的各族移民，都有过相同的经历。为了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重新树起对生活的信心，一批热心的香港移民以“过来人”的身份，成立了中侨互助会（S.U.C.C.E,S.S），给予他们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中侨互助会成立于1973年，主要是帮助新移民适应新环境，尽快融入加国社会。今天，它已成为卑诗省规模最大的华人社会服务机构，在大温哥华地区有23个服务中心，共有400多名员工，能以22种语言提供服务。业务包括：移民安顿、保健、就业、语言和职业训练、商业及经济发展、权益维护等。多年高质量的服务让他们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是不少欧洲国家在策划社会服务组织时的参考。

       执行董事谭阜全说：“目前，我们正和一些新移民一起推动一个名为‘Gateway to Asia’的计划，利用新移民对原居国的认识和人脉，协助加国商人把产品推销到亚洲去。我们也提供再培训计划，让那些专业人士，重返他们相关的领域工作，而不是变成劳力工作者，荒废他们的技能。”

       1998年，中侨互助会创立了青年领袖培训计划（Youth Leadership），发起人之一董达成说：“我们会对有兴趣的华人青少年提供半年左右的培训，让他们学习各种沟通、策划和领导技能，同时帮助他们加强资讯吸收和辨别能力，拓展人脉，让他们能自信地面对人生，长大后也能担负起回馈华社，服务社会的责任。”

       中侨互助会深受新移民的尊重和拥护，它是加国华人的一大成就。

中侨互助会是一个由华人管理的非盈利组织。“我们希望华人可以把经验带回亚洲，协助当地居民筹办民间社会服务机构。”互助会执行董事谭阜全说。

 1979年，加国电视台（CTV）曾引发一场风波，让大家真实地感受到种族主义并不是修改法律后，就能马上消除的。在他们制作的电视节目“校园大平卖（Campus Giveaway）”中，提出大学学府充斥太多“外国学生”，剥夺了本土学生的学习机会。当节目提到“外国学生”时，播出的是华人学生专心听课的画面。

       而在当时的华人学生中，拥有加拿大国籍的土长华人很多，但电视台却带着歧视眼光，把非白人一概当“外国人”看。节目播出后，立即引起了华人社区的公愤，为反对这起主要针对华人的歧视，全加华人协进会（简称平权会）应运而生。在其他族裔的支持下，平权会经过艰难的上诉，终于迫使电视台公开道歉。

       1984年开始，平权会又代表人头税受害者和家属，要求政府作出道歉和赔偿。经过22年的奋斗，加国政府终于在2006年正式道歉，至今，大约有800个受害者得到了赔偿，平权会将继续努力协助和监督政府完成整个赔偿计划。

       如今平权会的27个分会遍布加国各地，除了为华人争取权益，他们也关注其他社会课题，如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家庭暴力，以及推动种社会发展计划。

平权会总干事黄煜文说：“我爷爷缴过500元人头税，排华法案分隔了很多华人家庭，我们家直到二战后才团圆。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华人已成为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而不再是遭受歧视或排挤的弱势群体。

       与此同时，华人社会本身也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它比从前更加多元和复杂。只有华人才能够理解和体会每个地域的华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生活习惯，他们在抵步后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

       已落地生根的老移民和已融入加国社会的港台移民，早已作好准备，他们透过各类社会组织，背负起协助新移民融入加国生活的重任。

       这复杂和多元的华社虽充满变数，但华人皆团结一致，坦然迎接一切新挑战。

 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北邻美国，南接危地马拉与伯利兹，东临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西南濒太平洋。

       墨西哥的天然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金、银、铜等矿产，尤其是白银产量居世界之首，被称为“白银王国”。工业发达，制造业尤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盛产小麦、玉米，渔产丰富。旅游业发达，是世界旅游大国。

       墨西哥是文明古国，玛雅（Mayan）、阿兹特克（Aztecs）和托尔特克（Toltec）文化曾在这绽放出万丈光芒。它曾被西班牙统治长达300年，1821年宣告独立。

       1917年墨西哥颁布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将国名定为“墨西哥合众国”。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起连续执政，71年后终于轮到国家行动党上台，执政至今。

 1565年，随着西班牙征服马尼拉（今菲律宾首都）后，开展了与墨西哥的帆船贸易。一批当海员、技工和富豪仆役的华人，跟随着西班牙人，乘坐马尼拉帆船来到远在西半球的墨西哥。

       经过了数个月的航程，他们到达墨西哥的繁忙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初时，这批华人当中，除了一部分人在港口造船，还有一些人在墨西哥城经营理发、打铁、裁缝、铸银等生意，其中又以当理发师的居多。当时的墨西哥人都亲切地呼唤他们作“拜山那”（Paisano，西班牙语意为“同胞”），双方关系非常融洽。

       然而，华人理发店的生意蒸蒸日上，却挑起西班牙理发师的妒火。后者于是上诉西班牙总督，要求当局限制华人理发师的业务。尽管没有引起任何种族冲突，却多少预示了华人在这个国家坎坷的命运。

       200多年来，帆船贸易持续不断，直至19世纪初贸易结束，墨西哥的华人虽然有增加，却没有形成庞大的群体。不过，他们聚集和做生意的地区，已形成了一个小型商业圈，也是今天墨西哥城中国街的前身。

       帆船贸易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间，华人人数一直都没有显著的增加。直至1864年，墨西哥才迎来了第一批契约华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修筑连接美国与墨西哥的铁路。这批华工绝大部分是来自广东中山和四邑（台山、开平、新会及恩平），不但任劳任怨，而且不畏艰辛，深获雇主的赞赏。于是，雇主引入了第二批华工，并将他们派往矿场工作。

       数年之后，陆续登陆而来的华工几乎遍布了墨西哥的各行各业，如棉麻种植业、伐木业等。许多老板宁可聘请勤劳又便宜的华工，也不聘用当地人，结果导致越来越多当地人失去生计，怨恨也在他们的心中慢慢滋长。

       其实，抢了当地人饭碗的华工，日子也不好过。在开凿隧道或修筑铁路时，热死或累死的华工不计其数。历史上那一座座的枉死城和中国人山（Cero De Los Chino），就是华人在墨西哥奉献生命的见证。

       1910至1917年，墨西哥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期间，一些稍有积蓄的华工便借机转行从商。他们也租地种菜、经营小工厂杂货店等业，生活逐渐好转。

       不过，另一群华人则就没那么幸运了。居住于托雷翁市（Torreon）的华人就因为日渐富裕而招人嫉妒。1911年，托雷翁市303名华人被杀害的惨案，轰动了整个墨西哥华社。当时，正在店里做生意的华人，突然被士兵一个个拖出店外，捆在一起，让马匹拉着游街示众，直到他们皮开肉绽而死，场面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当地人也冲入店内掠夺烧杀，华人人财两失。那些逃过劫数的华人，莫不想尽办法离开此地。

       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恐慌，不仅造成墨西哥陷入财政困难，也令数百万人失业。华人又成了代罪羔羊。当局通过排华法案，规定华营商店内若需聘请十个员工，只能有一个是华人，这造成大批华人失业。

       那时，暴民常常在光天化日下抢劫华人店铺。当地军警也多方刁难，常常借口检查华人“居留证”，只要抓到没有居留证者，便立即驱逐出境。华人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能离开的都走了。1931年，墨西哥的华人人口从高峰期的4万6000人滑落至2万5000人。

       3年之后，排华浪潮终于告一段落，但是，总统卡德纳斯（Cárdenas）上任后却仍然限制华人入境。一直到了1944年8月，中国和墨西哥签署友好条约，两国的人民才能自由出入，也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对立局面。

* *在墨西哥城的市中心有一座高约15公尺的中国钟，是墨西哥华人在1910年为了纪念墨西哥独立战争100周年而集资修建的。*

    在20世纪50年代末，墨西哥政府曾一度放宽华人移民家属到此地来团聚的条件，并且允许约3000名持“难民证”的华人从香港入境。70年代以后，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则从中国以旅游探亲的名义进入墨西哥，再设法办理居留，然后找机会申请入籍。

       然而，不少华人在旅游签证到期之后，却仍然无法取得合法的身份。他们从此就只能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有钱的华人则选择买假出生证来掩饰自己的身份，以致原来姓周的变成姓Vianito；而姓刘的华人购买到姓李者的出生证，便从此改姓李。这样的现象持续到80年代末。

       一直到90年代初，经过墨西哥西北地区华社与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向墨西哥当局多次交涉，才解决了近万名华人合法居留问题。当地华人把这次的行动称作“大赦”。

       当时积极支持“大赦”的墨西哥房地产发展商甄英伟说：“政府同意让华人取得合法身份的消息，让我们非常振奋。在仪式举行的那天，住在墨西哥各地没有合法身份的华人，都涌到墨西加利（Mexicali)。那天的人好多，差不多有一万名。”

       这次的大赦对华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认可了华人对墨西哥的经济贡献，也是对华人社会地位的肯定。

1990年，墨西哥政府让约一万名华人取得合法身份，甄英伟与当时的墨西哥总理握手。（照片由当地华人提供）

 据墨西哥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Confederacion General de Asociaciones Chinas en Mexico，A.C.)统计，目前墨西哥约有6万名华人，他们主要说普通话和广东话。另有约40余万的混血华裔，则是早期华人移民与当地人通婚的后代，他们已不会说华语，只会说西班牙语和简单的英语。

       对华人颇有研究的甄英伟，将这里的华人大致划分为四类：第一类由来这里不超过20年的打工族组成，占总人数的八成。第二类是开小型中式快餐店的夫妻档或合伙人，占一成。第三类是有能力开连锁中餐馆，或从事私营行业如房地产等的，只有7%。第四类只占3%，他们多是拥有大量产业的家族企业成员。

       墨西哥的华人目前大部分居住在西北部、北部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城镇。其中以毗邻美国的两个城市墨西加利和蒂华纳（Tijuana）的人数最多。其次是首都墨西哥城、北部的华雷丝城（Juarez），以及东南部边境的塔帕丘拉（Tapachula）等。

墨西哥城地处海拔2260公尺的高原，没有冬寒夏暑，终年云淡风轻，气候凉爽。这里的华人约有一万名，以广东四邑移民为主，其中大部分是台山人，一般经营餐馆；北方中国人、香港人和台湾人则多数从事批发贸易，也有少数在大学任教。

       西北部城市蒂华纳的华人人口约7000人。而在沙漠中建起的下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墨西加利，干燥炎热，地面气温最高可达摄氏50度，最低35度，居住着6000名华人。这两个城市的华人，90%都开餐馆，以来自台山和恩平居多。

       粗略估计，全墨西哥包括自助餐馆、快餐店和火锅店在内的中餐馆超过2000家。这里的餐馆有高、中、低档次，不过还是以低档次较多。在首都墨西哥城的主要街道上，常见装潢简陋的中国小餐馆，一般设有四五十个座位，大部分为新移民所经营。业主有夫妻档，也有父子档。在收银台前多摆着“金蟾蜍”、“招财猫”及一些具中国特色的小饰品，有的餐馆也兼卖中国小商品。

       一名经营中档次餐馆的华人说：“墨西哥人从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接触中餐，对他们来说中餐已不是外来食物，反倒是每日不可或缺的主食。”上馆子吃中餐对当地人而言，一周少说也要去好几次。

       花钱大方的墨西哥人，不管是平日还是周末，只要有机会，就会到华人自助餐馆，享用要价75到80比索的丰盛早餐。食量偏大的他们，除了可以选用炒饭、炒面等主食，也可以吃到糖醋排骨、酸甜肉、炸虾球等菜肴。为配合墨西哥人的用餐喜好和时间，餐馆一般从上午8点开始到午夜12点；一些自助餐馆也提供午餐和晚餐，价钱从90至100比索不等。除了自助餐，这里也有高档次的中餐馆，让顾客随意点菜。

       由于墨西哥人经常光顾，中餐馆的生意一般不会太差，就算是面对同业竞争，华人也从不担心。毕竟每家餐馆都有自己的熟客，墨西哥人吃惯了一家餐馆的菜肴之后，就不愿“移情别恋”。

       只是，当地人口味偏甜、偏咸又偏辣，无论吃什么都要配上大量的辣椒酱和酱油，再挤上柠檬汁，才能吃得开胃，因此没法接纳原汁原味的中餐。墨西哥人虽爱好中餐，点起菜来也似模似样，却搞不清楚什么才是正宗口味。也因为这样，中餐馆老板深知留住墨西哥客人的秘诀，就是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辣椒酱、柠檬和酱油这三宝。而华人厨师早已习惯做变样的中餐。起锅前多加一勺糖，也成了特定动作。

墨西哥中餐馆最常见的装饰品就是大红灯笼和对联，有些女服务员还穿旗袍招待客人。

由此看来，墨西哥华人已经不在意中餐做得是否正宗，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融合当地特色，做出当地人可以接受并广受欢迎的中餐。

       墨西哥中餐馆不仅可以宣扬中华美食文化，它也是很多华人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大部分大陆华人刚到墨西哥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餐馆打工，一般可领取5000到10000比索的月薪，住宿和三餐由老板提供。

       他们每日辛苦工作，一般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偿还雇主从中国申请他们过来的债务。之后他们开始累积资本，数年之后便可自立门户开设快餐店。

 其实，大多数华人来墨西哥的时候，都怀着同一梦想，就是：“到美国去！”只不过，有些人很快就能达到目的，有些人用了一辈子的时间也只能原地踏步。但许多抱有美国梦的华人，在这里呆久了之后发现，这里其实可以拥有另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在墨西哥要申请美国签证，除了经济能力之外，有没有墨西哥国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墨西哥唯一的华人律师阚凤芹（Kan Feng Qin）对此作了解释：“入籍成为墨西哥公民有很好处，首先领取得墨西哥护照，申请美国十年签证较为容易。911事件前，有些条件好（如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的墨西哥公民可直接拿美国绿卡，享受去欧盟国家免签证的待遇。其次是成为墨西哥公民对做生意、旅游和生活上都有诸多便利，所以申请入籍成为许多人的愿望，特别是拉美裔和打算在此长住的亚裔。”

       不过，墨西哥政府近年来在入籍政策上做了重大调整。当局要求申请者从非移民FM3签证（No Inmigrante-FM3）转成移民FM2签证（Inmigrante-FM2），把入籍申请期延长了3至5年。在取得FM2签证后，待时机成熟便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卡（Inmigrado），然后才能申请入籍。入籍过程也不简单，必须经过口试、唱国歌、然后是100道西班牙外语问答题笔试。这些题目包罗万有，涵盖了墨西哥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地理、政治、经济、贸易等。

       屈指一算，要从外国人成为墨西哥公民，几乎要等上十年的时间，入籍后能否获得美国签证还是个未知数。就算获得美国绿卡，也要在美国住满15年才有机会申请入籍美国。因此，有人打消了往美国生活的念头。他们开始觉得：“或许留在墨西哥也不是件坏事。”

       “在墨西哥舒服多了，去美国说不定还要替别人打工，连生意都没法做。留在这里，我还能雇几个工人，生活压力也没那么大。”一名在墨西加利开中餐馆的老华人比较他在两地的生活经验。

       经常往返墨西哥与美国，家住蒂华纳的林先生说：“墨西哥人热情友善，如果我的车子在路上抛锚，路过的车子不是停下来帮忙，就是摇下车窗问是否需要帮我打电话。要是在美国，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有人来帮我啊！”

       家在圣地亚哥（San Diego），从广东台山来墨西哥已有20多年的蒂华纳鲍鱼大王黄沃沛（Wong Yon Pon)说：“我老了还是希望在美国安享晚年，所以我会参加入籍考试。”也是蒂华纳华侨协会主席的他表示，入籍美国后，就能享有跟美国公民一样的福利。由此可见，还是有许多华人没法放弃美国梦，他们依然眷恋美国。“美国社会福利好，就算是穷人也不会饿死，治安也没有墨西哥这么坏，生活过得比较安心。”

       那些已入美籍或持有美国绿卡的墨西哥华人，基于经济、福利、子女等方面的理由，多在美国购置房产。因此，住在两国边境城市的一些华人就形成了“白天在墨西哥上班，晚上回美国住宿”的生活方式。他们持有美国绿卡和墨西哥公民两种身份，可自由进出。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限于华人，许多墨西哥人也是这么过日子。

       对于每天都必须两地奔波，华人已习以为常。黄沃沛不假思索地表示：“久了就习惯了，我每天从美国的圣地亚哥开车到墨西哥的蒂华纳只需十分钟，而且有快捷卡，刷一下就可过关，很方便，可以省掉排队等待的时间。”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因为在美国有生意，有些是孩子在那里念书，才需要常常两头跑。

* *墨西哥人喜爱的“捧钱青蛙”，据当地华人说是从中国民间流传的“含钱蟾蜍”演变而来，摆在家中或店里，能招来财富和好运。*

       其实对墨西哥华人来说，墨西哥是个可以赚钱的地方，美国则是个安居的乐园。两个国家他们都喜欢，但是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最接近理想的生活方式。

墨西哥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也令人烦恼。墨西哥的基础教育并不健全，经济能力较好的华人尚可把孩子送到美国或法国国际学校去就读，但大部分华人却只能将孩子送往公立学校受教育。

       刚从广东台山到墨西哥城不久的赵姓女孩，因为父母都是打工族，每月薪水加起来还不到两万比索，她只好到公立中学求学。对于公立学校的教学方式，她感到难以适应。“我在这里只上半天课，上课时间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一点。上课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不专心，聊天的聊天，画图的画图，很多人迟到。我自己上课也不开心，因为还不太明白西班牙语，很多东西都不能了解。”

       她坦言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中国的教育方式，虽然很多课文要背诵，让她承受很大压力，但总好过这里，连想专心上课都很难。不过也有小朋友很享受这里的教学方式。来这里一年多，在墨西加利上小学六年级的小男生，笑容满面地说：“我很喜欢在这里上课，很自由又可以交很多朋友，又不会无聊！”他在课余还到真华百货公司帮忙。

       墨西哥中文学校中，以墨西加利中华学校的历史最悠久。据欧阳民教授说，这所学校是在1920年由来自三藩市基督教会甘巴仑长老院的施家祺和麦平锦两名牧师所创立。那时校务经费拮据，几乎难以为继，幸得黄绍南带头捐助1000美元作为创校基金，以及家长们慷慨捐款，学校才得以继续运作。

       目前，该校只提供小学一到六年级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小学的教材。另外还有数学补习班和英文班。校长梁成安指出，中华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上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没有一套适合他们的中文教材。因此，他希望中国有朝一日能提供一套专门针对西班牙语系国家的中文教材。

       除了墨西加利，蒂华纳和墨西哥城也有中文学校。长期由蒂华纳华侨协会管理的蒂华纳华侨协会中文学校成立于1940年，主席黄沃沛表示，由于当地治安不靖，家长都不想送孩子来上课，学校因经费不足而停办，直到2008年2月才由前蒂华纳华侨协会中文学校的老师李卓洪复办。

       由于学校还在草创期，目前只开办两个中文班和一个西语班。从中文在墨西哥掀起的学习热潮来看，校长李卓洪对中文学校的未来发展信心满满。他表示已经有多所本地大学和中小学跟他接洽，希望能邀请该校的老师到对方的学校授课。

       在墨西哥城营运了十余年的墨西哥福尔摩沙中华文化学院（Instituto de Idiomay Cultura China,s.c. ），则是由来自台湾的华裔姐妹李美虹和李丽虹共同打理。

现阶段，墨西哥的3所学校中，以福尔摩沙中华文化学院的课程设置最为完善，只要是3岁以上的学生，从小孩到成年人，都可选择适合自己程度的中文班。校长李丽虹指出：“学生如能顺利跟上每个阶段的课程，他们的程度甚至还能衔接中国的大学。”

       除了正规的语言学习课程，该校也开办书法、水墨画、中医针灸、东方花艺和中国烹饪课程，增加学生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该校也和当地西班牙语国际学校结成姐妹学校。

       可以预见，随着墨西哥人学习中文的兴趣日渐浓厚，中文教育在未来的发展是可预期的。

   墨西哥华人社团在热心服务华社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墨西哥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简称墨华联）是当地最活跃的社团。副会长初海燕说：“因为我们的季江勇会长意识到墨西哥华人社团必须扩大影响力，整合有限的人力资源，便在2005年展开社团整合计划。”

       社团完成整合后，成功地举办了多项活动。2008年首次筹办的春节花车游行，更是吸引了墨西哥城约十万名民众围观，可谓盛况空前。

       在职的墨华联委员几乎都把社团当成自己的事业，每次办活动都出钱出力，力求把华人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墨西哥人的面前。初副会长回忆当时情景时说：“那时候，每个委员都不惜放下工作到花车现场帮忙，看了真的很让我感动。”

       后来的汶川大地震，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组织筹款，第二天便把筹款所得悉数送到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

       此外，如果华人碰上麻烦，也可以向墨华联寻求帮助。初海燕说：“他们找我们协助，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墨华联曾出面解决墨西哥城市政府无故没收华商货物的事，也曾极力安抚遭绑架撕票的华人杜龙龙和刘苏的家属，希望把伤害降到最低。它也调解了不少新移民和老华人之间的纷争。

       在无数个助人的善举中，初副会长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行动，使华人更团结，不再是一盘散沙，“因为只有团结，才有力量。”

墨西加利政府为表彰华人的功绩而在当地华人墓园盖了一座中国式牌楼。

  20世纪初，一批美国红河开发公司的华工抵达墨西哥西北部的墨西加利。那时候的墨西加利虽然已有水源供应，但却仍酷暑难当，初来乍到的华工，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唯有艰辛工作，恪守本分，每天用血汗去换取那微薄的75美分收入。在同一时期，也有许多华工被派往农园种植棉花。

       时移境迁，到了1919年，经过了多年拓荒的墨西加利，已呈现一片繁华景象。华人的数量比当地人更多，一万人之中就有9000人是华人。杂货铺里的华人用微笑来招待顾客；做生意可以用华人的票据为结算凭证。这里也有中国戏院，在全盛时期，一个市区就有多达6个剧团演出粤剧；若想跟老朋友喝茶聊天，还可相约到茶楼。生病又有中医可看，如果碰上任何生活困难，已经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团也会提供协助。若称此处为小广州，一点也不为过。

       熟悉早期华人历史的周文超补充道：“那时，墨西加利天气炎热。为了避暑，贫穷的华人只好睡在潮湿闭塞的‘土库’（现称地下室）里，连张草席都没有。”现在在旧市区还能看到许多有土库的房子，华人已经改为仓库或麻将房，在闲暇时约三五好友，共聚饮酒或打麻将。

坐落在墨西哥城佐卡洛（Zocalo）区多洛雷斯街（Dolores）的十数家商店，可说是墨西哥华人经济活动的缩影。这里曾经散发着浓郁的咖啡香和微焦的烤面包香，而今已成为专做游客生意的旅游区。

       数十年前，这里聚集了许多华人开的咖啡厅。当时，面包和咖啡是当地人不可或缺的早餐，所以早晨的咖啡厅总能看到华人忙碌的身影。后来，到这里开店的华人越来越多，慢慢地形成了中国街，当地政府目前已把它规划为旅游区。它虽是只有短短40公尺的一条街，却将全国华人的主要行业集中于此。无论是卖工艺品和食品的小型超级市场还是中餐馆，抑或是一家中医诊务所，这里的一切无不散发着浓浓的中华情调。

       逢年过节，这里的节庆气氛更是浓郁。端午节粽子上市，中秋节商店摆满灯笼月饼，到了华人新年，林林总总的装饰品、东方服饰、炮竹、红包封套任君选择。这个时候，连中餐馆都会加入卖年货的行列。

       迷你超市兼餐馆少东李美松（George Lee）说：“除夕当天，爱凑热闹的墨西哥人都会涌入我们这条小小的中国街，挤来挤去，只为了看舞狮和烟火。那天整条街全是人，我们的餐馆和超市都挤满了客人，大家忙得不可开交。”

       在这条不长的中国街附近，矗立着一座醒目的中华牌楼。牌楼竣工于2008年2月，由华人社团、商号和官方机构共同集资兴建。当地华人说，这座簇新的牌楼不仅是中华街的象征，也是华人在墨西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无论如何，墨西哥城的中国街，是华人在此地400多年历史的最佳见证者，默默地倾诉着着华人社会的历程。

  墨西哥华人似乎在与时间赛跑，一刻也不松懈。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离开的一天，但还是努力地提升华人在墨西哥的地位。

       他们知道华人在海外生存已经不容易，就更应该团结一致，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不论是兴办中华学校，还是组织任何活动，他们都全心全意地付出，不求回报。他们深知唯有群策群力，才是生存之道。

墨西哥华团筹办的春节花车游行，是每年一大盛事，也是华人与墨西哥人互相了解的契机。

  危地马拉位于中美洲西北部，西部、北部与墨西哥等国为邻，东北与伯利兹接壤，东南与洪都拉斯及萨尔瓦多交界，南濒太平洋，东临加勒比海。

       它是古代印第安人玛雅文化中心之一，玛雅人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玛雅文化是美洲文明的源泉。危地马拉于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21年独立，1839年建立共和国。进入20世纪后，危地马拉经历数次军事政变，直至1996年底，才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内乱。

       危地马拉在印第安语里有“森林茂密之地”的意思，林地占该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境内有中美洲最高、最活跃的火山。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咖啡、棉花、甘蔗和香蕉等，小豆蔻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也是中美洲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工业基础薄弱，但在中美洲各国中相对发达。

  据载，1860年，有一对陈姓兄弟，合力抬着一架手摇缝纫机，从墨西哥徒步走到危地马拉，从此落地生根。

19世纪80及90年代期间，又有不少中国人从墨西哥、美国及巴拿马等邻近国家移居危地马拉。他们大多数是在完成泛美大铁路修建之后选择留下，闯荡异乡，或是因为无法回国而被迫另寻出路的华工。

       除了这批人之外，从中国内陆各地，经香港乘船至中美洲的华人也为数不少。他们先是抵达墨西哥，然后再跋山涉水抵达危地马拉。

       这些华人在进入危地马拉之后，分散到大埠小镇，部分开设商店，贩卖头巾、丝绣品及麻织品，另一部分则当裁缝、洗衣工人以及厨师等。移居危地马拉的华人日渐增多，政府于是下令华人必须登记。1895年，登记的华人共有579人。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前来危地马拉的华人更是与日俱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已经遍布全国。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则始于30年代初，当时有不少广东中山人先到香港，再花百多港元乘搭轮船远航至危地马拉。他们大部分都先在亲朋戚友的店内打工，数年后再自行创业。

       这波移民潮引起了危地马拉政府的注意，因而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华人入境的法令，包括1933年的取缔黄种人居留条例、1936年的取缔亚洲人营业条例，以及1944年的禁止新华人入境居留条例。

       到了五六十年代，又有大批华人以探亲或旅游的身份入境，过后再办移民手续，也有一部分人非法逾期逗留。当时，危地马拉华人的人数一度高达2000人；70年代末更增至7000余人。后来，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又有一些华人陆续到来。

       90年代的危地马拉有华人约1万4000人，其中80%以上已经加入当地国籍，大多居住在危地马拉城以及一些海港城市。

 如今，危地马拉华人约有2万4000人，祖籍以广东中山、南海、顺德等地居多。

       这些华人操着相近的方言，在异地相逢，显得格外亲切，构成一个凝聚力极强且团结的社群。华侨总会从1912年创立至今，积极为当地华人谋求福利，极力保留中华文化，承办中文学校，创建华人坟场，照顾孤苦老华人等。

       华人在生活习惯方面，大多已经融入当地。年轻一代的华人，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生活方式与行为思想相对西化。然而，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中美洲极具特色的华人社会。

  危地马拉尚属发展中国家，贫富悬殊，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多为劳力密集型产业。

       这里的华人大多经营中餐馆、杂货店和超级市场等。

       他们多是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在餐饮业方面。华人餐馆以粤菜著称，深受当地居民喜爱。首都危地马拉城的市中心，中餐馆比比皆是，不少餐馆的室内装饰犹如香港50年代的茶餐厅。

       从事百货批发及零售的华人，多售卖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如成衣、玩具、电器、装饰品及鞋袜等，生意很是红火。

  一般的危地马拉华人商家，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店内，勤劳挣钱。华人店铺通常是在双层店屋的楼下，面向车水马龙、行人熙来攘往的大街，楼上则是他们的住家，店里总是播放着粤语、西班牙语和玛雅方言歌曲。

       楼上的华人住家，墙上一般都装饰着各种颜色的传统玛雅织布，从阳台上纵目远眺，还可以看见蓝色天边的火山。

       也有华人从事农业活动，开设中小型农场，种植棉花、甘蔗和咖啡等。当地最负盛名的华商是陈幸雄。他于1978年从台湾移居危国，创建吉利公司，主要经营蔬菜水果销售。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他已拥有150多家处理蔬果工作站，年营业额达1500万美元。生产的荷兰豆质量佳，大量供外销，故被冠以“荷兰豆大王”。

       华商工作时间长，几乎没有闲暇外出。但是，难得出去旅行时，他们也舍得花钱。他们喜欢到当地的自然风景区旅游，一些火山地区、清溪深谷、森林、红树林、黑沙滩、溶洞或湖泊等，都留下他们攀山涉水的足迹。

       年轻一代的华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训练，多选择从事各种专业工作，如执业医生、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及公务员等，月薪一般在两三千美元左右，比当地一般人不足500美元的月薪高出很多。他们活跃于当地社会，且较受重视。

       平常生活乐趣甚少的老一辈华人，空闲时会选择与亲友相聚，一起搓麻将、玩小牌、唱卡拉ok或打乒乓球。而年轻一代华人则有更多的休闲娱乐活动，他们会与当地友族相约去看电影、参加舞会、踢足球或参与其他体育活动。危地马拉城夜生活十分热闹，4 Grados Norte及Zona Viva区为夜间娱乐活动的主要区域，已成为年轻华人在周末欢聚的场所。

 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华人组织是华侨总会，它是历史最悠久、会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华人社团。20世纪初，墨西哥发生排华事件，让危地马拉侨领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遂于1912年发起成立“旅中美洲危地马拉华侨总会”，简称华侨总会，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

       华侨总会成为散居各地华人的一个联系中心。不过早期的华侨总会只有临时会所，直到1919年，两位热心的华商侨领慷慨解囊，加上当时华社的捐助，才成功买下了使用至今的会馆。

       该会馆坐落在首都市中心1区的黄金地段，与国立圣卡洛斯大学戏剧院等国家重点保护建筑为邻。它的建筑特色可谓中西合璧。会馆外观富有浓郁的中华传统建筑色彩，室内设计则采用当地非常经典的雕塑风格，充满西方风情。

       会馆内还有一个大礼堂，后面有一座“安乐亭”，内里供奉着先人的“敬如在”牌位，充分体现出当地华人尊老敬贤的中华传统美德。

       华侨总会的宗旨是加强侨胞团结、守望相助、维护权益、兴办福利、共谋生存与发展。它成立以来兴办多项公益事业，如筹建华侨墓地、福堂，为贫苦侨胞免费提供丧葬场地、建立中华文化中心、为华裔青年提供体育、文艺等活动场所。

       早期，华侨总会为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华人提供栖身之所。即使在今天，那些贫困无依的老人，也会获得总会提供的免费食宿及零用钱。

       华侨总会成立的醒狮团及中国传统舞蹈团，经常应当地政府机关邀请到各地表演，每逢元旦、春节、青年节、华侨节及孔子诞辰，也会举行庆祝活动。此外，也曾多次参与当地捐款活动，救济灾民。

       台湾人也成立了多个组织，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危地马拉台湾商会”以及“中美洲危地马拉中华商会”。他们也经常和来自各地的华人交际往来，凝聚成团结一体的危地马拉华社。

安乐亭”内供奉先人的“敬如在”，同样出现在文化中心礼堂及华侨坟场的灵堂内。

  危地马拉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其中以信仰天主教最为普遍。老一辈的华人大都是佛教或道教徒，而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大多是天主教徒，从小就接受洗礼。同时，在部分华人天主教徒家中，亦不难发现同时膜拜观音和圣母玛利亚的现象。

       为避免丧失自身的传统价值，危地马拉华人对与异族通婚仍然持保守看法。第二代华人受父母影响，也很少与当地人联婚，达适婚年龄的男子通常会到中国娶新娘。第三及第四代华人，除少数与当地人通婚外，大部分仍然坚守着祖先的遗愿，只与华人结婚。只是由于大部分年轻华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如今婚礼多在教堂进行。

       危地马拉华人有着良好的互助互惠的风气。每当有任何华人面临困难求助时，其他华人便会鼎力相助。此外，当地华社也与本地人关系和谐，甚少与他们产生摩擦或冲突。

       危地马拉华人庆祝元旦如同庆祝春节般盛大，有些没有时间庆祝春节的华人家庭，就把元旦当作春节来庆祝。除了全家人聚餐，也会邀约好友与其家人到家中聚餐，同欢共乐。餐后唱唱卡拉OK、玩扑克牌、搓麻将，欢笑声不断。到了午夜12点，华人会在门前放鞭炮、燃烟花。放完鞭炮烟花，他们就会互相问好，融洽关系，开始新的一年。华人商店前更少不了舞龙舞狮，祈求新年生意兴隆。这些街头表演也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围观。

   当年毅然离乡到危地马拉闯天下的华人，把辛苦挣到的钱，都寄回家乡置业，希望有一天能衣锦还乡，不愿终老异地。他们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更希望魂归故国，而不愿埋骨异国，沦为孤魂野鬼。但是，由于中美洲与中国关山远隔，旅途险阻，加上金钱与时间不足等因素，不少华人死后只能暂时葬身当地，他日再转运回乡。

       当年，在香港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安排下，许多华人遗体才得以运回家乡安葬。

       种福堂基金会（简称种福堂）则于20世纪初成立，旨在向华社筹集资金购买地段，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当地华人的坟场。

       近年来，当地华人已改变了死后还乡安葬的观念，接受了就地安葬的现实。在首都三区的中心大坟场内，有华侨坟场。华侨坟场位于中心大坟场左边的一座小山丘上，四周全部是华人基园。华侨坟场由一间“先友祠”以及后方的灵堂墓园组成。墓园内外大约安置了50个先人的灵位，安葬的大多为早期华人先驱。

       如今，富有的华人也会像当地人一样，在坟场中买地建造大型的石碑墓园，安葬过世的亲人家属。然而穷人却只能租坟位，若亲人无法偿还租金，其位子就要腾出另租他人。

       现今，随着华人经济能力、生活素质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大部分人已经有能力在地点适中、环境优良的新墓地，选购坟地自建墓园。现代华人与当地人一样，习惯在每年11月1日扫墓。他们仍然保留敬香的习俗，但供奉的物品仅有鲜花、花圈和鲜果。简单的仪式后，家人也会留在祖先墓园前聚餐。华侨总会也会趁这一天，祭祀遗留在华侨坟场骨库内的先人遗骨。当地甚少华人会在清明时扫墓，只有极少数的老一辈的华侨会默默地进行，祭祀供品亦较传统，如烧猪、烧鸡等，敬香外也会焚烧金冥纸。

  危地马拉华人对文化的传承，一点都不马虎，积极推广中文教育。如今，华侨总会开办了华文学校，正式教授普通话、粤语以及舞蹈等课程。华文学校坐落在华侨总会的会馆左侧，共4层楼高。学校内设施齐全，包括视听室、图书馆、乒乓室、华人历史资料室等。学校师资和教材大部分来自台湾，课程相对浅白易学，主要教学生认识简单的汉字和培养阅读能力。学生通常在正规学校放学后或周末来上课。

       当地出生的华人孩子都上私立国际学校，英语和西班牙语非常流利，但大多不会说写华文华语，于是，家长们大都会聘请私人华文补习老师，上门教导孩子学华文。由于语言的障碍，家长与子女难以沟通，形成了代沟。但家长仍然希望后代保留华人的姓氏，为下一代取名时，也是尽量采用中文姓氏再配以西班牙式名字。如姓张，会取名为Estuardo Chang等。

       危地马拉教育水平较低，政府虽然提供9年国民义务教育，但公立学校教学欠佳，教师不负责，经常上街示威要求加薪，迫使许多华人家长宁可付昂贵的学费，也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国际学校就读。在那里，华人子弟不但可接受英语及西班牙语双语教育，毕业后还可到美国等国家的高中或大学深造。毕业后就留在国外做事，不再回来。这些到国外工作的华人后代，但他们都不会忘本，与父母维持联系。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华人子弟进入当地大学。他们多数进入公立大学，如危地马拉市的圣卡洛斯大学。也有部分在当地著名的私立大学就读，如马洛京大学、玛丽亚洛加尔培斯大学、狄瓦耶大学、蓝狄瓦大学等。

   危地马拉人民每年最期待的节庆非复活节莫属。尤其在安蒂瓜市所举办的大规模活动，吸引了许多人（包括华人）来参与，游客也慕名而来。复活节期间，游行路径都会铺上颜色鲜明、图案高雅的地毯。

       地毯的图案设计主要由杉木针、染成五颜六色的锯木屑、沙子、鲜花和花瓣组成，并由教堂、住家和商店铺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好让节日当天行经路过的游行队伍踩踏过去，以示对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景仰。游行队伍踩踏过后的地毯残留物，当地人一般将之视为是已经获得特别保佑的圣品，围观者可以拾起带回家，以保全家平安、生意兴隆。

       在安蒂瓜，复活节庆典一连延续好几天。在此期间，华人会相约到安蒂瓜，热情积极地参与每项活动。虽然他们有的不是天主教徒，但是宗教庆典的活力，却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他们。整个活动过程犹如华人的迎神拜会，场面热闹空前，规模庞大。

尽管华人在危地马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由于人数少，华社的发展仍无法快速成长茁壮，在经济上还未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然而，这里的华人安分守己，敬业乐业，与当地人和平共存，在充满玛雅、拉丁文化色彩的生活中，塑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华人社会。

伯利兹有潜水爱好者流连忘返的海洋火山孔“蓝洞”（Blue Hole），有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凯优（Caye）小岛，还有绵延数百公里蕴藏丰富资源的海岸线。风光明媚，民风淳朴，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到访。

       这里的总人口只有31万，种族多元，包括最早住在这里的马雅人、16世纪就到来的西班牙人、黑人与他族混血生下的克里奥尔人、仍活在19世纪中的德国村孟诺教徒、来这边工作的美国人以及开杂货店或餐馆的华人等。

       伯利兹没有钢筋水泥森林，没有太多的工业，而本土廉价炸鸡店却遍布全国。

       自1981年独立以来，伯利兹仍依靠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支援。经济发展不稳定，失业率居中美洲之冠，有三成以上的国民为生计担忧，治安不靖也成为政府最棘手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人仍选择移居这个国家，原因几乎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来。

    1865年，一艘载着480名广东籍契约华工的货船，从中国大陆远航至伯利兹（当时为英属洪都拉斯）。这一批华工甫一抵岸便被安置在森林中，从此过着清苦的伐木生涯。

       之后，又有一批华工来到了伯利兹，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到甘蔗园工作。

       过了几年，在契约期满之后，这些华工便留在当地弃农从商。他们没有太多的资本，只能选择入行门槛较低的杂货店。在生意上了轨道之后，他们大部分都与当地妇女通婚，开枝散叶，衍生了混血华裔后代。

       日复一日，华人人口持续增长，不过增长率缓慢。一直到20世纪初，墨西哥爆发了排华暴行，迫使不少华人仓皇离境，从墨西哥逃难到伯利兹，这才壮大了华人的行列。

       1930年到伯利兹来的100名华人，则有较为特殊的情况。他们原本打算移民到危地马拉，结果被危地马拉的海关拒于门外，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选择入境伯利兹。

       在二战期间，许多住在中国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为了逃避日本的侵略，先是偷渡到香港，再移民到美国的三藩市等地。后来，这些华人移民由于种种不利的因素，被迫从三藩市等地向美国南部迁移。在进入拉丁美洲之后，有人决定驻留在墨西哥，也有一些选择南下迁徙到伯利兹。

       二战后至80年代初，这里的华人人口只增加了200多人。那时候，华人主要是住在伯利兹城（Belize City），另一些则住在潘塔高达（Punta Gorda）以及口罗萨（Corozal）。

       1988年，伯利兹政府为了加速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地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宣布外国人只要购买价值2500美元的伯利兹国家债券，就可以申请成为伯利兹人，并获得护照。这一项政策果然奏效，成功吸引了许多来自香港、台湾以及逾期居留在美国的华人纷纷前来。这一年，伯利兹华人的数量有了激增的现象，达到1500人。

       1995年，由于海峡两岸局势紧张，战云密布，许多台湾人便以伯利兹为避风港，纷纷移居伯利兹。这一年，伯利兹的华人暴增，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华人约有1万5000人。

       然而，在华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候，却也发生了不少问题。

       1995年年初，有少数华人买通官员购得永久居留权，或进行贩卖居留权和护照等非法勾当，接二连三地遭伯利兹媒体揭发，使华人的形象跌到谷底；再加上一些华人从事土地投机活动，更是加深了当地人对华人的反感，所幸最后并没有引发任何激烈的种族冲突。

       2002年，伯利兹政府再次立法开放投资移民，吸引了不少在美国无法取得合法身份的华人前来伯利兹扎根立业。如今，伯利兹已经关掉投资移民的方便之门，所有想移民伯利兹的人士，都必须通过正常程序申请签证，且必须达到居留至少一年的期限之后，才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因此，近几年来这里的华人已经不多，大部分还是通过亲属的申请而过来的。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华人陆续离境。

目前伯利兹大约有一万多名华人，他们大部分聚集在伯利兹城、口罗萨和橙埠（Orange Walk），另有一些华人散居全国各地。现阶段居住在伯利兹的华人，大多来自广东台山和台湾。他们大都是在80年代以后才移居到这里，另外还有一些土生华裔和少数香港人。

       伯利兹的老华人不多，多数已经融入主流社会。而新移民则还是以第一代为主，他们大部分只能说广东话或是简单的普通话。他们之中，来自广东的华人多数选择入籍伯利兹，来自台湾的华人则大部分申请长期居留证。

伯利兹的市场小，发展空间有限，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投资，所以华人在这里创业，只能跟早期华人一样，以经营杂货店、炸鸡店、中餐馆等这类资本较小的生意为主。也有华人选择开设二合一商店，即炸鸡杂货店或炸鸡中餐馆，对他们来说，多元化业务既可以增加收益，也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这里估计有500家这类二合一商店。

       此外，还有一些华人经营面包店、汽车维修、礼品店或咖啡厅等小生意。不过还是有少数华人拥有颇具规模的企业，其中名气较大的为关世铭（Simon Quan）和伍永泉（William Quinto）旗下的企业。

       关世铭的百货商店主要售卖建筑材料、五金、文具等杂货，企业投资总额超过100万美元。伍永泉的业务则集中在烟酒业及房地产生意。这两个华人家族所经营的业务，估计占伯利兹杂货市场近三成的份额。

两个华人家族平日乐善好施，因此，他们在伯利兹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也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可说是伯利兹华人的成功典范。

       只是，对大部分生活在这里的华人而言，伯利兹始终是一块跳板，缺少归属感。许多华人当初选择移居到这里的时候，早就已经为自己规划好离开的时间，“再做几年等小孩念完小学、中学，我们就会离开。”

       陈太太说：“华人都在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时机一到，就会把店铺和房子卖掉，毫不犹豫地再移民他国。”这里治安不靖，生活环境不舒适，政治也并不稳定，更加速他们离境的决心。许多华人还留在伯利兹，主要目的是打拼赚钱，为来日铺路。

       在伯利兹，华人不放过任何一丝能更靠近梦想的机会。他们的店铺就算是公共假日，也照常营业。在这里开杂货店的华人，大部分在早上6点就起身开店，通常会一直忙到晚上11点才能休息。而那些兼卖炸鸡的杂货店则会营业到凌晨12点或更迟，只要有生意做他们都不会说要休息。

       在伯利兹城开了一家小小杂货店的陈明校说：“因为我们没有太多资本，所以这里是店也是家，我们就住在楼上，在楼下做生意。”他说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所以生活环境好不好并不重要，更何况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永远待在这里。伯利兹这几年的经济越来越不好，他们的小本生意也不好做了。现在他的老家广东台山可是发展得很好，所以离乡快十年的他想回去了。

       开炸鸡店的老板娘谭艳梨来伯利兹将近20年，育有3名子女。当年刚到伯利兹时，先在一家餐馆打工，几个月后，就筹钱跟先生一起出来做小生意。现在她和先生开的炸鸡店生意兴旺，在他们的店外常常可以看见大排长龙的景象。

  只是不管生意多好，他们却并不眷恋伯利兹，总想设法再移民美加。

       1972年来到伯利兹城发展的华人李国健则认为：“华人在这里生活就要融入当地，跟当地人做朋友，要懂得回馈社会。这样子才能自保平安。”身为高级太平绅士（Senior Justice of the Peace）的他，有权力担任罪犯的担保人，不管是黑人还是华人发生事情找他帮忙，他一般都不会拒绝，且不求回报。因此，不论是当地人还是华人，都很尊重他。

       在李国健的禾富便利店外，看不到铁栅栏，却可以看到黑人坐在那儿看电视，又或者聚集在店门口聊天嬉闹。至于其他的华人商店，大部分都为了自保和担心客人醉酒闹事，而在店铺里围起铁栅栏。

      有人说，在伯利兹经济能力较好的华人，除了关世铭家族和伍永泉家族外，有许多华人是靠卖伯利兹政府发行的彩票致富。不过要经营彩票，须有充足的财力。

       在口罗萨经营两家中餐馆的中华会馆会长容发龙，就是其中一个靠彩票发迹的华人。在他的店内总有许多长条型的彩票本子，不论当地人还是华人，不管年纪大小，都喜欢买一两张来碰碰运气。

       彩票每张售价有一元或两元，每张的销售利润大约是15%。容先生是彩票营业执照持有人，如果有人中奖，就可凭着彩票后面的盖章，到他的餐馆领取奖金。因为伯利兹政府只负责卖彩票，不负责付中奖奖金，而他就是从卖出去的彩票中赚取利润。由于政府无力支付奖金，搞得人民怨声载道，所以由持有执照的华人经营，更赢得当地人的信任。

* *截至2008年10月为止，伯利兹一共有80位华人太平绅士，其中有50位是由李国健提名的。2009年3月，伯利兹终于诞生了第一位华人市议员张文正。他来自台湾，在伯利兹念完小学和中学后，就到美国深造，过后回到伯利兹主要是为了帮助父亲打理生意，并且服务大众，回馈社会。*
* 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已经没有那么注重传统节日的庆祝，即使是良辰佳节，华商仍照常营业。年除夕，充其量只是吃得比较丰盛。当然，过年少不了的还有小朋友的“红包”。
* 在结婚仪式方面，华人也不铺张，新人会找几个知心好友去吃一顿饭，然后再请朋友到婚姻注册局见证整个注册仪式，婚礼就算完成。
* 而葬礼方面也很简单，死者在基督教堂经过牧师的祷告之后，就被抬到墓地跟当地人合葬，因为这里并没有专为华人而设的坟场。
* 在伯利兹公立教会学校念书，学费不算太贵，小学学费每年不到100美元，政府免费供应书本。其实在伯利兹念书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没有太多的娱乐场所，小孩不容易学坏，又可同时掌握西班牙语和英语，所以许多华人都乐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学习。学习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在这里完成中小学基础教育后，也有机会到美国深造。美国每年都会保留数个大学学额，以及提供奖学金给伯利兹的学子。
* 谈到下一代的中文教育，华人家长几乎不太在意。一般家长认为：“孩子会西班牙文，又会英文，他们没有兴趣学华文，我们也没有空去教他们。会说简单的广东话或华语，我们就很满意了。”
* 只会说粤语的第二代华人李先生说：“我出生在这里，从小到大，我的生活圈子就是当地人，我的太太是当地人，我不会说华语也没有关系。我跟太太说西班牙语，跟孩子也说西班牙语，没什么不妥。”

  华人一向把伯利兹视为跳板，最终的目的是再移民美国或加拿大。他们驻足伯利兹，只是抱着一种过客的心态，缺少归属感。他们在这里努力打拼，赚够了钱，一旦时机成熟，便收拾行囊，远走高飞，追寻更美好的明天。

 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西北部，东北接洪都拉斯，西北接危地马拉，南临太平洋，面积虽小，却是中美洲工业化程度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境内有数十座火山，其中几座为迸发频密的活火山，故有“火山之国”之称。

       萨尔瓦多原是印地安人居住地，是古代玛雅文化发祥地之一。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宣布独立，1841年成立共和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萨尔瓦多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政府更迭频繁，国家建设数十年来几乎停滞不前。1979年国内爆发了内战，长达12年之久，有近7万5000人因为这场战争而丧失了性命。

       1992年萨尔瓦多内战结束，政府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目前国家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盛产咖啡、甘蔗与棉花。其工业化程度近年来不断提升，主要有食品加工、纺织、成衣、卷烟、制糖及水泥等工业。

       萨尔瓦多曾多次遭地震及飓风破坏；国民贫富悬殊，生活水平低下，社会治安不靖。幸而萨尔瓦多人淳朴善良、包容，因此华人才能在这风雨飘摇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

  早在1877年，萨尔瓦多就已有华人的足迹。当时适逢萨尔瓦多政府首次颁布批准外国人入境的法令；与此同时，劳资合同也有注明，到此地工作的外国人可豁免纳税和服兵役。这些有利条件，吸引了许多华人冒险前来。

       从当地华人的口述资料得知，1880年，一名叫Adan Ton-Loy的华人来到萨尔瓦多，可惜其中文姓名已经无从考证。当时，萨尔瓦多的移民条例宽松，外国人在入境的时候不必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只需在港口登记姓名即可通关。“我的祖父关桂川在1884年便是这样入境的，他在阿卡胡特拉海港（Acajutla）上岸。”当地老华人关家熙说。

       早期华工抵境之后，先是在各个地区务农。过了一段时期，储够资本后，便陆续在各个城市开设小商店，开始建立属于华人的商业网络。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另外有少数华人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些从美国来的华人，有者是1869年美国东西铁路完工后被解雇的华工。为了生存，他们陆续从美国往南走，到美洲中部或者南部寻找工作机会。他们的到来，使萨尔瓦多的华人日渐增多，而商店也越开越多。

       20世纪初，萨尔瓦多颇具规模的华人商号已多达7家，包括广生隆、东兴隆、厚得昌、鸿盛泰、安记、昌记和广经祥，皆以丝织品买卖为主。那时，这7家商号也被华社称为“七家丝发庄”。凑巧的是，这7家商号的老板都是来自广东南海的九江。这时期，已经有约300名华人居住在此。

       就在华人的经济发展看似一帆风顺之际，不幸事件却接踵而来。

       1920至1930年期间，萨尔瓦多政府颁布了禁止阿拉伯人、黑人、黎巴嫩人、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入境的法令。自此，中国人便无法依循正规途径入境，如果要入境，唯有通过其他非法管道。

       1931年，萨尔瓦多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严重萎缩，当地人收入减少，消费能力也随之降低，导致华人商店的营业额大幅下降。在这段非常时期，政府却下令每家华人商店必须每个月上缴200美元的营业税。这对当时生意已经日渐惨淡的华商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那时，由于交不出营业税而破产倒闭的华人商店就有60多家。

       所幸，这项条例仅仅维持数月，即碰上一场改朝换代的军事政变。新的独裁政府上台后，并没有刁难华人。除了批准一些华人商店重新营业，也把营业税降到每月7.50美元，只是不准许华人售卖日常用品。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当时的圣萨尔瓦多市长不但把营业税提高至300美元，还限令华商必须于8小时之内缴款，否则立刻查封商店。接着，政府还下令驱逐华人；华人虽即刻向中国政府求援，但也无济于事。

       这时期，至少有百余家华人商店倒闭，许多华商只得离境，另谋出路。

       自此之后，华人在各方面均已难有建树。直至1954年，华人的入境要求以及居留的条件才有所改善。到了1975年，当地的华人人数回升至700多人。

       由于军人政府长期的独裁统治，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以及经济命脉一直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导致萨尔瓦多贫富悬殊的问题日渐严重。1979年10月28日，人民忍无可忍，最终爆发内战。当地的华人为免受战火波及，又开始远走他乡。一部分的华人逃到邻国危地马拉避难，一些则选择逃往美国。

       直至1992年内战结束后，当地政府开始实施6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移居他乡的华人才纷纷回流。

 目前，萨尔瓦多共有2000余名华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圣萨尔多，其中以混血华裔居多。他们的先人早期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省南海，也有祖籍中山、番禺等地的。后期移居此地的华人则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萨尔瓦多华侨总会会长莫启明（Roque Mocan）指出：“拿中国护照的人要来萨尔瓦多工作并没那么容易，除非他们的工作是本地人无法胜任的，比如中餐馆的厨师这类职业。”这正是近年来由中国大陆来的华人皆为厨师的原因。至于以其他职业身份移居萨尔瓦多的华人则不多。

       因此，萨尔瓦多华人的经济活动领域仍以中餐业为主，中餐馆约有20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3家；百货商店居次，其他行业则包括旅店、塑胶厂、面粉厂、成衣厂、资源回收公司、中医等。

       至于混血华裔则早已渗透当地各个行业，有的是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有的是子承父业，继续经营中餐馆或卖苏杭丝织品的百货店。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华人都恪守本分，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打拼。

圣萨尔瓦多市区的街道，随处可见手持着冲锋枪的警卫，让人不免忧心擦枪走火，无辜遭殃。当地持械抢劫案，因过去内战所留下的黑市枪械而日益严重。每况愈下的治安，令人焦虑不安。

       此外，这里地小人多，交通混乱，街上的汽笛声不绝于耳。在这里开车，不仅技术要好，警觉性也要高。

       在市区地带，人潮汹涌，车水马龙，只见华人商店林立。华商中有台湾人与大陆人，他们多是贸易商与零售商，销售百货商品，包括中国制造的文具、玩具、小型家电、装饰品和礼品等，货品应有尽有。由于售价低廉，生意不错。但是，如今他们最大的隐忧却是来自同行的竞争。这类恶性竞争，使华人同行之间在生意上处于敌对的状态，更有商店禁止同行入店。

       尽管如此，华人还是没有离开的打算，开百货商店的林老板认为：“萨尔瓦多的市场竞争没有美国市场那么激烈，还是有钱可赚。”

       除了有钱可赚，地处海拔680公尺的圣萨尔瓦多常年气候宜人，也是华人舍不得离开的因素。这里白天可以享受凉风习习，晚上则不必空调就能入睡，让他们乐得“流连忘返”。

在这里开店，华人除了要防范对手的刺探行情，也要分心留意当地人“理所当然”的偷窃行为。一名不愿具名的华人雇主说：“这里的员工很勤劳，但是他们那种顺手牵羊的举动，有时候真的让我们好气又好笑。”他们喜欢这里偷一点那里藏一些，若被老板发现，他们也觉得无所谓，把东西放回去了事。如果老板辞退他们，第二天他们还是会如常来上班，老板也无可奈何。

       原来萨尔瓦多的劳工保护法非常严格。如果老板开除员工，可能会被勒令关门大吉。因此华人雇主都不敢严惩那些手脚不干净的员工，只能循循善诱，或者强忍下来。久而久之，他们对这些偷窃事件司空见惯。“只要偷窃行为不是太离谱，我们一般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花红‘送’给他们。”中华百货公司董事长白德传（William Arturo Pai）说。

       有些华人老板则通过良好的福利措施，来杜绝雇员偷东西的行为，例如每月给奖励、半年一次分红、准时上班奖励等，都是颇具成效的做法。另外，他们也常常碰到雇员预支薪水的情况，所以干脆就每十天发薪一次，并且贴心地将薪水换算成小钞和零钱发给雇员，方便他们购物。

   一名华人老板说：“我们给员工好福利，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偷东西的问题真的有所改善了。现在已很少看到他们偷东西，而且他们也会不计较加班帮忙我们。”华人雇主的贴心行为，换来了当地员工的真心回报。

       在萨尔瓦多，只要一提起安全问题，老一辈的华人总会感叹：“以前，我们半夜两三点出去溜达都没有问题。现在？唉！半夜最好不要出去，危险啊！”今不如昔，这位老华人感慨时局的变迁。有华人说：“所幸这里的抢匪只求财，通常不伤人。”

华人最常碰到的倒霉事就是车子被抢。奇怪的是，如果受害者乖乖就范，往往在一天内就能在首都的某个角落找回失车。原来抢匪目的不在抢车，而是为了在抢劫后驾车逃离犯罪现场。

       在动荡不安的国度里，华人既要应对同行竞争，又要与当地员工周旋，更要保障自身安全，这一切都考验着萨尔瓦多华人的毅力和智慧。

  华人要在萨尔瓦多找到来自家乡的食品并不难，在首都就有20多家华人所开的中餐馆。但由于来萨尔瓦多的华人大多是投资移民，而入境打工的受薪阶层并不多，所以这里的华人商店和餐馆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因此在萨尔瓦多如果要用电话订中餐，恐怕得会几句西班牙语才行，否则日子难过。

  除了中餐馆，这里还有一家专售中国商品的超级市场。因此，华人若真的无法适应当地又咸又甜的传统食物，还是不必太过忧心。另外，也有一名老华人会定期到危地马拉去跑单帮，带些中国食品回来。

       这名老华人说：“萨尔瓦多只有一家售卖中国商品的超级市场，里面的商品简直是漫天开价，我到危地马拉带货，不只可以帮其他华人省钱，也可以自己赚些零用钱。”他一个月会跑两趟危地马拉为华人带回数袋酱油、茶叶、酱料等食品。

       早年来的华人，许多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与新来说华语的移民之间即使语言不通，也能以书写沟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后代中有许多人已不再懂得书写和说华语。他们的生活已融入当地，对于会不会说华语并不太在意。“华语”以前在萨尔瓦多是指家乡话，现在则多指普通话。一些华人表示，他们的孩子之所以不会说华语，是因为这里的华人太少，没有条件形成一个华语普及的环境，无可避免地演变成今日许多华人不谙华语的窘境，这无疑是当地华社在中华文化传承上的一大隐忧。

       其实早在40年代初期，华人先辈就曾开办过华侨学校，以期后代们能有学习华语的机会。可惜几年后华侨学校由于学生人数日渐减少，以致经济拮据而宣告停办。

       直到2005年，华语学习热潮席卷全球，当地华人才开始有意识的想要重办华侨学校。经过萨尔瓦多数个华团和台湾驻当地办事处的努力下，华侨学校得以复办。目前该校由华侨总会、中华文化协会以及中华总商会联合设立的华侨中心管理，营运费用则由当地华人和台湾当局共同承担。

这里的学生每月只需交十美元的学费，就可以在每个周末到华侨学校上两小时的华语课。华侨中心的教室设备虽不算齐全，却胜在学习环境整洁。这所学校目前设有幼儿、初级、中级及成人4个班级，学生人数约150人，教师有7名。其中有4名是在当地聘请的台湾华人，另外3名则是由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派驻的义务教师。

       可惜的是，学生中只有约十名是华人子弟，其余都是当地人。华侨中心负责人莫启明说：“当地人近几年来越来越重视华语的学习，很多大学都登门希望我们的老师能到他们的大学授课。”

       当地媒体也特别报道华侨中心在华文教育传承方面的努力，他们到学校访问义务教师的上课情形，共同来推广当地的华文教育。

   新一代的华人家长已经不似老华人般重视华文。以前，老华人通常都会严格要求孩子在家里用华语和他们对谈，如果孩子说其他语言，他们宁可孩子待在外头不要回家。他们心中那种不忘本，坚持学习华文和了解自身文化的精神，是这一代华人所望尘莫及的。

       这一代的华人虽然也希望孩子能说写华文，但是碍于华文教育在当地并不普及，只好让孩子到当地学校上学，学习西班牙文。经济能力较好者，每到暑假就会把孩子带回中国，让他们和亲戚朋友互动交流，从而提升他们的华语会话能力。至于经济能力比较弱的华人别无它法，则只好放任孩子逐渐淡忘母语。

       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后裔口操着西班牙语、吃咸咸的白玉米饼——普普萨（Pupusa）、喝甜腻的热可可饮料、支持萨尔瓦多足球队。每当球场传来进球欢呼声和烟火爆破声的时候，他们都会跟着跳跃欢呼。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反观中华文化对他们而言，则是难以理解的传统风俗，吃中餐就好像在享受外国食物，孝顺父母似乎跟自己沾不上边。

  “我的小孩今年8岁，会一点粤语，会一点普通话，只是他还是比较喜欢说英语和西班牙语。”1991年远嫁萨尔瓦多，来自中国广东的刘洁珠，其实内心中很希望孩子能受正规的华文教育。只不过他们家离首都太远，生活的地方华人只有3户。孩子没有学习华语的环境，日子一久，对自己的母语就益发陌生了。

       虽然这里的5个华人团体在举办节庆活动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处理华侨学校的事务方面却仍在摸索阶段。尽管上课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华人学生占极少数的问题仍是当地华社忧心的事情。

       虽说入乡随俗，来到异地他乡就该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可是在一些华人的内心深处，却隐约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华文化便会随着孩子的疏离而逐渐消失。

* *中美洲暨巴拿马六国中华会馆与华侨总会联合总会，在1966年1月27日于圣萨尔瓦多正式成立。这是中美洲最大的华团。*

 提起华侨学校，就一定要介绍莫启明这位身兼多职的老华人。60多岁的莫启明来自广东南海九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移居萨尔瓦多。他可说是当地华社发展的见证人，在华人圈子中是不能或缺的灵魂人物。平常大家都喜欢称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和西班牙语的他为“启叔”或“启哥”。

       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处理当地的华人事务，或者帮华人解决纠纷。由于中国大陆与萨尔瓦多无邦交关系，所以这里大部分的华人若碰到任何难题，脑袋里第一个闪过的名字一定是莫启明。

       说到他对当地华人社会的贡献，大家都如数家珍。

       莫启明在华文教育的推广上非常积极。在华侨学校草创时期，他每遇到华人就要求他们把家里的小孩送到学校的中文班学习。

       许多在萨尔瓦多的华人后代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中文名。他们觉得自己是华人后代，不应只有西文名。可是他们往往连自己祖先的姓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只好求助莫启明，请他帮忙想名字。于是，Juan Martinez Chong变成张安定、José Matias Delgado则是关永兴——这都是莫先生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另外，在华侨中心的学生名册上，也能看到莫启明细心地替每个学生所取的中文姓名。

       逢年过节，启叔会摇身一变成为华人庆典活动的召集人。每一年农历大年初一，华侨总会都会召集会员共享团年饭，300多人共聚一堂庆祝佳节，好不热闹。至于其他传统节日，例如中秋节和端午节，总会通常也会买些月饼和礼品送给会员。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华团向心力很强。凡有大型庆祝活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分你我，力求在全体华人面前展现最好的一面。

       可惜的是，萨尔瓦多目前还没有属于华人的中文报刊。中华总商会曾经办过会刊，但出版数期后就宣布停刊。现在只有由华人协会主导，专门报道萨尔瓦多华人事务的西班牙语网站还在运作。

萨尔瓦多的华人，对当地许多事情的看法，从早期的少见多怪，到现在的习以为常，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所幸，华人都能本着坚强的信念勇往直前，突破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冲击，化阻力为动力，跟当地人和平共处，华社才能有今日的和谐。

       毕竟，要在这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地方夹缝求生，华人凡事必须放宽心胸，学会包容，才能活得充实、自在、快乐。

150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在中美洲西北部发现了洪都拉斯，并赋予这个在西班牙语中有“无底深渊”意思的名字。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马雅文化遗迹、珊瑚礁和热带雨林生态，全在这里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是旅客向往的地方。

       然而，洪都拉斯国内政局变幻莫测，自1821年独立以来的100多年间，陆续发生了百多次政变。这里20%的富裕人口掌握着国家80%的财富，而50%的人民每天只有一美元的收入。近年来，通货膨胀日渐严重，从前一美元可以饱餐一顿，现在却连一把青菜都买不到，人民生活陷入困境。

       19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不只夺走了洪都拉斯1万3500条人命，也造成国家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飓风过后，国家经济倒退十年，直到今天，洪都拉斯仍没有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在经济受创、治安败坏和政治动荡的三重打击下，如今洪都拉斯的发展，就像个迟暮老人，步履沉重、举步维艰。

       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华人，有些已经盘算着离开，有些却选择坚持下去；离去或留守，理由各异。不管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对他们来说，这里甜酸苦辣的回忆，就算离开，也还是无法忘记。

据说早在19世纪末，便有一名华人从巴拿马来到洪都拉斯。他是祖籍广东的华人，叫作Dario Yip，不过，没有人知道他的中文姓名。

       自此以后，就有一些华人陆续从周边国家及中国广东到这里来谋生。这一批华人之中有契约华工，也有好些自由移民，他们大部分是在种植园工作。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洪都拉斯大约有400名华人。他们通常会把大部分的薪水汇回祖籍地，仅留下小部分作为储蓄。多数人在契约期满、累积了资本后，便开始做生意。碍于语言局限，他们仅能选择从事入行门槛较低的杂货店，店主只需要懂得物品价格和名称，还有“muchas gracias”（谢谢）、“bienvenido”（欢迎光临）等日常用语，就足以应对一般交易。

旧时新鸿栈公司由关有佩（Julian Quan）和关有怡（Joaqain Salvador Quan Pon）两兄弟共同经营，主要售卖中国的丝绸、围巾、披肩等时髦商品。

 在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华人仍然在杂货店这个老本行上辛勤耕耘，一步一脚印地往更加富裕的生活迈进。一直到了80年代，中餐馆才后来居上，成了当地华人的主流行业。80年代的华人人口增长缓慢，到了1988年，包括土生土长的华裔在内，全国的华人人口还不到1000名。

       90年代初，洪都拉斯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放宽了移民限制，只要愿意支付两万美金，就可移民到这里来。华人也搭上了这一趟便车，从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移入，进行投资。当时这里只有75家中餐馆以及76家杂货店。

       短短的数年间，华人人口便迅速地增至2500人。成功入境的华人大多数是通过亲属关系申请过来的，所以也仍然以广东人为主。

       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来到洪都拉斯的新移民与老一辈华人有些不同，当时的媒体曾经大肆渲染一些华人新移民从事人口偷渡或其他不法的勾当，严重打击当地华人的地位及形象。

在华人踏足洪都拉斯百余年后，华人社会已发展成两个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北部工业城圣佩德罗苏拉（San Peho Sula），其余则散居在全国各地。

       第一个群体指的是在当地出生的混血华裔，人数约有两万，他们会西班牙文而不懂中文，绝大部分没有中文名字，只知道自己身上流着华人血统。他们当中，有些受过高深的教育，在军事武装部队、政界与教育界颇具声望，如前三军总司令熊伯雄（Mario Raul Hung Pacheco）、前国防部长Maria Elizabeth Chinz Sierra、前财政部长Wilian Chong Wong和前洪都拉斯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Rigoberta Chang Castilo,都是非常出色的混血华裔。当地华人说：“洪都拉斯算是蛮开放的国家了，除了总统不能让外族人担任外，任何族群的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第二个群体则是6000余名在最近数十年从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到这里谋生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些华人不论是否在当地出生，多数从事中餐馆和杂货批发这两个传统行业。另有一些华人也逐步涉足进出口贸易、文具店、电子游戏室、制造加工厂、成衣厂等行业。

时至今日，经营中餐馆仍然是华人的主业。只要一踏出洪都拉斯通孔廷国际机场（Toncontín International Airport），一路上都就可以看到中餐馆。在进入市区后，中餐馆更是四处林立。此外，市内与郊区，华人经营的杂货铺随处可见。

       在特古西加尔巴山城，街道曲折起伏，群山环抱，开餐馆的华人95%是广东人。中餐因价格适中，份量又足，很受当地人欢迎。

在拉丁美洲一带，女孩满15岁就算成年，父母不管是贫是富，都会隆重其事，为女儿举行庆祝成年仪式。当地人多选择到中餐馆举办成年礼，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华人是个尊敬长辈和重视家庭的民族，到中餐馆庆祝重要的日子，感觉就是不一样。

       为了迎合当地风俗，这里的中餐馆也特别推出生日或成年礼自助套餐。丰盛的菜肴中，中式炒饭和炒面是不可或缺的，烤鸡、炒红豆、传统玉米饼、炸香蕉、煎或烤牛扒等十几道菜也是必备的。

       当地人对中餐的喜爱，已到了永不厌倦的程度。坊间甚至还流传着一个怪说法，就是只要有一个华人坐在店里，这家店的中餐一定既正宗又好吃。

       不过，近年来经营中餐馆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新移民。中餐馆越开越多，造成恶性竞争，为了抢生意，业主各出奇招，加重份量，以吸引更多顾客。

       在首都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有个传统市集。市集里，除了肉贩与菜贩以外，还有一家家华人杂货批发店毗邻而立。杂货批发店如此密集却能生存下来，靠的是薄利多销，以及彼此不成文的默契，以维持良性竞争，保住各自的客源。

       由于治安不靖，抢劫盗窃成风，华商为自保，不得不在商店树立起铁栅栏，当客人光顾时，老板把客人要买的东西从一个长、宽各30厘米的小窗口递出，一手交货，一手收钱，银货两讫，皆大欢喜。

其实，比起贫困的当地人，生活在洪都拉斯的华人，可说是富足到让人妒忌。这里人工便宜，生活费不多，一般家庭都可以请几名佣人来使唤，享受犹如富豪的生活，日子过得相当惬意。

       然而，一些华人却意犹不足，并用“生活无聊”来作为自己经常到赌场的借口。白天，他们忙着开店做生意，晚上过了11点，赌瘾发作，驱使他们去赌场搏杀一番。一名赌场老板表示，他常看到不少华人赌到倾家荡产，输掉餐馆、杂货店。他觉得华人好赌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实在是害惨了自己。

       不过，有另一群华人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活得悠游自在。他们在假日到山上、郊区游玩，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松懈工作上的疲惫。他们也会在生意淡季休息一段日子，带着家人出国旅游或回国探亲，让小孩开阔视野，也可以促进亲子关系。

       此外，也有人选择寄情宗教。南京酒楼老板娘梁太太说：“以前我也上赌场，但是后来我参加基督教会后就很少到赌场去了。每个星期天的2点半到5点，我们20多个人会聚在一起做团契。”如此看来，改变生活习惯并不难，最重要的是靠自己的恒心和毅力。

离开纸醉金迷的赌场，回到现实生活，许多华人的日子都过得很惬意。

       许多华人都不注重过节，就连最重要的农历新年，气氛也清淡如水。这里没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没有锣鼓喧天的舞龙舞狮，华人过节的气氛很淡漠。只要在国外求学或谋生的家人能回家团聚，大家一起吃个团圆饭就已得偿所愿，他们根本不在意其他庆祝仪式。

       由于时差的关系，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通常会特地在除夕清晨6点起来，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感受家乡的过节气氛。过后，他们照常开店，直到晚上歇业后才与家人共享丰盛的团圆饭。饭后再与亲朋好友相聚，翌日如常营业。这种淡薄的过年气氛已持续了许多年。

       直到近年，洪都拉斯华侨总会才开始筹办春节团圆聚餐，稍稍为春节增添了一些喜气。

每年的华侨节联欢大会是洪都拉斯华社最重要的节日。

 除了春节聚餐，华侨总会在每年的10月22日也会举办华侨节联欢大会，这是个象征华人与当地人友谊长存的日子。在这一天，华人和当地人共聚一堂，席间也进行抽奖活动来炒热气氛，奖品多数由华商捐出。华侨总会副会长叶慧明说：“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感谢平日捐款给我们筹办活动的当地企业机构如银行、饮料公司、食品公司等。”

       积极地举办活动之余，华侨总会也协助华人处理居留问题。叶慧明说，虽然成功与否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过他觉得能获得前三军总司令熊伯雄的支持，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虽然熊伯雄已经退出政坛，却仍在移民局等政府部门有一定的影响力。

       华侨总会的成立，说来也有一段故事。1932年，在洪都拉斯北部省份开设小杂货店的谭福休与朱兆盈，由于做生意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无意间抢掉当地一名土霸的生意。后者怀恨在心，就开始到处散布华人威胁当地经济活动的谣言，还发起签名运动，煽动当地居民及政要，千方百计要把华人赶出洪都拉斯。一时之间，排华声浪四起，从北部蔓延到首都，以致各地的华人惶恐不安。幸得当时的洪都拉斯总统卡里亚安帝诺（Tiburcio Carías Andino）出面调解，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在发生排华运动的这一段期间，洪都拉斯北部的圣佩德罗苏拉省的华人群体以及南部首都的华人群体，就是否该成立华侨总会这一个问题进行商谈。最终华侨总会在1930年代末正式成立，并且在往后的日子里，扮演着积极推动华社发展的重要角色，至今已经拥有超过3000名会员。

  华人和当地人通婚并生下混血孩子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下一代除了学习西班牙语之外，也必须懂得中文，才称得上是华人。因此，关有佩夫妇就在1937年设立了洪都拉斯华侨学校。

       华侨学校在50年代的发展最为蓬勃，主要以粤语教学，因此许多家长均乐意将小孩送到学校念书。一些华人还热心地帮忙接送孩子。老华人吴榜才回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开着自己的车，挨家挨户接送小孩上下课。十多个孩子挤在车上，还真热闹。”可惜学校后来因为缺乏师资而停课。

       在华侨学校停办多年之后，华侨总会终于在2007年复办了中文学习班。但是，由于华侨总会现有的会所并没有办法为学生提供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于是，他们只好暂时租用一所学校的教室来上课。因此，若是想恢复昔日华侨学校的光景，华侨总会仍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与精力。

洪都拉斯的广东人给这个国家取了一个粤语谐音「穷到拉屎」的别名，虽然不雅却很贴切。不过，不管它多么穷，唯有这里，才能让华人以小小的商店，赚钱供孩子到美国大学深造，再用很少的钱雇工人，让自己过上舒服的日子。

       长期以来，洪都拉斯政局动荡，社会不安，经济萎靡，生活在这里的华人，感到身心疲惫，所以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的治安和经济可以尽快好转。毕竟这里有太多属于自己的难忘经历，不是离开后就可以轻易忘记的。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中部，东邻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小国寡民，经济落后。

境内湖泊遍布，尤其闻名遐迩的尼加拉瓜湖（Lake Nicaragua），是中美洲第一大湖，湖水湛蓝清澈，美不胜收。周边300多座大小不一的岛屿，是寻幽探秘的好去处。中部高原山地多为活火山，因而有“火山之国”的称号。

       1502年哥伦布发现了尼加拉瓜，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宣告独立，1823年加入中美洲联邦，直到1839年正式建立共和国。美国从20世纪初多次干预尼加拉瓜政局，并在1937年扶持苏慕沙家族（Somoza family）上台，开启了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时代。

       1972年，首都马那瓜经历大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1979年左派桑地诺解放阵线（FSLN，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取代独裁政权成立新政府，实施私产国有化政策。

百余年来，尼加拉瓜的政局动荡不安，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民生困苦。生活在这个命运坎坷的国度，华人只能随之载浮载沉，前途未卜。

于华人何时最早抵达尼加拉瓜，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约于19世纪中叶，便有华人到尼加拉瓜来。另一说法却认为，直至1884年才有华人首次登陆尼加拉瓜的东岸地区。此外，也有记录显示，在1890年，有一些华人从美国、墨西哥等国移居到这里。

       接着，华人逐渐开始从东岸往西移，在马那瓜、格拉纳达（Granada）、马萨亚（Masaya）、莱昂（Leon）等省落脚。安定下来之后，华人大多数都选择从商，经营小型的杂货店，开设肥皂厂或饼干厂，也有华人经营餐馆，只有少数的华人务农或当工人。日子一久，便有一些华人和当地的妇女成婚，并且生下了混血的后裔。

       1930年，尼加拉瓜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华人入境。翌年，尼加拉瓜政府制定新的保护劳工条例，规定外侨所经营的企业必须有75%的员工是尼加拉瓜人。这一项新政策的推行，使不少华人陷于困境，不得不做离开此地的决定。

       如此一来，尼加拉瓜的华人人口自然就越来越少。1937年，尼加拉瓜的华人约有1000人。

       二战期间，大批华人涌进尼加拉瓜，华人人口逐渐回升。在1967年，尼加拉瓜已有大约3000名华人，其中以广东人最多，华人商号则超过250家。到了1970年代后期，这里的华人人口增至4000人左右，其中土生华人就占了3000人，他们主要是聚集在东岸和首都马那瓜一带。

       然而，70年代发生的两件大事，却令原本稳定的华社开始动摇了。一是首都马那瓜在1972年被大地震所摧毁。这次的地震不只造成死伤无数，经济大受影响，也震毁了位于市中心的中华会馆，并且阻滞了华资企业的发展。

       第二件事则是1979年桑地诺解放阵线成功推翻了苏慕沙的独裁政权，并将国家导向社会主义之途。这个新政府除了把私人财产国有化，也推行激进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陷入通膨危机。同时，由反对派挑起的频繁内战以及美国方面的经济制裁，更使原本危困的局势雪上加霜。

       眼看情况越来越糟，许多华人于是纷纷避走他乡，转往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及巴拿马等邻近国家，尼加拉瓜的华人人口骤降。而那些坚持留下来的多数是当地出生的华人。到了1983年，此处的华人商店已经减少至180多家。

       在1990年之后，尼加拉瓜的政局逐渐恢复稳定，新的民选政府励精图治，除了积极鼓励外商前来投资，亦很努力寻找解决外债的方法。

       从1992年开始，台湾人也陆续来这里投资设厂。到了2005年，华人成衣厂已经为尼加拉瓜制造了3万多个就业机会，当时的加工区一片欣欣向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桑地诺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回政坛，有好些华商担心过去的乱局将会重演，于是又再度酝酿着准备离开这里。

   目前，尼加拉瓜的华人可分为三大群体。第一个群体是老华人，他们多原籍广东，大多已年近古稀，主要居住在大西洋沿岸地区。

       第二个群体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是构成尼加拉瓜华社的主要群体，约有1800人，散居在全国各地。他们经过百余年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已经繁衍到第四、五代。这群混血华裔大部分都不会说华语，只会说西班牙语，也没有中文名字，有些甚至从外貌上看已不似华人，只能从他们的姓氏如司徒、刘、张、关、王等来判断他们具有华人血统。

       第三个群体则是近20余年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移居到尼加拉瓜的华人，约有300人。他们大部分是在成衣厂打工，或是结束工厂合约后，选择留下创业的华人。另一些华人则是早期外派到尼国协助开发农业技术的专家，任务完成后，他们因留恋这里的自然环境而留下来。

       华人大多经营中餐馆和从事商品贸易，也有华人经营杂货店、生产药品或种植稻米等。整体而言，华人在这里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大部分人都有车有房。他们多数集中生活在首都马那瓜和莱昂省。

       由于尼加拉瓜近年来政经陷于困境，治安不靖，许多华人选择离开。不过还是有华人持观望态度，静观其变，何去何从，取决于今后局势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尼加拉瓜加工区，成衣业发展欣欣向荣，为当地人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

       1992年台湾成衣制造企业富太，打响了华人到加工区投资的第一炮。翌年，年兴纺织也到这里开设成衣厂。接着鼎大、中国今一等也陆续到这里设立分公司。全盛时期，这个加工区共有12家华人成衣厂，总投资额达2亿美元，这是华人在尼加拉瓜史无前例的大型投资，也是华人经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目前担任诚扬成衣厂（Chen Yong S.A. ）总经理的张光宇说：“早期这里的成衣厂很好赚。当时，尼加拉瓜的纺织品出口到美国没有限量，运输又便利。这里的劳工工资低，也没有劳资纠纷问题。那时的投资环境真是好得没话说！”他指出，像成衣厂这类劳力密集的工业，如果少了这3项优势，就很难维持成长动力。

       然而，自左翼政府奥尔加特（Daniel Ortega）执政后，一切发展优势不复存在。新政府至今已数次调高国民最低工资，从先前的月薪100美元调高至125美元，无形中提高了成衣厂商的生产成本。

    这里的生意不好做，政治不稳定，治安也越来越差，很多华人都选择离开。但是也有人选择留下来，而吸引他们留下来的，不是奢想大富大贵，而是那不愁三餐温饱，又能获得适当享受的简单生活。

       据这里华商反映，由于这里华人少，同行竞争不那么激烈，没有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而且这里人工便宜，虽然工人工作效率低，但秉性纯朴，很少顺手牵羊偷东西。当地人虽然穷，却舍得消费，所以生意还是很好做。

       在东方市场（Oriental Market）经营服饰批发的浙江青田人南旭东说：“我们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中国货品批发中心，不止用现金交易，人流也很多，看起来是治安不太好的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做了几年生意，也没碰到有人进来打抢，反而常常看到店门前的路人被抢。可能是我们市场内的商店都会相互照应，抢匪才不敢猖狂作案。”

暇时南旭东会带着家人到海边购买新鲜海产，他开心地说：“尼加拉瓜两边靠海，海产很便宜，但是当地人不太吃鱼，我们就有机会买到便宜又新鲜的鱼虾。这里虽然不是什么都买得到，可是我已经觉得生活很不错了，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请几个工人帮我做事。如果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享受。所以我喜欢这里。”

       来自巴拿马的吴小丽说：“2006年8月我和夫婿决定来尼加拉瓜做生意。这里人民虽然穷却舍得花钱，竞争也小，生意好做得多。”他们现在一切满足，还没有离开的打算。

       尼加拉瓜华人基督福音会，是部分华人的生活场所。该会查经班成立了十余年，成员多是来自台湾的华人女性，每到周四，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分享阅读圣经的心得，闲话家常。此外，他们也会不定期相约在周六晚上，带着家人到餐馆饱餐一顿，唱唱卡拉OK，或喝酒聊天，愉快地度过周末。对他们来说，这些活动是日常生活里重要的调剂品，不管日子多么单调，能跟三五知己相聚也是一种享受。

 尼加拉瓜最早的华人团体，是1925年由7名华人共同成立的中国友好联盟（China Fraternal Union）。1930年代末，随着华人人口逐渐增多，当地华人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社团，以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团结华人的力量。1942年中国友好联盟改名中华会馆，并注册成为尼加拉瓜第一个合法的华人社团。成立初期，会员主要为居住在尼国太平洋沿岸的华人。

       到40年代后期，会员已发展到尼国各地，许多华人以个人或团体的身份加入，中华会馆成了尼加拉瓜最活跃和重要的社团。

       早期中华会馆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兴办中文学校，为华人子弟提供学习汉语文的机会。曾在中文学校念过书，拥有四分之三华人血统的刘兰坤回忆道：“还记得我十岁时曾经上过中文学校，那时会馆还专门从中国请老师来教我们说广东话。”

       另外，会馆还设立神像，带领会员祭祀祖先。中华会馆也为华人排难解纷，收留无家可归的华人，办理华人入境手续，及提供生活资讯等。此后，以中华会馆为核心的尼加拉瓜华社茁壮成长，随着华人移民持续移入，会馆的成员也不断增加。

       1972年，一次大地震使位在市中心的中华会馆会所毁于一旦，损失惨重。更不幸的是，随着1979年左派桑地诺政府上台，会馆被迫停止运作，直到1992年才恢复活动。

   华人人口少，加上文化断层，有些尼加拉瓜华人悲观地说：“30年后，中华文化说不定会在这里消失，如果没有办法把文化传承下去，下一代的华人将会忘记自己的华人身份。”而在这个非常时期，Fabio Lau所做的一切就显得难能可贵。

       60多岁的Fabio Lau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只有二分之一华人血统，不会说中文，只会西班牙语，原来连自己姓“刘”都不知道，却在尼加拉瓜进行了3年多的华人研究。为了探寻华人先辈的足迹，他走遍尼加拉瓜，反复探寻和记录，并从各个政府单位收集官方资料，撰写了数本关于尼加拉瓜华人移民的史书。

       2005年，第一本《尼加拉瓜华人移民史》（Antecedentes Históricos d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Nicaragua）问世。2007年的《华人在尼加拉瓜之根源与发展历程》，则更详细地纪录了华人先辈在尼加拉瓜的发展经过。他说：“接下来，我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人。”他计划把记录华人历史的文章，像传单一样免费夹带在尼加拉瓜日报供读者阅读。除了这些关于华人历史的研究，Fabio也将华人在当地的生活现况，刊登在由中华会馆出资，不定期出版的西班牙语刊物《EI Mandarin》上。

       Fabio之所以开始热衷研究华人历史则是缘起于数年前的一段经历：“2004年的某一天，一名加拿大学生来我们的华人中心，说要找华人在尼加拉瓜的资料。可是，我们无法提供任何资料。因为属于华人的历史，早在1972年地震时，就跟着旧中华会馆一起消失了。”

       在那之后，他意识到必须有人记录华人在尼加拉瓜的发展历程。他知道如果再不记录，资料就会越变越少，所以他便从父亲留下的一些文件中，开始着手研究华人在当地的移民经过。

 身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局势都不稳定的国家，选择留下来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没有十足的归属感。而土生华人，对中华文化已是一知半解，想要支撑起整个华社，已是有心无力。

       现阶段的尼加拉瓜华社发展，就像是一盘散沙，这里的华人，前途未卜，忧心忡忡。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南端，介于太平洋与加勒比海之间，南北分别是巴拿马和尼加拉瓜。由于境内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享有“野生动植物园”和“生态家园”的美誉。

       哥斯达黎加政治安定，是拉丁美洲各国中实施民主政治最悠久的国家，于1948年内战后更废除军队，在国际间以爱好和平著称。如今，它是中美洲国家中经济最发达、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2007年与中国建交。

华人移居哥斯达黎加已经有160年的历史。

       早期千里迢迢去到哥斯达黎加的华人，大部分都是苦力，他们当中多数曾参与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工程，最终定居于沿海一带。

       1855年，有32名华工自巴拿马被引入哥斯达黎的加泮大连省（Puntarenas）；同年，另有45人稍后抵达。他们被派往农园工作，是当地最早的一批华人。

       哥斯达黎加自19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兴建铁路，因而需要大量的劳工。当时，身在秘鲁策划华工兴建铁路的美国人Henry Meiggs Keith，在1873年引进了653名粤籍华工。这批来自香港及澳门的华工，在海上航行了近3个月以后，才抵达哥斯达黎加。

       甫一下船，这些华工便马上被安排去兴建连接圣何塞到大西洋沿岸的铁路。他们工作时赤身露体，餐风露宿，除了面对恶劣的非人待遇外，还必须面对蛮荒地区瘟疫的侵袭。不少华工因为不堪被凌虐，为求解脱而选择自杀，华人人数也就因此明显减少。根据人口统计调查显示，1855年抵达哥斯达黎加的77人中，到了1864年仅剩13人；而1873年间到来的华人，在十年后只剩下200多人。

       1897年，哥斯达黎加国会以华人是“有害种族”为由，通过了一项禁止华人入境的法令。直至1943年，经由吕华昌（Luis Wachon）等华人侨领的努力交涉之后，这些对华人不公平的禁令才得以解除。

       20世纪初，许多华工在合约期满之后均选择留在哥斯达黎加发展，有的弃农从商，有的栽植香蕉、可可、咖啡等作物。

       那时候，有一批中国人为了达成淘金梦，决意偷渡到美国的旧金山去，结果没有得逞，该船惟有南下并驶至哥斯达黎加的泮大连省港口。上岸了之后，他们在香蕉园或华人的店铺打工，储蓄了一定的资金便自已做生意。当经济状况开始稳定后，有一部分华人重返中国家乡成亲，并把妻儿带回哥斯达黎加，也有部分华人和当地的妇女结婚，从此衍生了许多混血华裔。

       从20世纪50到70年代，哥斯达黎加的移民政策相当宽松，较易申请入境证。华人只需在该国定居5年之后，便能够成为合法公民。因此，从广州、中山等地区涌入了大批中国移民。

       最近一波华人移民潮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哥斯达黎加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敞开国门，欢迎移民的到来，因而吸引了许多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等地区的移民。有些新移民开设中餐馆或杂货店，有的投资设厂。

目前，哥斯达黎加华人约有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他们主要经营传统的中餐馆、五金店、杂货批发、伙食店等；近年也进军其他行业，如旅行社、旅馆、汽车行等。早期华人多来自广东，聚集在泮大连省；后来的大批恩平人则落脚柠檬省（Limon）。如今，大部分老华人以及新移民大多在首都圣何塞经商。

    如今，华人已成为哥斯达黎加社会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沿海的柠檬省、泮打连省内的小城镇到国际大都会圣何塞市中心，每隔几条街就可发现一两家中餐馆和挂着中文招牌的杂货店与五金店，华裔的脸孔也随处可见。

       最初，大部分老一辈的华人都抱着落叶归根的观念，赚钱回国、买地盖房、安享晚年。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拼搏，在当地闯出一番事业后，观念已慢慢转变。如今他们选择在当地购地置业、落地生根。无论在人口集中的城市，还是人烟稀少的小镇，华人已从家庭式的杂货铺、餐馆、伙食店等，逐渐扩大经营房地产等领域。尤其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城市，华人商业占有很大的份额。老一辈的华人多以开中餐馆起家。如今，这些中小型规模的餐馆遍布全国各地，非常受当地人欢迎，尤其在首都圣荷塞，华人餐馆最具规模，且数量也最多。这个不满30万人口的首都，在闹市的大路两旁，中餐馆鳞次栉比，相隔几步便有一间。较早时，华人因资金少，一般在较偏僻的乡郊创业，这些地方治安不好，大家都步步为营，做足保安措施，唯恐发生不测。

       中餐馆大多是小本经营，属家庭式的生意。只需一个小店面，几张桌椅，便可开张营业。老板、厨师、服务员，打扫卫生，则动员全家，各司其职。如果生意兴隆，顾客盈门而忙不过来，至多雇用一两个外人助手。不过在首都闹市，也有三几间大型的中餐馆，富丽堂皇，装潢讲究，上门的食客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富商巨贾，像“皇朝”、“新东王”等饭店，都是有名的大餐馆。

  跟中餐馆一样，华人的杂货店，也多是家庭式的经营。不过，当中不乏具规模的连锁大型超市。超市售卖的货品，包括吃的用的，大多从中国进口；也有少数从日本、美国等国家进口电器、电脑与汽车零件。哥斯达黎加中哥工商联合总会曾举办过几届中国产品展览会，成为当地最具规模及影响力的商贸平台。

       从中国进口的各式商品价廉物美，深获哥斯达黎加人欢迎。华商每年都会往返中国几趟，与制造商洽谈合约进口货品。当地中国杂货业的繁盛，无形中也带动了该国进出口贸易行业的发展。

       哥斯达黎加以农立国，盛产的咖啡、可可、香蕉、凤梨、甘蔗等远销世界各地。华人资本家以其雄厚的资金，丰富的营运理念，购买大片的农园，大规模栽植蔬果，供本地市场与外销。也有企业家投资设厂，进军制造业与食品加工业。台湾人在渔业与水产业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移居到哥国之后，因势利导，占天时地利之优势，投资远洋捕鱼业及鱼虾养殖业，获利颇巨。

       哥斯达黎加沿海风光绮丽，境内多高原山地，火山穿插其间，迸发出的喷泉，云雾缭绕蔚为奇观。南部的拉米斯塔德国家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首都圣何塞美丽洁净，被誉为“美丽的花园城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哥国旅游业发达，沿岸省份的海港，常有来自北美、南美洲国家的游轮，载来许多游客。这些小镇内的小型旅馆，大部分由华人经营。旅馆设计简单，但设备齐全，加上价钱低廉，单人旅客一晚最低收费只要十美元左右，成为许多游客的首选。这些旅馆大多是当地经营五金批发零售或农牧等业务的华商，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副业。

       近几年华商除了发展传统行业，也积极开拓新领域。他们看中当地人每年重修房子的习惯，极力进军五金零售批发、室内设计装修、建筑工程承包等行业。随之还兴起了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替屋主办理买卖房屋、出租房子等业务。此外，亦有华人涉及服装、娱乐等行业。

       哥斯达黎加的国泰金融集团，是中美洲第一家华人控股的金融机构，集团旗下的哥斯达黎加国泰银行，可满足当地商家，尤其是华商在财务上的需求，同时促进该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发展。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一般上事业有成，生活安稳。尤其老一辈华人，生性勤劳节俭，颇受当地人敬重。然而，由于当年华人妇女移民较少，两性比例悬殊，定居之后，多半与当地妇女通婚。他们终日忙碌于创业工作，无暇督导子女，儿女们从小与母亲一起生活，长期受母方的熏陶，因.此都逐渐本土化，失却了中国的传统习性。但他们仍保有华人的姓氏，并以拥有中国血统而自豪。

       第二、三代的混血华裔，很多都已成为医生、律师、会计师与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他们也成立一个“华侨专业协会”，经常聚集连络感情。不少混血华裔也担任公务员，热衷从政，至今已有3位华裔国会议员。

       他们也重视仪表。出门前一定会悉心打扮一番。走在街上，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时尚优雅。见面或告别时，不忘握手、拥抱和亲吻等礼节。

       哥斯达黎加华人大部分祖籍广东，到中餐馆用餐或在家常吃到的大都是粤菜。然而，他们也接受当地美食，尤其偏爱炸大蕉、玉米、薄饼、黑豆炒饭等，平常在家中准备的中式美食，早已经混合当地的食材与口味。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盛产玉米的地方，华人家常饭菜中，少不了玉米粽、玉米饼、玉米团、玉米酒等。

       哥斯达黎加土质优良，盛产的蔬果新鲜甜美。华人喜欢在周末逛圣何塞的蔬果市集，这个大型露天蔬菜水果市集位于市中心附近的第十四大道，每逢周六沿街开放，出售各种新鲜蔬果，价格比超市便宜，广受市民的欢迎。

       哥斯达黎加的甘蔗糖赫赫有名，咖啡豆亦属顶级品种。大部分出口到欧洲国家。咖啡已成为华人早餐最普遍的饮料，而午餐和晚餐他们则饮用加粗糖制成的郎姆酒、糖酒等。每逢周末或假日，华人喜欢邀请好友到家中，喝着咖啡，吃着水果和甜品，闲话家常。

       搓麻将、下象棋是当地华人喜爱的休闲活动；运动方面，华人首选乒乓球及羽毛球。当地人非常喜欢与华人切磋球技，年轻华人则喜欢与当地人一起踢足球、跳交际舞、逛街或看电影，生活多姿多彩。这些互动的交流活动，无形中促进了华人跟当地人之间的了解。

   2003年10月6日，哥斯达黎加国会将每年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订为“中华文化日”，华人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这是华人经过160年辛劳努力的成果，也是当地政府和人民认可华人贡献的具体表现。

       每一届的中华文化日，哥斯达黎加华社各团体都会在旅哥广东华侨联合总会的带领下，全情投入，在国家公园、国会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地区，举办游行、书画工艺品展览、义卖、现场中餐烹调和传统歌舞表演等活动，中华文化气氛弥漫现场。除了华人，游行表演团队中还包括了一群当地青少年，与华人同欢共舞。

       哥斯达黎加华人重视中华节日，一般都会与家人一起欢度，春节会在家中吃团圆饭及向亲人朋友拜年。各地的中华总会，会举办一系列的迎春活动，尤其除夕夜的晚宴和大年初一的舞龙舞狮表演，更是不可少。

       每逢春节，在圣何塞市中心的中餐馆都会趁机推出应节菜肴。这些菜肴的名字都别具一格，寓意在新一年带来好运、幸福和财富。另外，业者也会准备一连串的欢庆活动，其中包括别开生面的醒狮表演、中国乐器、传统舞蹈演出、传统服饰时装秀、中华武术等。

       端午节最主要庆祝活动是赛龙舟。直到今天，在北圣何塞的La Ribera de Belen河畔，每年端午节都有举行龙舟竞赛活动。

       圣何塞市广东同乡会也曾举办盛大的中秋庆祝和牡丹小姐竞选会。这项节庆活动在酒家举行，会场以嫦娥奔月的彩画作布景，佳丽们身旗袍，在传统乐曲的伴奏下，登台亮相。如此气氯热烈的庆祝会虽然不是每年都有，却也为当地华人津津乐道。

当地有30多个华人社团散布各省，其中最主要的是设在圣何塞的哥斯达黎加中华总会，其他还有恩平同乡会、中哥华人华侨联合总会、致公党、台湾协会等。这些华人社团大多数仅靠老华人在支撑，年轻一辈华人大多参加哥斯达黎加华人青年协会、华侨专业协会以及中国哥斯达黎加工商联合总会。

       中华总会共有泮大连、柠檬、尼哥耶、圣十字中华会馆四个分会，鼎盛期会员人数曾高达2000余人，目前人数仅约200人。中华总会为加强各社团间的凝聚力与联系，经常举办大型新年、中秋晚会及其他艺文活动。

       为促进中哥两国贸易和提升华人社会地位，中国哥斯达黎加工商联合总会于1992年成立。现任会长翁翠玉上任后，于2005年创办了中美洲第一份中西文双语会刊——《工商》。该杂志面向哥斯达黎加主流社会及广大华裔，免费赠阅。杂志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哥斯达黎加双边贸易促进活动、两国商界投资资讯、杰出商业人士专访以及两国文化交流等；总统阿里亚斯、外贸部长鲁伊斯等官员都先后发表过文章。

       当地华人没有出版任何中文报纸，市场上可见的三份中文日报，即《拉美快报》、《拉美侨声》和《新报》，都是从巴拿马进口，除了巴拿马新闻，也有哥斯达黎的相关报导。而中文刊物则有《活水》及《号角周报》两份免费赠阅的资讯刊物；另外，中华总会、海外团结协会、台商会、台湾协会以及佛光山等均会定期出版会刊。

哥斯达黎加华人多为天主教徒，尤以第二代为甚。亦有小部分华人信奉基督教、佛教与道教。华人社会现有4间教会，即圣荷西华人福音教会、圣荷西国语浸信会、圣荷西活水基督教会和哥斯达黎加台福基督教会。四间教会的会友总数约350人，每周参与崇拜的人数约300人。身为佛教或道教徒的父母亲都很开放，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因此一个家庭成员信仰不同的宗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哥斯达黎加华人散居各地，当地没有华人庙宇。华人惟有在住家或店铺内安置神像或祖先灵位，每天简单祭拜。哥国唯一的华人义山设在柠檬省，历史悠久，多埋葬第一代华人移民。清明时节仍有少数老一辈的华人到这里扫墓，悼念先人。

       如今，华人葬礼都依照各自所属宗教仪式进行，分别葬在当地人经营的坟场。大部分华人后代皈依天主教，自然选择天主教式的墓地。与当地教徒一样，华人都在每年的11月2日万灵节，一家大小带着鲜花、水果等祭品，前往坟场扫墓，纪念先人。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子女可享有6年义务教育。华人子女大多就读于公立或私立学校，亦有一部分进入美国学校或其他国际学校。公立学校教学语言以西班牙文为主，部分学校亦有英语课程。私立学校则以西文及英文双语教学，但仍以西班牙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美国学校以英文为主，兼有少部分西文课程。

       华人家庭重视子女的教育，大部分华裔青年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专业的技能培训。

       目前，真正修读中文的华人后裔非常少，而且学习管道有限。现只有私立维多利亚学校及佛光山哥斯达黎加福慧精舍中文学校开办中文班。

       台湾人罗贞香女土开办的维多利亚学校，于1991年12月创立。从1979年开始的托儿所，到后来1990、1998年逐渐成形的中小学，通过当地台湾华人资助，罗女土一步一脚印慢慢地把学校办起来。该校原址位于首都圣何塞圣彼得区内，由于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学校在2000年搬迁到首都郊外。

       维多利亚学校把中文列入必修课，教学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从幼儿班至中学七年级，同时提供课外一对一补习课。毕业后，成绩优越的学生更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前往台湾大学深造。校内的学生大部分是当地人，只有小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的华人学生。

       在哥斯达黎加成立了将近20年的佛光山，是中美洲地区的主要分社。佛光山福慧精舍配合当地慈善机构Atenas红十字会，有时派发物资救济该国贫民。

       除了弘扬佛法，福慧精舍亦设立中文学校，以培育华人下一代人才。该校目前有140多个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当地人，其余则是华人后裔。中文班固定在每个星期六全天教学，也安排一对一的个人补习。由于当地华人在中文听力与书写上比较吃力，学校尽量采取图文并茂、轻松易懂的教材，分初级、中级和高级3种。

私立维多利亚学校创办人罗贞香女士是首位在当地办校的台湾人。

   随着中国的崛起，每年都有大量哥斯达黎加厂商参加广交会和其他中国商品交易会，到中国旅游的人也逐年增多，当地掀起了一阵学汉语的热潮。

       有鉴于此，中哥工商联合总会于2006年开办了首个“商务汉语”学习班，近20名哥斯达黎加企业界人士成为首批学员，其中不乏知名银行集团、物流企业、进出口公司负责人。当中更有一些华人后裔，他们多不谙中文，但仰慕中华文化，借此机会好好地学习中文。

  在哥斯达黎加，许多华人后代拥有地道的西班牙姓氏，例如Sanchez、Acon等；或者根本说不清来源，如Yockchen、Sanchun、Manzan等不中不西的奇怪姓氏；有些甚至一家人拥有不同的姓氏。

       西班牙式姓名的排列顺序通常为：名字、父姓、母姓。有些妇女结婚后，会在她的本名后加上丈夫的父姓，中间则用前置词“de”连接，如前柠檬省中华会馆会长黄倩珍女士，姓名是“Juanita de Acon”。

       早期华人与哥斯达黎加女性结婚后，为了得到当地户籍，都选择以妻子的姓氏为小孩登记户口。如华裔前驻华大使Francisco Tacsan，其家族在哥斯达黎加的姓氏是Tacsan，但其祖先本姓应为卢（Lu）。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从早期的被排斥到最终被接纳，是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与抗争的结果。

       如今，华人已渐渐融入当地，成为哥斯达黎加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着富足与安逸的生活。展望未来，哥国华人的前途还是令人感到乐观。

   巴拿马，位处中美洲地峡部分，东西各与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为邻，南北濒临太平洋以及加勒比海。

       巴拿马境内贯通太平洋及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称，在经济及军事上极具重要性。巴拿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该国发展成为中南美洲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以及拥有100多家国际银行代表处的金融中心。

       巴拿马于150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独立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1830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解体，巴拿马成为新格林纳达共和国的一个省。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脱离新格林纳达共和国，成立巴拿马共和国。

  巴拿马的第一批华人移民是在1854年左右抵境的，他们主要从事铁路建筑的工作。当时，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计划开辟一条横贯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Panama-Colon）的铁路。由于当时黑奴制度被废除，劳工极为缺乏，统治者遂转而引进契约华工。1848年，一家专门承包铁路修筑工程的巴拿马铁路公司，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招募华工。1851年到1856年之间，他们把大约两万名华人送到巴拿马修筑铁路。

       华人不仅是修筑铁路的主要劳力，在开凿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工程中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从1881年运河工程动工开始算起，巴拿马运河公司在20年内先后招募了上万名华工。1914年运河竣工之后，巴拿马人在这项工程最险峻的地方树立了“契约劳工亭”，以表达他们对华工的崇敬之情。

       20世纪20年代，美洲国家接连颁布限制移民法令，巴拿马政府也依样画葫芦，制定了限制华人入境法令。这时期墨西哥爆发排华暴行，大批华人流落到巴拿马。1935年，巴拿马政府规定，在农工商业等领域所雇用的职工必须要有至少75%是巴拿马人，而外籍人士在巴拿马经商也必须有当地人股东，这导致华人营业困难，失业率激增。后来经中国驻巴拿马外交机构及华商的努力交涉，巴拿马法院最终裁决该规定违宪而停止执行。

       据中国驻巴拿马外交机构的统计，1945年巴拿马境内的华人不足2000。到了60年代，为了配合巴拿马经济的发展，巴拿马政府实施了开放式的外国人投资条例，促使很多华人重返巴拿马。

       基本上，巴拿马的华人新移民可分为两批。

       第一批是1990年代末期来自港澳的华人，他们属投资移民，带来雄厚的资金，准备投资在巴拿马运河区、自由贸易区或者商业中心。

       另一批华人新移民，则大部分来自广东花县，他们随着20世纪80、90年代的移民大潮来到巴拿马，并散居在郊区小镇，从打工开始，慢慢积累资本，再踏上艰苦的创业路。经营小本生意的以中餐馆、洗衣店、伙食店、五金店居多。

       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华人新移民，散布于巴拿马许多偏远而资源匮乏的市镇，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巴拿马城中巴公园内华人抵达巴拿马150周年纪念碑。

巴拿马华人人口居全中美洲之首，占巴拿马总人口的4%左右；而混血华商的人数可能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上、当地华人有90%来自中国广东省，以花县最多，约占70%；另外也有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华人。

       华人主要分布在首都巴拿马城和科隆市（Colon），部分散居在戴维（David）、贝诺诺美（Penonome）和奇特雷（Chitre）市等地。巴拿马城华人最多、新、老华人移民，分别聚集在新华人街区和旧唐人街。

       巴拿马华人中富商巨贾不多，多数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平缓。150多年来，华人从小型中餐馆、洗衣店、杂货店开始，扩展到大型加工业、制造业、进出口贸易，进而渗透至旅游、医疗、金融、建筑、运输等行业，基础稳健。他们开的成衣店、珠宝行、钟表店、烧腊店等在巴拿马城区比比皆是；而城外较偏远的乡镇，街头巷尾都有华人开的伙食店和中餐馆。

       此外，也有华人从事农牧业，以种植蔬果和养殖鸡、牛为生。这些农产品在当地极为畅销，科隆区一家由华人经营的畜牧场，是该区最主要的牛肉供应商；此外，由台湾人投资种植的柚木林，占了巴拿马柚木总量的50%。

       巴拿马运河让巴拿马在国际上声名显赫。提起运河，当地华人会想到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旗下的巴拿马运河港口公司，这家由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创立的公司，于1997年标得对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长达25年的管理权，并于2005年对运河扩建工程追加投资，和记黄埔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投资总额已达4亿美元，让当地华人引以为傲。

       由于华人移民历史悠久，加上人口众多与集中，巴拿马华人在文化传承方面没有太大的难题。他们成立了中美洲最具规模的中文学校，也创办中文报、网路媒体以及中文电台，丰富了华人的精神生活。近年当地开放的经济体制，不断吸引、也留住了华人的心。他们积极参与当地发展，与国家共存共荣

 以前，老一辈的巴拿马华人为了生活和孩子的将来，不分昼夜埋头苦干。迫于无奈，他们把孩子交给当地保姆照顾，也让下一代接受当地教育，以便他们可以轻松地融入当地社会。然而，却忽略了让孩子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不知不觉中塑造出了许多黑眼睛黄皮肤的巴拿马人。

       如今，在巴拿马土生土长的华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入籍成为公民。他们与当地人一同学习、工作，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可惜许多不通晓中文，对中华文化一知半解。他们被当地老华人称为“十一点仔”，意为差一点、是不完整的华人。这些新生代大部分不再子承父业，也不愿像父辈那样天天埋头经营餐馆，而是选择自己创业，或出任政府部门与大企业高职，或成为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基本上，他们的收入属中上层，生活西化，与老一辈华人比起来相对舒适无忧。

       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华人逐渐习惯了当地拉丁文化和民俗。华人与当地人一样，在正式场合一般都是西装革履。富有的华人女性多数都有一件名叫“波列拉”（Pollera）的传统巴拿马服装，以便出席隆重的场合。饮食方面，当地华人很喜欢巴拿马鸡肉汤“桑科乔”（Sancocho）以及肉煮赤豆，配上大米和玉米等主食。

       至于消遣活动，老一辈的华人喜欢到左邻右舍作客，下棋、搓麻将，闲谈生活趣事，或到赌场小赌。年轻华人则喜欢参与现代体育运动，如足球和棒球；周末或假日晚上，则相约三五好友去看电影或到歌舞厅劲歌热舞。

       同样的，当地人与久居巴拿马的华人接触日繁，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在巴拿马首都，华人经营的商店约有2000家，其中以杂货店和中餐馆数量最多。城中的萧德庆、振兴、永和昌、三环公司等大商行已是全国有名的大型杂货零售店。华人店里的中国货价廉物美，加上中国日益昌盛，尤其具中华风味的装饰品很受当地人喜爱。走进一间间华人商店，顾客大多是当地人，购买力非常高。

       此外，当地人对华人文化的认知，已从敬佩华人的勤奋营生，提升到对中式菜肴的欣赏。巴拿马人对中华饮食的高度接受，造就了当地蓬勃的中餐业，用筷子品尝炒饭炒面等食物的习惯，也已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从早期华人移居巴拿马开始，华人在此代代繁衍。巴拿马建国之初，华人多和当地人混居于市郊，经营小生意；如今，各大城市如巴拿马城、科隆市、贝诺诺美市等都形成了明显的华人聚落，成为正式与非正式的“唐人街”。

       国家经济中心巴拿马城，是最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巴拿马城分古城、老城和新城3部分。早期华人主要聚集在巴拿马古城的Calidonia社区，这里别致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式的修道院、大教堂、医院和皇官等建筑，被狭窄的街道、色彩缤纷的楼房围绕着，散发着浓烈的西班牙风采。古城在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巴拿马第一个唐人街（如今统称旧唐人街）便现身在这个古城区中。

       当初巴拿马铁路和运河工程为古城带来了商业生机，竣工后部分留下的华工拿着苦苦省下的积蓄开始做小生意，慢慢地演变成今天的旧唐人街。早期唐人街的发展区域一度扩大到中央大道、涵盖Santa Ana公园，鸦片馆、算命馆、寺庙与华人老铺林立。当时陆路交通不发达，而唐人街就坐落在火车总站旁，许多在科隆等外埠的华商三两个月就搭火车到此进货，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如今，城内有同乡会、杂货批发零售店、五金行、餐馆及中药铺等，还有填满一座座楼房的华人住家。除了火车总站，旧唐人街还连接中央市场及周边的码头、蔬果和鱼肉市场等地。这些都是华人与当地人聚集、交际、做生意的地方。

 随着巴拿马城的发展，华人社区跟着不断扩展，延伸至Betania行政区的El  Dorado新城。这个华人密集的商业中心，于1994年被巴拿马市长Mercedes Garcia de Villalaz正式命名为巴拿马新唐人街。一排排的店铺：中餐馆、旅行社、中国杂货店、理发店、洗衣店、中文影碟中心等，全由华商经营，而顾客则以当地人占大多数。

       巴拿马首都的华人多居住在新旧唐人街附近。一般年轻上班族栖身简单方便的现代公寓，较富有的华商则选择恬静幽雅的高级住宅区，不少与兄弟姐妹亲友为邻。每逢周末假日，华人都会涌向高楼林立的首都新城。位于老城和古城交接处的新城，其中央大街为全城最宽阔、最繁华的街道，是华人和当地人的购物天堂。中国银行也在这里拓展业务，为华社工商界和当地人提供金融服务。

       在角纪利省的贝诺诺美市以及科隆贸易自由港属的科隆市，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唐人街，但有许多华人聚集在那里生活。贝诺诺美市的发展早期是由两家华人主力开拓，如今继续由他们的后代在背后推动着。

 这里，华人多集中在市中心两条主要的横贯街道。华人表面上经营杂货店，实际上却通过三四代多年的置业投资，买下了市中心多条街区的店铺，控制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进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幕后推手。许多华裔姓氏更是在当地成了响当当的招牌老字号，例如Chang、Him、Lam等。

       离巴拿马城约100多公里科隆市，位于运河大西洋入海口处，是国内第二大、但也是最穷的城市。许多华人在这里谋生，当中以新移民尤多。华人大部分经营小型的中餐馆、伙食店及五金店，客源尽是当地人。这些华人都居住在店铺后方或楼上，生活简朴。

       而在位于科隆市东北部的科隆自由贸易区内，有不少较富裕的华商，在这占地约400公顷的2000多家企业中，与阿拉伯及犹太人肩并肩，从事进出口和转口贸易。他们从中国进口各类纺织品、日常用品、家电以及各型机械，再转出口到其他欧美国家。

在传统节日方面，当地华人最重视春节。华人遵循旧俗，除夕夜阖家团聚吃团圆饭，大年初一派红包、拜年等。由于大部分华人在农历正月初一仍做生意或上班，大部分节庆活动都安排在傍晚打烊后进行。巴拿马前第一副总统阿图罗·巴利亚里诺曾数次出席花县同乡会的春宴，而巴拿马市长也出席中华总会的新春晚宴，向全体华人拜年。不少当地人会与华人一起过春节，参与贴春联、挂红灯笼、放鞭炮、拜年和春宴等活动。

       每逢春节，各大华人团体都会举行春宴、茶会，庆贺新春的来临。角纪利、科隆等华人地方社团，会筹备敬老春宴、理监事就职等欢庆活动。花县同乡会曾举办过“投胜灯”活动，吸引了当地各大商行及金融机构出重金投标，以求个“万事胜意”的好兆头。而代表巴拿马全体华人的中华总会，每年都在首都不同的地点，尤其是购物商场及商业区，举办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如拜年、醒狮采青、文艺表演以及放烟花鞭炮等，把巴拿马城渲染在一片浓浓中华节庆气氛当中。

       巴拿马华社把每年的4月5日定为清明扫墓日。这一天，华人会聚集在华人历史最悠久的安肯山（Ancon Hill）El Chorrillo 坟场、El Carmen教堂等地祭拜祖先，凸显了当地华人重视儒家传统及孝道。他们认为清明除了悼念先人，也是获得先人祝福的重要节日。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巴拿马，华人大部分信奉天主教。但当地也约有2万5000名佛教徒，因此有些华人家庭中会有两种信仰共存的现象，例如年轻一辈的华人子女可能从小就受洗礼，常参加教会活动，却又恭敬地遵从父母亲意思祭拜祖先或神佛。

       19世纪首批华人到巴拿马建筑铁路时，就带进了关公信仰。当时，有多个客家团体，在如今的巴拿马旧唐人街区联合兴建了供奉关公、观音圣像的人和会馆。这座于1898年建成的人和会馆关帝宝殿，是目前当地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每当华人庆祝农历新年、中秋和关公诞等节日，庙里庙外香火鼎盛，人潮沸腾。

* *自2004年开始，巴拿马政府宣布，每年的3月30日为“全国华人日”。这一举措是对华人为巴拿马所作的贡献表示肯定。*
* 年轻一代巴拿马华人从小生活在西方文化的氛围里，西班牙语及英语是他们的生活语言，只有少部分人会以简单的普通话或方言与父母交谈。当地最常见的华人方言有粤语和客家话，而部分新移民则习惯以普通话沟通。
* 巴拿马许多华人子弟都报读由基督教浸信会所办的学校，例如巴拿马城的Instituto PanAmericano学校、科隆城的La Salle de San Jose学校，以及La Academia Santa Maria学校等。由于一些天主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信教才能入学，因此有些华人家长，让孩子在出世时就接受洗礼，以方便长大后入学。为了不让孩子丧失学习中文的机会，有不少华人家长为子女聘请家教补习中文。同时，也有不少家长趁着学校年终假期，把孩子送到中国学中文；有些孩子则在高中毕业上大学前，到中国学习华语一年。
* 老一辈华人移民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不断为下一代的中华文化教育而努力。1986年，巴拿马华人集资百万美元在新城边缘的友谊大道建立了一所集体育、教育、文化与观光于一体的普及化教育中心。这所全权由华人承办的教育中心——巴拿马中巴文化中心和中山学校，现有学生近2000名，是中美洲最完整、且最具规模的教育机构。学校内有会议室、图书馆、体育馆、游泳池、运动场等；学制分为幼稚园、小学及中学的12年教育。此外，该校还提供社区教学、烹饪、武术、美术劳作等副科。
* 在巴拿马，除中山学校外，教授中文的学校还有华人基督教所建立的仁爱书院。这所位于拜地耶区（Paitilla）、于2002年注册的学校，使用英、西、中3种语文教学。与中山学校相比，仁爱书院规模较小、教授中文科的时段较短，从幼儿园至小学6年级各4班，每班学员30名左右，中文课由3位教师负责，以融合当地教育与中华特色为办校宗旨。而其他学习中文的管道，包括基督教会、巴拿马大学以及中华工商总会开办的中文班。
* 华人只要有能力，都会供孩子完成大学教育，较富裕的家庭常把孩子送到美国、加拿大等地深造。在中山学校毕业、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有不少获颁巴拿马各大国立及私立大学奖学金，免费进入大学就读，毕业后回馈社会。而到国外深造的华人子弟，毕业后有些继续留在国外，部分则选择回国工作，对国家发展贡献良多。
* 巴拿马华人除了成立中美洲规模最完整的中文教育机构，也透过中文报章、网络、电台3种方式，推动该区域中文媒体的发展。
* 巴拿马华社每天出版3份中文报，即《拉美快报》、《拉美侨声》以及《新报》，传播最新的国内外新闻。这3份中文报价格统一，零售价每份50美分，每月订阅费十美元，每天总发行量在3000份左右，读者群主要是通晓中文的老华人及新移民。他们大部分通过订阅，获取当地第一手的华社新闻，同时了解中港台最新消息。与当地土生华人相比，他们对当地华社及祖国的发展较为关注，中文报对他们而言已成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 于1992年创刊的《拉美快报》，是目前巴拿马发行量最大、历史最久的中文报，居拉丁美洲中文报发行量第二位。每日推出对开16版新闻，每周出版6天。发行区从国内各省延伸至哥斯达黎加，并在哥国设有分社，主要负责该国境内的报纸发行及广告业务。
* 前身是《侨声日报》的《拉美侨声》，创刊于2002年，同样以16大版发行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两国。秉持着“服务侨胞、华侨之声”的理念，该报配合国内外华社创办版面，着重报导华社侨团的各项活动。巴拿马最年轻的《新报》，则由当地华社于2004年集资成立，办报宗旨为提升华人在该国的形象与地位，同时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
* 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也加入中文媒体阵容，丰富且快速地传播华社资讯。对电脑科技兴趣浓厚的科隆侨领冯培坚，在2002年自行成立了“巴华网”，经常转载当地中文报新闻，为当地华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资讯管道。另外，中华总会也与时并进，于2005年成立了“巴拿马侨网”及“巴拿马论坛”，为会员提供即时华社动态。
* 此外，巴拿马还拥有唯一的一个中文广播频道——1180AM中文频道，每日广播新闻和各种音乐节目。中文综合节目“雯雯与你，空中相会”，尤其广受欢迎。该节目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从早上9点至11点播放，内容精彩多元，主持人以鲜明活泼的港式播音风格，吸引了当地许多原籍广东、通晓粤语的听众，大部分是年轻的新移民。
* 早期巴拿马华人分散在奇利基、角纪利省、科隆、西部等地区，成立宗乡组织，如科隆四邑同乡会、巴拿马花县同乡会、巴拿马西部中华公所、旅巴四邑华侨联谊会等。眼见社团各自为政，缺乏一个中心团体，各地华社之后成立了一个联合性的代表社团——巴拿马中华总会。
* 前身为中华会馆的中华总会，成立于1943年，其宗旨为“以一个慈善机构联络感情，共谋全侨福利，发展华侨事业，促进中巴文化交流”。中华总会理事来自各个华人社团，当中包括花县同乡会、古冈州会馆、中山同乡会、鹤山公所、四邑华侨联谊会、人和会馆及清远从化同乡会等。各地区同乡会主席或会长自然成为中华总会理事，国内其他省份的华人组织也都派有代表参加。总会透过工作委员会，不断扶助会员，并负责协调各社团、商会、民间组织等。同时，总会经常在国内发生重大灾情时参与赈灾活动。
* 如今，许多成功华商以及新移民创业家，都是通过巴拿马同乡之间“充会”的方式筹集资金。长久以来，华社利用同乡经常会面的机会集资，再贷款给有需要的华人，扶助他们创业或扩展经营。这一筹集资金和互助互利的“充会”方式，对新移民尤为重要，直接推动、壮大了华人经济发展。
* 巴拿马华人在事业有成后，从不忘回馈社会。例如始自1998年的巴拿马电力通（TELETON 20-30）慈善募款活动，中华总会每年的捐款额均在6万美元以上。2007年，中华总会正式成为电力通主要赞助单位，旗下各大华团捐款总额更高达8万8000美元。该笔款项将资助巴拿马儿童医院，造福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华人的爱国之心获得当地社会好评。
* 拥有中美洲最大的华人族群，巴拿马华社引领着中美洲华社的互动与交流。巴拿马城自1966年召开第一届的中美洲暨巴拿马华侨恳亲大会后，续由中美洲各国的华社轮流举办至今。中美六国恳亲大会可称得上是历史最悠久的海外华人国际性会议，且已发展成该区华人联系的重要平台，成就许多共识与合作。
* 老一辈华社领袖在每一届恳亲大会交流，不忘邀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每年，中美洲6国都会举办各自的华侨小姐选美，当选的华侨小姐将代表该国华社参加“中美洲暨巴拿马华侨小姐选美”比赛。而中美洲中国青年会的成立，也是由该恳亲大会发起。

现今许多巴拿马华人后代已失去祖先的姓氏，主要是因为早期华人初来报到登记资料时，由于语言障碍，当地官员常把华人姓名中第一个字误填为名字，后两个字填为姓氏。例如，陈阿福，登记时他会说自己叫“阿福”，记录的官员只写“Apuy”，流传到后代就以“Apuy”代替了“陈”姓。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奇怪的西文姓氏便取代了华人原先的中文姓氏。

       这类姓氏当中，姓Ah-Kai者其原姓是Cheng，Vong-Chong则为Wong。也有原姓Chong的被误写为Lim-Yuen，Him姓登记为Naranjo，Ho姓改为Othon或Ocon。当时，许多华人终日忙于工作，无暇处理更正名字所要面对的繁杂手续，将错就错让填错的西文名字一代接一代继续使用至今，有些当地华人的原本姓氏早已无从考究。

       所以，如今可以直接通过音译姓名来辨别华人身份的可能性极低。尤其部分华人后代信奉天主教、取了教名，或父母为了方便以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干脆把孩子名字拉丁化，其中文名更是无迹可寻。

 在华人踏足巴拿马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充满了心酸与悲愤的历。他们为了寻找美好的生活，漂洋过海来到巴拿马，在不同的阶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修铁路、开运河到现代化建设，洒下的血和汗凝聚出无数的成果。

       如今，巴拿马华人已渐渐融入主流社会，开拓出一番新天地。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工程、科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无一不是华人在幕后默默推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踏实勤奋的华人是推动巴拿马二十一世纪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古巴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两百多公里，是加勒比海面积最大、也是当今世上寥寥可数的孤傲国家。这里的统治者不理会世俗的眼光，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古巴由1600多个岛屿组成，气候温暖湿润，以蔗糖为主要经济支柱。古巴出产的雪茄，及由糖蜜提炼的兰姆酒更是闻名于世。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旅游业揭开了古巴的神秘面纱，到古巴观光成为许多旅游者的目标，而到这里则一定不要忘记欣赏一场古巴人的棒球比赛——这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全民运动。

       在1868年与1895年的两次独立战争里，华人曾积极投身于古巴的革命洪流中。他们舍身杀敌的功绩，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那坐落在哈瓦那市中心、8尺高的黑色大理石记功碑上这么写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但是，1959年那场改变古巴命运的革命，也同样改变了华人的命运。那时，能离开的华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在50年后的今天，绝大部分都只能靠着政府每月的配给静静度日。虽然最近几年华人新移民不断增多，但华社昔日的荣耀已一去不复返。

  最早抵达古巴的华人是以苦力的身份到来的。1847年6月，212名广东籍的契约华工飘洋过海来到古巴。他们到岸后立即被剥去上衣，热烫的铁条接着便在他们的身上烙下一个“C”字，表示他们是属于古巴的；然后被他们带往哈瓦那的人贩市场，分为上、中、下3种等级，全身赤裸地任买主看验估价，甚至被鞭打以测试其筋肉反应能力。

       买主选好并付钱后，便将这些契约华工送到种植园去劳作。他们在工头的皮鞭下一周工作7日、每日十三四个小时不停地劳动。在买主的眼里，华工的性命不值一文钱，他们仅是出卖劳力的畜牲而已。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每个月仅有几个古巴比索的工资。挨了数年，好不容易到了合约期满，原本约定的一张免费回乡船票却被雇主扣押下来，回不去的他们唯有留下来继续工作。

       那时候，客死异乡的华工们最悲凉的下场莫过于死无全尸。据记载，在古巴还曾经发生过糖寮用华工的尸体混杂牛马的骨头，燃烧成灰来提炼白糖的事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活着的时候已被压榨得不成人形，在死后仍然得不到全尸。

 1874年，被卖到古巴的华工已经多达14万3000人，被虐待致死的竟有1万7000人。由于回国无望，华工唯有留在当地娶妻生子，并且开枝散叶，这便是古巴目前数十万名混血华裔的来源。不过，华工在行婚礼的时候，非常坚持传统风俗，他们不愿意前往教堂结婚，只希望能在关公像前与当地妻子互相许下终身承诺。

       1886年，古巴取消了奴隶制度，获得人身自由的华工们陆续进入城镇，他们用累积多年的资金自行创业，或在华人的商店里打工。

       在短短数年内，华人所经营的商行、杂货店、洗衣店、旅馆等已经遍布全古巴。而那些走街串巷的卖货郎，以及自产自销的蔬菜小贩也活跃于各个社区。除了哈瓦那之外，古巴东南面的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Santiago）亦成了另一个华人聚居地。

       那时候的哈瓦那唐人街，是美洲最大、同时也是最兴旺的华人社区。这里极为热闹，烧腊点心铺、布店、药店、杂货店林立，还有好几家戏院和麻将馆，向来非常注重子女教育的华人也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学校。

       1893年，一批华人在哈瓦那成立了中华总会馆，每逢农历新年或其他中国重要的节日，他们就会聚集在谷奇瑶（Cuchillo）与桑哈街（Zanja）之间，燃放爆竹、舞龙舞狮，热热闹闹地进行各项庆祝活动，一直到了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维持着这样的传统。

       1915年前后，中华总会馆筹资了数万元，设立颐侨院，专门收容那些60岁以上孤苦无依的老人，又购下一块国家墓地作为中华总义山，让华人死后能够入土为安。

       华人最后一次大量移民古巴，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革命的前夕，那时候，有不少华人因为中国动荡不安而逃到古巴来。

       但是，自从卡斯特罗宣布带领古巴走社会主义经济之路，华人又纷纷逃离古巴。卡斯特罗政府采取极为严格的国有化措施，没收所有人的财产，取缔所有私人经济，甚至连修补鞋子的小摊位也要收归国有，对华人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无数人的资产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短短的数个月间，华人人口非常明显地急速减少，能走的都移居到附近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留下来的旦夕之间都变成了领工资的劳动者，以往一片欣欣向荣的哈瓦那唐人街也迅速变成了落寞孤寂的街区。

       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海关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偷渡的古巴人能够抵达美国的陆地就算移民成功，不会被遣返。可是，倘若在海上被逮住的话，就只能遣送回国。1959年之后，从古巴移出的众多华人当中，可能大部分都选择前往美国。

   在推行社会主义治国的最初阶段，古巴政府全面禁止个人拥有私产，因此有些老华人就算想把私下收藏的三五千美元，留给自己的儿女也不行，因为一旦被政府发现，就会收归国有。那段日子，华人都不敢把钱存在国家银行，因为只要被政府发现在银行存入超过每月基本工资的钱，就会被当局彻查资产。

       自1959年古巴推行计划经济后，长期以来，古巴的经济就停滞不前，民生困苦，境内的年轻华人都已远走高飞。如今，这里只剩下198名老华人，他们都在65岁以上，祖籍包括广东四邑（开平、恩平、新会和台山）、番禺、斗门、顺德、九江等。他们大部分都在40、50年代之间移入，主要聚居在哈瓦那华区周围，其中有8名老人住在市中心的颐侨居里。

       另外这里还有多达10余万名混血华裔，除了少数几个混血华裔懂得华语，活跃于华人社区，担任中文教师、社团主席等职务外，其他人几乎都已不会中文。除此之外，现在在古巴所见到的年轻华人，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据悉，古巴华人是拉美地区华人社区里与异族通婚最多的群体，混血华裔改名换姓现象最为普遍。为留住即将消失的古巴华人历史，邵正和将军和现任中华总会馆主席的崔广昌等人，多年来积极致力于哈瓦那华区的挽救与复兴工作。但放眼来看，古巴华社暮气沉沉，前景依然不甚乐观。

    50年来，时间之神似乎跟古巴开了一个玩笑，整个国家好像依旧在原地踏步。在古巴留学6年的阳楚明说：“这里好像是中国大陆的80年代，但是那种感觉却又不太一样，好像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说不出的情绪是复杂的，也的确无法用单纯的思维去理解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仅就货币制度而言，古巴就比其他国家复杂得多。这里同时流通两种货币，华人称那类供当地人使用的货币为土比索（Cuba Peso），也就是古巴比索，称另一种供游客使用的货币为红比索（Cuba Convertible Peso），也称为可兑换比索。华人通常用土比索到国营商店和菜市场买东西，红比索则是到自由市场、超级市场、旅游区等地购买奢侈品时才派上用场。

       在古巴要赚红比索不容易，这里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以土比索来计算的，每月平均只有300元左右（约12个红比索），如果是公务员则可以按薪水比例，每月获得额外的10至30个红比索补助。

       古巴的老华人多数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每个月可领取约200土比索。他们每天带着供应本，到指定商店领取一颗比拳头小一点的免费面包，像果汁、汽水这种要付红比索才能买到的奢侈品，他们可能要省上几年的时间才舍得去买。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在古巴赚到可观的红比索，就不要有物质奢望，不然日子会很难过。

    老华人说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政府并没有让他们挨饿。在古巴，只要有粮油供应本，每个月都可以用低价买到定量的日常所需，包括鸡肉、鱼肉、牛肉、大豆、米、菜油、肥皂、牙膏等。“面包、糖加水”就可以当一餐，当然不会饿死，只是想多吃些什么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有华人表示，他们有时半年也吃不上一粒鸡蛋，牛肉的话，恐怕要多走几家商店才能买到，鱼肉呢，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另外在供应本上有个特殊的栏目，就是每月老年男性可免费领取数支雪茄和4包香烟，7岁以下的孩童则免费配给牛奶。

       因为国家长期物质短缺，所以不得不实行供应本以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所需。古巴民间常常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今天有的，明天未必有。”

       阳楚明说：“我就经历过市场上足足两个月没有卫生纸的日子，那时候有机会去酒店，就从那边悄悄带些出来，不然能怎么办？”那种感受当然不好，因此她后来也养成了生活必需品在有的时候就尽量多买的习惯。

       4卷卫生纸要价1.5红比索，按照当地收入来看，真不便宜。阳楚明这样的留学生没有供应本，许多生活用品就得到红比索商店购买，开销很大。不过她认为自己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只要省一些，对生活不要太计较就行。“其实现在的古巴比以前好很多了，尽管现在有钱还是买不到一些想要的东西。”她说。

       在劳尔（Raul Castro Ruz）未接任哥哥卡斯特罗的总统职务以前，古巴华人简直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除了通过外国游客得知外面发生的事情外，就没有其他管道了。直到2008年劳尔上任后，政府才逐步放宽通讯限制，开放手机市场，也批准国营商店向个人售卖电脑等。

* *在1961年4月17日猪湾事件发生后的隔天，古巴华人为保家卫国而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华侨民兵队，这支编号179的民兵队被称为黄淘白（Jose Wong），是为了纪念在1939年遭政治谋杀的华人革命领袖黄淘白。此后每年的4月17日，古巴社会主义同盟都会为这位古巴革命先驱者、革命组织保卫工农联盟领导人及民兵队举行纪念活动。*

       尽管有进步，但从国外拨电话到古巴，费用依然高昂，且通话也不清晰，要想跟古巴华人通过电邮联系，也要等上好一阵子才会有回应。

       目前，古巴互联网的发展很不均衡。在大学校园内已经可以使用无线网络，但在一般百姓家里还是不能自由上网。古巴华人想要上网，只能到特定地点，费用每小时要价6个红比索。外国人则可以自由申请互联网服务，月租费约合28个红比索，限用30个小时。

       一名中国留学生说：“因为网速慢，费用昂贵，而且有时间限制，所以我每次都只是上网发邮件，内容都是离线打好后粘贴到邮件上的。”

  古巴人喜爱读报，最受欢迎的《格拉玛报》常在开卖两个小时后就会售罄，如果想看，就只能从起早摸黑去排队的古巴人手上用多出几倍的价钱购买，常常一份原价20分土比索的报纸，二手价高达80分或100分。

       在龙岗亲义总公所等待免费午餐的81岁老华人李鼎来，就习惯每天清晨6点半到报摊去排队，买格拉玛报来看。不过，他却不一定买得到，因为许多人比他来得更早。对古巴人来说，虽然转手卖报纸的收入不算可观，毕竟也是一个额外收入。

   龙岗亲义总公所旗下的餐馆，是华区唯一提供免费午晚两餐给无依无靠的老华人的地方，老华人把这里称为“老人食堂”，每天中午11点半都可以看到数十名老人聚集在这里用餐。除了吃午餐，他们也自带餐盒把晚餐带回家。

       90岁的马熙平是“老人食堂”的常客，1948年从中国大陆来到古巴。数年来，他前后6次想离开古巴，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成行。马先生这样的经历，也是许多老华人的写照。

       由于这里物质匮乏，“老人食堂”虽然有政府资助，免费供应的饭菜也仅仅是一块小小的肉，一小碗由黄豆或黑豆熬成，时淡时浓的汤汁或面条汤，再加上一小堆有点干硬的白米饭。对这些孤苦无依的老人来说，虽说不上美味可口，但至少还能够填饱肚子，因此，他们都很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食物。

       除了龙岗总公所，古巴洪门民治党旗下的餐馆，也一样每天免费供应午晚餐给老华人，但是来这里用餐的人必须是民治党的会员才行。

   在哈瓦那除了唐人街的十家中餐馆，还可以看到另一类别具一格的餐馆，那便是由华人社团所经营的中餐馆。有趣的是，这些餐馆的名字就是社团的名称，餐馆的老板就是社团的主席。这些社团主席，必须是华人或华人后代才有资格担任。

       中华总会馆是古巴最大，也是唯一没有经营餐馆的华人社团。第二大华团是民治党，社会主义同盟排在第三。其他有黄江夏堂、李陇西公所、九江公会、余风彩堂、安定堂、朔源堂、至德堂、陈颖川堂和中山自治所。另有一家林西河堂已宣告倒闭，现在成为古巴武术学校办事处。

* *古巴是拉丁美洲地区最早出现华人社团的国家，即1867年由古巴华人钟熙等人在哈瓦那市成立的“结义堂”。*

古巴每一个华人会馆的会员，每年都必须缴交12个土比索的会费，他们除了可以参加新年聚餐外，会馆每个月也会为当月生日的会员搞生日会，并派发一袋小礼物。这样的福利在古巴非常少见，因此许多人都希望成为会馆的成员。只不过入会并不容易，一定要提出确凿的华人血统证件才行，以杜绝有人冒充华人后代。

       古巴至今仍不允许私营机构的存在，但是在哈瓦那却有华人私人餐馆，原来，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与古巴的友好关系，以及华区促进会的努力而促成的。

       华区促进会成立于1993年，由邵黄将军和一群古巴华人在庆祝中华总会馆成立100周年时所发起。当时，他们委任拥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背景的华裔伍月梅，规划重建华区的蓝图。

       伍月梅指出，在重建计划中，除丁修复华区老建筑外，他们也希望能延续中华文化的传承，因此，他们的规划定期举办中华文化活动及文娱表演。不过，这样的计划需要大量资金，那时古巴经济极度低迷，政府根本设有资金拨款协助华区的整修。

       这时，华促会想到了自给自足的方法，便向政府申将唐人街内的9个店面规划成餐馆特区。然后他们再把执照发给华人或华裔，与他们合作开设私人餐馆以筹集资金。这项计划除了能招揽游客促进观光业外，也能筹到数修华区的经费。

       后来，华促会把这个概念扩大使用，与华人社团合作馆，挽救了许多因严重短缺经费而濒临关门的社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会馆和餐馆合二为一的原因。

       与华促会合作的餐馆在运营初期，华促会每周都会调查餐馆的成本和利润，经过计算再决定每周该向餐馆收取多少营运费用。

       华促会还建立了老华人养老院——颐侨居、古巴武术学校和中国传统艺术馆。其实，对伍月梅来说，自己不仅不懂中文，对中华文化的接触也非常有限，复兴华区的工作对她而言是很艰难的任务，她说：“能够走到现在，真是很不容易。”

       尽管华促会已在2000年解散，但是伍月梅坚持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却仍未消失。她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回到华区转转，看看这里的发展状况。

   现阶段，华区内的古巴武术学校已经办得有声有色，每周一至周六的上午7点半到9点半都会看到学员在这里练习武术，有时舞剑，有时挥拳，有时耍棍。

       武术学校负责人李荣富说：“我们主要教学员两种修身养性的功夫，分别是导引养生功和练功十八法，小孩、年轻人、老年人、生病的人都可以到我们这里练功。”

       该校目前有5000多名学员，全古巴包括公园在内，共有50多个不同的练习场地，全国有40多名武术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李荣富的一名华裔女学员黄美莲的表现非常出色，常常能在古巴的电视节目如“看中国”中，看到她的表演。黄氏曾到北京学习过数年武术，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另外一位必需介绍的华人，是在中国传统艺术馆教授普通话的邓小荣。当年他也是华促会的成员之一，是难得会说广东话和普通话的纯血统华人。

       “我之所以能够说流利的广东话，是因为我母亲以前在家里开班教小朋友广东话、唱歌和玩游戏。所以从小我就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学习。”后来他发现，如果想要更透彻地了解祖籍地的文化，必须学会普通话，所以到林肯学校去上课。

       当时，林肯学校是古巴唯一能学普通话的地方，华语教师也只有一个，他就是冯啸天。邓小荣去上课的时候，冯啸天已经在那里教华语30余年了。

       邓小荣说，冯啸天在世时，除了当华文教师之外，也曾担任过华文报《光华报》的总编辑。1995年在中国传统艺术馆里成立的华文班，也是由冯啸天一手创建的。对于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贡献，冯啸天功不可没，直到去世数年后的今天，古巴华人仍会常常提起他。

       一位中文名叫美兰的古巴华文教师，很努力地用生硬的华语解说道：“除了星期天以外，这里每天都上课，上课时间从傍晚到晚上8点，每个月的学费是20个土比索。华文班分成一至四年级，念完四年级后可升到高年级。”她对华文有浓厚的兴趣，也是冯先生的学生，她的女儿目前也在这里学华文。

       此外，艺术馆在周六还另外开设免费的普通话和广东话补习班，而教师就是平日在傍晚上华文课的学生，他们都是义务教师，学员则从小学生至50多岁的老人家都有。这里的师生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出正规的华文教师到古巴授课，毕竟这比学生做义务老师强多了。

  1868年，古巴的独立之父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Céspedes）为了反抗残忍的西班牙殖民者，带领古巴人民展开第一次独立战争，而契约华工们为了替惨遭棍打鞭笞致死的同胞们讨回公道，也义无反顾地从庄园逃出来参与这场斗争。

       在这次的独立战争期间，有一位名叫Tankredo的华人中尉，作战时遭西班牙军队逮捕。当时，西班牙人误认为他仅是一名“苦力”而要将他放走，可是一身傲骨的他却从口袋里取出文件并交给对方看，以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并非苦力，然后他说：“射吧！”请对方了结自己的性命。另一位名叫Pio Cabrera的华人战士则是在1878年的一次战争当中，为了掩护战友安全地转移阵地，而独自一人面对50多名西班牙殖民军，直至壮烈牺牲为止。

       到了1895年，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领导人民展开了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华人军官胡开枝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捐作革命军饷，并以大量的粮食接济古巴革命军。在革命结束之后，胡开枝曾经担任圣克拉拉（Santa Clara）省的卫生局长、哈瓦那移民局领导等职。他一生性格豪迈，且乐善好施，死后被古巴政府授予上校军衔，安葬于中华总义山。

古巴华侨纪念碑，为纪念华人参加两次独立战争中的贡献，上面刻着：

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

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在长达30年的独立战争当中，有成千上万留着辫子的古巴华人投身革命洪流，当时有数支部队是由华人所组成。一名古巴老华人自豪地说：“那些西班牙军很怕我们华人军队，他们都以为我们华人会武功，很能打又不怕死，还没有跟我们的先辈正面交锋就已经被吓坏了。”

       1938年于古巴马坦萨斯省出生的华裔将军邵正和（Moisés Sío Wong），曾经与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并肩作战，一起投身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目前，他是古巴储备局局长兼古中友协主席。

       卡斯特罗曾问过他，到底有多少名华人参加古巴独立战争和革命战争？邵将军回答说他也不知道确实的数字，因为有许多华人已经改用西班牙名，仅从姓名上完全无法分辨他们的身份。不过，保守估计前后至少有一万多名华人参与两次的独立战争，而参加卡斯特罗革命战争的，则可能有数百人。

       为了纪念这些在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华人勇士，仍在古巴生活的华人于每年的清明节，总会到哈瓦那市滨海大道与Reina街交汇处那8尺高的记功碑，以及中华总义山的先烈纪念碑敬献花圈，以表达对先贤的敬意。

    哈瓦那市中心的德拉贡乃斯街（Dragones）是华区的入口处，那里有一个写着“华人街”3个大字的中式牌楼。这条华人街是1993年经过华区规划和整修后而形成的。

       走过4个街口，眼前出现了另一座小小的“中国城”牌楼。从牌楼下走入华区，常令人疑惑，这里真的是华人区，抑或仅是一个招揽观光客的旅游景点？

       没错，这条满是游客的步行街，就是昔日唐人街的原址。入口处左边，挂着残旧招牌的金鹰戏院仍在营运，只不过，观众早已不再是华人，而是当地人。

       有50%华人血统，只会说西班牙语的古巴社会主义同盟主席沈先莲，回忆父亲在世时的生活时，也聊起了自己当年在戏院玩耍的经历，她的父亲以前在市场卖猪肉，她小时候最喜欢跟着父亲到唐人街的社团、公园、餐馆和戏院送肉。

   “有时，父亲没办法照顾我，就把我放在戏院看戏。我最喜欢戏院里的卡通片，虽然我懂的中文不多，也看不太明白卡通片的内容，不过戏院里会有人解说，所以我很喜欢去戏院。”她回忆说。那时，除了新大陆戏院，还有一家新民戏院，另外还有演出粤剧的上海大剧院。不过现在都已拆除，只剩下金鹰戏院。

       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古巴人的中华总会馆书记周卓明，对唐人街里的电影院也有很深刻的记忆。他说自己的广东话和普通话就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小时候自己总喜欢往电影院里钻，还依稀记得一些那时候放映的电影“宝莲灯”、“黄飞鸿”、“方世玉”……“那时，每周都会有一部华语新片上映。”

       老华人说，虽然这里的街道依然和从前一样热闹，只不过，一切已变了样，从前的永兴隆、广生荣、万草和、两利、恒安隆、广昌隆等老字号，都已经找不到痕迹，现在这里只有排列在两旁，由华人或者华裔经营的十家中餐馆。

       事实上，真正由血统纯正的华人经营的餐馆只有两家，其中一家是东坡楼，业主是已经在古巴生活了60多年的老华人陈钊森。

       另一家是1997年由李荣富夫妇所开设的天坛饭店。李荣富只有1/4华人血统，太太陶琦则是在1995年和父母来哈瓦那寻找商机的上海人。

       为了吸引游客，这里的中餐馆装潢，必不可少的就是红灯笼、鞭炮、对联，还有佛像。而为了配合天性浪漫的古巴人，这里所有餐馆的室内照明设备还特别采用了昏黄的灯光。

       岁月沧桑，昔日鼎盛的唐人街，如今已很少看到华人的踪影，特别是年轻华人。没有人知道这条唐人街究竟承载了多少故事，但是每当走过这里，就会隐隐地让人感到有些悲凉。

 百余年来古巴华人的命运，随着古巴的发展而大起大落。

       他们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独立战争，也历经过从腰缠万贯到一贫如洗的日子。对他们来说，以前的日子是值得缅怀的美好回忆，但是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凄凉，虽然手头没有几个钱，却能平静地安度晚年。

       他们之中有人到死都还想着回中国看看，只不过能如愿以偿的并不多。也有回过中国几次却还是选择回来的老华人。

       或许他们回到哈瓦那，每天抽劣质雪茄，跟老友打上两圈麻将，然后在华区闲逛几圈再回去休息，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安心吧！

       许多人都有顾虑，华人总有一天会在古巴完全消失，中华文化会在这里灭绝。然而，依照目前的发展看来，中华文化似乎还能苟延残存，只是今后如何发展，就取决于华人今后的动向了。

    牙买加风光旖旎，每年接待至少100万名游客。除了旅游业，铝土和蔗糖也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其中铝土产量位居世界第三。

       牙买加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却融合了非洲的诡谲氛围、西班牙的华丽风格及英国的贵族传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它以蓝山咖啡闻名于世，在贫民窟长大的鲍勃马利（Bob Marley）则创造出风靡全球的雷鬼音乐（Reggae Music）；而短跑飞人博尔特（Usain Bolt）更是横空出世，连创佳绩，叫人啧啧称奇。

       经过百余年的岁月洗礼，华人已逐渐从小型咸头铺（Ham Tdiu Poo）老板，蜕变成零售业巨子。早期华人一般对这里怀有深厚的感情，很少想过离开，但随着当地治安每况愈下，新移民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熟悉的画面周而复始地上演着。

 早在1854年，华人已经取代黑奴而到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以及糖厂来工作，其中包括英国殖民政府从中国广东招来的客家华工，还有由巴拿马转移到此地的契约华工，共有472名。

       这一批华人刚抵达牙买加不久，大多数便因为健康欠佳，或无法适应当地环境而相继死去，只有极少数人存活下来。

       在合约期满之后，有者选择回国，也有一些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去，而决定留下来的则各自创业，有的从事批发行，有的开咸头杂货铺。

       从1864年至1870年之间，又有200名左右的契约华工，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或圭亚那迁移到这片土地。而第三批华人移民则是在1884年直接从中国乘船过来，主要是来自广东东莞、宝安和惠阳3县的客家人。在这之后，陆续抵达牙买加的华人大多数是这批客家人的亲属。

       另外，也有一些来自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的华人，他们中包括了男性、女性以及婴儿共680人。

       1893年，牙买加华人增至800多人，他们大多集中在金斯顿市中心创业。此处开始成了华人主要的活动地点，中国城也就逐渐成形。经商的华人收入日益丰厚，商店也逐渐由小型转为中型规模。

       1904年，这里的华人筹资修筑中华义山；1923年，他们开设了华侨留医所；1924年，新民学校成立，供华人子弟学习中文，华人社会日渐成熟。

       1950年代，华人在牙买加的经商势力，已经从零售业扩展至食品制造业以及轻工业等。那时，华人拥有全国最大的冰淇淋厂以及数家大型超级市场；同时，华人在面包业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还有部分华人将触角伸至电影、保险、旅游以及房地产等行业。

       根据统计，牙买加当时大约有两万多名华人，其中超过半数是纯华人。在这一个倡导“来自多元，一个民族”（Out of Many，One People）的国度里，华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倾向于华裔牙买加人（Jamaicans of Chinese Origin）。

       到了70年代，牙买加开始向古巴靠拢，在国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政治倾向引起社会恐慌，许多华人担心本身的私产会遭国有化，于是以低价变卖产业，接着迁往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圣马丁岛等地展开新生活。

       那段时期，牙买加华人人口大减，各地的商店可说是十室九空，仅有数千名华人选择留了下来。

       80年代末，牙买加积极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吸引了大批华人前来谋生。此后，华人群体更趋多元，除了客家人，也有很多来自福州、温州、广州等地的移民，另外，还有一些因为苏里南的政局动荡而来到牙买加的再移民。

       90年代中期，华人人口回升到两万人之多，这一个数目至今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牙买加住着一万多名土生华人，祖籍以广东东莞、宝安和惠阳3县为主。他们大部分已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会说家乡话，平常以英语或帕托阿语沟通。然而，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还是相当重视，如农历新年会吃团圆饭、清明时节举行公祭（Gah  San）等等。他们在各自领域也都有亮眼的表现，零售业巨子Wayne Chen、音乐家Bryon Lee、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 Commercial Bank）大股东Micheal Lee Chin就是当中的佼佼者。

       至于新移民，尽管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日子，但投入的感情并不深厚。对他们来说，牙买加不过是移居加拿大或美国的跳板，赚够了钱就会离开。究其因，他们说：“这里治安越来越差，政府又束手无策，我们每天做生意都不安心，所以才会想着离开。”

土生华人长期从事零售业，占了极大的市场份额，早期开设咸头铺的经验，乃是他们经商的最大优势。Super Plus Food Stores掌舵人Wayne Chen的父亲，就是靠在穷乡僻壤开咸头铺起家，目前拥有25家超级市场连锁店。

新移民也大多追随前辈的步伐，开设咸头铺或从事批发业。单单就金斯顿市中心和蒙特歌湾（Montego Bay）的大街小巷，就能找到上百家华人杂货批发店。另有一些华人选择开设超级市场、中餐馆、快餐店、面包厂，或在华人店铺打工。

    开咸头铺是牙买加华人的传统行业。早期华工在契约期满后，就陆续在全国各地开起这类主要售卖日常食品，如咸牛肉、咸猪皮、咸猪尾、咸鳕鱼、咸马鲛鱼的店铺，顾客大多是市井小民。

       早期开咸头铺的华人，通常会就近住在店铺楼上。华人初来乍到，往往连一句英语或帕托阿语都不会说，也不晓得怎样做生意，只好默默观察顾客的眼色，接着拿起竹竿轻敲着货品，问说“This？That？”直到顾客点头或回答“Yes”，才把货品取下来。

       今天，首都金斯顿的公主街（Princess Street）聚集了至少20家华人咸头铺和批发商店，但从店名或店铺外观，根本难以判断老板是否为华人。店内架着铁栅栏，从地上延伸到天花板，只有探头细看，才能发现一张张躲在铁栅栏后的华人脸孔。他们有的是坐在特意筑高的柜台往下监看员工的“掌柜”，有的则是在铁栅栏内忙进忙出拿货的伙计。守在第一线的通常是当地黑人。来这里购物的顾客，其实无法随心所欲地浏览，他们只能隔着铁栅栏说出自己想要的物品，再请店员帮忙取货。

       在蒙特哥湾的超级市场则大开门户，让顾客任意选购商品，而老板就在柜台上方的阁楼，观察店内的营业状况。就此，华人店主剖析道：“我们这么做，不但较容易抓到小偷，而且能更快察觉到匪徒有所行动，以防受到攻击。另外，疲倦时也可以小睡一下。”约15尺长，6尺宽的空间，可容纳一个单人床架、一张办公和电脑桌，除了去厕所、出外办事，华人一整天几乎都会呆在这里。

  基于牙买加法律极为注重对女性的保护，这里的男性一般都不敢随意碰触女性，所以只好耍要嘴皮子，转以轻佻语言来占女性的便宜。

       在蒙特哥湾与先生一起经营咸头铺的古绮云（Sweetie Liu），就常常碰到黑人顾客向她示爱。她说：“那些游手好闲的黑人，不管你已婚未婚，只要看到你是华人就喜欢把‘Do you want to marry me? I really love you!’(我真的爱你，嫁给我好吗？）挂在嘴边。你如果不搭理，他就用帕托阿语骂你几声，骂完之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向你示爱。”他们乐此不疲，就是好玩。

       刚到这里的华人女性几乎都有过这般境遇，所以她奉劝各位女性切勿躲躲闪闪，只要强势应对，他们也就知难而退。

       Wayne Chen出生于牙买加，却不受当地复杂的男女关系影响。他说：“我认为父母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对婚姻的忠诚、做生意的居安思危以及对儿女教育的关注，我会想办法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牙买加华人女性倾向于与华人男性结婚，在她们看来，华人比黑人男性来得可靠。黑人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生活没有太多规划，反观华人，大多拥有稳定的工作，或自己开店做生意，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对伴侣的忠诚度，都比黑人高。

       在中华会馆担任中文教师的苏燕指出：“我教的牙买加男学生都已成家立业，有好几个孩子，但向我介绍他们的妻子时，还是用‘This is my girlfriend’（这是我的女友），跟我们很不同。还有几个50多岁的学生，子女都在国外，都是自己或跟父母一起生活，从不提起另一半。”

       华人男性，则大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是华人。不过，由于到牙买加谋生的华人男性比女性多，讨到华人老婆的机会便相对少了，因此许多已届适婚年龄的华人男性，若在本地无法找到合适对象，一般会通过媒妁之言来完成终身大事。

       选择与当地人一起生活的萧德文（Siu Tak Man）则说：“感情的事没有种族之分，缘分到了自然就会在一起，我跟她很合得来，我开店她帮我很多，我们不常吵架，只有讨论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才会出现争执。”

       一个是23岁时才从香港移居牙买加的华人，一个是在当地出生的黑人，双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唯有多番磨合才能在感情路上走得更长久。

       经历了一次抢劫事件后，他就萌生带妻小回香港的念头，只是担心家人无法接受他与当地人结为夫妻的事实。尽管如此，他还是乐观地认为：“孩子都生了，他们还能怎样？”

 土生华人与新移民之间难免会一些文化上隔膜。由于新移民不会说英语或帕托阿语，而土生华人又对华语或家乡话一窍不通，故此，土生华人与新移民的交流可说是几乎等于零，新移民一般也不会去参与当地华人社团所举办的活动。

       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移居牙买加超过20年，现任中华会馆会长的陆康华（Wilson Look-Kin）意识到这一点，希望能通过中文教育来促进彼此的互动。他说：“当务之急就是大力开展中文教育，让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此外，土生华人和新移民聚在同一间教室上课，也提供了多一个相互交流的管道。”

牙买加中文班由新民学校首办。新民学校于1930年易名为华侨公立学校，40年代获得大力发展，学生人数高达300人，但由于师资、经费短缺，50年代开始改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语为辅的方式授课。中文班曾一度停办，直到近年才由中华会馆复办。

       目前，中文班的一切教学工作，都由中国公派教师苏燕负责。她亲自教授周一至周六的中文学习班，包括成人班、儿童班、汉语考试辅导班等，工作压力着实不小。会馆希望能多找几名教师减轻她的负担，但这里的中文人才不多，中国公派又须等上一段时间，现在唯有由苏老师一个人支撑。

       华语在牙买加只属外语，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及英语和帕托阿语。苏老师有些泄气地说：“班级太大，时间太短，很多学生又常常迟到，能学到的就更少。加上这里没有一个让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个星期学的可能下个星期就忘记。”其实，她了解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却无法做出什么改变。

     牙买加有一份免费派送的中文报纸——《蓝山侨讯》（The Blue Mountain Journal）。这份出版将近30年的报纸，由华人协会资助。现阶段由来自中国的李蕾琴（Maria Lee）和来自印尼的吕启明（Lui Kai Meng）担任中文和英文编辑。《蓝山侨讯》每月出版一次，印刷1000份，内容包括英译的中国大陆新闻以及中译的牙买加新闻。

       兼做中医自然疗法生意的李蕾琴说：“我们都是这份报纸的义工，因为这是一份免费的刊物。我们主要是为华人服务，让华人有个发表心声的空间，同时也希望让刚来这里的华人多了解他们周遭发生的事情。华人来到牙买加，却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那是没有意义的。”此外，她自费将报纸送到国外，希望外界更了解牙买加华人的动向。

       至于华人所办的英文媒体，以前有《宝塔》（The Pagoda）杂志，现在则有中华会馆不定期出版的《中华会馆通讯》（CBA News）。《中华会馆通讯》涵盖面广泛，内容包括当地杰出华人的专题介绍、华人节庆的由来等等。

       除了提供讯息，这份刊物也是会馆与会员之间的沟通桥梁，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每逢公祭，会馆将在会讯注明祭祖的时间；中秋节将至，它也广邀会员前来参加聚餐。陆康华说：“至少我们每年清明祭祖时，能看到许多华人面孔，比较可惜的是，新移民鲜少参与。”

       农历新年期间，中华会馆也会推出一份随《新闻集锦日报》（Jamaica Gleaner）星期天刊附送的英文特刊，专门介绍牙买加华人过去一年在音乐、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与贡献。这仅有助于华人更了解自身群体的动向，也是当地社会了解华人群体的一扇窗。

  在牙买加，除了店铺，新移民最常出没的，该是教会了。早在20世纪中期，当地华人就试图通过信仰基督教，融入当地社会；如今，新移民则是从宗教信仰寻找心灵慰藉。

       这里共有两所华人基督教会，一所是金斯顿的牙买加华人基督教会，另一所是蒙特哥湾宣道会。天主教和佛教由于信徒不多，至今仍未设立教会。

       蒙特哥湾宣道会发起人之一陈婉燕（Nancy Poon）说：“平日出席教会活动的信徒大约20至30人，而受洗的华人将近300人，多数是新移民。”金斯顿的教会人数，则比宣道会多出好几倍，有土生华人，也有新移民。对信徒来说，教会不仅仅是每周日必须报到的地方，更是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

   蒙特哥湾没有华人社团，因此每当华人碰到难题，总会第一时间向宣道会求助，位于金斯顿的中华会馆和中国大使馆，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许多新移民初来乍到，无法适应新环境或内心积累太多压力，都会找牧师倾谈；与雇主产生纠纷，也会透过教会去调解。

       以1999年抵达牙买加的熊琼霞为例，她当时在一家华人纺织厂工作，后来结婚生子，没想到丈夫在一次争执后离家出走。从那时起，她便独立撑起整个家，日子并不好过，所幸她从宗教信仰找到精神寄托：“对我来说，‘主’真的非常重要，他让我找到生活下去的力量。”她非常希望“主”会把丈夫带回他们身边，毕竟年幼孩童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另外，教会也撮合了不少佳偶。许多华人刚抵步，语言不通，通常会选择加入教会，开始结交新朋友。日子一久，许多男未娶、女未嫁的单身男女就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蒙特哥湾宣道会近几年曾多次举办结婚典礼，在牧师的见证下，新人在三房一厅的教会活动中心许下终生承诺。

   在牙买加常常会听到华裔被称作“十一点”（Ship Yit Diam），关于它的由来，有两种说法。据当地华人作家钟全安解释：“一跟十合起来就成了“土”字，代表土生华人。”在蒙特哥湾经营超级市场的潘文健则持有不同的观点：“十二点是正中间，指纯正华人，十一点少了一点，就是指不会说华语或家乡话的华人后代。”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许多华人新移民也入乡随俗，把跟自己没有共通语言的华裔称为“十一点”。

       华商对这个称谓相当抗拒，因为他们觉得带有歧视意味。然而，牙买加知名媒体从业员李逢生却认为：“当你知道你是谁，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你就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即使被人当面称作“十一点”，他也丝毫没有受歧视的感觉。

       此外，当地人常会以Miss/Mr.Chin来称呼华人，“如果刚好姓陈，可能会感到诧异，如果不是就会莫名其妙。”

       对此，华人不厌其烦地解释道：“早期到来的华人，以广东东莞陈（Chin）姓客家人为主，郑（Chang）曾（Chong）李（Lee）姓的客家人也不少。当地人对华人这4个姓氏印象较为深刻，所以只要看到华人面孔，就会称他们为Miss/ Mr.Chin，或换上其他3个姓氏。”这与通行中南美洲的“Chino”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当地人来说，华人的名字并不好记，于是索性把常见的姓氏当作对华人的统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牙买加华人基于当地政局动荡而移居国外，后来形势逐渐明朗，部分华人选择回流，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里始终是他们的家。

       今时今日，这个国家尽管称不上人间乐土，但是其独特的风土民情还是充满着魅力的，也难怪这里的华人大多不舍得离开。

       所以，初来乍到的华人如果对这片土地没有什么好印象，那只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不够长，因此，若是还没来得及发现牙买加的美好，就匆匆决定移居他方的话，那就真是太可惜了。

    与海地（Haiti）相邻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第二大岛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东部，占该岛三分之二的面积。首都圣多明各拥有历史悠久的教堂、医院、法庭，名胜古迹随处可见。

       相继被西班牙、法国、美国统治过，多米尼加如同文化大熔炉。外来与本土文化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多米尼加风情。温暖的阳光、蔚蓝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更让游客流连忘返。此外，制糖、咖啡和卷烟工业也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

       国内贫富悬殊，基础设施不完善，时而断水断电，但当地人总是乐观以对，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华人到来，也不过是为了一圆淘金梦。秉持这股信念，华人目前已占据当地快餐和汽车旅馆业的领导地位，并把触角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

 据记载，最早来到多米尼加的华人应该是于1862年抵达的。这批华人大部分是契约华工，以来自广东的台山和恩平人居多。

       住在多米尼加已有50年的华人律师何荣欣披露，第一名出现在多米尼加历史上的华人，名字叫李潘乔（Pancho Lee的音译），曾经参与1864年的复国战争（War of the Restoration）。

       另一位名留史册的华人是华商Gregorio Riva。他从古巴引进了少数华工，前往多米尼加的希巴欧（Cibao）生产砖块以及生石灰。之后，这一批华工先后到萨马纳（Samana）、尤纳（Yuna）和莫卡（Moca）定居，并各自发展本身的事业。

       在1920年代，多米尼加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因而吸引了更多华人移居到此地。抵达多米尼加后，他们大部分在章鱼养殖场、洗衣店及餐馆里工作。之后，也有一些华人陆续在城镇做起生意，并且带动了当地零售业的发展。在1940年代的多米尼加，售卖汽水、果汁、啤酒、三明治、烤面包的华人“凉水馆”（即茶餐室）随处可见。

       1950年，这里的华人人口已经达到455人，以广东恩平人居多，也有一些从古巴迁移过来。当时，华人的经济渐具规模，许多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陆续转型为超级市场。圣多明各的杜阿特街区（Duarte）汇集了多华人商店，唐人街开始成形。另外，一些华人也开始经营菜园，以满足当地的日常所需。

       到了1960年代，一名吴姓钟表师傅从香港移居到多米尼加，并引进了钟表珠宝的营业概念，在当地掀起一股热潮。那时候，华人修理钟表的技术精湛，加上信誉良好，以致华人钟表业一度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华营钟表店曾经多达80家。

       在1966年抵达多米尼加，而今已经移居美国的岑灼槐说：“我到多米尼加替一位同乡的叔伯打工，主要是做首饰和修理手表。那里聚集了数千名华人，光是我们的那一家店就有十多人在工作。”对那时的生活境况，他仍然记忆犹新：“在这里，人们都十分热情、友善，不会歧视华人。有的甚至还认为华人高人一等。”

在累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华人便陆续投入其他行业，数名华人于1963年合股在圣多明各建起第一家名为“皇宫”的汽车旅馆。

       1980年代初期，此处的华人人口增至5800名，主要分布在圣多明各以及其周边城镇，除了投靠亲友的恩平人之外，也有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移民。

       为了使新来的同胞更快融入多米尼加的主流社会，华侨总会开始出版《侨讯》，可惜后来因为缺乏人才和资金，在1990年代中期被迫停刊。

       1990年代以后，大批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移民抵境，使华人人口迅速膨胀。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主要经营利润丰厚的炸鸡快餐店（Pica Pollo）和指甲彩绘店；来自台湾的移民则多数是投资商人。

       2006年之后，多米尼加华人人口达到百余年移民史上的最高峰，并持续上升。华人主要分布在圣多明各、那罗曼拉（La Romana）、圣地亚哥（Santiago）等地，他们大部分从事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

       据华侨总会统计，多米尼加目前有两万多名华人，主要是广东人后代，以及来自中港台的新移民。土生土长的华人，大都说西班牙语、英语，会说家乡话或华语的少之又少。在这当中，较受瞩目的是鲜花基金会主席吴玫瑰。她不仅积极推动中国城的兴建工程，也筹备出版《多米尼加华人移民史》，记录19世纪至今多米尼加华人的移民概况。在当地华社提起吴玫瑰，几乎无人不晓。可惜身为混血华人的她不会说华语，但她的儿子曾到北京修读十个月的华语班，简单对话不成问题。

       百余年来，华人在多米尼加发展顺遂，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而当地人对新移民也抱持开放态度，华人可以自由从事任何工作，当医生、教师、会计师、律师、作家或经济学家的，不乏其人。

       在多米尼加的大城小镇，不难找到华人开设的炸鸡店，粗略估计，全国大概有500家。华侨总会秘书陈佩珠说：“华人开的炸鸡快餐店数量很多，就连全国连锁快餐店集团，也快要被我们逼出市场。”

       近年迅速崛起的，则是由杨浩文和一名来自美国的越南华人引进的指甲彩绘店，全国约有70至80家。多米尼加约有50家华营汽车旅馆，绝大部分集中在圣多明各郊区，而经营杂货店、超级市场、进出口贸易、食品买卖等生意的华人也不在少数。有的华人还投资经营高尔夫球场和乡村俱乐部。

       多米尼加华人人口虽少，但经济影响力不容小觑，难怪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Leonel Fernandez Reyna）非常关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并呼吁当地人多花时间学习中文。

吴玫瑰推动中国城的兴建工程，贡献良多。

在多米尼加开炸鸡店只需几万美元成本，但想从这盘生意赚钱，必须靠长时间营业及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

指甲彩绘店是华人的新兴行业。

每天上午9点，华人业主就要到市场买鸡肉、大蕉、木薯、猪蹄、牛腩等食材，然后赶回店内烹煮菜肴，完成后即放入保温柜内。到了11点开门营业，客人陆续进来点菜，才能稍稍喘一口气。一般华人店铺会营业至深夜12点，有些甚至到凌晨一两点才打烊。他们大多全年无休，或只在生日时放自己一天假，余下的时光都献给工作。

       炸鸡店老板每天就在炸鸡、砍鸡、炒菜中度过，而身为太太的，除了服务顾客和收钱外，还要处理许多突发事件。旺角炸鸡店老板娘陈佩珠表示，自己的西班牙语说得不太好，很多问题无法妥善处理，因此只好找儿女代劳，毕竟两个孩子从小在这里长大，熟悉西班牙语，也了解当地民情。

       其实，像陈佩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华人就算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却还是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生活圈子，就像一个小小的中国城，自己走不出去，别人也走不进来。

       炸鸡店生意虽好，但必须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汽车旅馆的回报更优。因此，有一定资本的华人都选择合股投资汽车旅馆，只是这行业成本高昂，没有千万至亿元很难成事。投资这门生意的华人，大多是靠其他行业起家，如经营炸鸡店、超级市场和照相馆，合作对象也几乎都是华人。有需要的话，他们还得成立银会（Chinese Money-Loan Associations）筹集资金。

       对许多华人来说，在多米尼加开设一家小小的店铺，就能养活整家人，衣食无忧。虽然华人社群不大，却也能找到三五知己，闲暇时一起相聚出游，偶尔办个聚餐联络感情，至少比留在祖籍地替人打工来得强。

       多米尼加华人，只要行为端正、刻苦耐劳，一般都能找到工作。他们每月平均工资比当地人高，约为1万5000比索，而且老板通常提供免费吃住，可谓衣食无忧。做生意的华人，若想长久居留，也会买房置地。反观当地人，大多态度懒散，薪资不高，且没有储蓄的习惯，钱花光后就跟老板预支，买东西通常选择分期付款。

       这里的华人大多选择跟同族结婚，如果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们通常会回到祖籍地物色对象。毕竟两夫妻胼手胝足经营生意，总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就算是入行门槛较低的炸鸡店，也无法一个人独立经营。

  另一方面，或许是成长背景相似，一些土生土长的华人男性还是会选择当地女性作为终身伴侣。他们愿意与异族通婚，能否白头偕老，彼此的包容、体谅还是很重要的。

       择偶之外，华人做生意也倾向于跟文化背景相近的同族合伙。大部分当地人天性乐观，认为迟到是理所当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不来上班就不来上班，工作只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做生意即使签了合约，他们还是有本事要赖，难以令华人信任，所以寻找同族合伙人，较为妥当安全。

       当然，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将Supermercado 100%超级市场打理得有声有色的夫妻档梁顺伟（Deigo Leong）和何仪秀，就相当欣赏多米尼加人的单纯善良。梁顺伟说：“许多当地员工在我这里工作超过十年，彼此和睦相处，我们很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办，他们也办得很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雇主和员工要互相体谅，好好沟通，一起合作才能达到双赢。”

     多米尼加华人喜欢合伙做生意，喜欢聚在一起吃早茶，也喜欢到会馆搓几圈麻将。此外，他们还喜欢一起搞社团，这里的社团数量之多，在加勒比海地区可说数一数二。

       自1940年代开始，多米尼加华人先后成立了多个华人团体，服务广大华人。依成立年份排序有1942年华侨总会、1975年华侨青年会、1977年三益堂、1981年至德宗亲会、1989年台湾商会、1993年洪门致公总堂、2000年鲜花基金会、2002年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多米尼加支盟、2004年中多联合总商会，以及2006年七姓堂等。这里还有两个宗教团体，即中华基督教浸信会咏恩堂和慈济基金会多米尼加联络站。

  目前有4个社团的会所坐落在中国城内，包括华侨总会、七姓堂、至德宗亲会和洪门致公总堂。而三益堂则在离中国城不远的位置设下堂口。这些团体在多米尼加不仅扮演着凝聚华人的角色，也逐渐成为一般华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七姓堂和至德宗亲会为例，它们为华人提供了完善的娱乐设施，包括液晶电视、麻将桌、特别订制的发牌桌等，还有服务员不时斟茶递水。而洪门致公总堂则设有乒乓桌，让大家通过运动强身健体，近年也开始举办乒乓球公开赛。

       此外，这些社团也发挥了文化传承的功能，华人逢年过节的庆祝活动，几乎都由这些社团联合包办。每逢农历新年，华侨总会和台湾商会通常会找一些大型场地举办联欢会，有时候是聚餐，有时候是郊游。庆祝方式虽然简单，节日气氛却依然浓厚。

       大部分当地华人，每年清明节都会选在休息日或在开店营业之前，携带鲜花、香烛、冥纸等，到个别会馆的公墓去祭拜祖先，整个扫墓仪式既简单又庄严。有时他们也会带同孩子前去祭祀，以灌输他们饮水思源、不忘先人的观念。

由于多米尼加是个天主教国家，所以设在当地人坟场内的华人墓地，为了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除了会在墓室内置放十字架，也会采用当地人的安葬方法入殓。后人会将先人的棺木放入大型存放格内，7年之后捡骨，再放入较小的存放格，往后就以献上鲜花、焚香烧冥纸的方式祭拜。值得一提的是，由多米尼加华人集资筹建的华人公墓在2008年2月23日开始启用后，举凡无亲无故的华人往生后都能安葬于此。

 多米尼加的华人子弟，自小就从父母的身教言传中学习到孝道和对长辈的尊重，并且懂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华人也非常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许多家长希望孩子至少能听懂华语，所以从小就让他们到中文学校上课。因此，这里的华人子弟一般都能掌握3种语言，首要是西班牙语，其次是广东话，再来便是普通话。由于这里与海地为邻，许多私立学校也教授法语。语言能力强的小孩，还会说英语和恩平话。不过，孩子难免会诉苦：“我不喜欢学华语，不喜欢写中文字，因为很难写！”

       翻开多米尼加的中文教育发展史：华侨总会于1958年就成立华侨学校，当时由朱华担任教职，饶凤祥于1967年接任。1980年代中期是华侨学校发展的全盛时期，那时一共开设幼稚园班、初阶、中阶、高阶4个级别，学生人数将近100人，教师由台湾侨务委员会聘请。当年还有由华人基督教会附设的圣多明各中文学校，那时学生有30余人，不过后来随着学生逐渐减少而关闭。

   华侨学校也曾多次面临关闭的风险。“1998年接任教职的施老师才到这里没多久就染上赌瘾，几乎天天上赌场，完全没有尽到教师的责任。”熟悉华侨学校历史的秘书陈佩珠说。

       从那时起，侨校的学生人数迅速减少，校内运作始终无法回到正轨。眼看侨校快要倒闭，陈秘书在2004年毅然接下教职，同时让自己的女儿到校兼课。直到近两年另一名新教师加入，学生人数才慢慢回升到30多人。

       而另一所办了十多年的台湾商会附属中文学校，其师资与环境都较华侨学校强。副校长鲁玉香这样介绍学校的营运情况：“目前，学校固定在每周五和周六上课，分小学、初中、成人等14个班级。学校共有200多名学生，98%为华人子弟，其余则是本地人的子女。”

       令人惊喜的是，这里即将出现一所崭新的中文学校，即中多联合总商会附属中文学校。该会总顾问吴国祥透露：“我们商会目前还没有会所，所以计划在一片2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兴建4层高的办公楼。我们还打算在大楼内设置大礼堂、公尺文和英文学习班教室、学生自习室、文化中心和100个车位的停车场。如果这个计划顺利推行，预计能在明年完工。”这项计划估计耗费150万美金，完全靠中多联合商会的13名执委和50多名会员联合出资。看情形，多米尼加中文教育即将迈入一个新阶段。

 位于首都圣多明各市中心杜阿特街区的中国城，是多米尼加华人主要的商业中心。这座于2008年4月17日正式启用的中国城，共有两个入口，分别设有“天下为公”和“四海为家”两个牌坊。一条横街加上一条竖街，整个城区共有40余家商店。

       中国城内有孔子广场，孔子像后墙上是栩栩如生的龙凤雕饰；另一座广场则矗立着十二生肖、观音雕像，富有中华文化气息。

       据说当地华社曾多次提出兴建中国城的计划，但皆告失败，究其因是华人在多米尼加的影响力还不足。直到曾任策划部副部长的吴玫瑰展现出莫大的魄力，这项计划才初露曙光。

       吴玫瑰与其他数名推动者吴健儒、何荣欣和吴华叶，不仅要周旋于市政府各个部门，还要争取广大华人的支持，着实不易。所幸后来在总统的大力支持下，才获得市政府融资。

      建设中国城，是为了重新打造这个地区，除了兴建两座广场和两座牌楼之外，也将更新这里的照明、通讯、道路系统，翻新华团会馆，兴建图书馆和中文学校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平日虽然只有四五个华人菜摊，但每到星期天就会变得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讨价还价声此起彼落。为了应付一星期的需求，顾客通常都是将蔬菜大把大把地装入购物袋内。

       菜贩忙着做买卖，中餐馆服务员则不停地招呼喝早茶的客人。在多米尼加，除了中餐馆和炸鸡店一周营业7天之外，从事其他行业的华人大多在周二休业。

   多米尼加华社可说是加勒比海上一颗热力四射的明星。在经济上，华商们试图把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在中文教育上，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倾注心血。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打拼，在祖籍地发生天灾时慷慨解囊，在多米尼加遭遇风灾时亦出钱出力。一个是祖籍地，一个是居住地，如有可能，两者都要兼顾。

       也有的华人觉得这个地方落后肮脏，跟不上时代，当地人不文明、没礼貌，于是将孩子送回祖籍地生活，希望他日赚够钱后能回乡与子女团聚。

       然而，还是有许多华人不惜耗费万余美元，申请移居多米尼加，一方面到这里来碰运气，另一方面则试图以此地作为跳板，再移居到美加等国去。

唐人街上的牌楼刻着“四海为海”4个字，道尽了多年来尼加华人的苍凉。

   波多黎各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在西班牙语中寓意“富裕之港”。西班牙曾在此建立殖民据点，1898年美西战争后割让给美国。1917年起，美国承认波多黎各居民为美国公民，并于1952年赋予它“美国自由联邦”的政治地位，在税务、教育、卫生、住房、文化、语言等领域享有自行决策权力，美国联邦政府则主控移民、国籍、海关、防卫、外汇、交通、通讯、国际贸易等事务。岛民可投选波岛总督，却无权参与美国总统的投票。1998年就未来政治定位举行公投，超过半数的岛民对此并未表达意见。波岛的身份地位，仍旧得不到确认。

       波岛自1950年代起迅速实现工业化，现已成为美洲重要的医药业和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密集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成了波岛经济发展的阻力。多年来失业率偏高，致使涌入美国工作、定居的波多黎各人，接近岛上的半数人口。

       今天，岛民衣食住行，样样都是美国品牌，但生活、文化层面依然保有拉丁美裔的特色。这里西班牙文比英文盛行，从路牌、招牌到餐牌，都采用西班牙文；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人很少，却约有四分之三的人根本不说英语。

迈入21世纪，移民往来愈加频繁，岛民的背景文化更趋多元，不变的是，波岛依旧难以摆脱“美国驿站”的角色，而华人，则是这驿站的常客。

    早在19世纪，华人已踏足波多黎各。

       在西班牙殖民时代，除了拉丁美裔人士之外，其他移民一律不受欢迎进入波多黎各。直至19世纪末，西班牙与美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推动地方发展，大批的中国男性才通过“苦力贸易”登陆美洲。多米尼加、古巴及波多黎各一般都是他们踏足美国的驿站。

       不过，也有部分华人为波多黎各优美的景色及淳朴的民情所迷，决定留在这里从事餐饮或洗衣业。

       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令，华人移民因而无法以劳工的身份入境美国或美属地区。一部分原本就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也迫于无奈而迁移到波岛，并参与当地的铁路及城市建设工程，据说另有一部分华人在庞塞（Ponce）的制糖厂工作。

       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波多黎各因为《巴黎条约》的签署而成了美国的海外属地。政治地位的改变令华人入境波岛的阻力更大，岛上华人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减缓了下来。

       到了1899年，由于美国担心人口贩卖集团把大批华工引入波岛，于是进一步强化排华法令，禁止古巴华人进入波岛；只有那些原本就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华人，才能够自由往返美国和波岛。

       1959年，古巴共产党革命胜利，大部分古巴华人为了避免私产被收归国有，纷纷逃往国外，波岛也成了他们其中一个落脚点。到了1960年代，委内瑞拉及多米尼加等中南美洲国家的华人陆续涌入波岛，同时也有少数来自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华人移民。

       迈入21世纪，华人移民潮仍然没有间断，主要来自中南美洲，而中国移民也不少，其中以广东恩平人最多。他们一般都会在这里住上二三十年，待挣够了钱并获得美国绿卡之后，便另寻出路。

       早期的华人，有的已经离境，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则与当地人通婚，早已脱离了华人圈子。

       今日的波多黎各华人，大多是在1970年代之后才抵达的。在这一批人当中，来自古巴的华人可说是资历最深的前辈，目前仅剩数十人，现任中华会馆主席周国强便是其中一人。他笑说：“其实我算是来得比较迟的古巴华人了。”

       事实上，古巴华人早在1959年革命之后，就已经大批迁移到波多黎各。当时最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的雪糕生意。由于波多黎各的天气炎热，雪糕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古巴华人只需要购置一台雪糕机器，便可开一家雪糕店。“雪糕店的成本低，盈利高，自然成了最热门的生意。”周国强说。

       在岛上住了将近40年，看尽了华人社会的变迁。他说：“从数百人，慢慢变成2000、3000人，如今已经突破7000人了。当年祖籍九江的华人很多，现在新移民则多数是恩平人。”

周国强是现任中华会馆主席。背后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及波多黎各邦旗

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人士，是波多黎各的少数民族。约一万名亚裔人口当中，华人占了多数，共7400人。华人家庭只有280户左右，余下的都是单身男性，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

       岛上华人看似朴实无华，但笑容里却掩不住经年累月漂泊后留下的沧桑。他们当中以恩平人居多，但绝少数直接从恩平移民波岛。许多华人抵达波岛前，曾在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古巴等地生活过，或跑遍了半个地球，最终决定停驻波多黎各。

       波岛华人以第一代移民居多，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圣胡安和周边城镇，约98%从事餐饮业，少数经营杂货进出口或零售等小生意。新一代华人则大多成为上班族或专业人士。

       “在中南美的生活经验，让我们更轻易融入当地社会。我们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也熟悉拉丁美洲的文化风情。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对亚洲人总是那么友善、亲切。”这是华人普遍的说法。

       然而，波多黎各是华人奋斗、挣钱的地方，却不是厮守一辈子的家园。美国才是华人的终极目标。

       不少华人辛勤工作，都把赚到的金钱送到律师楼，为的就是早日申请到美国绿卡，一圆他们的美国梦。等待是一种煎熬，许多华人即使在波岛拥有稳定的收入，却为了居留问题而忐忑不安。

       华人一般选择在波岛创业，在美国置产，把子女送到美国深造，最后全家迁移到美国。也有不少人大半辈子就在美国、中南美州和加勒比海岛国之间奔走。

  波多黎各不大，却集原始与文明于一身。城镇和郊区的落差甚大，圣胡安或周边城镇人口密集，交通设施完善，建满平房、高楼及商店，尽显波岛繁华的一面；走入郊区，人烟稀少，处处是黄泥路，眼前都是高山绿林。

       华人到波多黎各，绝非为了远离世俗或亲近大自然。他们正是冲着岛上的勃勃生机而来，大部分居住在圣胡安或周边城镇。华人聚居地不多，却显得有点零散，整个族群缺乏凝聚力。

       华人就在自己的小天地有规律地生活着，也许是一个厨房、一家小店铺、一所房子或一张赌桌。

  波岛市区最常见的是五彩缤纷的快餐店招牌。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往往并排着四五家快餐店，足见当地市场之庞大。“当地人不爱烹调，比较喜欢到外用膳或订购外卖。”华人餐饮业者道出其中原因。

       多为小本经营的中式快餐店，犹如一匹黑马、以风味独特的美食，成功冲破众多欧美连锁快餐店的重围，争得一席之地。

       中式快餐店的招牌上鲜少出现方块字，倒是常看到“Asia”或“Chino”的字样，并挂上红灯笼或漆上红色来突出华人的特色。店内装潢一般简洁明亮、柜合后方贴着菜单，列明菜式名称和价钱，有些还附上照片；餐桌整齐地排列着，地砖抹得发亮，绝对可媲美连锁快餐店。中式快餐店大多设在路旁或路口，主要为了方便顾客开车到“Drive Through”叫外卖，有的还附有小型停车场。

       从硬体设备至待客服务，中式快餐店与连锁快餐店可谓旗鼓相当。客人选择中式快餐，主要还是对它的食物情有独钟。“这里的人非常喜欢吃饭，如果他们只爱吃面包，我们就完蛋了。”华人笑着说。

       中式快餐店的招牌菜是炒饭和炸鸡，另有迎合当地人口味的青椒牛肉、辣椒鸡肉等菜式，同时也售卖当地传统美食，如炸大蕉、炸猪扒、炸猪肉等等。“以前雪糕也是我们的一大卖点，但由于准备工作太繁复，很多店家只好把它放弃。”一名快餐店老板说。

 现今，华人在波岛开了600多家中式快餐店及20多家服务式中餐馆（Service Restaurant）。

       服务式中餐馆大多开在商场内，规模中等，约有4至8名招待员，不时推出中西自助餐，消费群主要是当地的中产阶级。近几年，日本餐开始在岛上流行，华人也把握商机，以期能分得一杯羹。现今，日本餐馆的老板和师傅几乎都是华人，要吃到日本师傅做的料理还真不容易。

       “华人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框框内，相互竞争。比方说，某华人开了家餐馆，如果生意不错，另一家华人餐馆马上就开在它附近。”在波岛生活超过20年的台商梁鹏，分析了华人餐饮业所面临的问题。目前，他积极开拓新市场，所经营的几家餐馆，装潢高贵时尚，兼售中西美食，希望能吸引中上层的消费群。

 在餐馆打工的华人，称得上是当地的高收入群。一位华人厨师说：“当地人月收入少于2000美元，我们这行的月收入却介于2000至3000多美元！”难怪华人纷纷投入餐饮行业。只要不上赌场，在餐馆打工的薪水足以让华人过好生活，并可在短短几年内，存够资本，自行创业当老板。

       由于资金有限，中式快餐店多属家庭式经营，最常见的是丈夫掌厨，妻子掌柜，或亲属联手打理。若生意火红，或许会多请一两名华人厨师或当地人当收银员。

       “波岛的员工薪金支出太高了，多请一名员工，一年就少了几万美元的收入，许多华人情愿自己辛苦一些。”华人老板说起他们的难处。另外，几乎所有快餐店都使用即用即弃的塑料餐具，省却了聘请洗碗工人的费用。

       当地人多数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周末休息，每天下午3点半之后，公路上便开始出现下班赶着回家的车龙。华人赚取了稳定的收入，却牺牲了正常的生活。有的一星期工作6天，每天从上午11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一名在餐馆打工的华人无奈叹道：“我们的生活日夜颠倒。当地人晚上9点吃夜宵，我们才吃着晚餐呢。”其实，华人也希望能与主流社会多些接触，但现实却不容许。“就算华人圈子要办联谊活动，我们也很难挤出时间，大家都太忙了！”华人感慨。

  出席华人宴会，是一件累人的事儿。华人办喜宴，总是要等到午夜12点才能开席，曲终人散已是凌晨两三点，小睡片刻，又要抖擞精神，起身干活。“多数华人结婚都不宴客了，因为很难挑到一个适合的日期。我也很久没吃喜酒了！”湖南酒家老板“醉龙”笑说。岛上两家最大的中餐馆——利口福和湖南，适合举办大型宴会，但设宴的通常是当地商人或高官显要，华人甚少大排筵席，顶多是亲友聚餐。

       近年来，波岛经济开始下滑，餐饮业带给华人的利润，远不及1990年代般丰厚。Kimpo Garden餐馆老板张志明说：“这几年百货腾涨，我们餐馆用得最多的白米，价钱涨了好几倍，成本越来越高，盈利越来越少，生意难做啊！”

     竞争激烈、经济不景之外，华人还面对生命威胁。一名快餐店员工说：“持枪抢劫在这里司空见惯。我碰过好几次，匪徒午间冲进来，用枪指着我，我只好把收银机的钱全都掏出来给他。”华人快餐店多数用现金交易，自然成了抢匪的干案目标。“2008年，有一个华人被匪徒在脑袋开了一枪，死了；2009年，另一个华人被射穿肺部，幸好保住性命。”华人心有余悸地说。有些餐馆为保安全，只好聘请保安人员在晚间看守。

       创业能赚取比打工更可观的收入，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于是这群踏实、耐劳的华人，继续在餐饮业里默默耕耘。

      少数华人成功跳脱餐饮业，转向其他行业发展。

       岛上的第一家华人超市——加华超市，创立于1980年代。老板娘王景香分享创业点滴：“当年我原本也在餐馆工作。看着华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些华人离家那么远，一定非常想念家乡的食物。于是我就开了这家超市，专卖华人食品，比如罐头、酱料，还有从纽约运来的新鲜华人蔬菜！有些顾客还开心得跑来向我道谢，这也是我开超市最大的满足感。”

 现在，岛上共有4家华人超市，集中在圣胡安市区，大多从下午2点营业至凌晨2点，因为主要消费群——华人都是在午夜下班后，才前来选购食品和杂货。除了从事零售业务，超市也批发蔬菜和食材给中式快餐店和中餐馆。

       运输发达的今天，货物流通快速，但亚洲超市老板娘李慕贤回忆起当年：“这里的超市只能买到小白菜，其他蔬菜或食材根本找不到。有华人从美国回来，带给亲友的手信，就是各种各类的蔬菜！”如今，岛上出售的食品和蔬菜，虽比美国贵了一倍，但还是大受欢迎。毕竟对华人来说，身处异地，却可以尝到家乡风味，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现在在岛上生活的华人真是幸福多了。”一个在岛上住了接近20年的华人说。除了食品越来越多样化外，华人接收中文资讯也更加方便。当年要看中文报，就必须订阅。中文报纸从美国船运过来，送到手中往往比出版日期慢了几周。现在只要到超市，华人就可以购得当天出版的《星岛日报》、《世界日报》、《侨报》和多种中文杂志。

       此外，华人也可以透过互联网、卫星电视，观看中港台最新的节目。和另一端华人世界的距离，终于拉近了许多

除了餐饮业和超市，也有一些华人经营食品批发业。华美和中美是岛上两家食品批发公司。华美创立至今已超过20年，中美则属后起之秀，两者主要批发米、油、盐、肉类以及蔬菜给餐馆。

       另有华人从事礼品零售和批发生意。在圣胡安老城区，有两三家华人开设的纪念品零售店，专做游客生意；服装店和假首饰店的消费群，则是当地妇女。

       华人的经济发展局限在特定领域，大规模的商店也寥寥可数。商人张志光说：“和美国的连锁品牌店相比，我们实力相差太远了。我们根本无法和他们竞争，大商场也不会给我们机会。”华人只好继续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守住一盘小生意。

       大部分华人后代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在父母的鼓励下，前往美国发展，多数成为白领阶层。少数不喜欢美国生活的年轻人，则留在波岛，选择创业的不多，一般都是上班一族。

   在阳盛阴衰的波多黎各华人社会里，许多男性到了适婚年龄还找不到伴侣。一名华人回忆道：“在岛上孤独老死的华人不少。我曾两度替朋友抬棺木，灵堂上空荡荡的，死者没有家人，朋友也寥寥无几，非常凄凉。”

       一些中年男子努力工作，存够“老婆本”后，便透过媒人或亲友介绍，回乡娶妻，然后带着妻子回到岛上继续打拼。老夫少妻的现象在这里很常见，不少年轻的过埠新娘坦承对波岛毫不了解，却义无反顾地决定出走，无论婚姻成败，都是一次心甘情愿的冒险。

       波岛华人思想传统，结婚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感情大多在婚后才开始培养。为了子女的未来，他们携手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丈夫通常支撑家里的生计，妻子则负责打理家务、照顾孩子。如果丈夫选择创业，妻子就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两人共同为一盘生意拼搏。

       华人父母尽量在物质方面满足孩子，也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只要能力许可，父母坚持把孩子送到著名的私立学校求学，让他们掌握好英语和西班牙语，以期日后能顺利考上美国大学。父母用心付出，子女一般听话长进，但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双方在思想上总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一名母亲说：“我的女儿西班牙语说得比家乡话好，有时她想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却碰上语言障碍，看她着急的样子，我也难受。我走不进她的世界，她也不了解华人的传统观念。”华人后代外表像华人，但个性和生活方式却跟当地人没有两样。他们从小说西班牙语和英语，家乡话或华语只是家用语言，对中华文化多半是一知半解。

       除了家中亲友之外，出现在华人后代生活圈子的几乎都是非华裔。一个华人女生说：“母亲希望我以后的结婚对象是华人，但跟我同辈的华人真的少之又少，要碰上喜欢的就更难。华人总认为当地人太花心，婚姻难持久，但跟华人结合就一定幸福吗？”土生土长的华人，大多和当地人共组家庭。

       老华人一般对当地人有着负面的印象，如当地人喜欢享乐，对人生缺乏规划，不懂未雨绸缪，加上对待爱情合则来不合则散的态度，都叫华人父母安不下心。然而，为了孩子的幸福，许多父母最终还是妥协：“只要孩子喜欢和开心就好。”

 华人父母为孩子铺设未来，花尽心思让子女到美国升学。省下的钱，一部分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另一部分则用来购置美国的房地产。“我们通常会在美国买房子，那么孩子升学时就有地方住。以后我们退休了，也会搬过来一起生活。”10个华人中，8个都会说出类似的人生大计。

       岛上有不少华人家庭长期分隔两地生活。有些父母留在波岛工作挣钱，孩子独自在美国求学；有些则是丈夫一人留在波岛工作，太太随孩子到美国当陪读妈妈。

       华人坚信，暂别是为了以后的重聚，分隔两地，也是为了美好的将来共同努力。

    波多黎各华社中单身汉占多数，他们没有家庭，只有工作和同事，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最恼人的是如何打发业余时间。岛上营业到深夜的只有酒吧、舞厅和赌场。酒吧和舞厅挤满了当地人，热闹的氛围更凸显华人的孤寂。落单的华人多数会选择可单独进行的活动——赌博。因此，赌博成了许多华人的生活乐趣，甚至精神寄托。

       美国政府有意把波岛打造成加勒比海上的拉斯维加斯。大部分酒店都附设赌场，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却意外招来大批当地华人捧场。有些华人平日一下班便赶到赌场搏杀，到了星期天晚上，由于隔天是大部分华人餐厅的休息日，因此赌场更是挤满华人。华人赌得倾家荡产的不多，但无法自拔的赌徒却不少。“那些嗜赌的人若不戒赌的话，再拼个十年八年，最后也会是落得身无分文的下场。”一名华人感叹。

       岛上生活单调，缺乏娱乐，赌场确实是消磨时光的好去处。“到赌场不一定要赌，我们也常邀约朋友去喝茶聊天，那里的环境相当舒适。”当地华人说。

       为了吸引人潮，赌场不时会办活动。“每逢春节赌场都会举行派对，设有幸运抽奖，还有舞狮和华人歌星演唱，香港歌手罗文也曾来登台呢！很多华人喜欢到赌场过年，可惜这两年经济不好，活动也减少了。”一名华人太太说。春节在波岛并非公假，加上华人分居各地，过年时大家都如常埋头苦干，“年味”不浓，其他华人传统节庆也一样。

       曾经，中华会馆是让华人联谊的地方。中华会馆成立于1975年，是岛上第一个华人组织。随着会员老化，人数逐年下降，所办的活动也越来越少，现在华人到会馆，大多是搓麻将或聊天。“要不是摆着几张麻将桌，那就更难聚集华人了。”中华会馆主席周国强叹息。

       如今较活跃的华人组织，该是成立于2000年的洪门致公总堂（简称洪门）。创办人兼现任主席何永强对当地华人情况非常熟悉，领导理事们收集当地华人资料，协助华人处理问题、解决纠纷。另外，洪门也和中国大陆领事馆及世界各地洪门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接待到访的海外宾客和媒体等，拉近波岛华人与海外同胞的距离。

       “波多黎各人口流动量很大，华人要不忙着工作，要不在美国、中南美州之间来回奔走，召集华人办活动并不容易。”洪门理事道出华人组织所面临的困境。

       今天，华人人数不断攀升，华社壮大了，但关系却比以前疏离。

  对波岛华人来说，三餐温饱比心灵富足更为重要。很多华人对宗教毫无概念。岛上的佛堂乏人问津，目前规模已缩小至一张小桌子，桌上摆着几尊供人膜拜的佛像，就算初一十五，来上香的人也非常少。

       然而，不少心灵空虚的华人仍渴望透过宗教得到精神慰藉。1997年，波岛华人写信向香港基督教会传达他们对宗教的需求，于是两名香港女传道士千里迢迢到岛上传福音，并协助成立华人基督教会。现今，教会共有200多名教友。每个星期天的主日会，分成两个时段——午间2点和晚间11点举行。“白天出席的多数是华人家庭，我们还特别为小孩开办主日学和中文班。晚上11点出席者以单身男性居多。”传道士梁清云解释。

       前来赴会的教友大多居住在圣胡安和周边地区，住在偏远地区的教友，由于工作时间无法配合，加上路途遥远，因此甚少参与教会活动。传道士说：“我们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到访郊区，把福音传给更多华人。”

 除了是一个宗教组织，华人基督教会也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教会开办的中文班规模很小，教学方式也不正统，但至少让华人子弟享有接触方块字的机会。教会的中文老师说：“我们用西班牙语和粤语教学。这里粤语最通行，无论是台湾人或中国大陆人，几乎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每逢华人传统节庆，教会也举办一些庆祝活动，学校假期则举办郊游，联系彼此。

   创办于1974年的Star Cream，是波岛最有名、且历史最悠久的中式快餐店。现任业主方宝璇夫妇回忆说：“当年我们从美国来到这里时，岛上只有古巴华人开设的雪糕店，以及几家售卖川菜和粤菜的杂水楼。我们一开始只卖雪糕，后来尝试加入炒饭和炸鸡，反应不错。之后我们再参照欧美快餐店的概念，就开创出中式快餐店了。”他们为快餐店取名“Star Cream”，也是希望借“Cream”来纪念他们以雪糕创业的历史。

       Star Cream真正引起注目，与一场火患有关。“当时店铺附近发生火灾，媒体采访时正巧提到我们的店名。或许是因祸得福，我们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客似云来。”方宝璇回忆。自此，Star Cream迅速窜红，成为业界亮眼的品牌。

       Star Cream成功后，马上引起一阵跟风潮。一些曾在Star Cream打工的华人自立门户，开了风格相近的中式快餐店，另一些华人新移民眼见有利可图，也遵循这经销模式大量复制。不久，中式快餐店迅速遍布大城小镇，到了1990年代，中式快餐开始在波岛餐饮业中站稳阵脚。巅峰时期，Star Cream开了7家分店，甚至有上市的计划。可惜后来家族里的年轻人都往美国发展，管理层青黄不接，他们只好逐步结束分店生意。现在方宝璇夫妇在打理的，是仅存的一家店，经营了约20年。

       方宝璇感慨地说：“许多已到美国生活的波多黎各人，回来度假探亲时，会特地来这里吃炒饭和炸鸡，他们想念这味道。老顾客透过我们的食物，找回了旧时光。”

       方宝璇夫妇守住的岂止是一盘生意，当中还包含了风光的家族历史和早期华人移民的珍贵回忆。

 在岛上居住超过二十年的老华人，早已习惯四海为家。他们在岛上花光了青春，积累了财富，时机到了，就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往邻近的美国大陆奔去。他们相信，那就是「家」。

       对土生土长的波多黎各华人来说，这里就是家。他们深爱着这片土地，并以它为傲。然而，他们却不能背弃父母的期望，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离开的终究比留下的多。

       历经万水千山的漂泊，「家」的轮廓已逐渐模糊，但华人却不曾放弃追寻。

   坐落在加勒比海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的圣马丁，南部属法国管辖，北部是荷兰属地，两地分割350多年来，没有海关也没有边界，岛民不需护照就能自由往来。圣马丁岛山清水秀，年平均气温不超过摄氏30度，每年都吸引无数欧美游客到这里来过冬。

       从17世纪开始，圣马丁陆续遭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入侵。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在17世纪为了争夺食盐而爆发战争；法国与荷兰人于18世纪为了甘蔗种植园而发生冲突；18至19世纪英国殖民者还前后3次占领圣马丁。后来统治权又回到荷兰和法国手中，两国终于在1815年签下巴黎协定，正式确定法属圣马丁占地52平方公里，荷属圣马丁占地34平方公里。

       在荷、法、西、英4种文化的互相融合下，圣马丁散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魅力，也吸引了世界各地近百个不同国籍的人民到这里居住。这些文化各异的族群，在坚持自己信念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文化，和平共处。因此，40多年来华人才能在这里自在地生活，并乐观积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

 根据在圣马丁生活了近40年的华人余玉华透露，最早到这里讨生活的两名华人，名叫余永良和张生。余永良是从荷属阿鲁巴（Aruba）迁移到这里，张生则来自荷属库拉索（Curacao），两人的原籍地同是中国广东。

       1962年，他们听说圣马丁还是个未开发的地方，物资缺乏，也比阿鲁巴和库拉索容易创业，因此不约而同地踏上冒险之旅，前往圣马丁一探究竟。

       在这里打工存了一点钱的余永良和张生，1964年合资开了岛上第一家中餐馆，取名为“中国夜”。在毫无竞争的优势之下，他们所售卖的中式杂碎餐一碟2美元，顾客每天络绎不绝，收入日渐丰厚。后来张生选择再移民到其他国家，余永良则在这里继续打拼。

       在圣马丁住了20余年，来自台湾的侯晋德补充说：“和余永良差不多同期抵达的华人还有林木龙。60年代，圣马丁渔业兴盛，很多台湾渔船都停靠到这里补充食品，林木龙当时就因喜欢这里的环境而留下来。这里最好的时候，港口能停驻超过50艘渔船，不过现在鱼都差不多被捕光了，也很少看到渔船。”

       在这里开洗衣中心将近20年，来自香港的王柏林说：“在1962年至1964年之间，这里住着7名华人。”从1970年到1972年，又有20多名华人从千里达和牙买加移民到圣马丁。1973年，余玉华从苏里南到圣马丁投靠余永良。

       1975年至1976年期间，大约有70名华人从千里达、多米尼加、牙买加等地过来，中华会馆第一任会长岑悦昌及最后一任会长余健新便是于这段时期移居圣马丁的。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华人移入圣马丁的巅峰时期。于这段时期到来，而今仍然住在这里的华人包括王柏林、赵国良、朱远光、黄慧霞、侯晋德、黄少为、蔡云天等，这批华人不论是住在荷属圣马丁还是法属圣马丁，都已入籍荷兰或法国，或拥有两地的长期居留身份。

      华人在圣马丁虽然只占总人口的5%，却稳居零售批发业的第二位，同时在餐饮业也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目前华人已开设超过70家超级市场和近百家餐馆。

       根据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馆统计，圣马丁大约有4000多名华人，平均每22个华人之中，就有一个华人拥有自己的商店。这些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少数来自香港。这些华人在商业上的发展，可说是岛上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圣马丁至少住了20年的华人，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亲戚或姻亲关系。在这里以香港楼的老板余玉华的亲戚最多，而跟岑悦昌一家有亲属关系的也不少，还有朱远光家族则因为有9兄弟姐妹，所以由他们申请过来的亲戚也很多。因此，来圣马丁只要找到这3个家族，就大致能够了解华人在整个圣马丁的发展情形。

  居住在圣马丁的大部分华人是生意人。

       在这里经营超级市场的华人，除了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劳，也必须节俭度日，才能把钱累积起来。他们大部分都是乐在其中，并没有太过埋怨这样的日子。

       一大清早，当地人喜欢在上班前到华人开的超级市场排队购买新鲜出炉的面包，下班后大约是4点半左右，也会再度光临等待新鲜面包。圣马丁的居民一般上薪资不高，在扣掉房租和交通费以后，他们只能选择便宜又美味的面包当作主食，不然一个月的薪水根本不够负担生活开支。

       50多岁的朱远光在17岁时就到圣马丁帮姨丈余健新工作，4年后在姨丈的协助下他自行创业，开了现在的超级市场。他在香港的本行就是做面包，到这里后，他也不忘本业继续在超市内卖面包。对他来说，做面包的利润太少，比一般超级市场要花更多时间，不过可以带客入店，带动生意。

 这些华人超级市场，由于在店内供应现烤新鲜面包，所以他们凌晨4点半就要到店里准备烤面包的所有材料。他们说：“我们都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早上起来吃了早餐，就去开店，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才休息回家吃饭。”

       他们的午餐通常是随意解决，对他们来说，晚餐是比较重要的一餐。部分华人喜欢自己在家里做晚饭，有时候煎条鱼，炒个小菜，弄些沙拉（Salad），再加个腊肠切片，就是丰盛的一餐。只是他们的用餐时间一般比较迟，通常都是7点半收工回家烧菜做饭，到真正用餐的时间已经8点半，如果是开店到9点半的华人就更迟。这样的生活的确辛苦，但是对这些华人来说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由于圣马丁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两地商家在买卖货品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标价方式。在荷属区的商店内，所有商品的标价都必须采用荷属安德列斯盾来标示。不过在付款方面可以选择用盾或美金，只要在收银机上按键，系统便会自动转换。美金也通用于荷属区。

虽然在这里做生意的华人都习惯了这样的计算方式，但是他们却仍然觉得这种货币制度还是有些麻烦，他们说：“不明白为什么在荷兰境内早就淘汰的荷兰盾，在这里却还要继续使用，其实我们希望能取消这样的制度，毕竟领美金薪水，会比荷兰盾更省事，至少不用再做货币兑换。”

       在法属区，则已从早年采用法郎的制度改为通行欧元，政府也规定商家在店内只收欧元，不能用美金，用美金等同犯法，被抓到就要罚钱。

       除了要适应不同的货币制度外，在法属区和荷属区做生意的华人也要面对两地施行的高税收政策。在法属区做生意的赋税包括劳工保险、营业税等至少占生意额的四成或更高，荷属区的税务则约占生意额的一半。在法属区做生意的华人，每月必须给予当地员工的法定最低工资为1100欧元。而荷属区的每月法定最低工资则约为700美元。不过在这里开超级市场，扣完税后，一般还能有三成左右的盈利，因此部分华人认为还是颇有赚头，也逐渐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来适应这样的税收政策。

       朱远光觉得现在生意没有以前好做，利润也没有从前高，税务也太重。但是他却认为：“比起以前，现在的我更懂得做生意。我来这里的时候怎么说都只有17岁，哪里懂得什么是会计、怎么去做生意，在这里这么多年，看到政府那些精明的官员，是怎么跟我们这些小生意人算税，我学了很多，自己也在进步，就知道如何去应付他们。”

岛上唯一的华人酒店——幸福酒店。

   在圣马丁做生意的机会很多，有心人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只要持有护照就不必申请营业执照，只要有钱有地方就可以开业，税务缴足政府不会来找麻烦。

       只可惜在这里做生意的华人，除了超级市场、酒店、餐馆和洗衣店之外，经营其他行业的却不多。目前只看见一些华人开设的珍珠奶茶铺、影视光碟和摩托车出租店。而在岛上吸金最多的珠宝首饰、电器等名牌商品店则没有华人的踪影，都掌握在印度人手中。

       住在这里的华人，几乎都对圣马丁的整体治安和环境感到满意。税务虽重，但是是有得赚，因此觉得钱还不够的华人一般都不会想着离开。有钱赚，生活又过得相当稳定的华人，更希望在这里定居。

在圣马丁生活的华人，经济能力较好的通常会置业。一些华人贪方便，就会买下距离店铺不远的房子，或者就住在店楼上。当然，也会有人到治安比较好的半山腰地段买房子。

       想在这里置产的华人大部分都有在这里定居的打算。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念大学，如果要念小学就一定要念私立学校，要念中学就必须是美国和加拿大名校，大学当然是送到美国或加拿大去，他们都希望孩子能成为人中龙凤。孩子如果打算回来，他们通常都已决定继承父母的生意，当然也有人会在这里创业，毕竟比起在美国帮别人打工，还不如自己回来做生意好。

       以T恤、短裤和拖鞋打扮就能出门的王柏林，就正和业主洽谈买下他现在居住的房子。他说自己住了十多年，都懒得搬家或者离开这里，儿子有工作，女儿也嫁到加拿大去，他已经没什么好担心。他说：“都住习惯了，朋友都在这里，回去老家没有朋友，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还不如留在这里好。”

       超级市场的老板娘朱慕升则选择在圣马丁建自己的房子，这栋房子在2009年初建好。她说：“我在这里呆了20多年，能建起一幢大楼，我已经觉得此生无遗憾。我满意现在拥有的一切，并认为在圣马丁的华人都应该感恩自己能生活在这片土地。”她觉得这里的华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当地的文化那么丰富，华人却还是生活如前。“我喜欢参与社会活动，捐助慈善单位，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跟当地人打成一片。”她语重心长地叙说自己的想法。

    而对朱远光来说，虽然现在的日常收入不比以往，却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日子过得还算舒适。他曾经考虑移民加拿大，但后来却由于资格不符而放弃。其实他在这里那么多年，想离开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可以找到生活的重心，找到满足感，又何须到其他地方受苦？至于未来，他总是抱着平常心去看待。“我今天规划，事情明天可能就出现变化，与其去规划不知道的将来，倒不如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好，不是更好吗？”

       在圣马丁经营珠城酒楼（Pink Pearl Bar Restaurant）的赵国良是位好客的华人，他喜欢和朋友分享美食，朋友说起某家的包子好吃，他隔日就给捧上一个自家的让朋友试吃：“怎么样，比那家的好吃吧？”在这样的热情下，谁还说不好吃？当然包子的好味道也真是没话说。

       正因为赵国良对于美食的这份好胜心，珠城酒楼才能屹立不到。同时顾客只要来到珠城用餐，就可以免费欣赏圣马丁美丽的海滩风景，这也是这家餐馆的重要卖点。这里不只游客和当地人喜欢光顾，华人在周日的时候也喜欢到这里喝茶聊天。

       朱慕升和黄慧霞是对好朋友，她们偶尔会在周日选择到珠城酒楼用点心，两个家庭的成员一起到餐厅用餐享受天伦之乐。而刘戴安娜（Diana Liu）则喜欢到天鹅酒家（White Swan Bar & Restaurant）用餐，她说：“这家餐厅是我每天必到的饭堂，每次老板都会给我做好菜，常常有惊喜，我喜欢在这里吃饭。”戴安娜觉得吃饭最重要是开心，不喜欢吃主食只爱特色小菜的她，最明白个中乐趣。

       在这里有数位平均年龄不到30的年轻少妇，每个周日都会带着自己的宝宝，找个地方聚会聊天，她们一个月平均会光顾珠城酒楼一次。大部分来自广东恩平和新会的她们，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移居到圣马丁来，在这里住了两年到十多年不等。

       提起相互认识的经过，其中一位年轻妈妈冯小燕说：“那时我们正好都怀孕，待在家里很闷，就不约而同走到海滩散步。那时碰到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华人孕妇也在散步，就很自然地交上了朋友。”

       只不过这群年轻妈妈对圣马丁这片土地并没有太强的归属感，她们始终认为自己的家乡比较好。其中一位妈妈说：“等孩子大一点我就要把他送回大陆让我的父母带，在中国的学习环境比较好，我还是希望让他在那边求学。”其实，身为父母的哪舍得跟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总会有回国的一天，所以也就不介意那短暂的分离。

       每个人对于生活的定义都不同，但是能肯定的是，这些华人大部分都能在圣马丁找到自己的人生归属，对他们来说，是走是留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在圣马丁岛上，有两位华人从无到有建起慈济联络站，并致力为岛上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虽然耗上许多时间精力，却成功地赢得了当地人和政府机关对华人的尊重；这两名华人就是张振业的父母——张杰荣和朱细芳。

       张氏夫妇在1984年从香港经由加拿大，辗转来到圣马丁发展事业。在这里经营超级市场多年后，朱细芳开始走访圣马丁的老人院及残疾收容所，希望在这里找到心灵寄托，找到一个能回馈社会的方法。终于在数年前，她在一次回香港的旅程中，在当地书展看到了静思文化的书摊，从此开启了她的慈济生涯，也让她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

     认识慈济后，朱细芳于2001年决定在圣马丁建立慈济联络站，以大力推广为善的理念，希望亲朋戚友和超市员工都能投入慈善事业。经过数年努力，他们成功地让员工自愿投入慈济事业。现在只要他们发起任何慈善活动，员工几乎都是二话不说地全情投入。而那些当地女性员工，也已经习惯在当义工的时候梳着标准的慈济头型，穿着蓝色或灰色上衣以及白色长裤来做慈善。

       “可惜的是，这里的华人都不太参与慈济，现在我们的义工只有20多名，定期捐款的会员也不多，只有50多人。”也帮母亲分担慈济行政工作的张振业感慨地说。

       不过他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在数年前他们的善行获得了荷属圣马丁国会议员的肯定和表扬。

       张振业认为慈济改变他许多观念：“我们一家人变得更和睦，做什么事都很团结。我非常乐于从事慈济。”慈济的义工们通常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到老人院去服务，帮忙老人家剪指甲，并表演唱歌和手语给他们带来欢乐。

       当然，在这里除了从事义务工作，有些华人会选择在周末到俱乐部去和朋友喝一杯或跳跳舞。经济能力要是好些，也可以选择到附近的萨巴（Saba）、圣尤斯特歇斯（Sint Eustatius）等小岛轻松度假。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一度的四月份狂欢节中，华人也会献上舞龙舞狮的表演，一起欢庆这个圣马丁岛上重要的节日。

      来自中国天津的田树培博士，是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在圣马丁建立了岛上规模最大的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American University of The Caribbean School of Medicine）。

       1964年，他到美国短短的9个月，就完成了由餐馆跑堂到电子公司技术员的角色转换，后来又进入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电机工程硕士，最后又在美国联合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为时8年的苦读，为田树培打下了进入美国教育界的坚实基础，他先后在两所大学担任过电子工程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教务长。

       他在1975年获选为立百乐蒙工艺学院的校长，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在任期的3年多光景，他先后增设了8个科系，学生人数增加了50%，令该院达到了空前的繁盛。

       然而，这位教育家却在1978年时辞去年薪丰厚的校长职位，在一所天主教大学租借宿舍，用4万多美元开办了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这是第一次由一位东方人用私人名义在美国兴办医科大学。

       可惜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灾难将田树培苦心经营的大学毁于一旦。但田树培并未因此而放弃，反而越挫越勇。

     如今在校园协助舅舅处理业务的刘戴安娜说：“幸亏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圣马丁买下十英亩的土地，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就到这里重建大学。我们是在1995年8月23日搬到圣马丁岛的。那时候的我简直忙得焦头烂额，十多年来，还是一直在忙。”

       提起这位舅舅，刘戴安娜的脸上总是挂着敬佩之情：“我很多事情都是跟舅舅学的，他对每一件事情，不论大小事，都一丝不苟，仔仔细细地完成。他觉得华人在国外不能被别人看不起，一定要比别人强，所以他坚持要做的任何事情，就一定会完成。”

       已经有80岁高龄的田博士，如今不再为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的校务烦恼，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事业全权交由儿子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不再热心教育事业。除了圣马丁的医学大学，田树培也在天津捐助了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的建校工程。刘戴安娜补充道：“我舅舅打算在天津捐助一所中学，预计投入数十万美金。”

 圣马丁数百年来由两个国家管理，岛上各族长久和谐包容地生活着，身在其中的华人，也充分体会了只要愿意去尝试，就能看到奇迹的精神。

 华人都习惯将这个国家称为千里达。它主要由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组成，超过70%的人生活在特立尼达岛上。

       1498年，哥伦布宣布特立尼达岛为西班牙所有，而多巴哥岛则历经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多次争夺而易手。1889年，两岛终于合并成为英国殖民地。196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宣布独立并加入英联邦。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个国家多元种族共存的局面。其中，印度人与黑人占大多数，其余还有欧洲人、阿拉伯人以及各族混血的后裔等。

       而华人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已超越了200年。

     在早期的西方殖民政府时代，由于许多当地土著印第安人死于传染病，导致殖民者到这里建立甘蔗园及咖啡园之后，面临缺少劳工的困境，于是就把非洲人贩卖到此处当奴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华人和印度人就成了千里达最主要的契约工人。

       1806年，第一批为数147人的契约华工抵达首都西班牙港。早期的华工大多数都来自广东省，且以中山县居多，其次是东莞、台山和新会人。在契约期满之后，决定留下来的华人就把积蓄投资在洗衣、制鞋、制衣、餐饮等行业。

       当时，在千里达的华人女性只有20多人，导致许多华人男性与黑人或印度妇女结婚。

       华人所经营的店铺遍布西班牙港，大多是小本经营。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里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华人企业家、银行家，其中阿良家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926年，阿良家族的祖辈踏上了这一块土地，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成功创立了以食品加工、日用品化工、房地产、餐饮业等为主体的家族公司。

     华人在经济上站稳了脚步后，便开始将原本身在广东的亲友陆续接到千里达，这里的华人人数逐渐增长。90年代，新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的移民，他们多数在华人餐馆或商店打工。

       “华人刚来时，身无分文，拎着两个皮箱就来闯天下了。他们大部分都是先替朋友或亲戚打工，累积了一些钱之后才做生意。”当地的华人回忆说。“华人大多从事小本生意，几乎所有的伙食店都是由华人经营的。”

       千里达的商业竞争力较弱，所以华人赚钱也很容易，这是吸引华人前来的原因之一。

       1989年，千里达发生暴动，大部分华人的店铺都遭了殃，超过半数的华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

       然而，华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待事件平息了之后，他们重整旗鼓，继续营业。华人为了实现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生活，不惜一切重来。他们大多数都是从早忙到晚，一周工作7日，每日工作18到20个小时。

       “老天还是会眷顾有心人的，幸运的是，千里达近十年来的经济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也逐渐安定。”这是当地华人一般的看法。

*祖籍广东宝安的何才爵士（Sir Solomon Hochoy），于1960年出任最后一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督，是历来首位获英国委任为总督的华人。他在当地独立后的1962年至1972年，出任首任高级总督（Governor-General）。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千里达第二大城市圣费尔南多的一段高速公路命名为“何才”公路。*

 千里达约有6000名华人，但在全国134万人口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华人来到这里，悠悠两个多世纪，积年累月用青春和汗水一点一滴地搭建自己的舞台。

       祖辈们最早落脚的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仍然是华人最密集的所在。首都西班牙港是新移民大展拳脚的地方，大部分知名的中餐馆、百货店都集中在那里，华人四大社团也集中在市中心的大街上。

       客家人是最早到来的华人，但大部分都移民了，他们留下来的后代，就像老树盘根错节，已根深蒂固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并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他们紧紧地拥抱着这里的文化，说的唱的都是流利的英语，华语反倒疏远了。

       这里90%的华人，来自广东一带。部分新移民来自福建，以亲属、厨师的身份移居到千里达。英语是他们融入当地的必修课。

       华人最感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中文学校，也没有中文报刊。

   华人踏海来到千里达，船一靠岸，右面是细滑白沙，清澈海水，左边是山丘屹立，碧草如茵。华人窃喜：“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加勒比海阳光暖和，微风迎面徐徐吹来，华人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来。

       刚到的华人，一般都是替亲戚或朋友打工，先熟悉环境、学一点英语，攒积了本钱后，再自立门户，自己开店当老板。

       华人离开家乡，心里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寄人篱下，天天看人脸色的打工仔，他们认为“工字不出头”。“帮别人打工，就是帮别人赚钱，自己开店做生意，赚的钱都是自己的。”于是，千里达的华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做生意。

       初次创业的华人，大部分都会选择开中餐馆。

       对华人来说，开一间中餐馆成本少，但收益大。“早上用了100元买食材，晚打烊时就可以连本带利全收回来了。”千里达人酷爱中餐，简单的炒饭炒面加鸡肉令人百吃不厌。在他们心目中，华人是一流厨师，并执着地认为只要是华人就一定会下厨，而且厨艺一定很好。

       因此，千里达中餐馆不怕没人来光顾。

     华人小本经营的小型中餐馆多如牛毛，有些是夫妻携手打理，有些则聘请几个店员帮忙作业。因为治安问题，小型餐馆的柜台上都架上了大拇指粗的铁栅栏，将里外截然分开。不论从里往外看，还是从外往里看，怎都像是活在笼子里。老板、员工、厨师、家人的活动全都在笼子里。“没办法，围栅栏可以防盗，也可以保护自己。”华人无奈地说。栅栏底部还有个小小四方格空间，让人付钱买单。

       经营中餐馆的时间自由。一般的中餐馆从上午十点开始营业，到晚上十点打烊。“如果人手足够，你甚至可以营业至凌晨一两点。”周末，客人在店里喝酒嗑花生，华人就不着急赶客人。“运气好，还可以多卖几瓶啤酒，赚些小费呢。”华人笑着说。

       千里达有近5000家大大小小的中餐馆。用最简单的乘除法来计算，意味着平均1.2个华人就有一家店！

       “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华人习惯分散投资，他们常在同一时间开好几家分行。”小小的中餐馆只要开张就能赚钱，所以即使辛苦，华人也乐此不疲。

       位于圣费尔南多的点心皇大酒家的老陈炎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在千里达奋斗了十多年，一人兼营好几家中餐馆，除和朋友合股经营占地一万平方尺的点心皇大酒家，卖点心也卖各式粤菜。此外，他还单独另开了几家中餐馆，生意都不错。“千里达中餐馆很多，多少还是有些竞争。大型的中餐馆人来人往赚得比较快也比较多，小餐馆则是分散投资，赚点零用钱。”他如是分析。

       圣费尔南多的长城酒家，是千里达面积最大的中餐馆。它像是一座中国城堡，因为治安问题，主人要求客人把车开进来，停车免费。下车后，经过小型“御花园”，行过小桥流水，才来到餐厅。客人推开大门，中国菜香味扑鼻而来。千里达的总统、高官、名媛淑女、名人球星特爱光顾。

       老板宋耀金来自东莞龙岗，爱吃梅菜扣肉、焖猪肉，是个不折不扣的客家后裔。在千里达住久了，他已忘记如何说客家话。他用英语说：“在千里达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赚到钱，不像欧美国家，那里的竞争力大，华人餐馆若不出奇制胜，就没有立足之地。”他那爱好音乐的小儿子，也从加拿大回到千里达，因为只有在千里达的慢步调，才能兼顾他的工作与兴趣。

       在Chaguanas镇上的Buffet King自助餐厅，可容纳百人，在千里达一枝独秀。与其他叫餐点菜的中餐馆不一样，来到的客人付上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自助式地任选任吃。自助餐馆因此异常红火，即使营业了十年，客人还是源源不绝。老板Ronald Chow于60年代从广东来，他说：“自助餐盈利很高，开张第一年，我原以为其他华人也会效仿经营，哪知等了十年，还是没遇上同行对手。”他很失望，连做梦也希望千里达可以多冒出几家自助餐馆和他一决高下。

      华人星期天饮早茶吃点心的文化，也渐渐成为千里达人的习惯。

       星期天，茶楼必定人山人海，华人、黑人、印度人齐聚一堂。“一大早，当地人就来喝早茶了。以前，他们点菜千篇一律，不是烧卖就是虾饺，现在可会吃了，凤爪、排骨、蛋挞、奶黄包样样都要试。”西班牙港金鹰酒家的老板萧容庆说。

    餐馆生意好，华人也头疼，最大的困扰就是人手不足问题。特别是星期天，生意滔滔，人手不够，所有的事情都会乱糟糟。“这里请人工作很难，老板还得看员工脸色，特别是大厨，他们自尊心很强，骂一骂就走人。有些攒够钱的华人也会自己开店做生意，华人很少打长期工。”老板也有本难念的经。

       因此，很多华人老板透过经纪公司，以两年签约形式，在中国大陆聘请厨师。“这有点像赌博，一赌就是两年，万一聘请到情绪化的厨师，只好自认倒霉了。”华人说：“签一个厨师的手续费用至少6000美元，老板不仅需要为他们免费提供伙食和住宿，每个月还得准时发薪水，薪水每个月约1800至2000美元不等。”

       当老板苦水多，然而，“老板”这头衔却是华人出外闯世界的梦想。

## 

    如果说中餐馆“劫持”了千里达人的味蕾，那华人百货、超市就成功地占领了千里达人日常生活的消费市场。

       走在西班牙港的夏洛特街（Charlotte Street）上，会发现很多华人经营的百货店或超市。早期的伙食店已消失，顺应时代改变，华人把自助式、开放式的超市营业模式，呈现给千里达人。

       当地人爱吃零食爱吃甜品，一些华人百货店就零售糖果、饼干、让当地人自由选择。“只要卖些包装可爱的精果干粮，当地人就很喜欢了。他们口袋只要有钱就会天天来，有些更是早上、晚上来两趟，店里不怕没人来光顾。”在夏洛特街拐角处经营明斐贸易公司的潘丽珍说。

       当地人爱花钱、爱购物的欲望，正好满足华人爱赚钱的心态。

* *为了让当地人意识到华人的杰出贡献，2006年，千里达总统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华人抵达千里达200周年。那一年，千里达政府更是把10月23日的华人登陆日设为公共假期，全国放假一天。*
* “百货店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卖，进货的时候，看见什么都会拿到店里去卖，数量不多，但一定卖得出去。”小型百货店设什么规则模式可言，华人想卖什么就卖什么，小小的一家店，里里外外，塞满了各种货物。当地人说：“除了应有的商品外，偶尔还可以在华人百货店找到惊喜。”所谓的惊喜就是，譬如原本想买面包，结果却“捡”到便宜且合心意的帽子。
* 夏洛特街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永盛唐山百货。店面不大，一进门还有铁栅包围着，几个类似警卫的当地人在门口把关。客人要购物，得先通过黑人那关，他们只要对你咧齿一笑，那就表示你合格，可自由通过铁栅门进去购物了。整个过程，在几秒钟内完成，明明要去买东西，却感觉是去银行保险库领黄金。
* 永盛唐山百货是老字号，店里全卖华人货品和食品。干粮、调味料、药丸药品，还有华人拜祭的物品等，填满整间店铺。这里是华人常来“朝圣”的地方。特别是星期天，华人喝了早茶，就来购物了，人来人往，店家忙得连去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 “这里的东西，在许多超市都买不到。千里达天气热，华人喜欢来这里买龟苓膏、腐竹、薏仁等回去煮凉茶或糖水。”老板黄帝良说。他在千里达住了40多年，家人孩子都移民加拿大了，他却留在这里。“我喜欢加勒比海的天气，喜欢这里的老朋友街坊。”他说。
* 他和当地华人相处融洽，华人喜欢到他店里溜达。“在这里买东西很有亲切感，老板常会给优惠价，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折扣。”一个提着大包小包刚从永盛百货出来的华人说。
* 华人生病了，也去永盛百货。“华人病了都习惯吃些成药。小孩咳嗽了就来买枇杷膏，肚子吃坏了就买保济丸，女人吃的白凤丸也可以在这里买得到。”华人说，在千里达看医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这里看医生要等很久，常常都是痛的时候看不到医生，不痛了才见着医生。”为了省时省麻烦，华人小病小痛，自然而然地就往永盛百货跑。

|  |  |
| --- | --- |
|  | 夏洛特街的永盛百货最受当地华人欢迎 |

     就像旅游书籍推介，在加勒比海滩晒太阳，是最舒服的度假方式。当地全年夏天，有点炎热，但海风徐徐吹来，也算舒适宜人。比起北美和欧洲大陆的寒流来袭，华人更是享受这里天天摄氏27度的气候。

       撇开忙碌的工作不谈，华人的生活可用写实写意、悠哉游哉来形容。

       千里达是个美丽的岛国。这里植被繁茂，四季鲜花盛开，酸甜香郁的热带水果压满枝头。明媚的阳光，洁白柔絮的海滩，清新湿润的空气，加上阵阵轻柔的海风吹拂着岸边的椰林和棕榈树，让华人找到释放疲惫的休息站。

       这里有好几个漂亮的海滩。忙累了，华人带着妻儿，就在Maracas Bay清澈的海水中游泳，或滑板冲浪。躺在细软的沙滩上晒晒太阳也是常有的事。“千里达很小，驱车到海边也不过几十分钟，星期天下班了，就坐在车上吹海风，很舒服。”黄帝良介绍说。

       华人无论怎么忙，都可以找到放松解压的方式。在千这里很难找到一个肤色白皙的华人。或许因为天天与沙滩阳光为伍，华人的肤色几乎都是健康的古铜色。

       华人说，来到千里达，他们是幸运的。天天与阳光“见面”，想法也变得很积极。

       对新移民来说，闯世界、创事业是辛苦艰难的，然而他们的想法和态度却没有因此而消极。他们努力工作，辛勤地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铺路。他们不赌不嫖，星期天陪着家人去饮早茶，或是带小孩到海边玩。

* *来自广东省的李龙（John Lee Lum)是千里达第一个发现油田的人。1880年，他来到千里达，刚开始在朋友的百货店工作，后来自己当老板。他在千里达发迹，后来还投资开发石油、办银行，并受政府委托发行首批千里达货币，是千里达华人的翘楚。*

       有些华人则上教堂寻找寄托。平安与满足写在华人的脸上，心底流出的微笑明显地刻在他们的嘴边。“华人与当地人共用一个教堂，每个星期天一起崇拜，教堂的费用一起分担。”来自香港的陈伟国说。每个星期天，他负责教会的粤语唱诗班。“干里达的华人多说英语，参与教会的华人其实不多，懂得用中文宣教的人更少。”

       千里达的华人必须会说英语，因这里的人种多，即便是占多数的印度人也说英语。华人入乡随俗，也天天用英语。“很多中文词汇都忘记了，要说华语，其实有点为难。”华人说。

       千里达的新生代很少能说华语。土生土长的黄洪治回忆说：“这很容易理解的。小孩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忙于工作，小孩童年时接触的所有东西，包括教育、资讯、娱乐、电视、课本都是英文，朋友们也都说英语。英语无处不在，强烈地包围小孩，就连在家里，家长也和小孩说英语。”

       “以前，爸爸妈妈会用蹩脚的英语和小孩沟通，想要从他们那里学到更多的英语词汇，好方便做生意。”不知道是小孩影响父母，还是父母影响小孩，到最后，千里达的华人，老的少的都说英语了。他们的英语，带着当地的口音和特殊语调，也混杂了当地人自创的词汇。

       早期的华人多与印度人、黑人通婚，他们的下一代已不再是华人那样的黄皮肤。千里达大部分的新生代，都不会继承父辈的生意。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想要自己去闯。

       于是，他们选择当医生、律师、校长或银行的高级职员，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威望。“在千里达，华人地位很高。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生意发展都很成功，是华人的骄傲。”千里达著名华人厨师周国强说：“唯一的大型购物兼娱乐商场Movie Town也是属于华人的。”

       华人在千里达代代相传，但在这里住得越久，身上中华文化的成分就越来越微弱，连中餐的餐牌，也渐渐地换上了英文字母。老一代的华人还能用粤语或客家话说上几道华人菜名，像Pak Chan Kai（白斩鸡）、Chow Har Look（炒虾仁）、焖猪肉、梅菜扣肉等。新生代只有兴趣吃，根本不懂菜名。

       如今华人都说英语，让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更显艰难。这里没有华文报纸和华文学校。华人有心要办报，但办报的资金以及专业人才是最大问题。“我们也试过办学校，常常都只有老师没有学生。”当地华人说。

       “虽说华语是自己的母语，但是小孩学了也用不上，因为这里是英语通行，所以还是得为小孩的前途着想，一切英语为先。”大部分的华人家长都说同样的话。“这里连中文名字也用不上，我已经忘记自己的中文名字是怎么写了。”一名家长如此坦言。

       华人也不过中秋节、农历新年或其他的传统节庆了。“偶尔朋友送月饼来，我们才知道快过中秋了。”在餐馆打工的华人说。

       农历新年，千里达没假期，华人也照常上班。除夕夜吃团圆饭这回事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但华人说：“我们还是会坚持给孩子红包，象征祝福，让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安康顺利。”

       新春佳节对新移民来说，是平淡的一天。对新生代来说，更是个模糊的日子。

       然而，夏洛特大街上的四大会馆，可不会因此而放弃。为了提醒华人不忘农历春节，他们每年都很用心地筹备新年聚餐。

     迎着海风面向海洋，华人承认心里总会惦念着海洋另一岸的故乡。然而，想到自己用一辈子青春努力建立的家园，看着一手培育的孩子踏向幸福的人生，他们觉得由衷欣慰。

 南美洲西部的秘鲁，是古代印加文明所在地。后来又是西班牙殖民政府在南美洲的统治中心。首都利马建于1535年，以浓厚的殖民色彩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秘鲁矿产丰富，铋和矾的蕴藏量居世界首位，石油自给有余，在拉美诸国中，属于经济中等水平的国家。山地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全境从西向东分为热带沙漠气候、高原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适合发展多样的农作物种植和畜牧业。秘鲁人经常自夸，他们的土地可以种出将近4000种不同品种的马铃薯。

       20世纪80年代，秘鲁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高达10000%；90年代备受争议的总统藤森上台，才扭转颓势。近几年，秘鲁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利马城到处大兴土木，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

       这片古老而富足的土地，养育着世界各个种族的人群，其中包括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南美最大的华人族群。

近年的史料显示，早在1613年，就已经有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住在利马城，他们多数从事石材加工以及手工劳作。

       然而，世人一般都公认19世纪中叶才是大批华人抵达秘鲁的年代。那时的秘鲁刚独立不久，百业待兴且急需劳动力，于是，为数75人的首批契约华工，在1849年10月15日抵达秘鲁。后来，秘鲁废除了奴隶制度，又立法奖赏那些引入华工的国人。此后的25年内，十万名华工源源不绝地踏上了卡亚俄（Callao）码头，形成秘鲁历史上最大的华人移民潮。

       这些华工大多数在广东以及福建沿海一带被拐骗而来，签下了长达8年的契约。在为期4个月的海上航程中，华工挤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船舱内，仅有大米和咸菜充饥，很多人因为传染病而接连病倒。在航程结束时，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华工葬身茫茫大海。

       熬过这段“死亡航线”上岸之后，华工们随即被带到苦力市场任人挑选。有者因为身体瘦弱而无人问津，被迫站在烈日下暴晒好几天，最后被人口贩子以贱价卖出。当时，在当地的报章上经常刊登这样的广告：“又一批苦力完好到达，身体健壮，无生理缺陷及恶习”。对买卖双方而言，华工不过是一件会劳动的商品而已。

       由于当地的印第安人认为下海是不吉利的，大部分华工因而被卖到沿海的棉花及甘蔗种植园当苦力。他们早上4点便得起床工作，晚上则睡在上锁的寮棚内。部分华工在钦差岛（Las Islas Chincha）挖掘鸟粪，作为出口肥料。烈日下，他们忍受着恶臭，以铁铲挖鸟粪，再将之装上船，稍有松懈便遭毒打。另外，也有华工在塔拉帕卡（Trapaca）和阿塔卡马（Atakama）一带的硝石区采矿，或者在中部及南部修建铁路。总而言之，在秘鲁，最危险和最辛苦的工作都由华工来承担。

       华工那微薄的工资，在七除八扣之后已所剩无几，许多华工在合约结束以前就积劳成疾或受虐至死。也有人趁着监工不备时自缢、跳崖自尽，甚至挖鸟粪自埋。在那个年代，每一个种植园都有华工的墓地。埋葬于小沙堆底下的他们没有棺木，也没有寿衣，甚至连一小块注明姓名的墓碑也没有，似乎也没有人记得这群可怜人。

       1874年，秘鲁和中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废除对华工的苛刻规定，并严禁华工买卖及虐待事件，此后，华工的生活才得以改善。契约期满的华工大部分流向内地，转行经商或者从事农工业生产。那时，利马的卡蓬街（Capon）渐渐形成了唐人街，到处都是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面包店、裁缝店、理发店、修鞋店和小饭铺，还有赌馆及鸦片馆。这些小商人除下布衣裤的农民打扮，穿上了呢绒西装。

       1890年至1930年间，一批香港移民抵达秘鲁创业。他们很快便垄断了秘鲁华人的商贸活动，并进军金融保险和船运业等。这些卓越的成就使当地人对华人刮目相看，加上秘鲁政府严禁鸦片，以致华人瘾君子的数量大为减少，秘鲁人于是逐渐改变了先前对华人的不良印象。

 几乎每一名离乡背井的移民，心中总是怀着衣锦还乡的梦想。而身在家乡的父母也翘首企望，通常还会先为儿子娶亲。在婚礼当天，新娘子就只能和公鸡拜堂。然而，由于新郎一直都没能回来，根本不知道父母在老家已给他添了家室，所以多数会在当地与印第安人或黑人妇女成婚。

 当年，有华工请人到山里找来一群女子，然后双方蒙眼进入屋内，并且分成两排面壁站立。当主持人击掌时，男方和女方便同时转过身来，站在对面的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这种情况看似荒唐，却是早期华人极其无奈的真实写照。

       在那个年代，得以踏上漫漫长路回乡，是一件让人羡慕不已的事。即将返乡的华人除了在报上登广告之外，还要请同乡吃饭饯行，十分铺张。欣喜若狂之余，回乡的行李还带上送给亲人们的衣服、收音机、甚至脚踏车。

       华人再度大批来到秘鲁，是在20世纪70年代。移民初来乍到，大多数都只能在街上卖菜、猪肉以及洋葱炸肉“奇卡隆”（Chicarron）。他们居住在市场对面的横巷，每日早上4点就得开始工作。而那些早来的华人却已经发展到坐拥良田，设有碾米、麻绳和布匹等工厂，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

       此外，自8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广州人移居秘鲁，当时华人约有4万人，华人商贸公司遍布利马各地。他们在塑胶、土产批发、玩具生产、粮食加工、保险和电器等行业都有一定的成就。

       近年来，一些华人不法之徒，将秘鲁沦为偷渡的中转站。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新移民登上了开往美国海岸的船只。途中，有人因为遇上风浪而翻船、或是为了躲避海警而跳海，甚至被无良的人蛇遗弃荒岛，尚未抵达彼岸就已经含恨而终。秘鲁华工的辛酸史早已落下帷幕，小部分的新移民却开始奏起了另一首悲歌。

* *19世纪中叶，在利马南部小镇干盆地庄园的华工因不堪长期受欺压，在南美洲太平洋战役中充当智利军的向导，击退了秘鲁军队。这件事激起秘鲁庄园主人对华工的仇恨，引发大规模的屠杀华工事件。仅仅一个月之内，便有1500名华工惨遭杀害，写下秘鲁华人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秘鲁华人的确实人数，至今仍是个解不开的谜。

       华人和当地人经历几代通婚，后裔血统复杂。有人估计，华人华裔数量已突破300万，超过秘鲁总人口的10%。

       华人大多聚居在首都利马，北部的特鲁希略（Trujillo）、奇克拉约（Chiclayo）、标拉（Piura）以及意基度（Iquito）等城镇也分别有几十户华人。秘鲁华人大多祖籍广东，主要是中山，其次为番禺、鹤山、台山、恩平、新会等地。这也是为什么粤菜得以成为秘鲁饮食的主流，以及利马每条街上都有中餐馆的原因。

       华人凭着智慧才干，在商业领域表现突出。土生土长的华裔融入秘鲁社会各阶层，从蓝领阶层的德士司机、技术工人，到白领阶层的教授、经理、总裁，再到政军界人物都有。

       今天，华人和秘鲁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一样的中式炒饭，建设秘鲁的经济，丰富着秘鲁的艺术，共同打造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中文媒体和学校不缺，但在普及中华文化方面，眼前却是一段漫长而未知的路。

     首都利马是秘鲁华人的大本营。

       在这里，燥的陆地和潮湿的海滩相邻，残破的老房和新式的大楼交错，富人和穷人擦肩而过，一切是那么两极化，却又是那么和谐。

       老华人、新移民以及许许多多混血后代安分地各据城市一角，寻找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位于市中心的唐人街，成了各群体的汇集地。华人来买《秘华商报》，来茶楼吃港式早点，来选购中国食品，来参加社团活动，甚至就在这里开店谋生。隔着一百多的时光，剪去长辫子、摘下瓜皮帽的人们，正在同一条街上，和怀着同样梦想的先贤遥遥相望。在街上不期而遇的华人，仍以华语或广东话问候聊天。如果不是穿梭其中的秘鲁人，还有那招牌上的西班牙文，人们也许会误以为这是广州或香港的某条街道。

       对秘鲁人来说，中国并不遥远，因为中国人就在他们左右，中餐就是他们的主食。

       大半个世纪以来，华人在5000家中餐馆里忙忙碌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当地人称作“chifa”的中餐馆，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了秘鲁每个角落。秘鲁中文杂志《新视野》曾报道，连没有华人居住的郊外小镇也出现挂着大红灯笼、写着Chifa招牌的小饭馆。不过，那是懂得煮几道中餐的当地人经营的“翻版中餐馆”。

地人之所以会把中餐馆称为“chifa”，个中有段渊源。早期移民多为广东华工，每到吃饭时间，送饭来的人就高喊“吃饭！吃饭！”当地人乍听之下像是“chifa”，久而久之“chifa”就成了中餐的代名词。当时的华工肯定没想到，今天秘鲁人对中餐的喜爱，甚至超过了华人本身。一名年轻的秘鲁人说：“如果只有一种选择，我会放弃秘鲁菜而选吃中餐。”

       1921年开张的第一家中餐馆南京酒家，让利马市民开始接触中餐。此后，当地人的餐桌上不再只有马铃薯、玉米和面包，而是各式中国菜，米饭更成了秘鲁人的主食。如今，中餐已和秘鲁餐并驾齐驱，成为当地两大菜系。报摊上摆着中餐食谱，扭开电视可看到中餐烹饪节目，中餐在秘鲁无所不在。当地人可以随口说出一串熟悉的中餐菜肴：炒米饭、炸馄饨、馄饨汤、柱候鸡。60年代中餐风行起来，市面上出现了一些西班牙语新词，如姜叫kion，酱油叫sillao，炒饭叫chaufa，云吞汤叫sopa wantan。当秘鲁人喊出这些和广东发音相似的字眼，也意味着中华饮食文化已在这里落地生根。

       创业起家的艰苦辛酸，早已随时间消逝，但遍布利马各个角落的中餐馆，却成了华人奋斗最好的见证。

       在利马数一数二的富临门酒家，就是华人以坚毅、冒险和勤奋得来的成果。这里接待过秘鲁许多高官显要。继承父业的罗兆雄有他的坚持：“我们要推广正宗的中餐，也要提高中餐馆形象。”他的厨师都是从广州和香港重金聘请过来的。餐厅的自助餐极受欢迎，他还计划推出让客人在家上网点菜叫外卖的创新服务。秘鲁的中华美食节，富临门是主要承办单位，还请来秘鲁总统主持开幕。

* *平安夜的餐桌上，很多华人和秘鲁人都会以烧乳猪取代火鸡。中华饮食在秘鲁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利马蔚蓝的天空下，有在五星级酒楼运筹帷幄的商贾，也有在城市边缘挣扎求存的新移民。事业稳定的华人可以开房车，可以去郊游、打麻将或唱卡拉OK。以福建人为主的新移民，却只能和那间仅可容纳五六张桌子的小“chifa”相依为命。他们说：“除了生大病起不了床，不然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生活要比在中国老家辛苦十倍。”不走的唯一理由，就是赚到的钱比老家多。当地人最爱吃的炒饭售价一碟4块新索尔，一个月下来餐馆就有2000美金的盈利

    新移民集中的圣华区（San Juan de Miraflores），目前有两三百家这类中餐馆。那一带以当地贫民居多，治安不靖。哪怕只是一张小凳子，或是一张餐单，经常不翼而飞。对新移民来说，即使是一个廉价灯泡，也是重要的财产。

       新移民语言不通，只能在城市一角默默耕耘，似乎早已被世界遗忘。因此，当张献珉牧师带着福音走进他们的小“chifa”，很多人深受感召。宣道会秘鲁华侨事工会每两星期一次的聚会，教友都风雨无阻的出席。这也许是全世界最晚开始的基督教聚——午夜12点，新移民打烊后匆匆赶来，有时连晚餐都来不及吃。平淡生活中唯一的心灵养分，的确比生理上的饱餐更重要。

  秘鲁虽未追上发达国家的脚步，但它却不是一无所有。除了矿产、石油、生态资源等，秘鲁的农渔产品尤其丰富，却因为疏于管理而得了个“坐在金山上的乞丐”称号。然而，善于开拓的华人，还是找到了创业起家的空间。

       今天，秘鲁人到中餐馆吃饭，到土生华人黄业生经营的“Wong”连锁超市买生活用品，穿着由黄仲儒创立的Calimod品牌鞋子。秘鲁小孩用的文具，多由刘铨兴公司、泰兴公司、泰来公司或大陆公司批发出来。近几年秘鲁的建筑业和矿业前景看俏，揣着资金的新移民，飞到秘鲁大展拳脚。圣窝霞区（San Borja）这个新兴商业区的公寓，住进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华人。这个地区治安较好，消费自然水涨船高，一栋中档公寓要六七万美金。

  混乱与污浊，是很多华人对利马的第一个印象。一年只有几场霏霏细雨，这里既不需要下水道排水，也不必携带雨具出门。少了大雨的洗礼，利马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当汽车疾驰而过，路上黑烟四窜，尘土飞扬。“窗明几净”这种美好画面，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事。

       比起国际大都会，利马也许不够繁华，不够先进，甚至不够干净。但是华人发现，这里也因此没有发达国家的匆忙和压力，没有大都会的冷漠和疏离。秘鲁人亲切和善，没有等级观念，而且包容心很大，乐于接纳每个族群和文化。人文环境如此和谐，真正难得，下不下雨，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华人移民常对他们远方的亲友说：“利马是个留人的地方。”也许是为了四季如春的气候，也许是为了发展的机会，也许是为了包容和谐的社会，但最重要的是，这地方从不让华人觉得难以适应。想念中餐，道地的粤菜、上海菜、四川菜、火锅都有，连婚宴喜庆需要的鱼翅乳猪也一应俱全。腻了，有海鲜或牛肉为主的传统秘鲁美食，也有当地盛产的玉米做成的饮料和甜品。华人既吃秘鲁鱼生（Cebiche）,喝秘鲁汽水印加可乐（Inca kola）,也到郊外烤肉。秘鲁华侨宣道会的刘牧师在国外住了几年，还是决定回来，原因竟然是：“这里的水果很便宜。”

 居住在利马的华人，总找得到爱上这座城市的理由。

       华人一旦住下来，多数都不愿走。不过，1996年，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了日本大使馆并绑架人质，到处人心惶惶。有些华商为了人身安全，变卖产业，举家迁移他国。隔年，恐怖分子遭政府一举歼灭，利马的治安才逐渐改善。今天，和许多首都一样，利马也免不了一些小偷小抢事件，不过华人都知道哪一区是安全地带，哪一区是治安黑区。庆幸歹徒一般不伤人，对当地华人来说，利马仍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城市。

       每当夜幕低垂，霓虹灯闪烁的赌馆和角子机店，成了城里的一座座游乐园，诱惑着华人。有人只是赌赌运气，有人却押上了全副身家。某某华人沉溺赌博的新闻，偶尔在华人圈子里口耳相传，华人基督教团体还因此办过几场戒赌讲座会。秘鲁不禁赌，遍布利马大街小巷的赌馆很多是当地华人经营的，利马最大的赌场亦由华人投资。

       利马地广人多，却没有地铁连贯各区。搭出租车既方便又便宜，是华人出门的首选。当地人收入不高，路上充斥着兼职司机，加上政府管制不严，有执照的、没有执照的、旧车、破车都开到路上来载客。司机为了争取时间载客，在路上横冲直撞，而且为了节省都不开冷气，仅是开车窗透风。抵达目的地，又是一阵灰头土脸。当地华人对司机的驾驶态度颇有微言，但想想一公升无铅汽油要超过17块新索尔，还是搭出租车比较划算。

这座看似失序的城市，其实住着一个悠哉游哉的民族。秘鲁人约会一定迟到，答应的事也经常食言。了解了他们的习性，华人学着放慢脚步。在这个地方，一切都需要包容，他们深深明白这点。

   像漂泊的船终于找到停泊的港湾，许多华人来到秘鲁便停下了流浪的脚步。

       这么遥远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每年竟吸引了近万名新移民千里迢迢前来？“秘鲁不是花花世界，生活却很自在；秘鲁不是先进国，华人地位却很高。”这是在这里待了18年，经营旅社的汪丽群所得出的结论。

       秘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包容和接纳，让人忽视了传统的价值。春节期间，唐人街的舞狮舞龙固然热闹，一名父亲却说：“家人各忙各的，年夜饭也吃不成了。”

       每逢端午中秋，走在唐人街的华人后代，已经无法从包装缤纷的应节食品里，体味到其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底蕴。

   中文教育亦然。早在1925年，秘鲁华社就设立了中文学校。不过多年来几间中文学校的大门总是开开关关，至今剩下3所，即中华三民学校，其分校孔子学校以及若望廿三世中文学校。这3所都是正规的私立学校，在利马颇有名气，每星期有2到3节的中文课，其余科目皆以西班牙语授课。

       在若望廿三世中文学校任教多年的高老师说：“学校里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有华人血统，但他们学起中文非常吃力，倒是有时秘鲁人更有兴致学中文。”这所学校由意大利人丘先觉主教创办，所以校园里有一间天主教堂，高老师和其他十几名华人天主教徒每个星期日都来做弥撒。

       今天的秘鲁华人，仍然努力在主流文化之外寻找保留祖先传统的一方空间。他们在秘鲁亡人节举办集体祭祖活动，并请神父来祈祷。少了清明的肃穆，少了传统的元宝蜡烛，秘鲁华人敬仰先辈的精神始终未改。

       两族通婚的婚礼中，有上香、敬茶仪式，也有秘鲁式的晚宴派对。根据秘鲁习俗，新郎要跟女方所有女亲戚跳舞，新娘则必须跟男方所有男亲戚跳舞。

       华人和当地女子通婚几乎成了这个社会的传统。自华工开始，秘鲁女子就对华人的刻苦、负责和专一赞赏有加。难怪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华人是蜜糖”的说法。秘鲁有个有趣的规定，婚前15天，结婚双方必须在教堂和3家不同的报章刊登启事，公告天下。

适应和融合都需要时间，而华人社团总是及时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当年，重获自由身的华工无法马上适应当地社会，带着强烈宗亲色彩的华人会馆于是在利马沿海城镇成立。先贤在秘鲁开拓、建设，也带领华社融入当地，为华社排难解忧。他们走了，却留下了一个和平而没有纷争的华人社会。

       “秘鲁华社非常团结，没有帮派之分。”说起这件事，古冈州会馆主席罗源深感自豪。古冈州是秘鲁最早的华人会馆，成立于1867年，也就是第一批华工抵达的18年后。此后，其他八大会馆相继成立，即番禺、中山、同升、鹤山、介休、花都会馆、龙岗公所以及龙善社。中文读物也陆续诞生。至今还在出版的《公言报》就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报。而走过了70多年岁月的西语杂志《东方文化》，仍是土生华人了解东方文化的重要平台。

       当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在1886年建成，当地华社从此有了核心的管理机构。

       今天，华人仍以位于唐人街中心点的通惠总局马首是瞻。至于其他的华人会馆，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霜，它们的任务似乎也完成了。想当年，先贤曾在这里开过多少会，做过多少关于华社的重大决定，安顿过多少无处可去的新移民。如今，会馆的墙壁已斑驳，墙上的照片也已发黄，它们就像一个个寂寞老人，向无数经过的后代，絮絮诉说着那些早已远去的辉煌事迹。偶尔一两名路过的后辈仿佛听到了这些故事，他们走到先贤的灵位前深深鞠躬，再给旁边的关公塑像上香。

       秘鲁华人始终相信，关公保佑了他们漂洋过海的先贤，也一定会继续保佑在秘鲁生活的万千华人后代。因此，5000间中餐馆都不约而同地挂上了关公画像。每年6月，古冈州会馆、同升会馆以及龙岗公所都会准备烤猪，隆重庆祝关圣帝诞辰。秘鲁中文网站“秘鲁通”，也会报道当时的盛况。

* *中医极有可能是随着华工一起进入秘鲁的。直到1918年，利马发生了致命流行病，由一名中医师潘侣安所配制的中药挽救了很多人命，中医中药才被秘鲁民间所认可，在秘鲁，中医师一度享有颇为崇高的社会地位。如今，中医诊所非常普及，然而那些拥有小铜秤以及百子柜的传统中药店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关公也许真的听懂了秘鲁华人的祈求。今天，华人在秘鲁是备受尊重的民族。很多秘鲁人拥有华人血统，自然是其中一个原因。然而最关键的是华人的贡献。

       “中国人不仅为秘鲁人提供了美味的中餐，也提供了一流的哲学家、作家和专业人员。如果没有那些在19世纪耕种了我们土地的中国人，秘鲁不可能取得现在的发展和成就。”秘鲁前外交部长费尔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 格兰达（Fernando de Trazegnies Granda）这样说。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年戴宗汉引进新的稻米种植法，提高了秘鲁稻米产量，获得政府颁予的农业勋章。参与建设的同时，华人也全力回馈秘鲁社会。他们为贫困地区建学校、盖医院、送物资。

      不管天灾或人祸，华人华裔始终和这个国家站在同一阵线，甚至，走到了最前线。

       1999年是华工抵秘150周年，秘鲁从官方到民间都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那年，圣窝霞区建起了中国公园，卡亚俄港口伫立了一座纪念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一套纪念银币，通惠总局和土生华人组织联合举办许多大型的庆典活动，有花车游行、文化表演、联欢晚会、土生华裔小姐比赛、表彰有功华人等等。秘鲁国会和文化界也出版了多部跟华人移居史、中华文化以及中餐有关的书籍。

       同年，秘鲁总理更为早期秘鲁雇主欺压华工的事件，公开道歉。虽然这句“对不起”迟了150年，然而，华人和秘鲁人并没有把自己羁绊在历史恩怨里，因为大家早已是一家人，难分彼此。

       走到今天，最令华人安心的是华人可以在秘鲁自由地参政。华裔将军和高官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担任过总理。即使只要住满两年，或与当地人通婚3个月后就可入籍，一些华人仍旧拿着永久居民的身份。反正在这里，身份、种族、肤色都不是重点。差别在于，永久居民必须每年缴付约20美金的外侨税，如果要和秘鲁公民结婚，则须出示自己在原居国没有结婚的证明。

1921年，配合秘鲁独立100周年纪念，通惠总局筹资在利马市区的大公园里建了一座宏伟美观的大型云石喷水池作为贺礼。4年后，总局又以全秘鲁华人的名义，向利马市政厅捐赠了两座分别为“驼羊”和“训牛”的铜雕，庆祝利马开埠400周年。

  通婚是两种文化互相交融的捷径。在秘鲁，这个过程早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如今，每十个秘鲁人之中，就有一个拥有华人血统。他们也许有着鲜明的东方轮廓，也许还保留中国姓氏，也许懂得说几句广东话，也许还受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影响。又或许，在一些通婚好几代的家庭，所有关于中国人的蝶丝马迹，经历过时间的冲刷和过滤，早已消失殆尽。然而，他们跟在当地出生的纯华人一样，都拥有共同的名字——土生华人。

       很多土生华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流着一定比例的华人的血。然而，秘鲁文化才是大部分人的母体文化。

       一出世，他们就和当地人一样，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以后，最隆重的节日都和秘鲁习俗有关。元旦前夕，土生华人穿上代表好运的黄色衣服，和朋友喝酒、跳舞、开派对。有人在大街上焚烧布人偶。他们相信，霉运会随着一切烧成灰烬。有人换上远行装束，拖着行李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盼望来年得偿所愿到国外旅行。当午夜的钟声响起，有人吃下12粒葡萄，许下12个月份的期许。在拉丁文化下长大的土生华人，总能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上挥洒热情。

       部分土生华人曾听长辈的唠叨，或因童年到过中国，对美丽的中华文化念念不忘。于是，他们创立了土生华人组织，如秘鲁华人协会和秘鲁华人文化中心。通过文化表演、展览等活动，拥有同样身份背景的人来寻找对自我的认知，寻觅着一条通往祖辈文化的道路。这个过程，化成了文字和照片，记录在秘鲁华人文化中心出版的月刊上，留给后人去回顾。

  华人来到秘鲁，不只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秘鲁的社会结构、饮食习惯，甚至创造了秘鲁一部分的历史。

       秘鲁的过去和现在，都写上了华人的名字。未来，秘鲁人仍会亲切地把华人唤作「同胞」（Paisano）。这份和谐，一定会代代相传。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其国名在西班牙语为“赤道”之意。它曾经是印加帝国发源地，1532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长达300年，1809年宣布独立。二战后政局动荡，政变迭起，文人和军人政府交替执政达19次之多，直到1979年之后，政局才渐趋稳定。

       厄瓜多尔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石油产品占其出口贸易总值三分之一以上，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此外，厄瓜多尔也出口香蕉、虾及咖啡。2000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厄国取消了贬值中的苏克雷货币（Sucre），改用美元为通用货币。

       厄瓜多尔气候因地区而异：港口城市瓜亚基尔（Guayaquil）四季皆夏，是全国最繁忙的城市；首都基多海拔2830米，属凉爽的高原气候；而丛林区如克维多（Quevedo）属于潮湿的热带雨林气候。华人基本上分布在以上3个地区，并顺应环境发展各种行业。

   1875年，一批广东中山人被人用“卖猪仔”的方式骗到秘鲁建造南美大铁路。当时有许多华工或过度劳累、或染病致死，有者甚至因为不堪折磨而自寻短见。所以，有不少华工费尽心思准备逃到周边国家。与秘鲁相邻的厄瓜多尔，就这样迎来了第一批华人。

       他们首先在曼塔（Manta）登陆，然后辗转来到克维多。在农民出身的华人眼里，克维多的沃土是一块难得的宝地。他们传授给当地人种植方法，当地居民也对他们以礼相待。华人终于认定克维多为栖身之所，正式为漂泊不定的日子划下了句点。

       待一切都安顿下来以后，华人在缺乏资本及语言不通的困境下，只得从事当地人不愿意做的粗重工作，例如挨家挨户地收集脏衣物，替人洗衣糊口。

       1899年，厄瓜多尔政府开始禁止华人入境。这项变相的排华法令，完全断绝了厄瓜多尔华人的发展，迫使华人无奈地再次踏上征程，另谋出路。而走不了的华人就只能听天由命。1918年，厄瓜多尔境内只剩下1500名来自广东的华人。

       1944年8月，厄瓜多尔前总统维拉斯哥（Velasco）发表声明，欢迎华人通过正规的手续移居到厄瓜多尔来，从此掀起了第二波的移民高潮，同时也惠及了原本就在境内的华人。经过数十年的彷徨，老移民终于获得合法的居留证，他们的财产也获得更大的保障。

       此后，到来的华人大多是合法的移民。他们从中国飞到南美洲的周边国家，之后再辗转进入厄瓜多尔。此外，也有一部分移民从秘鲁迁往此处。新一批的华人移民虽然是名正言顺入境，而且出路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耕田种地等劳力工作，但是在手头上没有太多资本的情况之下，他们免不了还是要打工数年，一边苦干一边偷师学习经商之道。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出国热，适逢厄瓜多尔的移民条件放宽，只需要在中国把手续办妥，在入境厄瓜多尔7天之后就可以领取合法证件。这一来，华人自然更是蜂拥而至，这一批移民的出现，为当地华社注入了一股新力量。

*当年，厄瓜多尔政府曾专门聘请了6名农民出生的华人，前来传授耕田种稻等种植技术。该国农业发展蓬勃，并成为盛产香蕉的“香蕉之国”，华人功不可没。*

     目前，厄瓜多尔约有混血华商17万人，他们主要说西班牙语；另外约3万名华人则是老移民及其后代，以及讲华语的新移民。

       华人集中在瓜亚基尔、克维多和首都基多3个主要城市，其中以沿海的瓜亚基尔华人最多，其中又以来自广东中山的华人老移民为主。早期，首都基多并无华人移民，直到最近十年，新移民人数渐多，而且来自五湖四海，各个籍贯皆有。

       厄瓜多尔庞大的混血华裔社群有着历史因素。早年华人移民均为男性，在此落脚后即与当地女性成婚，衍生出混血华裔。随着时间的推移，代代相传，混血华裔如滚雪球般增加，远远超过纯血统华人的数量。

       混血华裔已完全被同化，不论是生活方式、思想行为，宗教信仰，都已全然本土化。他们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及地方语言，但却不会华语或中国方言。不过他们仍保留“变相”的华人姓名。他们也隐隐然意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并引以自豪。

       虽然厄瓜多尔华人的构成分子复杂，从事不同的行业，彼此不相往来，但也没有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多年来相安无事。彼此相处尚算融洽，隔阂不大。

在厄瓜多尔，不同籍贯的华人，从事行业亦有别。广东老移民多投身餐饮、五金、杂货等行业，而九成以上的福建新移民则从事贸易，并以经营鞋子及手提袋为主。据悉，福建人曾尝试靠“锅铲”起家，但因烹调手法不合当地人口味，导致生意惨淡而被迫结业。近年来新移民中的外省人，多从事零售、批发进口及餐饮业。

       目前厄瓜多尔共有约800家规模不一的中餐馆，其中500家集中在瓜亚基尔，另300家则在首都基多。

       此外，华人五金店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可观，目前，全国拥有约130间华人开的五金铺。在瓜亚基尔，五金店铺都集中在一起，几乎家家都生意兴隆。但投入五金行业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激烈，造成该行业难有突破。商家表示：“这一行依旧有利可图，只是发展再难攀高峰。”

       如今，中餐馆和五金业已呈饱和状态。商业头脑灵活的华商，转而引进中国商品，中国货价廉物美，大受欢迎，这就大大促成贸易进口业与零售业的兴起。进口的中国货种类繁多，包括服装、鞋袜、电器、装饰品及脚踏车等等。

   至于台湾商人，携来丰厚的资金，投资设厂，生产食品、纺织及塑胶等产品。

       厄瓜多尔华人亦有从事种植业及养殖业的。种植业主要集中在土地肥沃及雨量充足的克维多，养殖业则分散在沿海地区，大部分集中在马查拉（Machala）一带。一些华人拥有自己的农园，在自给自足之余，也批发予当地市场。华商朱家俊就拥有30公顷的农园，除了种植供自己超市贩卖的蔬菜之外，也种植油棕幼苗，外销他国；当地著名企业家梁公壁也种植水果供自家工厂生产罐头。

       在首都基多，还有少数华人从事旅行社及美容院等行业。

       厄国混血华裔则人才辈出，其中包括厄瓜多尔大学教授华盛顿·阿霍伊（陈志忠）、经营太平洋香蕉王公司的“香蕉王” 赛贡多·王（已故），及前劳工部长吉列尔谟·陈博士，都是当地著名的专业人士。

     当年中餐在当地掀起热潮时，广东话译音的“Chaulafan”（炒冷饭，意为炒饭）及“Chifa”（吃饭，现指中餐馆）等外来词，也被纳入厄瓜多尔的西班牙文里。而炒饭更是各家中餐馆的“镇店之宝”。  说起“Chaulafan”的典故，就得回溯几十年前的往事。据说，当年广东人陈箕公在厄瓜多尔经营餐馆，某晚11时左右，陈箕公的餐馆如常要打烊时，店里突然闯入3个当地人，嚷着要食物。当时店里已无主要食材，老板灵机一动，生火把冷饭炒一炒，再加点酱料、虾仁、鸡丁、肉块及青菜丝，炒成3大盘炒饭。那3名当地人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后，满意地离开了。

       3天后，店里来了六七个生客，对着菜单看了又看，却叫不出名堂来，说了半天，老板才恍然大悟，再次生火炒起冷饭来。客人问起菜名，老板不假思索地说“Chaulafan”，翌日，菜单上就多了这道菜肴，并在当地大受欢迎，当地人甚至以“Chaulafan”称呼华人，让人啼笑皆非。

       改良式“炒饭”征服了当地人的味蕾。当地客食量大，消费能力有限，所以经济实惠的炒饭经常成为餐桌上的主食。

       走在瓜亚基尔街道上，偶尔可见中文字的招牌。小小的店铺上，挂着“Chifa”的招牌，高挂的红灯笼永远成双成对；走进店内，墙面上的中国结、红彤彤的挂历映入眼帘——这些正是厄瓜多尔小型餐馆、甚至任何华人店铺的招牌装饰。放眼望去，顾客九成是当地人。

       当地人好中餐，因此以“Chifa”为招牌开设的餐馆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华人说，近年来连当地人也看中了中餐馆的商机，也纷纷开起“Chifa”来了。

  当初，多数华人抱着“赚到钱即移民北美”的想法而来，岂知当赚得第一桶金后，他们却已心系厄瓜多尔。“当时，几乎人人都盘算着赚了钱便走，但到后来实际走的也没几个。”老移民李树强表示。

       如今还留在那里的老移民，除了继续忙碌过日子，每逢周日还会相聚，打打太极、会友聊天，甚至组团到南美各国参加各项比赛。当初的美国梦，早已不知所踪。

       新移民眼见老移民发展不错，便接二连三到来。不少来自穷乡僻壤的新移民向亲友借了钱，冒着非法逗留的牢狱之险，背负着一家老小的期望来到厄瓜多尔。他们总是期盼着数美金的日子快些到来，早日把债务还清，衣锦还乡，或到美国去，一圆美国梦。

       他们先是勤奋刻苦、安分守已地打工挣钱，稍有积蓄，便当起老板来。厄瓜多尔的创业成本低，区区一两万美金，便能做些小生意。

       不过，厄瓜多尔的华人移民，落叶归根者人数远不及落地生根者多。目前，3万名华人之中只有六七千人仍持有中国护照。许多华人为了实际利益及经商便利，而选择入籍厄瓜多尔。

 一名华人表示，拿着该国护照，可免签出入中、南美洲国家。“只要有了证件，学会西班牙语就不怕被欺负。碰上海关刁难，我还能理直气壮地与之争论。”

       放弃祖国国籍，并不代表忘本。许多已入籍的华人，每年也必忙里偷闲，一家大小返中国一解乡愁。部分人则坚持保留原国籍，期盼有一日能告老还乡。

       新移民多为福建人，而老移民多为广东人，两者语言不通，又从事不同类型的生意，彼此甚少打交道，关系也比较淡薄。除了为生活挣扎求存，新移民还面对语言不通的困境，难以融入社会。后来，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贴心地为新移民开办西班牙语班，并聘请通晓粤语及华文的老移民担任导师，不但帮助了新移民，也拉近彼此的距离。

       一些热心的老移民还会赠送电器及物品给新移民，用以装备他们租住的居所，双方关系日渐融洽。

* *设于1978年的肯尼迪医院（Grupo Hospitalario Kennedy），是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医院，创办人为王（Wong）氏与林（Lama）氏两大华裔家族。医院由王氏出资开设，林氏则负责看病问诊。医院从只有20名医生及60张病床，发展至今已有160名医生及近千张病床的规模。这家医院还有个连当地人都不晓得的优惠，即凡华人问诊，费用会自动打九折。*

       目前，该国共有20个华团，由不同的群体组成。最早的是成立于1907年的中华总商会。后来移民陆续到来，华人人数增多，分歧在所难免。当年厄瓜多尔中华总商会就因政治及家属因素，分化成两大派系，权力斗争相当激烈，最后导致一代商会就此没落。

       自中华总商会没落后，华社群龙无首，直到1993年成立“8人小组”，并吸纳了100名原属瓜亚基尔华侨华人协会的会员后，终于1999年成立了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再次团结华社。

       如今，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发展稳定，每年固定主办节庆活动之余，也当起红娘，举办活动让未婚男女相互认识，而8月份的花车游行更是华社的年度盛事。

     除了为华人服务，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也负责接待中国官方访问团、表演团体等，住宿、饮食、旅游全由华人解决。

       1967年成立的克维多中华慈善会，则在70年代建立了该国唯一的华人公墓，这在南美洲诸国中实属难得一见。华人公墓虽建在天主教坟场里，但并不局限任何宗教的先人在此长眠。华人会在每年11月2日至11月3日的万圣节（又称亡人节）前来扫墓，而中华慈善会在这一天也会提供元宝、蜡烛、烧猪、水果等祭品让来者供奉先人。克维多华人公墓仅有160个墓位，所以一些华人死后或葬在当地坟场，或由后人将遗体运回家乡安葬。

   在厄瓜多尔，华人移民后裔懂华文者少之又少。这些老移民后代，外貌虽仍是百分之百的华人，但是他们几乎已完全同化，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但华语或方言却一窍不通。

       其实，厄瓜多尔曾出现过正规的中文学校，并拥有校产，高峰期曾有300名学生，共开办6个班级。然而随着华人移民减少，华人子弟和混血华裔又不上中文学校，故中文学校被迫改制成当地学校，并招收当地学生。后来，随着中华总商会的没落，学校因无人管理，在1997年关闭及拆除。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与厄瓜多尔的贸易扩展，前往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多，更多人需应用华文华语，相应地提升了华文的价值。目前，厄瓜多尔至少有4所大学开办中文班。

       在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振华中文学校于2007年9月正式成立，华人终于有机会学习母语。不过，振华中文学校仍在起步阶段，目前只有一名老师及60名学生，每周授课两次，每次两小时，采用中国编印的教科书，3个月为一学期，收费40美金。

       老移民生活宽裕，且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一般把孩子送入每月学费约300美金的美国国际学校，让孩子以后能到美国接受大专教育。通常，孩子毕业后会留在美国发展，成家立业，再把父母接过去定居。不过老移民一般习惯了原居地，只是厄美两地来往穿梭。

       “我把孩子送入德国学校，好让他们多学一种语文。”华人家长认为孩子不会华文已输人一截，所以应学会另一种外语，有助于将来的出路。

* *台湾高雄的菩妙上人一心想在厄瓜多尔弘扬佛法，经由台湾移民的热心捐助，建成了厄瓜多尔第一间佛堂元亨寺，占地一万平方公尺。该寺于2007年对外开放，并特邀瓜亚基尔市长Jaime Nebot主持剪彩仪式，厄瓜多尔电视台亦有报道。庙堂的静坐班及华文班还吸引了不少当地学员。*

       一些老移民把孩子送入德国国际学校就读，学习德语、英语及西班牙语，继而到德国接受免费大专教育。

       厄瓜多尔唯一的华语电台，是1968年在基多市始创台的“安第斯之声”（HCJB-FM）。它一直延续至今，是厄国唯一的华语电台。然而以往一连7天开播的电台，如今只有在周六与周日晚上十点才开播，分别有粤语及华语的“医药信箱”及“非常岁月”两个节目。

       2007年，卫星转播让厄瓜多尔的电视荧幕出现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在同一年里，华人也创办了华文报章《厄华侨报》。12版的《厄华侨报》为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的机关报，内容以中国及厄瓜多尔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为主。

       该报的出现对华社而言是一大惊喜，该报先是免费派送3个月，后来因广告收入不足，亏损过巨，只得收费销售。尽管目前日销600份，依然入不敷出，每月亏损800至1000美金不等，还需仰赖华团补贴，才能支撑下去。

郝晶是振华中文学校唯一的中文老师。

从厄瓜多尔华裔的西班牙姓名里，可寻见中文姓名的踪迹，而所谓的中文名字，实际上为小名。原来，当年首批华人移民目不识丁，在登记时误报小名及乳名，当地官员也不明就理地把小名当成姓氏来记录，这么一来，“阿海“（粤语A Hoi）成了”阿霍伊“。由此造成的变”姓“比比皆是。

       如今，华裔西班牙文姓名中常常出现“阿二”（A Er），甚至“阿狗”（A Go）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姓氏”。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批移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不再重蹈覆辙，姓氏翻译也较为正规，例如将“顾”姓译为“Cruz”。

       变“姓”之误固然令人遗憾，但如今古怪姓氏却成了华裔考究祖籍的唯一线索。他们从残留的中文姓氏中寻根问祖，再认祖归宗，亦在抽丝剥茧的寻根过程中了解中华文化，对自身拥有的华人血统感到光荣。

       2006年，厄瓜多尔第五代华裔华盛顿·阿霍伊（陈志忠）就曾千里迢迢从厄瓜多尔到中国中山市三乡白石铑山村寻亲。他高兴地表示：“虽在厄瓜多尔成长，但在祖父的调教下，我还会说中山客家话，与乡亲沟通绝无问题。”

  “东方大酒楼”是厄瓜多尔企业家梁公壁的一项投资，从筹建至开业只花了一年时间。

       这座4层楼高的豪华餐馆，是华人办婚宴、洗尘、请客的最佳选择。餐馆内的会议厅曾获厄瓜多尔总统垂青，在该处召开记者会。

       梁公壁自1975年由香港到厄瓜多尔闯天下，以制酱油起家，因此有个“酱油梁”的称号。创业初期，他带着产品到小商铺推销，游说店家摆卖其产品。后来产品受欢迎，生意渐上轨道，他再借机生产自家品牌的即食面，产品还外销至周边国家如巴拿马及墨西哥。

       做生意“求新、求变、求快”的梁公壁似乎永不言倦。这边生意一上轨道，那边便开始涉猎其他行业。他还以“一条龙”形式生产水果饮料及罐头，全权包办种植、生产及销售。

       本着永不停歇的企业精神，他在2008年开设了第三家工厂。这回，他看准厄瓜多尔“水比汽油贵”的市场，在山泉地带建了200公顷的现代化工厂，生产矿泉水。除了主干产品之外，其“东方食品公司”亦生产香蕉粉、玉蜀黍粉、味精、辣椒酱等。

   厄瓜多尔华社是复杂的。华人与混血华裔之间，老移民与新移民之间，因思想上的分歧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始终存有鸿沟。然而有时中国的情意结，却把老、新移民联系在一起，一旦面对共同的难题，他们便会站在同一阵线，共赴时艰。

       当初被华人视为跳板的驿站，经过了长期的经历与考验后，华人改变了对厄瓜多尔的看法，觉得这个赤道边缘的国家，地方美丽，人民热情，确实有留下来的理由。

       厄瓜多尔华人，终究还是幸福的一群。

 玻利维亚因纪念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而得名。1825年，正是这位来自委内瑞拉的英雄率领大军，帮助玻利维亚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

       拉巴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城市。它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然而，独立后的玻利维亚一点也不和平。

       与邻国的两场战争，使玻利维亚不但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国土，而且还从临海国家变成了内陆国。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前后经历了190余起政变，平均每十个月一次，更换过近70名总统。加上贪污腐败盛行，工潮澎湃，即使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各种资源，玻利维亚至今仍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

       尽管没有吸引人的优越条件，这里却包容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为了生计而勇闯四方的华人，一直到了20世纪初才注意到玻利维亚。据说，最先抵达此地的是一名姓方的广东人，他当初是从秘鲁坐着牛车而来的。

       玻利维亚华人的先驱为宗教移民，此一现象在整个海外华人世界中并不多见。1963年及1965年，在香港普世教会的安排之下，两批移民由香港乘船来到圣克鲁斯市（Santa Cruz），每一批约有十户人家。

       60年代的圣克鲁斯仍是一个落后的乡镇。这里完全没有柏油路，只有稀疏的路灯，房子屋顶上盖的是棕榈叶，而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则是马车。

       当时，教会将移民安顿在中国第一农场和第二农场，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一切所需，包括住宿、衣服以及一年免费的伙食。

       起初，这些华人在农场里种菜，每逢收成时节，他们便挑着担子步行到城里去售卖农作物。直至两年后，教会自香港运来自行车，华人才有了代步工具。

       他们省吃俭用，存够本钱之后，就开始饲养猪、鸡和牛等家畜。当时，圣克鲁斯市的人口还是很少，市场并不大。有的华人购买了卡车运货到首都拉巴斯去卖。

       渐渐地，华人开始走出农场，进城开店，做起小生意来。其中以开设餐馆的最多，也有少数人开设杂货店、贸易行与小工厂。如此一来，日子长了，两个中国农场也就荒废了。

       台湾人到来则是70年代后期的事。他们以投资移民的身份开设小百货店。另有一些应聘过来的技术工人，在合约期满后，就留下来经营小生意。

       嗣后，这里慢慢有了华人开设的珠宝首饰店、汽车和电器修理铺、旅馆、面包店、礼品店、舞厅、照相馆、中医诊所、理发店、纺织厂、塑胶制品厂和食品加工厂。然而，到了70年代末，玻利维亚的华人总数也不过约寥寥的100人。

       那时，玻利维亚的商业发展尚在起步阶段，华人的店铺生意兴隆。但是，好景不常，1982年的一场货币危机，导致华人的存款大大贬值，一夜之间，财富几乎化为乌有，让人欲哭无泪。老华侨回忆说：“到医院生个孩子都要背一麻袋的钱去。”

       由于前途茫茫，华人唯有纷纷打道回府，或另觅栖枝。

       在货币风暴过后，依然有华人前来投靠亲友，甚至携带家眷过来闯事业。90年代，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得最多。当时，玻利维亚的签证条件较为宽松，许多人都将此地当作移民欧美国家的跳板。

       有些移民通过中介偷渡入境。他们大多来自福建的农村，每人只需付3万美金，中介便能代购船票，获得经济担保书，办妥签证手续。

       在那些年代里，华人被欺诈及勒索事件每天都在玻利维亚上演，遇害被杀的案子也不时发生。华人大多经商，经济条件比较好，往往成为受害者。

       后来，当地华社痛定思痛，毅然团结起来对抗这些不法分子，迫使他们知难而退之后，玻利维亚华人的日子才逐渐回复平静。

尽管玻利维亚政变不断，游行示威频繁，经济落后，华人移民仍然继续入境。现今3000名左右的华人，居住在东部最大城市圣克鲁斯的占三分之二，其余则散布在首都拉巴斯和西部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

       福建莆田人姗姗来迟，但已跃升为主要的华人群体。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开炸鸡店或烤鸡店，圆着自己安家致富的梦想。夜里，他们大多喜欢打麻将或上赌馆消磨时光。早来的香港人及台湾人则延续传统行业，安份地经营中餐馆、百货店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商店。少数佼佼者也在进出口贸易和工业领域别开天地，脱颖而出。

       当初，很多人的确把这里当跳板。然而，住下来的华人觉得，如果资金有限，到北美国家只能替别人打工，又要遭人白眼。在这里，不管店面多大，自己毕竟是老板，乐得自在。

       这里华人人数不多，却也组织起华侨联合会守望相助。人在异乡，并不妨碍他们建起佑海宫膜拜妈祖。中文学校的出现恐怕还需时日，华人期望能先办个中文班。

       时光流逝，不知不觉，华人其实已经对玻利维亚日久生情，平添了几许留恋与不舍。

    社会政治局势长期不稳，的确严重阻延了经济发展，加上市场空间有限，无法造就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家，外来移民更缺乏一展身手的余地。教育程度不高的华人，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当地复制一间又一间烤鸡店。

       华人从20世纪70年代起涉足烤鸡店，很快就后来居上，取代了日本人和韩国人。目前，华人经营的烤鸡店已突破200家，也就是说，基本上每十多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烤鸡店老板。在华人比较密集的圣克鲁斯，华人烤鸡店几乎占据了当地烤鸡业市场的80%。

       王和夫卖了20多年的烤鸡，回忆当年，犹是无限感慨。“当初的店铺都是租来的铁皮屋，摆上几张桌椅就开张做生意。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烤鸡、收钱、打扫、洗刷，样样都要自己来，非常辛苦。”

       这些烤鸡店单一菜色，要么烤鸡，要么炸鸡，规模大一点的店两种套餐都卖。不用推出新菜式，也不用创设新煮法，更不必大肆宣传，却天天客似云来。烤鸡店甚至不用装璜，因为当地人只想填饱肚子，不讲究任何情调或排场。当地华人常说：“烤鸡店真是伟大的行业。同样一式的烤鸡不只养大了好几代的玻利维亚人，也养活了开烤鸡店的几千名华人。”

       一座城市有上百家烤鸡店，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华人靠的就是薄利多销。烤鸡套餐除了有鸡肉、炸薯条、炸香蕉片，还附上米饭或面条。当地人觉得比较划算，更喜欢光顾华人烤鸡店。

       只提供汽水和矿泉水，不卖酒，是华人烤鸡店不成文的做法。原因是当地人嗜酒，老板最怕招来借酒装疯的“醉猫”。

       店里的34寸电视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它对招揽食客大有助益。装不起卫星电视的玻利维亚人喜欢到店里边吃烤鸡，边观赏电视节目。到了足球赛季，店里更是座无虚席。顾客少的时候，华人老板会把电视转到中文频道，关心一下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最新消息。

       烤鸡店属于小本经营，开业不难。新移民过来后，只要在亲友的店打工偷师，再拿出几千美金，就可以另起炉灶。当地劳工便宜，哪怕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也会请几个玻利维亚人到店里帮忙。

   早上8点，华人老板就必须打开店门，让工人进来清洗鸡肉、烤鸡、炸鸡，或做其他琐碎的准备工作。11点，烤鸡店开始营业，忙碌的一天正式开始。店里人声喧闹，老板不断把柜台的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收钱、算钱。员工充足的时候还能应付，要是有员工请假或缺勤，老板就得卷起袖子，到又闷又热的厨房帮忙。到关门打烊，华人回到店后或楼上的住家，已经是午夜十一二点。

       烤鸡店全年无休，华人老板嘴里抱怨疲倦，心里却很踏实。每个月的盈利，除去基本开销，就是汇款回老家，或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学校。

       玻利维亚没有太多奢华的物质诱惑，华人最大的娱乐不过是和朋友打牌搓麻将，唱唱卡拉OK，或是上赌馆解解瘾，生活俭约而朴实。

       说起勤俭持家，当地华人可是想到做到。很多人以店铺为家。如果租房，月租大约70到140美元。虽然他们开的是2万美元一辆的二手车，外出主要还是搭公车和出租车，一来方便，二来省钱。尤其在拉巴斯，市内道路狭窄，车子又多，开车上街老是找不到地方停车，还不如搭出租车便利。只要拨个电话，三五分钟后出租车就开到家门口，到市中心收费一般不会超过1.5美元，经济实惠。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赚得少，花费也小。

       对华人来说，发大财也许不太可能，但实实在在工作，扩大营业，一家人三餐温饱也不成问题。除非有一天玻利维亚人突然不吃鸡肉，要不然华人在烤鸡业这行仍可以细水长流。

 “不喜欢的早就走了，留下来的都喜欢这里。”这是一名老华侨谈到玻利维亚时的切身感受。

       的确，也许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去评断一个地方的好坏。

       在外人和离境者的眼里，玻利维亚政局动荡，是一个令人却步的国度；但留下来的人看法不同，觉得生活环境安定。虽时常上演的罢工示威，是他们熟悉不过的街头一景，但对生活并没有大碍，日子照样可以安心地过下去。

       问问做各类生意的华人，答案竟惊人地相似。

       经营塑料制品厂和木材厂的郭照庆，手下有40个工人。去过不少地方，但惟有回到玻利维亚，他才能真正放松下来。在圣克鲁斯住了快30年，他毫不掩饰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其他地方的人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在这里工作就是娱乐，不必刻意去休闲放松。”

       与郭照庆差不多同一时期来的还有大约200多名台湾人。他们在这里开素食餐馆、美容院、旅馆、保龄球馆等，生意大都上了轨道。其中陈锐津开的养猪场，现已发展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农场，也是唯一的华人大型企业。

       民风纯朴，环境干净，生活简单，没有压力，是华人身居玻利维亚最实在的体会。

       即使在这里扎下了事业根基，甚至建立了新的家园，第一代华人仍不时想起老家的种种好处。大部分人赚到钱后，多半会将子女送往欧美读书就业。他们在这里撒下了汗水，消磨了年华，是留还是走的问题，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中，成了他们心中难解的困惑。毕竟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已化为他们的记忆与情感，很难潇洒地说走就走。

       虽然玻利维亚的周边国家，平均生活水准都比较高，东面的巴西更是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但久居这里的华人深深了解，生活中那份自在悠闲，才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里没有邻国紧张兮兮的工作环境，没有令人沮丧的交通堵塞，没有空气和噪音污染，更没有败坏的治安问题。看似萧条的城市里，其实也透着生机，只是一切都显得宁静而安逸。不疾不徐，不慌不忙，正是这里的生活节奏。因为从容，幸福放大了，快乐深化了。当地华人从不因身在南美洲最穷的国家而看轻自己。

       内心的满足，难为外人道也。

    当外人好奇华人对玻利维亚的留恋时，华人想也不想，脱口而出：“不必担心青菜有农药，因为农夫没钱买农药。海产肯定很新鲜，因为鱼贩没钱买雪柜。”三两句话，几分幽默，几分轻松，伴着几分智慧，几分热情。

       既来之则安之，市场太小，华人小规模、多样化经营即可。只要诚实、公平做生意，这里不会让人饿肚子。当地餐食菜式单调，华人学着去欣赏，慢慢地也爱上了用土豆、豌豆、玉米、大葱加上肉类熬煮的热汤。路上遇上游行，交通堵塞，可以干脆把车子停在一边，反正大家都不赶时间。这时候烤鸡店反而门庭若市，因为当地人做不了什么事，只好跑到餐厅打发时间。不过，罢工若持续好几天，运输不畅，煤气和鸡肉短缺，华人老板又难免会愁上眉梢。

* *拉巴斯地处高原，一般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熟不透，因此当地每户华人家庭和烤鸡店都有高压锅，才能做出美味可口的米饭和面条。*

       在华人看来，玻利维亚原始、朴素，充满着新奇和特别的事物。穿戴着传统服饰的人随处可见，热闹的露天市场喧嚣不断。人民天真纯厚，容易相处。当地华人曾遇到这样的事：买柳橙不能买一整篮，买针只能买一根。问为什么不能多买，当地小贩会瞪着眼睛说：“这么快把东西卖完，那我下午岂不是没事干了吗？”

       当地人做任何事都当作享受，但是数学不好，经常找错钱。他们没有减法概念，让华人既觉有趣，又感无奈。比如说，一件东西23元，拿张50元钞票付账，收款员会慢条斯理打开抽屉，边拿出钱，边从23开始算起，直至加到50，那叠多出的钱就是该找还的余数。数学能力堪称天下第一的华人，这时虽然已经心算几十遍，却也只能耐心等待，最后还要道声感谢。

       乐天随性的当地人，什么事都可以等。即使生病看诊，也是慢吞吞的，让华人哭笑不得。拉巴斯的中医师于萌，就经常碰上没有准时赴约的病人。7年过去了，他已经不会动气：“只好自己晚点回家休息。”不仅如此，每次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病患找上门来，他不但分文不收，还给他们车费回家。他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

       当地华人常说：“当初根本没想过要呆下来。”结果留了下来的华人也不在少数。

       因为，玻利维亚还有其他的魅力吸引着他们。

       是天气！圣克鲁斯地处平原，属热带气候，四季阳光灿烂。中部山谷地区科恰班巴市属于温带，温和宜人。

       两个城市夏天不热，冬天不冷，硬是留住人心。

       拉巴斯处于3600公尺的高原，低温、缺氧，竟然也可以吸引华人。也许，站在这个全世界最高的首都，抬头看到那片湛蓝，乡愁融化，就不再念念不忘要离开了。

       其实，当初华人也都经历过一段适应期。3年前从福建过来和丈夫团聚的周敏，就曾病得一塌糊涂，后来才克服了高原反应。“现在反而不习惯圣克鲁斯的平原气候，太热了。”拉巴斯印地安人以羊毛斗篷和五颜六色的手编帽子保暖，华人出门都带上毛衣或外套；圣克鲁斯华人则是终年穿着夏装。从拉巴斯到科恰班巴，从科恰班巴到圣克鲁斯，不过是几个小时车程的距离，高低凉热，却让人以为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一天之内，温热变幻无常，身处其境，也是有趣。

## 

这个地方让华人有归属感，除了环境和民情，还因为政府对移民的宽厚政策。

       只要住满5年，外来者就可申请永久居留，之后再归化为公民。不过，近来归化条件多了一条，即申请者必须会唱玻利维亚国歌。第一代华人西班牙语本来就不灵光，用来唱国歌更是提词忘句，尴尬得像个孩童，所以都乐于当个永久居民。反正入籍与否，差别不大。

       玻利维亚公民60岁以后可每个月领取200玻币的养老金。这对华人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此外，每次总统大选，公民都必须前去投票。有些华人被政府抽中当投票站站长，也就一板一眼地履行起服务公众的职责。

       受惠太多，理应回馈。华人关切当地的方式有多种，人数也越来越多。当得知玻利维亚尚有64%的人处在贫穷线以下时，华人纷纷带着物资和金钱，走进当地人的社群，送上一点心意。最近，佛教慈济刚刚在圣克鲁斯和拉巴斯设立办事处，开始为慈善事业忙碌奔走。当地一名退休银行经理受感召加入了义工团队，并坦言：“中国人在这里帮助我的同胞，令我非常惊讶，也很感动。”

       尽管入乡随俗，尽量去了解当地，但华人也意识到要敞开胸襟，用文化来介绍自己。华人社团曾和中国使馆联合举办过一次“锦绣中国”的大型展览。用色彩斑斓的照片展现出中国面貌的日新月异和华人文化的多姿多彩。当地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一个相关报道，让玻利维亚观众对中国有更深的认识。

       除了看家的中餐手艺外，华人也把望闻问切的中医带过来。圣克鲁斯和拉巴斯都有中医诊所，提供针灸、推拿、按摩等治疗。政府承认中医，近几年中医师经常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当地人对中医，尤其是针灸便熟悉起来。只见中医师拿几支针这里插插，那里扎扎，病痛马上消失，仿佛魔术一样神奇。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西医看不好的病、很多人都会来找中医解决。中医收费相对便宜，连带中医师也让人觉得更加亲近。

       到华人住家转一圈，墙上春联已经褪色，小小的中国结沾着些灰尘，很难再看到更多其他具中国特色的摆设。润物细无声，倒是玻利维亚人对中华文化越来越感兴趣，精致的中华小饰物更是令他们爱不释手。一些对中华文化认知更深的当地人，摆放的中国饰品甚至比华人家里还要多。一个不小心，会让人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华人家庭。

       华人与当地人，开始结下不解的情缘。

当地人热情善良固然是事实，但华人还是愿意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华语、福建话、广东话或莆田话，是第一代华人惯用的语言。对他们来说，西班牙语像隐形的障碍，使他们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每年春节，圣克鲁斯的两广同乡会和拉巴斯的天河中国文化之家，都派出舞狮队伍来给华人商家拜年。平常多累都不愿休息的华人，会提早打烊，参加华人社团举办的佳节聚餐。端午中秋，大家互赠自家做的粽子月饼。人数虽少，节日气氛难比故乡，但脉脉温情，聊慰于心。

       中文报在目前还是奢侈的计划，不过两本内容丰富的侨刊填补了空缺。玻利维亚中华总会出版的《侨声》和玻利维亚中华工商总会的《长城侨刊》，成为华社圈子的信息来源。而其中的当地新闻和移民权益的相关特写，更是当地华人所需的生活指南。

       曾经，华社内部纠葛连连，让人寒了心。如今这里的华人走出阴影，安居乐业。他们深深感到，团结，才能安身；和谐，才有安定。

       中华总会、两广同乡会、莆田同乡会、中华工商总会、华人基督教会和佑海宫管理委员会，是圣克鲁斯的6大华人社团。现在它们已经成立华侨联谊会。联谊会的最高执行员，由6个会长轮流担任，每两个月轮换一次。华社的任何冲突和问题，都在联谊会的月会上公开协商、沟通和解决。烤鸡店老板如果遇上当地官员借卫生检查来敲诈，社团会义不容辞协助争取权益。华商们说：“近来，这类烦人的事件明显减少了。”

       大部分华人在春节期间，会到圣克鲁斯的佑海宫上香。佑海宫古典雅致，供奉的妈祖娘娘，是近年刚从万里之外的台湾请来的。不管怎样，侨领和华人信众都相信，此后那些戾气十足的事情果然少见了，人心也越来越齐。香烟缭绕中，华人祈求神明继续保佑这群跨海越洋谋生的子民。

一些新老移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988年，圣克鲁斯华人修建起自已的教堂，正式成立了华人基督教会。主日崇拜定在周日下午4点到5点半，因为这段时间烤鸡店的顾客比较少。

       每当夕阳的余晖照进这座教堂，寂静的圣殿顿时充满了祷告、赞美和感恩之声。

       除了温暖富足的生活，华人还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依托和平安。玻利维亚的可爱，也包括让华人自由拥有自己社群的生活。

    在玻利维亚，婚嫁成了华人的大问题。

       华人在这里找对象不容易，异族通婚还只是偶尔有之。单身男子通常到了适婚年龄，就请老家的长辈物色对象。待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飞回中国娶亲。婚后返回玻利维亚，等到孩子出生满月，他们才设宴请客。

       有了孩子，教育又是另一个难题。烤鸡店生意忙碌，父母只好把孩子送回中国请长辈照顾，也好让孩子学学中文。等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再接回来。

       这里的华社在不断改善，唯独欠缺的是中文学校。以前曾经开办过中文班，可惜早已停办。华人有意让下一代接触些华文教育，但现实中又不可能。华人孩子一般会送去当地的私立学校就读，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不错，但学费却非常高，然而为了让后代有更好的出路，华人家长都不惜代价。他们不想让孩子像自己一样，困在一间间闷热的烤鸡店里。

       私立学校注重西班牙文和英文，华裔子弟的双语说得异常流利，但因为没上过中文课，只能说简单的华语，读和写的能力不高。

       重开一个中文班，是目前玻利维亚华人的急切企盼。

       孩子在当地学校上学，突破了语言鸿沟，但一毕业，他们又飞到外国去深造。出去了，感受到大都市的繁华热闹，很少人会再回来。玻利维亚，只是他们每年回来度假、探亲的地方。

       “这一辈子赚到的钱都花到孩子身上了。”华人常这样感叹。

       这正是他们的生活写照——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只要梦想在延续，自己在玻利维亚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周遭的一切也是美丽的。

   坐落在拉巴斯一条宁静街道上的天河中国文化之家，是玻利维亚唯一一家华人开的武术馆。

       馆主黄幼十多年前和队友受邀到南美洲表演武术，后来滞留在玻利维亚。那时他身无分文，只能在公园过夜。户外寒风凛冽，衣衫单薄的他根本无法入眠，一早起来练功取暖。到公园来晨运的路人看见一名中国人在练功夫，马上过来好奇地询问。原来当地人很早就对中国武术有种莫名的迷恋，只是一直没有人教。黄幼于是应邀当起教练，中国武术从此式走入玻利维亚。

 武术馆名气越来越大，黄幼也经常上电视台表演以及接受报章杂志的访问。几名学有所成的徒弟已经成为他的助教。经过黄幼的不懈努力，武术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受到当地的普遍欢迎，连海军陆战队军人、名人政要的保镖都来拜师学艺。

       当地最早的舞狮舞龙活动也是由他发起。他激动地回忆：“这里第一只舞狮是我自己亲手制作，一笔一画完成。”近期，他更是把武术馆大大改造一番，门口刻上了两只栩栩如生的雕龙，馆里也增加了更多中国特色的装饰。每一部分，他都是自己动手，用心打造。目前，天河中国文化之家正在筹办中餐烹饪班、雕刻班、绘画班、书法班以及中文班。

       如今他和玻利维亚籍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家庭生活美满。从被迫在公园过夜的穷光蛋，到今天是超过6000个学生、备受敬仰的武术师父，黄幼写下了华人玻利维亚故事的精彩一页。

新春时节，天河中国文化之家的舞狮会积极排练，准备给华人商家拜年。

    最初陌生担心，现在熟悉自在，华人在波利维亚落脚，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这个南美高原之国虽不是华人的故乡，却热情款待他们，给了他们奋斗的空间，成就了他们小小的梦想。当初为何决定移居这里已不重要，因为这些华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都找到了留下的理由。

 南美洲内陆小国巴拉圭资源匮乏，先天条件不足，被西班牙长期统治；加上几次战争，更使它元气大伤。19世纪60年代，巴拉圭倾全国之力对抗巴西、阿根廷、乌拉圭3国，连8岁儿童和年迈老人都被征召到前线。战败后，被迫割让大片国土，还失去超过一半的人口，成年男子剩下不到3万人。

       1932至1935年，与玻利维亚的一场血战，又使它的国力跌到谷底。在1989年斯特罗斯纳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之前，巴拉圭经历了无政府状态与军政府专政时期。

       巴拉圭长期依赖农林畜牧业，经济增长缓慢，贫困人口高达40%；贪污腐败盛行，治安败坏，社会乱象丛生，难题多多。唯一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与巴西合作建造了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伊泰普水坝（Itaipu Dam）。

       面对各种严峻挑战，巴拉圭一直是南美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因此，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华人踏足这片土地。

1952年，欧玉明和家人从香港来到巴拉圭，13年后，他的妻舅陈雄才一家跟着到来。如今，陈雄才的后人仍然留在这里。

       此后，贫瘠落后的巴拉圭，就一直没有太多华人问津。

       到了70年代，台湾掀起出国热，许多华人选择登陆巴拉圭。实际上，这些移民大多是要到巴西、阿根廷、美国和加拿大等大国，只是巴拉圭签证条件较为宽松，容易入境，所以成了最好的跳板。

       然而，老天似乎给这些华人开了个玩笑。当年，在巴拉圭的亚松森机场，前来接机的亲戚神色凝重地告诉他们：由于巴西加强入境管制，现在，他们恐怕是过不去了。前方无路可走，他们就只好先留下来找些事做，再伺机而动。很多人就是这样滞留在巴拉圭。据说，这时期领取过巴拉圭身份证的华人数以万计。

       那时的巴拉圭非常贫困。一名华人忆述道：“一下飞机，看到破败的机场，马路是泥土和石头铺成的，巴士好像随时会散开，眼泪就掉下来了。”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

       华人最在行的就是做小买卖，因此，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逐渐布满了亚松森街道，中间也穿插华人所开设的旅行社、中餐馆和旅馆，还有当地人称为“Copetin”，即一种以卖点心和汽水为主的小吃店。

       开了店，又进了货，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除了毅力，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不论卖什么，都得用纸笔、计算机，再比手划脚一番，才能把价钱说清楚。

       没想到，他们这一呆就是几十年。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后来的命运，竟然也跟着巴拉圭的经济一路起伏跌宕。

* *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特别在桥头成立了扫黑组，负责保护当地华人。扫黑组的警员都住在桥头的中华会馆，当中还有多名警员会说华语。*

       在80年代中期，巴西与阿根廷严厉管制货品进口，税收极高，物资也严重短缺。同时，巴拉圭则采取自由进出口政策，降低进口税。因此，周边国家的人纷纷前来跑单帮，以华人为主力的批发以及零售百货业也随之形势大好。

       当年赶上这波“经济奇迹”的华人依稀记得：“走在路上，总是有当地人搭讪问时间，华商因此大量入口手表，还有首饰、化妆品等。”

       那时候的运输业不发达，华商必须亲自去台湾或香港把货押来。这些小物件可以带得多，卖得也好。一只手表只有5分钱蝇头小利，但一天可以卖几万只。来巴拉圭的航班不多，每个上机的华人都至少带着几十包货。那时，机场满地都摆满了华人准备带上机的货品，蔚为奇观。

       到1985年，当地华人人数已突破1万5000人。近年来，更有一些中国大陆移民陆续前来；大展拳脚，期待能够创造新的奇迹。

 巴拉圭目前有6000名华人，80%聚集在第二大城市桥头，其他则散居在亚松森、贝多芳市（Pedro Juan Caballero）和英格纳松（Encarnacion）。

       多年来，华人坚守百货零售和批发业，掌控了桥头60%的商业活动。少数涉足木材和家具出口、黄豆出口、农药进口、机械进口、木屑发电厂、旅行社等。

       桥头是个拥有17万人口的移民城市。巴拉圭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韩国人等多方杂处，华人在其中打造出自己独特的社区。华人商店、中文学校、社团、中文报章和宗教团体，一应俱全。因此，通晓华语、英语和当地语的第二代，到国外念书、就业都极具优势。

       不轻言放弃，是当地华人的信念。如今百货市场低迷，华商并没有萌生去意，反而觉得这是转型的好时机。他们始终觉得，巴拉圭极具发展潜力和经商机会。

巴拉圭是农业国家，工业落后，工厂缺乏零件，须坐飞机出国去买。在这种情形下，进口就成了最好做的生意。华人到此，不管是什么出身，都下海从商。资金雄厚的做进出口，口袋有点钱的开间小店，什么都没有的就先打工。

       做生意，总有风险。在巴拉圭经营进口贸易，更要面对市场不按牌理出牌的游戏规则。

       “巴拉圭是个畸形市场，大好大坏的极端都会出现。”华人说时轻描淡写，其实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场合。这些年来，经济大起大落，市场时好时坏，官员敲诈贪污，盗贼伺机而动。山穷水尽，柳暗花明，还好每次经济下滑总跟着另一波经济重振，华商早已处变不惊，总算闯出了一条路。

       90年代，华人聚集地由首都亚松森渐渐迁往东部的东方市（Ciudad del Este），并且开始了另一个传奇。

       东方市地处巴拉圭、巴西与阿根廷的交界处，由于3国同属南美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MERCOSUR），3国之间的民众可自由出入境，并不需要签证。而且附近有世界奇景伊瓜苏（Iguazu）大瀑布以及伊泰普水坝，每日都吸引不少游客和单帮客前来。

    桥头是巴拉圭最大的贸易区，每天迎接着成千上万的人流。对突如其来的拥挤，小城有点招架不住；空间小了，垃圾多了。这显然不是最理想的居住环境。然而，华人却在这里聚集、生活。

       桥头市中心，几条街道纵横交错，这便是华人主要的活动空间。漫步街上，可以看到华人经营的中餐馆、面包店、东方食品百货店、牙医诊所、图书以及录影带出租店、保龄球馆。还有中华会馆、中文学校，都是相隔几步之遥。                 华人依然过着出国前的生活，他们说闽南语、华语、客家话，吃地道的客家菜、豆浆油条、蚵仔面线或港式点心，家里都安装“小耳朵”卫星转播，收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电视节目。网络普及，年轻人听的是港台最流行的歌曲。“有时候一整天都说不上几句西班牙语，根本感觉不到这是在国外。”这绝非夸大之词，之前有个销售员只说会闽南语，生意额还很高呢！

     难得的是，传统习俗在这里依然如故。派红包、舞狮舞龙、提灯笼或口味繁多的应节食品也都不缺。然而热闹归热闹，大家还是每天照旧开店营业。华人忙碌之余不忘参加社团聚餐，有时每人带一道菜去，让大家分享，有时到中餐馆边吃边唱卡拉OK.

       一切得来不易，桥头华人非常惜福。

       华人之间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关系非常好。闲来串串门子，打打麻将，日子平淡了些，胜在舒心自在，浓浓的人情味叫人倍感温馨。东方市中华会馆会长孙志雄就是因此而决定留下。他也是个热心人。只要有人找上门，即使请教芝麻小事，他也会一一给予满意的答复。

     “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横跨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3国。”此话并非夸大其间，尤其是一水之隔的巴西福斯市，对桥头华人有极大吸引力。那里的消费水平比桥头高1.5倍，但环境洁净，空气清新，治安良好，搬去居住的华人有增无减。早上，华人从福斯到桥头开店，桥头孩子则到对岸上学。周末，桥头华人到福斯购买日用品，也有人开车过去吃早餐。

       每一天，两三百名“两栖华人”在友谊桥上擦肩而过。过了桥，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片天地。

       巴拉圭大盗小贼横行霸道。当地华人都说：“遇劫就像吃饭那么平常。”曾有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载走华商整座仓库里的货物。市区华人于是选择有保安的公寓，走出家门则马上提高警惕。

       盗贼能防，贪官却防不胜防。官员经常以查税为由，向华商索取财物。华商语言不通，又不了解当地法律，只能任人鱼肉。殊不知贪官食髓知味，变本加厉，连政要也来索贿竞选。久而久之，华商养成了“破财消灾”的观念。

       巴拉圭就是这样。看似风平浪静，其实险象环生。为了生存，大家各出奇招，明哲保身。

   巴拉圭贪官多，贫民更多。华人走在街头巷尾，总看见伸手要钱的失学孩童。车子停在红灯前，街童马上翻跟斗、要杂技，盼看官赏赐一两个硬币。另一些则在身上挂满小商品，穿梭在车子之间叫卖。这个国家的贫穷，就是这样暴露在阳光下，毫不隐瞒。车内车外，不过一窗之隔，却俨然是两个世界。

       华商入驻，为当地人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话说回来，华人也需要他们当雇员、帮佣和保姆。偶尔家长抱怨：“孩子太依赖帮佣，洗个碗都不愿意。”但每户华人家庭都离不开当地工人。在华人眼中，巴拉圭员工忠诚、尊重老板。不过他们同时也有拉丁民族乐观知足的天性，不太把工作当一回事，不但无故缺勤，还装病请假。华人最受不了他们慢吞吞的态度，但全国上下都一样，叫人无可奈何。

       对当地人来说，工作是明天的事，今天应该用来享乐。大路旁、公园里、店门口，总坐着无所事事的人们，手里一个茶杯，怀里一个茶壶，悠闲地喝着南美人最爱的马黛茶（Mate）。

夏天的巴拉圭气温可达摄氏40度，茶中加入冰块就变成“马黛凉茶”（Terere），也有华人抱起茶壶边走边喝。大部分华人其实不习惯马黛茶的味道，也无法接受传统喝法。

       当地人也未必接受华人的食物，对没吃过的中餐食材不敢尝试。华人吃得津津有味的虾，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只恶心的虫子。当地的中下阶层没能力上餐馆，吃中餐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除此之外，双方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多交流。

       华人认为巴拉圭人有热情，没感情：“送礼物给他们时就表现得很热情，有事请他们帮忙却不得要领，还说礼物可是你自愿送的。”时间一长，华人便筑起一座隐形的城堡。巴拉圭人无意走近，华人也在自己的城堡里自得其乐。双方始终保持雇主和雇员的安全距离。

       孩子若是跟巴拉圭人交往，家长多半要反对。早年战争使巴拉圭男性人数锐减，如今男女比例是1对7，加上当地人婚姻观念开放，一个男子可能在3年内结3次婚，一个女人的5个孩子也可能有不同父亲。道德伦理观念薄弱，华人说什么也不愿女儿嫁给当地人。虽然当初是自己把孩子带来这里，下一代跟当地人来往在所难免，但看到许多异族通婚夫妻都以离婚收场，只好硬下心肠棒打鸳鸯。

       死后，华人和当地人安葬在同一墓地。华人遗体都在24小时内下葬到公立或私立墓地，私立的有保安人员看守，以防有人“盗墓”。曾有一群医学院学生为了省钱，叫人到公立坟场挖走死者头盖骨，直到家属要捡尸骨火化，才发现亲人头盖骨不翼而飞。只要负担得起，华人宁愿多付一点钱，也不要亲人死无全尸。

  东方市中华会馆是桥头华社的核心，陪着华人走过了25年风雨飘摇的岁月。会馆的活动中心总有人在学西班牙语、上电脑班，参加社交舞蹈班、唱歌联谊会和棋艺社。会馆也设立了贫寒子弟奖学金。此外，亚松森中华会馆、巴拉圭客属宗亲会、台湾商会和巴拉圭工商妇女会也相当活跃。

  近几年新成立的华人社团不少。当地华人常开玩笑说：“一个招牌掉下来，打中的可能就是某某会长。”

       巴拉圭自上世纪80年代就有华人基督教会，那是最早的宗教团体。如今桥头有4个华人基督教会，教友超过100名。

   90年代，佛光会和慈济陆续在亚松森和桥头设立据点，同时开办各种手工学习班，反应热烈，甚至当地人也皈依佛法。亚松森道场经常看见当地人打太极、做禅修，非常积极。同时也有华人信奉一贯道和白莲教。

       此外，华人组织积极回馈当地社会。慈济功德会连续7年募捐旧衣物给贫困的印第安人，为他们盖学校、赠送桌椅课本，同时长期参与救急扶危，协助车祸伤者、顽疾病患。一贯道在亚松森设立普济医院，针灸收费非常便宜。其实，大部分华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只要做慈善，大家一定出钱出力，从不计较名利。

 热心的华人曾因捐赠轮椅过关卡，遭受敲诈而显得沮丧，但也因为受惠者一个友善的微笑，或一个感激的拥抱而开心。巴拉圭佛光禅净中心的主持觉圣法师还记得：、“一个男子坐上轮椅后喜极而泣。40年来只能在地上爬行的他，第一次发现坐起来后，天空竟如此广阔。”这是给施赠者最好的回报。

 蓦然回首，移民的辛酸历历在目。不过，诸多的人生梦想，却也因当年迈出这关键一步，才得以实现。

       忙忙碌碌，就是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孩子也不轻松，清晨五六点就起床，准备到当地学校或搭校车到巴西学校念书。放学回来，又得赶到中文学校上课。

       巴拉圭有4家中文学校，桥头有民办的中山学校、大成学苑、中华语文学校，亚松森则有巴拉圭中正学校。在这里，接受中文教育的华人子弟高达85%。

       而来自大陆的家长则多数把孩子送回家乡就读。

       20年来，第一代华人坚守岗位，细心照料这一片片文化的园圃。中正学校的萧哲文校长多年来坚持为学生的文章剪报写评语，中华语文学校豁免贫寒子弟学费，中山学校则每年举办园游会和校庆，让孩子在互动中学习。学校经费不够，华人马上捐出日用品。

       春风化雨，学生中文水平颇高，混血儿也说得一口流利华语。巴拉圭中文学校因此成为南美洲中文教育的楷模。

       第二代华人自在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不过交友时要么选择华人圈子，要么选择当地人圈子，楚河汉界，非常清楚。课余，华人子弟除了参加才艺班，也趁空档打篮球、打保龄球，生活非常充实。

 高中毕业后，有人到合湾升学，小部分留在当地，其他的到欧美国家深造。通晓华语、西班牙语、英语、瓜拉尼语，甚至是巴西的葡萄牙语，使他们就业时无往不利。近来，不少人进入墨西哥华资企业工作。

* *华人往来于桥头和福斯市，言谈之间不时夹着巴西的葡萄牙语。他们把这种自创的语称作葡西语（Protunol）。*

       离开好像是一种必然。虽然第二代华人认定自己是巴拉圭人，在巴拉圭有家人有朋友，有他们认为全世界最好吃的香肠夹面包（Pancho），但就是少了发展机会。除非愿意在百货店里复制父辈的人生，否则他们将在外国成家、扎根，延续上一代寻梦和圆梦的故事。然后，等着父母捎来他们爱吃的圣诞蛋糕、巴西特产水果汽水（Guarana）、以及巴拉圭亲友的消息。

       父母宁愿两地奔波，也不想把孩子绑在身边，担心这个环境磨损了年轻人的斗志，又担心下一代找不到对象。倒是他们自己，还在几个落脚点之间徘徊。回去台湾，恐怕已跟社会脱节，故人也所剩无几。有心跟孩子团聚，却担心难以在欧美国家另起炉灶。一切要重新来过，太冒险了。

       只要生意还能做，还是呆在巴拉圭比较好。

       于是，他们安于现状，努力工作，再用换来的酬劳，去化解现实中种种问题。水质不干净，买矿泉水或滤水器；警方执法不严，买枪自保；贪官横行，给钱了事。再有余钱的话，还可到周边国家旅行。

       为方便出入境，第一代华人多数已入籍。不少人拥有多重身份，左手拿巴拉圭护照，右手持巴西居留证，在北美洲有业务的还持有美国、加拿大护照。

       近来，申请入籍巴拉圭除了口试还要笔试，导致入籍人数减少。

       拿到巴拉圭护照，并不等于就有了归属感。这也许是华人不关心当地政治的原因。他们大多不去投票，即使参政也只是昙花一现。迄今，只有一位叫林阿枝的桥头华人当上过市议员。

       西班牙语不灵光，一直是他们的致命伤。一名移民16年的华人承认：“会一些单字，全没文法，也连不成句子。”关于居住国的种种消息，只能依赖阅读当地唯一的中文报《传薪日报》以及巴西出版的《南美侨报》。之前还有《城市新闻》以及承播台湾电视节目的影视公司，可惜都已停业。

       第一代华人的隐忧是就医疗服务。孩子不在身边，自己不会西班牙语，有病痛无法找医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为此，不少人萌生起回老家的念头。这一天，却不知是何年何夕。

《传薪日报》创刊于1991年，每周一至周六出版。

   20多年前，华商看到许多巴拉圭人三餐不继，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捐出物资。孰料物资来不及送到贫民手中，就被贪官瓜分，还拿到市场上出售。原来做善事倒成了考验智慧的事。于是，巴拉圭华人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就是希望汇聚更多华人力量，更透明、更有规划地推动慈善事业。

       基金会办过的活动不胜枚举，有冬令大型物资发放、圣婴节玩具派送、轮椅捐赠、意外紧急救护、义卖、资助病痛复健中心、提供电脑教材给贫寒学生等。十几年来，它和国际佛光协会巴拉圭分会一起，每天送面包、牛奶、日常用品到老人院、孤儿院和聋哑学校。基金会还捐出几十台豆浆机，教人用当地盛产的黄豆制造豆浆，取代价格较高的牛奶。

       中巴佛光康宁医院，是巴拉圭华人慈善事业的另一个里程碑。耗资100万美元的医院坐落于幽静郊外，主要对象为妇孺。只要踏进医院大门，所有服务皆免费。当地孕妇早产问题普遍，医院的保温箱已救活2000多个小生命。穷人死后没钱下葬，基金会也会施赠棺木。

       生老病死，只要贫民有需要，基金会总是解囊相助。

       如今，巴拉圭第一夫人基金会、当地私人企业和非营利团体纷纷跟华人慈善基金会合作。经由媒体报道，华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几年前桥头计程车司机罢工示威，当地人特别叮嘱：“华人帮助我们，别去骚扰他们。”李云中会长道出感悟；“要在别人的地方立足，一定要回馈当地社会。”

       巴拉圭华人也许不是最富有，却是最懂得施惠的一群。付出，令他们内心更加宽怀、富足。

  巴拉圭，无疑是这群华人生命中的转折点。居住环境和日常生活不尽完善，但他们并不祈求太多。一间自己的住房，一份比在老家时高点的收入，一个让孩子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巴拉圭正好实现了这些梦想。

       和主流社会仍有一大段距离，然而华人以慈善开了头，并将循着这个方向，主动走近对方。坚韧、坚强、坚持，曾帮助华人渡过许多难关，也一定能让他们从容面对未来。

  乌拉圭是南美洲第二小国，夹在阿根廷和巴西之间，仿佛注定了它受人忽视的命运。然而，它也曾因为在1930年夺下第一次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而声名大噪。50年代的乌拉圭，曾有过一段令人美慕的辉煌时期，那时期它政治稳定、福利优厚，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度位居全拉美之首，还因此赢得“拉丁美洲的瑞士”的美誉。这一切随着1973年军政府上台而烟消云散，高压政治迫使十万人民迁移到邻国。

       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乌拉圭的经济还在原地踏步，工商业发展停滞，人民主要依赖农牧业为生。还好乌拉圭境内几乎没有高山，不是丘陵就是草原，土壤肥沃，非常适合耕种和畜牧。

       走过风光与低潮，而今的乌拉圭安静恬然，几乎让人忽略了他的存在；即使因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舒适的气候而被列入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十大国家之一，也没引来太多的华人。

  这里的华人可算是姗姗来迟。

       在20世纪50年代，广东省新会、开平及浙江省的中国移民，乘船来到乌拉圭。这里移民人数的增长率十分缓慢，直至1967年，也只有区区151人。他们在这里经营洗染店、杂货店和餐馆，一些人则从事劳力工作。

       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有少数台湾人挟带着资金到乌拉圭定居，从事小买卖安家立业。同时，也有一些台湾士兵因为退伍之后有意到海外发展，遂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当时，经常有台湾的远洋渔船停靠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港口，这些台湾船员就成了当地华人做买卖的主要对象，有者索性将中餐馆开在码头旁，以招徕台湾船员的生意。

       此后，乌拉圭华人的状况便没有多大变动。

       一直到90年代，一小批来自中国大陆沿海一带的移民辗转到这里住了下来，才使乌拉圭的华人人口略有增加。

 时至今天，乌拉圭只有区区300名华人，在乌拉圭300万总人口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往来密切，相处融洽，更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

       乌拉圭的环境洁净、景色秀丽，人民热情。这里的华人开设中餐馆，与当地人分享中餐和素食；中医悬壶济世，为当地人解决疑难杂症。然而，由于移居时间尚短，他们和主流社会之间难免仍有许多隔阂。

       今天，华人成立了社团、出版了刊物，开办了中文班，在当地的主流文化之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一点一滴找回归属感。也许，先找到了自己，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别人的生活中。

     这里是一片没有污染的处女地，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全国文盲率只有3%，劳工教育水平极高。蒙德维的亚港设施完善，然而，乌拉圭独独缺少那些踌躇满志的华人所需要的市场。“留下来的都是没有憧憬、胸无大志的人。”当地华人总是这么自嘲。是的，如果他们真的想发大财、赚大钱，当初的目的地就不会是乌拉圭。

       可是，他们不是不能走，而是不想走。

       蒙德维的亚安静的大街上，散落着二三十家华人经营的杂货店和礼品店，还有少数贸易公司、超级市场、照相馆和旅行社。

  这些店主多是夫妻档。他们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钟，每天定时开店、理货、买卖和打烊。晚上煮顿晚餐，租看连续剧光碟，或到朋友家打打麻将，唱唱卡拉OK，或跟在国外深造的孩子通电话聊天，平淡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这些年来，也不是没有其他华人来过这里，只是看到这么一小块蛋糕，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乌拉圭的工业至今难成气候。塑料袋工厂老板王东埔说：“我来的时候，已有一家当地人开的塑料袋工厂。当我的工厂投入运作，那家工厂就不得不关门大吉。”

       20年过去了，他的工厂仍是当地唯一一家塑料袋制造厂。然而，这中间曾有过风浪。乌拉圭的工会势力很强，动辄煽动员工罢工示威。他的工厂一度因为员工罢工停产。此后请工人的时候，他会筛掉工会成员，果然换来了风平浪静。

       乌拉圭法律规定，3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工会，如果发生劳资纠纷，工人有权利霸占工厂，把老板赶出去。有意在这里投资设厂的商家，因此都打退堂鼓，一走了之。乌拉圭现在的4家华人工厂都是“老工厂”，有十几年历史，包括一家化工厂、一家塑料袋制造厂和两家渔业加工厂。

       “想当初，因为语言不通，又不了解人家的法律和风土人情，吃了不少亏。”吃一堑，长一智，经营渔业加工厂的翁贵重总算摸索出一条路。他还一度名列乌拉圭150大出口商。他的工厂主要把渔产品加工冷冻再出口到国外。

       当地人虽然住在海边，却不爱吃鱼，对海产了解甚少。早期他就是在海边捡当地人不要的鲨鱼鳍，卖到中国大陆和香港，打下了事业基础。他深深明白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道理。身为乌拉圭台湾商会会长的他，认养了当地的孤儿院、公共食堂等福利机构，极力帮助弱势群体。

       90年代抵达的那一批华人没有经济基础，得知当地人爱吃炸春卷，索性在家制作春卷卖给当地餐馆。至今大概有十个家庭从事这门生意，竞争相当激烈。其中以王振德创立的斌歌中华料理最具规模。他利用机器生产，一天最多可以卖出6000条春卷，许多餐馆和星级酒店都向他要货。

       位于市中心的十几家中餐馆，春卷也是主要卖点。除了中餐，一些中餐馆也卖当地食物。乌拉圭人本来只爱吃牛肉，而且食量是华人的两倍。近来当地人健康意识提高，加上全球刮起瘦身风，成就了当地3家华人素食馆。

乌拉圭，可以说是当地华人一个意外的发现。

       没发生过惊世骇俗的大事件，也没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成就，在偌大的世界版图中，乌拉圭是这样一个安静的小国。这群路过的华人住了下来，而且正以同样的态度，不强求，不急躁，写下自己最满意的人生。

       乌拉圭地处亚热带，气候舒适，温度常年保持在摄氏18到24度，四季常青，风景秀丽。这里工业发展缓慢，没有污染，水质干净，空气清新。一个患有呼吸器官疾病的华人，来了几个月就不药而愈。现在，她说什么也不愿走了。

     周末的街上，露天咖啡座飘散着浓郁的咖啡香，公园木椅上坐着聊天休息的人群。除了广场中央遛狗的路人，一切看起来就是一幅静止的画面。蒙得维的亚城里最寻常的街景，完全体现了这里的恬静、安详与平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身心自然开朗愉快。

       真有什么烦恼，大不了驱车到郊外，享受不用花钱买的蓝天白云和青青草地。再远一点可以到著名的旅游景点。东边有著名海滩东角（Punta del Este）、西边有独特的湖光山色和位于萨尔托（Salto）省的大温泉。

       在全球“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名单中，乌拉圭总保持在前5名的位置。可以想象，能够和大自然相处得这么和谐的，一定是个温和而友善的民族。乌拉圭人的热情，叫华人受宠若惊。他们都说，即使是路上的陌生人有困难，当地人也会主动帮忙；如果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会两肋插刀。

 “乌拉圭人非常淳朴，人情味浓，跟他们交往不必拐弯抹角，很轻松。”移居这里不过十年光景的吕先生，却做好了落地生根的打算。他偶尔会和孩子说中文，但是他很清楚，学好西班牙语才是最重要的。往后，乌拉圭才是他们的家。

       这里一切的美好，只奖赏给愿意留下来的人。

   在乌拉圭，生活从来不会焦头烂额，而是让人享受的悠哉游哉。吕先生的农场种了满山梨树，每到收成季节，他就骑着马巡视工人采收梨子。南美小国有此景此情，不免让他想起一千多年前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

       “当初也有一段过渡期，每个人都一样。突然之间，文化不同了，语言不一样了，朋友也变少了。还好，华人之间平常来往频密，浓浓的人情味很快弥补了心灵上的失落。”吕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国际佛光会乌拉圭协会的主席，在乌拉圭这二十几年的得失，也许只能用因缘来解释。

       今天，这个小群体里的每个人都彼此认识，凡事互相帮忙。比如家长们自组中文班，把孩子送到其中一个人家里，由家长轮流担任义务老师。这做法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随着乌拉圭华人协会在2007年成立，当地才有了另外一个正式的中文班，也办起了唯一的中文刊物《乌拉圭华人通讯》。

    他们总是用尽一切方法，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

       过年过节，应节食品匮乏，华人自己制作糕饼互相赠送。除夕夜，几户家庭约好一起吃团圆饭。婚礼上也保留迎娶和敬茶仪式。中国食材在这里非常稀罕，于是，回国探亲后回返的行李中，总有大包小包的药材、食品。连家里摆设的佛像或观音塑像，也跟着他们千山万水来到乌拉圭。

       有一年中秋，乌拉圭华人协会托人从距离3个小时船程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买来月饼，分送给会员。2007年的中秋节，他们还第一次举办了中秋茶话会。乌拉圭的月亮不见得比故乡圆，但那一晚，月光却照亮了每颗思念传统文化的赤子之心。

      就像无法适应当地那些甜得令人舌头发腻的甜品一样，许多文化差异也不是一时之间可以适应。

       至今，许多华人父母仍无法接受孩子和当地人交往。那些发生在异族通婚家庭的文化冲突，他们都听得太多。比如，华人家庭以男性为主，但乌拉圭是女性地位更高；当地人没有长幼之序，在家都直呼父母亲姓名；儿媳婚后也不懂称呼公公婆婆。这一切对仍有强烈传统观念的华人父母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的。

       华人移民乌拉圭只有半个世纪，要求第一代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确太难。其实，华人对当地人而言，也只是刚刚搬来的新邻居。双方对彼此的生活习性仍是一知半解。

    尽管如此，当地人都乐于接纳这群陌生的邻居，从政要首领到平民百姓皆不排外，华人在当地生存和就业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只要持有临时居留证，就可以呆3年，同时还能马上申请永久居留。当地政府承认双重国籍，符合条件的华人大多已入籍。

       很多华人毕竟不是这里出生长大，持乌拉圭护照，对他们来说只是多了一层方便。然而，他们也无法否认，乌拉圭的土地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感情，当中还夹杂着一种习惯。习惯了，就不想再奔波，再漂泊。唯一可以令他们再次动身的，也许就是来自家乡的呼唤，以及身在跟国外的孩子团聚的心愿。

       “我们西班牙语不好，万一有什么病痛都不晓得怎么告诉医生。”上了年纪的华人，最担心这件事。把孩子叫回来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当初怎么胼手胝足也要让孩子上当地私立学校，然后送到欧美国家念书。这个地方没有让子女施展才华的平台。于是，这些羽翼丰满的孩子飞出去了，留下渐渐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弟妹们长大了，总有一天也要走的。

       乌拉圭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当地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大学和专科学校均免收学费。但是，公立学校上课情况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翘课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他们常常罢课示威，要不然就自己放假去了。私立学校则不会有这种荒唐事，不过学生每月要交高达六七百美元的学费。“现在最大的负担是教育费。”这是华人家长共同的感受，但开放式的教育制度，的确让孩子获益不浅。在这里，功课都是分组完成，孩子有机会在讨论和分享中学习。

       乌拉圭华人家长高度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50年代之际，社团几乎都热衷于开办中文班，一度把当地的中文教育推上高峰。1951年，乌中文化学院成立，除了开设华文、书法、绘画班外，还开办中国文史和哲学班，学生大多是当地人。每到节庆之日，还有茶会、酒会和电影招待会。

       后来，一名叫曾瑜的人创办了中国文化中心（1963年扩建为中国文化之宫），进一步把中华文化推广到乌拉圭各阶层。60年代，华文班的当地学生曾达6000人。此外，一名热衷中文教育的乌拉圭女子也办过中文学校。

* *乌拉圭人不喜欢大红颜色，一些华人会入乡随俗，就算在春节时期也避免穿得红彤彤。乌拉圭人的名字必须冠母姓，因此当地华人的身份证也有两个姓氏：母亲姓氏与家族姓氏，变成“复姓人”。比如李大明，母亲姓刘，他的名字就是刘李大明。*

       另外，华人也曾经从瑞士运来十多万册的中文图书，至今还收藏在乌拉圭国家图书馆。

       1954年，华人还成立了中华会馆。会馆曾经安养许多孤苦无依的老移民，并筹建了中华公墓，安葬去世的老移民，每年还买鲜花去祭拜。如今这个社团因为后继无人，已经不再活跃，但是为华社的种种付出，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虽然华人经济能力比一般当地人好，但勤俭持家的乌拉圭华人不张扬，不炫耀，从身上穿的衣服到开的车子，都是强调朴素和实用。不过，有些人却舍得花三五万美金，为去世的长辈买一块花园式墓地。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移民的最佳写照——侍奉父母、照顾孩子。这一辈子，总在为别人奔波劳碌。然而，他们却甘之如饴。

 当初对乌拉圭一无所知，后来发现它的种种美丽。当初只想要过境，今天却割舍不下。这一切都在华人的意料之外。

       也许，乌拉圭华人真的没想到要落地生根，但一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说不出一个离开的理由。如果平静是一种生活赐予，那他们已经拥有，而且心底还带着点甜甜的滋味。

   阿根廷仅次于巴西，为南美洲第二大国。它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濒大西洋，西接智利，北界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东北连巴西与乌拉圭。

       阿根廷自然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煤铁等矿产。农林牧渔业发达，盛产米粮与肉类。工业相对进步，种类繁多，有钢铁、汽车、电力、化工、石油、纺织、机械及食品等。

       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迅速增长，一度跻身世界经济十强之林，吸引大批移民迁入。但自1930年的一场政变，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阿根廷政府更迭频繁，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更是重创阿根廷经济，继而引发社会动荡。一路颠簸了20多年，目前已趋向平静，并以丰富的物产成为世界五大粮食出口国之一。尽管如此，它至今仍无法走出负债累累的窘境，使得外资一直保持观望态度，裹足不前。不过，乐天知命的阿根廷人还是一如往常跳探戈、看足球，乐此不疲。

       阿根廷经济局势暗潮汹涌，当地华人生活亦随之起伏不定。

    追源溯流，华人最早在19世纪末，途经秘鲁、智利、巴西等地之后而来到阿根廷。

       接着又有一些中国移民从欧洲辗转抵达这里。有者为欧洲船上担任海员的广东人，也有一战时期被招募到欧洲战场当华工的浙江青田人。战争结束后，他们一路打短期工，以凑足船资，然后来到阿根廷谋生。

       那时侯，阿根廷政府十分欢迎欧洲移民，对亚洲移民则管制较严。因此，直至20世纪的20年代，阿根廷只有40多名华人。

       50年代前后，一些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游客入境之后，申请居留获准，华人逐渐增至300人。70年代之后，台湾人听说阿根廷不但局势稳定，而且遍地黄金，于是不惜花费几千美金办理手续，全家移民到阿根廷来，阿根廷华人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

       在那段时期，对比周边国家，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较高的。华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营洗衣店、水果店、中餐馆、中餐外卖店等，生活稳定。

       当时，阿根廷华人的地位颇高，阿根廷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切不明白的事都可以去问华人。”

       但好景不常，正当大家准备在此地安居乐业的时候，阿根廷却陷入了债务危机。接着，阿根廷政府垮台，1989年，物价还一度上涨了50倍。

       许多华人被迫放弃本身的业务，迁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地，或者回到台湾。华人人数从原本的5万人滑落到3万5000千人。

       到了90年代，一批批中国大陆移民涌入，华人人数又很快地回升。他们大多来自上海、福建、浙江和广东一带。

       2001年，阿根廷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所有人的个人资金惨遭冻结，每个月仅能从银行取出一定的数额。至今，提起当年的惨况，一些老移民仍然心有余悸：“原来可以购置一套三房一厅房子的存款最后只够买一张短程车票。”

       2002年，阿根廷经济逐渐好转，一批中国大陆人闻声而来，当中许多人并未取得合法的身份。两年后，当地政府宣布大赦，允许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办理合法居留权，约有9000多名华人取得合法身份。

       此后，阿根廷华人急速上升，迄今已高达十万人，成为南美洲华人人数增长幅度最快的国家。以福建福清、福州、长乐等地为主的新移民，占了十万华人中的三分之二。

       近20年来，尽管阿根廷经济波动激烈，它依然是中国人向往移居的国度。

20世纪50年代之际，由于当时华人人数不多，很难买到中国食品。当地人的主食是牛肉，青菜只有马铃薯、番茄、黄瓜等几种，因此华人决定自己栽种青菜，吃不完就拿到贝尔格拉诺区（Belgrano）中华会馆附近贩卖。摊档越来越多，每个周末还有人卖鸡鸭，形成一个市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人街遂逐渐成形。

       生活稳定后，华人开始向更多领域拓展，大多数人以经营杂货店、珠宝店、陶瓷店、旅行社、中西药店、旅馆、照相馆等。少数人涉足工业，包括设立造纸厂、炼油厂、塑料厂、食品加工厂、成衣厂，也有人在农牧业、渔业开拓事业。

       今天，华人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4000家超市、700家中餐馆、200家洗衣店、100家网吧以及60家进出口公司。此外，机械厂、汽车维修厂、电器维修厂、食品制造厂、化工厂等，也发展到数十家，均为小型企业。

       如今，每星期有一两百名新移民带着期待的心情，坐着长途班机降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纵然很多华人并未入籍，然而，这里环境宜人，当地人不排外，如果事业顺利，定居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有300万人口，加上周围同属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2座卫星城镇，总人口达1400万。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此。这个繁华热闹的城市，是很多人创业的起点，当然也包括远道而来的华人。

       他们首先发现这里物产丰富。牛肉是当地人的主食，阿根廷境内的牛只比人还多，不管物价如何高涨，吃牛扒始终最经济实惠。当地人没挨过饿，造就了他们平和洒脱的个性，凡事大而化之、慢条斯理，到银行办一件事排上三四个小时是平常事。当地华人不禁形容阿根廷为“整个国家像一部没有上紧发条的机器”。

       当地人不思竞争，反倒为华人制造许多机会，加上商业环境自由，华人超市迅速扩张。短短20年，遍布大城小镇的华人超市占据零售市场30%份额，年度销售额高达85亿比索。超市的兴起带动华人相关行业，包括律师事务所、翻译、运输报关、旅行社、超市货架和设备销售、传单印刷、移民事务所等，专门为华人提供配套服务。

  当年，新移民刚从农村出来，没有太多资金，又不懂当地语言，只好先到中餐馆或杂货店打工，有了积蓄后，便承顶下阿根廷人的小超市，边做边学。华人勤奋苦干，周末也不休业，给城里人带来许多方便。他们很快取代阿根廷人，掌控了城里大部分超市。现在，许多阿根廷人的店铺也效仿华人超市，周末照常营业。

       为了节省开支，老板什么都得做。忙不过来，就把家人接过来，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很多新移民还来不及多看阿根廷几眼，就开始了昏天黑地的工作。生活似是一部单调的电影，不断重播。一切都在匆忙中完成：起床、开店、吃午餐、进货、收钱、打烊……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超市是唯一的生活平台。

       规模较大的超市除了食品、卫生用品、厨房用具、衣物、家电、烟酒、海鲜和蔬菜水果，还附设牛肉部。超市雇用秘鲁或玻利维亚外劳，但他们经常缺勤。碍于法令过于保护劳工，而且员工难找，超市老板往往都忙得团团转。大超市老板在柜台安装了广播器和麦克风，以方便跟员工沟通。

       长时间营业、薄利多销，是华人超市后来居上的致胜妙方。一件货哪怕只赚一毛钱，也不会放过，一天下来，两三千比索的营业额不难，通常两三年就可以回本。好事传千里，同乡纷纷赶来分一杯羹。

       向人借也好，和别人合伙也好，凑足30万到60万比索（约10万到20万美元），在店门口挂上“supermercado”（西班牙语：超市）招牌，一间新超市就开张了。当地华人说：“3年还没本事开店是很丢脸的事。”

 新移民循着相同的轨迹，一步步走向发迹的梦境。苦干几年后赚了钱，或扩充营业，或和朋友合股再开一间超市。一个人拥有好几间超市股份并不稀奇。现在，每个月平均有19家华人超市开张。据说前几年的移民高峰期，几乎每天一间。

       市内超市数量逼近饱和，有人把心一横，闯进周边的贫民区。那里治安不靖，黑社会猖獗，连当地人都却步。然而，15万贫民的庞大消费市场，却叫华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贫民区的华人超市果然大受欢迎，那里的左邻右舍说：“有了华人超市，我们不必到很远的地方买东西，这里什么都有，价格又便宜。”为安全起见，超市都聘请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驻守。市区内的华人超市也安装铁门、警报器和闭路电视，以防盗贼毒手。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华人无法忘记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时，398家华人超市遭暴徒洗劫的惨剧，也记得遭大型零售集团肆意抹黑的教训。庆幸每一次，华人都咬紧牙关熬过去了。

 气候凉爽，空气清新，这是大部分华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个印象。400多年前，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就把它命名为Buenos Aires，意思是“空气清新”。如今，这里空气清新依旧，华人开车时最爱拉下车窗，使车内弥漫着清爽的气息。

       古老而庄严的欧式建筑散落各个角落，雕像和纪念碑林立，植物四季常青，街头艺人自得其乐。抬眼望去，俨然是某个欧洲城市的街景，处处美不胜收，果然没辜负“南美小巴黎”的美誉。

       美景令人舒心，然而，华人忙碌到无暇欣赏。他们大多数是移居不超过3年的新移民，最熟悉的路线是从家里到超市。有人甚至很少走出店里，在超市2楼加几张床褥，添几张桌椅和厨房用品，就是一个家。一直到午夜，才有洗澡和电视机传出的声音，回荡在偌大的屋子里。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刻，就是观赏卫星电视的中文节目。

       其他的消遣活动似乎跟华人无关。阿根廷人在舞厅大跳探戈，在歌剧院看演出，在海滩享受周末阳光，华人则在超市里打滚。每天傍晚，阿根廷人在横跨市中心的女人桥上和河畔散步、聊天，华人却还在超市里工作。阿根廷人享受圣诞和元旦的长假，华人依然蜗居在超市里。

       难怪替华人打工的阿根廷人会说：“华人没有7月9号也没有5月25号（这两天都是法定假期）。”

周日来临，大部分超市只开半天，总算可以松懈一下。这时候，平时游客居多的华人街街道上，仍可见许多华人在商店、中餐馆、理发店、中医和牙医诊所、美容院、咖啡馆进进出出。有人乘便到中国屋和东亚超市添购自己超市没有的东方食品，也有人选租了几部连续剧，或给家乡的亲友拨打长途电话。

       除此之外，他们既没时间，也不需要花费，吃的喝的、日常用品都可取自超市。比起当地大学生1500到1800比索的月薪，超市老板的收入足以挤进中产阶级。有了一定积蓄，买车子买房子都以现金一次付清。此举并非炫耀财富，而是认为分期付款要还利息太划不来。

       即使买了房子，很多人还是继续住在超市楼上，理由是“每家超市都被打抢过，住楼上既方便又安全”。曾有人不甘血汗钱被劫匪抢去，顽强抵抗而酿成死伤悲剧。阿根廷允许民众拥枪，华人都带一两把防身。

       新移民还没能力买一部3万多比索（约一万美元）的汽车，出门大多乘搭地铁。在阿根廷搭地铁是件有趣的事。第一站上来一个卖口香糖的，第二站来个推销剪刀文具的，第三站又来两个街头艺人，在车厢里奏起乐曲，路程充满乐趣。

       有车的华人有时也搭地铁。“车资一律75比索，几平等于不花钱，而且不会堵车。”首都车流量高，经常要堵上一两个小时，但不堵车时又得面对当地司机的“疾速考验”。华人常说：“阿根廷人什么都慢，只有3件事快，花薪水快、放假快、开车快。”

       但是，又不得不佩服市内的街道规划。偌大的城市有2000多条大大小小的马路，包括能让24辆车并排通行、全世界最宽的街道——七九大道。这里每个街区都经过严密规划，每一条街固定有100号，街道两侧门牌单偶数相对，非常工整。即使真的找不到目的地，还可以询问路上站岗的警员和热情亲切的路人。

阿根廷社会丰富的拉丁文化，华人要了解和融入，需要一段很长的磨合期。

       第一代华人日常生活中极少有跟当地人交流的需要，学几句简单的西班牙语就能应付。总的来看，华人社群至今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说自己的语言，过自己的生活。

* *2006年，华人青年刘松代表阿根廷参加第八届的南美运动会，并且摘下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男子团体赛的银牌和男子双打铜牌。此后，他还曾代表阿根廷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甚得阿根廷人民的爱戴。*

       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华人而言非常新鲜。华人发现：“阿根廷人个性浪漫，感情丰富。”在地铁站打电话讲到伤心处，可以旁若无人哭起来；位于街心的广场或公园，常见躺在那里午睡的人们，或正拥抱亲吻的情侣。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真情流露的民族。

       说到装扮，他们却一点不马虎。阿根廷人注重仪表，出门一定是套装或西装。他们爱面子的程度，最让华人感到好笑：“年底放长假，阿根廷人爱到海滩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没钱去度假的人为了面子，买好干粮，足不出户在自家天台晒两个月，好让别人以为他们也去度假了。”

       待得较久的华人，生活习惯多多少少受到影响。到当地餐馆吃饭，也学会了把面包当前菜，烤牛肉吃得不亦乐乎，吃完正餐后再来一个甜点或一杯咖啡。跟当地人打招呼，同样会把右脸贴上对方的右脸。含蓄的第一代华人开始总觉得很忸怩，“练习”几次就会越来越自然。

       华人比较难接受的是当地人对遗体的处理方式。曾有华人死后火化，阿根廷妻子主张把骨灰撒向大海，男方家人却不愿亲人“魂飞魄散”。还有一回，碍于当地法律，一名遭谋杀的华人迟迟不能下葬，直到破案为止。华人虽重视入土为安，却也无可奈何。

宴会是当地华人参加得最频繁的社交活动。今天张三结婚，明天李四孩子满月。一名华团领袖笑说：“一个月有20个晚上要在宴会中度过，有时一晚要赶几场。”

新移民很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正值适婚年龄，首都中餐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婚宴。为了迁就开超市的亲朋戚友，宴会在晚上11点才开始。午夜时分，餐馆外寒风凛冽，餐馆内“salud”（西班牙语：“干杯”）敬酒声此起彼落，一直到半夜两三点才结束。酒足饭饱，回家小睡一下，第二天还是照旧开店营业。

       日子没一刻空闲，连传统春节也挤不进他们忙碌的人生。派红包、吃粽子都在超市里。春节期间，如果没参加华人社团的聚餐，几个人在家吃一顿简单的便饭，也就算过年了。

       难怪当地人对华人的印象，一直是“开超市的”或“工作很勤奋”，其他的一无所知。虽然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却掩不住好奇。当舞狮舞龙出现在华人街，阿根廷人总会争先恐后，涌到最前面摸一摸龙头，祈求走好运。他们对中国小饰物、风水以及中医更感兴趣。中国医药专科学院创办人钟清医师的学生几乎全是当地人，尤其以西医为多。当地华人说：“他们学成后治病中西贯通，很受病患认同。”

       钟医师在阿根廷开班授徒50年，出版过许多相关书籍，培训了很多当地人，曾荣获当地移民局颁发的贡献奖。这份肯定令他欣慰，但大部分华人无力维持文化传承却让他担忧。

中医在阿根廷不需执业执照，吸引很多当地人来学。这是中国医药专科学院里唯一一名华人学生。

   20世纪的第二代华人，在这里长大、受教育，融入得非常快。他们互相称呼彼此的西班牙语名字，爱泡露天咖啡座，喜欢追看足球赛。周末不是在舞厅跳舞，就是在同学家开派对。受当地人影响，土生土长的年轻华人18岁后喜欢搬到外面公寓独居。他们跟阿根廷人一起长大，跟当地人通婚的例子不少。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第一代难免担心土生儿和母体文化渐行渐远。庆幸一群有心人在20世纪70年代就种下了中文教育的幼苗。

       那个年代，资源和条件有限，几名家长以车库和储藏室充当教室，自己敲敲打打钉了桌椅，开始教中文。后来他们在华人街办了侨联中文学校，却因无法负荷不断增加的学生人数，一再搬迁。

       创办人之一的杨镕鉴老先生回忆起过程的艰辛：“有一年开学，全校师生被拒于借来的校舍门外。我只好带大家到附近的植物公园举行开学仪式。”

       30年岁月流转，阿根廷多了华兴中文学校、新兴中文学校、爱育中文学校以及最年轻的富兰克林中文学校。4所资历较久的学校老师还成立了阿根廷侨校教师联谊会，切磋教学方法。

       如今，前人种下的中华文化之树，正在这块南美土地上茁壮成长。

每个周末早上9点到下午5点，1500多名孩子到学校上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课余则学习古筝、书法、跆拳道、空手道、水彩画、舞蹈、音乐以及各种球类运动。校方每年举办各种学术比赛、办校刊，学习过程充实而精彩。坚持到高中课程毕业的华人子弟，中文造诣颇高，中文交谈、阅读和书写都不成问题。

       近年来，华人把孩子送到中国念书蔚然成风。一方面家长工作忙碌，没时间关心孩子学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从小接受中文教育。那些在阿根廷完成高中教育的，少数到台湾或欧美国家升学，也有人成功考进当地著名的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只上半天课，华人学生利用下午时间打工，赚些看电影、喝咖啡的零用。

       当地师长对华人子弟印象很好。一位中学校长赞誉道：“华人家庭教育一定很严格，跟阿根廷小孩相比，他们注重礼貌、校服整齐、上课不迟到、责任感强，看到老师还会点头行礼，这在阿根廷是很大礼节呢！

华人子弟数学和英语成绩特别好，即使是插班生，只要掌握西语，很快就追上课业。接着就看得懂西班牙语的电影和报章。     这对第一代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第一代新移民因为语言障碍，遇到问题只能去请教早来的移民。这后来促成了第一份中文报章的诞生。创办人解俊林回忆：“同样的话重复一百次，我想不如办一本刊物。加上当时我本身经营旅行社，想做一本宣传公司、招揽生意的小刊物，于是就有了《阿根廷通讯》。”那是1984年，当年印刷不普及，每则新闻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写着写着，20多年过去了。如今报纸易名为《新阿根廷通讯》，与《新大陆周刊》和《世界新闻》一起为华社提供各种资讯。翻开报章，除了新闻，广告占了很大篇幅，且大多刊登在显著版位。超市聘请切牛肉工人的广告最多，其次是超市转让、承租等，再来是社团的聚会、活动通告。当地另一本中文杂志《时事商业报》同样以超市业者为主要服务对象。

*阿根廷的电影协会曾经联合中国相关部门，以阿根廷华人的创业经历为题材，摄制了一部名为《天涯尽处的中国人》的纪录片*

大部分华人并没有宗教信仰。他们把300坪大的超市当作最实际的依靠。只有少数人参加佛教团体活动，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阿根廷共有7个华人基督教会，不少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教会慰藉了许多空虚的心灵，帮助许多新移民熬过过渡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阿根廷新兴教会有小班制的西语课程，帮助新移民掌握当地语言。规模较大的教会不仅开办华语、闽南语和西语聚会，还出版周报和小刊物，让教友们交流、分享。

       教会的关怀和理解，让新移民在超市以外，找到了另一个寄托所在。一位牧师分享：“很多年轻人因此成功戒掉烟瘾。”超市星期天营业半天，一家人无论多累也坚持轮流上教会。教会也积极配合，特别设早堂和午堂两场主日崇拜。

       宗教组织不时访问贫民区、孤儿院、老人院和智能障碍学校等，帮助华人走进当地人圈子。阿根廷慈济义工甚至号召当地人一起参加活动，市政府也极力配合每次的义诊和物资发放。

    陌生的环境、对法律不了解以及真假难辨的稽查人员，一再考验着他们的毅力和决心。更无奈的是华人同业之间不时发生钱财纠纷。两家超市靠得太近，常有争执、打架，甚至暴力威胁事件。也有新移民想一步登天，成帮结伙打劫、勒索同乡。

       华人社团不得不从中调解。福清会馆为了避免这类恶性竞争，规定会员的超市至少须相距3条街。成立于2004年的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则通过专题讲座、超市展销会等，积极整合和引导小资本超市改善营业情况。公会出版中西文并茂的月刊，刊登法律、税务制度等实用商业资讯，是华人超市老板最实用的参考书。懂得使用网络的老板还可登陆网站www.casrech.com浏览最新资讯。

       为了收得事半功倍之效，该会还特地聘请阿根廷人担任秘书，协助争取华商权益，同时树立华人良好形象。阿根廷近几年通货膨胀令百姓雪上加霜，公会主动跟政府签署协议，维持物价。为此，阿根廷总统还向广大华人致谢。

       成立短短几年，公会的成绩有目共睹，成了当地影响最大的华人团体之一。与此同时，以业缘和地缘为主的新社团不断冒起，几乎每年平均增加十个。

       岁月静静流过，阿根廷华社已在逐渐成熟、壮大。

       新移民持续通过留学、旅游、探亲等渠道进入阿根廷。当地政府很大方，不会遣送逾期逗留者回国，更让华人趋之若鹜。

       现在，很多人持有永久居留身份（俗称红本）。华人之间的家常，不是超市就是红本。持红本者可参与省政府和市政府行政当局的省长选举，入籍者则可投票。不过，要不是法律强制规定国民必须投票，华人宁可把时间放在工作上。

       在心底深处，仍有许多人只把自己当过客。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的答案千篇一律：“谈不上满不满意，习惯了。”对于这片土地，大多数人的感受也相同。“物产丰富，没有天灾，适合居住”；“商业机会多，不歧视华人”；“生活节奏较慢，压力小”，说着说着，却又舍不得离开了。

1972年，第一个华人社团——阿根廷自由华侨联谊会成立，并在华人街上建立中华会馆。如今这里成了许多老年华人的聚会地点。他们在这里下棋、喝茶聊天、跳舞或唱卡OK，消磨时间。

   早期，阿根廷人经营的自助餐，效益一般。后来，华人闯进这一行业，以更低廉的价格吸引顾客，终于使自助餐受到阿根廷人的欢迎。甚至曾有华人自助餐馆因生意太好，店里无法容纳众多顾客，老板突发奇想，到郊外把一家戏院改装成自助餐馆。如今，最大的自助餐厅已发展到可容纳千多人的规模。

       华人自助餐馆靠的是薄利多销。在自助餐馆内，顾客只要付12到15比索，就可以吃到烤牛肉、鸡肉、意大利面等主食，以及各种中式菜肴，还有当地甜点、蛋糕，样式繁多，任君挑选，能满足食量比华人大两三倍的阿根廷人的胃口。市区内主要的步行街开了好几间这类餐馆，竞争非常激烈。每到晚餐时间，员工都拿着广告单走上街头招徕顾客。

       在阿根廷，自助餐叫做tenedor libre，据说是当地华人创造的词汇。当时华人不晓得西语“自助餐”怎么讲，想起自助餐就是拿着叉子走来走去，于是结合了西班牙语的叉子（tenendor）和自由（libre），创造了这个新词汇。

  一间间超市像一艘艘小船，阿根廷华人正在海上破浪前行。这些年来的坎坷仍历历在目，但顽强的华人却早已重新摇动手上的桨，奋力向对岸划去。

       他们是一群太专注划船的水手，不知不觉错过了沿途的美景，也错过了和从旁经过的船家交流的机会。然而，只要他们愿意敞开心胸，主动招呼和攀谈，一切都不会太迟。

    智利是全世界最狭长的国家。在地图上，它宛如一条曲折的道路，蜿蜒于南美洲大陆的边缘。有人夸张地形容：“当你把头枕在安第斯山脉，脚就伸进了太平洋。”这里气候多变，北部是干燥的沙漠地带，南部却有冰山漂浮于海面，智利的地理环境，就是那么不可思议。

       16世纪中叶，智利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08年，趁着西班牙国内动乱之际，智利人民高举独立的旗帜，击溃了殖民地的军队，于1818年正式宣告独立，成立智利共和国。独立后，智利历经政治动乱，经济萎缩。但近些年来政治渐趋稳定，治安良好，政府廉洁，对外贸易发展蓬勃，吸引不少外来投资者，其中也有不少华人企业家。

       目前，智利有华人1万5000人，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混血华裔。

 华人最早来到智利，是出于偶然。

       在19世纪中期，一批广州沿海一带的华人被送往秘鲁、古巴和巴拿马当苦力。他们之中约有70人临时改变航程而到智利去，在北部阿塔卡马（Atakama）及沟进波（Coquimbo）的矿场工作。

       1879年，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发生太平洋战争。当智利攻打秘鲁时，原先在秘鲁甘蔗园和农场受尽虐待的1000多名华工，协助智利军队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智利政府为了答谢华工的助战，于是允许他们留下来。就这样，华人在盛产硝石的达拉帕卡（Tarapaca，原属秘鲁）、安多法卡斯达（Antofagasta，原属玻利维亚）及伊基克（Iquique）等城市住了下来。

       20世纪初，轮船公司开始有了往来中国与南美之间的航线，越来越多的华人因此来到智利。当时在智利的华人至少超过1500人，他们从事各项足以糊口的买卖活动，并且省吃俭用，有了一点钱就在硝石矿场附近开店售卖牛肉、酒、家用燃料以及食品杂货等。

       等到经济好转，华人就迁往城内。北部的达拉帕卡、伊基克和阿里卡（Arica），首都圣地亚哥开始出现华人店铺。

       自30年代起，全球经济大恐慌严重地冲击智利的硝石出口，市场萧条，杂货铺更是惨淡经营。有的华商被迫变卖家当，然后回国；有者选择迁居到邻国去碰运气；更多的人则因为破产而滞留智利，回国之日遥遥无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牛肉店成了智利华人的新兴行业。除了牛肉店及传统杂货店之外，华人也经营服装店或电器店等。据说，当时伊基克的街道拐角处全都是华人店铺。

       华人与当地女子通婚的例子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保留中国姓氏，不过大多数已经和当地人没有多大分别。

       1973年之后，智利的局势逐渐恢复稳定，于是开始有不少台湾人陆续移民过来。他们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带着资金过来开店售卖礼品、服饰和文具等，也有一些华人在伊基克从事进出口贸易。

       1983年，席卷智利的经济风暴致使新移民纷纷迁到欧美国家，有的则选择回到台湾。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广东人因为有同乡或亲戚在智利开中餐馆，因此前来投靠他们。从1990年到1995年，智利的经济前景一片大好，华人纷纷赶来分一杯羹，到了2000年，智利华人已经增至5000人。

随后，又有从中国北方过来的大批新移民登陆。自此，智利的华人群体便不断地扩大。

早期伊基克中华会馆在公墓买下一个坟墓区，安葬客死异乡的华人。

  带着冒险的勇气，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华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里。

       目前，居住在智利的华人约有1万5000名，大多是近20年间的移民。遍地机会的智利没有让人失望。广东鹤山、恩平和台山人在中餐馆开创人生，而台湾、浙江、福建等地的华人，则在百货贸易行业找到了自己的小天地。

       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首都圣地亚哥是华商圆梦的乐园。辛苦是必然的，还好回报也成正比。今天，大多智利人都熟悉中餐；每户智利人家里，都可找到几件中国货。这些年来，华人社团、中文学校、宗教组织陆续成立，中文网站和中文报纸也在近两年陆续登场。

       智利华人不介意比别人付出更多，因为，每天当第一道阳光照进这座城市时，他们便又向梦想靠近了一步。

  中餐馆在智利极受欢迎。“哪怕只是一间小店，只要脚踏实地工作，没有赚不到钱的理由。”智利华人总是这么说。在700家中餐馆里埋头苦干的华人，为的就是丰收那一天。“中餐馆中午开店，午夜打烊。回家看看电视节目，凌晨两三点才睡。第二天早上11点再回到店里工作。”这是昌华大酒家老板马志华一天的作息，日复一日。即使生意上了轨道，有当地人伙计，但订货、算账，老板一定亲力亲为。

       拼搏了大半生，现在很多华人已拥有好几间中餐馆。

 丰富多姿的中餐，飘洋过海来到智利，最后只剩下寥寥几味——葱炒牛肉、春卷和炒饭，再加上经过改良的“炸馄饨”，这就是智利人认知的“中餐”。尤其是当地人称作蒙古牛肉的葱炒牛肉，几乎是他们必点菜肴。中餐馆老板说：“几十年来就吃这一道，智利人的口味太容易打发了。”

       如果说很多华人靠葱炒牛肉发财致富，并不为过。他们纷纷把家乡的亲戚朋友接过来，先在中餐馆打工，然后开外卖店。外卖店不需桌椅，不请工人，小孩负责看柜台，父母负责煮炒，夜里就睡在店里。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就可以开餐馆了。

       智利的中餐馆就是这样一家变两家，两家变四家，而且都是自家人在经营管理。第三代华人的新兴酒家老板罗文广说：“现在我们家族的中餐馆加起来有三四十家，这还不包括远房亲戚呢！”

眼前的风光，实在很难令人想象智利人曾排斥中餐。早期当地人觉得中餐馆不卫生，污蔑华人用猫肉、狗肉和老鼠肉做中餐食材。后来，华人聘请当地人当主厨，又请当地官员到中餐馆吃饭，想方设法，才政变他们对中餐馆的观念。中餐逐渐登上当地饮食文化的殿堂，并渗透到智利人的饮食习惯里。以前智利人不吃葱，现在郊外的农田种着大片的青葱，还有华人爱吃的大白菜、苦瓜等。

       智利人爱享乐爱消费，华人爱做生意、肯拼搏。不只中餐馆以平均每月一家的速度增加，价廉物美的中国货也很快“攻陷”智利市场。在圣地亚哥火车站附近的百货市场、韩国街和智利中国商品贸易中心（当地华人称作温州城），中国制造的玩具、手表、礼品、布料、衣服、五金等商品琳琅满目。

       火车站附近的百货市场就是唐人街。华人店铺占90%，除了大大小小的批发零售店，还有中国食品店、中餐馆。华商笑说：“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看到短裤拖鞋打扮的人，因为只有华人才会穿得这么随性。”占尽地理优势的市场，早上十点开始人潮不断，直到傍晚6点才散去。

       眼光独到的华商比别人更早掌握当地市场趋势。梁政渊创办的Golf球鞋、钱维国的Fashion Park服装连锁店和石崇的Cuci背包已是当地知名品牌。近来，越来越多华商回到中国大陆设厂，再把自己工厂的商品运来智利，开创了新的产品销售网络。远在智利北部伊基克的华商，也是这么两点一线做贸易。2007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智利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华商在其中作出不少贡献。

     “只要这里还有赚钱的机会，就会继续呆在这里。”习惯漂泊的智利华人，对于未来，总有一丝不确定。

       无可否认，智利庞大的商机，是大部分华人移居的理由，也是他们至今还在这里的原因。加上迷人的景致、友善的民族、浓郁的文化气息，就显得锦上添花。连频繁的地震，也只是华人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在智利经历过无数次地震的华人，早已习以为常。

       开埠400年之久、充满殖民时代风格的圣地亚哥城，在无数次的地震和洪水中，经历着侵蚀、破坏、修复和重建。街上往来的路人仪表堂堂，连乞丐都衣著整齐。圣地亚哥治安良好，市中心每隔几步就有身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巡逻。路旁的长椅，经常有人在聊天或闲坐；露天咖啡座上，永远有人啜着咖啡谈笑风声。

       这份闲情逸致，对华人而言却太奢侈。他们的目标明确，不能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在温州商城经营服装店的郑婉洁，别人晚上8点放工后就回家休息，她还一个人跑到仓库搬货。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已是午夜12点了，但她没有抱怨：“只要有生意就好。”温州城里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很多才踏出大学校门，就来这里创业，卖一些中国进口的鞋子、首饰、背包等小商品。

       圣地亚哥消费颇高，这一带租用两房一厅的公寓，月租600美元。在外买个便餐大概也要5到10美金，华人大都自己带便当，一来省钱，二来不习惯当地食物。智利人一日三餐离不开肉类和面包，又喜欢甜食，口味比较重，华人也会偶尔品尝，天天吃就受不了。

智利人的这道菜肴，混合肉类和各种蔬菜炖熟的Cazuela，相当受华人欢迎。

 天生喜欢享乐的智利人，花钱只图当下开心。周五发薪，周一口袋已经空空如也。华人拼命郎似的工作精神，丝毫也影响不了智利人。这点，身为老板的华人感受最深：“即使给他们双倍工资，他们还是不愿超时工作。如是华人，过年也要赶来加班！”无关孰对孰错，只是文化和价值观不同。

       这些文化差异，华人都适应了。但让他们忧心的是孩子选择当地人为婚嫁对象。反对归反对，街上不时可以看到当地女子挽着华人男子的现象。等到论及婚嫁，父母亲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

       智利是天主教国家，不鼓励堕胎和避孕，拉丁民族又热情开放，单亲妈妈比比皆是，很多女孩才上初中就怀孕了。华人家长惊吓不小，认为社会风气太开放，不太适合小孩成长。有些人因此计划等小孩到了上学年龄就打道回府。智利人爱抽烟，全国有40%的人是烟民，也使他们担忧。

  不过，在华人眼中，智利人单纯、善良、个性温和，非常尊重外来移民。智利人对很多事情不求甚解，不会刻意过根究底，生活的确少了很多烦恼。

       大部分第一代华人因为语言障碍，与当地人交流甚少。极少踏出华人圈子的他们，很多时候只讲华语，偶尔会说几句西班牙商业用语。当他们的孩子跟智利朋友在咖啡座谈笑风生，在智利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跳舞歌唱，他们却只能“袖手旁观”。

       不过，只要相互尊重，主动踏出第一步，一切隔阂都会迎刃而解。

     2002年，圣地亚哥的智利佛光协会成立后，陆续开办的中文班和中国武术班，让很多智利人认识了中华文化。在素菜教学和佛经讲解的活动中，也以智利人居多。当地已有3000名智利佛教徒，远远超过为数200多人的华人基督教徒。除了圣地亚哥和伊基克道场，圣地亚哥郊外小镇塔拉甘特（Talagante）建设的佛光园也已开放。

       关怀，让双方又靠近了一点。佛光协会不时举办义卖筹款、募捐和轮椅捐赠活动，帮助当地贫困人士。基督教徒也经常举办活动奉献爱心。圣地亚哥华人基督教会还定期率众探访老人院、孤儿院和家暴受害者。

  奔波，是许多智利华人共同的生活写照。有时为了社团之间的联系，有时为了生意，有时为了探望妻小。从伊基克到圣地亚哥，再从智利到中国，他们马不停蹄，处处留痕。

       从智利搭飞机到中国，要在好几个机场转机，过程非常繁琐。然而隔着海洋的家乡，让智利华人心甘情愿地在地球的两端，一次又一次地跋涉。要结婚就回国去讨媳妇；老移民过世时举行火葬，好让家人把骨灰送回老家。尤其那些成年以后才来到智利的华人，他们不愿，也无法融入当地。这里赚了钱，就回去买房子，很多人是这么想的：“总有一天要回去。”说着说着，大半生就过去了，他们却还在智利。

       华人入籍，很多时候只为了智利护照带来的出国便利。外来移民在银行存入两万美金，就可申请居留，两年后改为永久居留。一旦在智利居留满5年，就可以申请入籍。智利并不强制国民投票，但一旦登记为选民，就必须前往投票。华人嫌麻烦，大多选择不登记。加上很多人并不想长久呆在这里，总是抱着一副事不关已的心态。内心深处，那个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才是家。

       由于智利人不爱爬楼梯用餐，这里的中餐馆无论规模有多大，大部分都仅以底楼做生意。很多中餐馆老板干脆把二楼当作住家。

       在这里长大的第二代却不是这么想。他们说智利人的语言，吃智利人的食物，读智利人的书，玩智利人的游戏，甚至都有西班牙语名字。他们的工作、家庭和朋友都在这里。他们的未来，也在智利。

       这些年轻华人，有人如鱼得水，却也有人迷失彷徨。有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来到这里，受智利文化影响极大，模仿智利人的一切，想当个“智利人”。他们的确融入了主流社会，但在当地人眼中，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有些沮丧，担心迷失了自己。

       移民智利，改写了两代华人的人生，也让两代人之间衍生出许多矛盾和挣扎。

智利很早就有华人社团。19世纪末，在圣地亚哥的智京中华会馆成立之后，其他城镇也相继出现中华会馆。早期，穷困潦倒又无依无靠的华人，就靠着智京中华会馆安排三餐住宿，得以度过晚年。那个穷困的年代已经结束，但会馆旁边那一排残破的楼房却一直没有拆除。斑驳的墙壁是智利华人的历史烙印。

       随着圣地亚哥新移民增多，新社团纷纷冒出来。华人社团总数并不多，而且地域性相当显著。广东人加入智京中华会馆，台湾人参加智利华侨联谊总会、台湾会馆和台湾商会，江苏人则有智利江苏商会，另外还有一些大陆商人加入智利（伊基克）华商联谊会。

       社团除了举办传统佳节聚餐，也定期举办夏令营，让属下青年会的成员重新认识并亲近自身文化。智京中华会馆和智利华侨联谊总会也分别买地充作华人专属坟场。

       中文教育，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是使命，更是责任。1914年，老移民曾创办了一所中文学校——华侨华文学堂。这么多年来，即使华人人数不多，中文教育断断续续，有心人却一再捡拾起这颗文化种子，一次次播种、施肥、灌溉。

       在伊基克，台湾会馆开办了中文班，以小班制的方式让孩子在周末上课，母亲们轮流当老师。首都则有隶属智利华侨联谊会的圣地亚哥中文学校，以及隶属智京中华会馆的智京中文学校。两所学校设备相当齐全，可惜孩子们始终难以理解父母亲的苦心。方块字对他们而言，陌生而艰涩，说华语经常词不达意。下课钟声一响，他们就说起了西班牙语。

       孩子们渐渐长大，当地学校的课业越来越繁重，能够坚持每个周末来上4小时中文课的人越来越少。上了高中后，他们更加抽不出时间。

   华人子弟成绩好，成功进入名牌大学的不在少数。出国的出国，留在本地大学的多选修医药、法律、会计等专业科系，很少继续选修中文课程。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开办的中文课程，报读的都是当地人。

       大环境固然有其限制，但“有志者，事竟成”也不无道理。2008年2月，智利华人引颈企盼的第一份中文报《智利华报》终于亮相。在此之前，智利华侨联谊总会出版的《智利侨讯》和智京中华会馆出版的《旅智华声》是华人主要的中文读物。年轻人则喜欢上智利华人网和智利华人天下，浏览各种讯息。

       智利也有一群爱好文学的华人，来到天涯海角仍孜孜不倦。他们成立了智利文艺协会，出版过5期《智利文艺》。第一届会长钱维国还办过“包子宴”，一篇文章换一个包子，鼓励大家投稿。智利本身是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国家，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已故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不少当地华人都知道，智利人更是一脸自豪。这位诗人曾3次游历中国，写下了壮丽诗篇《中国大地之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2007年，5名华人子弟在圣地亚哥中文学校修毕高中中文教育，在毕业典礼上接受校方赠送的礼物，以资嘉奖。

  面对海天一色的太平洋，背靠一望无际的沙漠，这就是伊基克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寸草不生，滴雨不下，看似荒凉，却居住着1000多名华人，因为这里是著名的免税区（Zona Franca，简称ZOFRI）。

       30年前，免税区初设，设施简陋，生活艰苦，路上随时可见赶着马车的人们，但没想到后来却成为华人做生意的天堂。当时智利邻国物资短缺，华商看准时机经营转口贸易，加上竞争不大，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当时的华商都是台湾人，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商人逐渐增加，连带中餐馆也迅速发展到30多家。免税区里华人开店接近200家，占所有店铺的10%，其他商家来自印度、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但卖的都是中国货。这里只批发不零售，拥有固定的顾客群。每天早上9点，来自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买家已等在店门外。仓库一般设在批发店隔壁，卸货的港口也在免税区附近，非常方便。玩具批发老板叶庆和说：“这是最容易做的生意。”

       生活朴实悠闲，常年都是摄氏18到22度的好天气，在浩瀚的海洋和荒凉的沙漠之间，唯一要忍耐的是单调和寂寞。偶尔免不了有人抱怨“连一间有情调的咖啡馆都没有”，或是“青菜选择太少”，但伊基克华人学会了在单调中找乐趣。周末不开店，到超市买日用品、看场电影、或是到漫天沙地的高尔夫球场打球，都可以非常尽兴。为了互助联谊，这里设立了台湾会馆、伊基克佛光协会、台湾商会、高尔夫球协会，有早期广东人创办的中华会馆，也有新移民成立的华商联谊会。

       这个充满潜力的小城，将继续迎接怀着理想而来的华人。

   华人最初停留在这里，纯属偶然。今天，他们的停留，也未必长久。

       这么多年来，智利华人总是不停地寻找、停驻、再启程。他们像是盘旋在高空的苍鹰，看准目标，就勇敢往前冲。为了未来，一切的冒险和挣扎都有了意义，因为他们始终深信明天会更好。

       远处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脉，一直默默注视着这群来来往往的过客。不管抵达还是离境，不管停驻还是过境，智利总是以这种安静而沉着的姿态，敞开胸怀，迎接华人到来。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西北隅，北临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它是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咖啡在这里被称作“绿色金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哥伦比亚也盛产黄金；绿宝石出口量占世界总供应量的50%左右。

       哥伦比亚不仅资源丰富，优美的景色也使它享有“南美洲的雅典”之美誉。高山地带如首都波哥大四季如春，而沿海地带的巴兰基亚（Barranquilla）及卡塔赫纳（Cartagena）则有着让人心旷神怡的秀丽美景。近年来，哥伦比亚政府积极扫毒，誓要洗净背负已久的可卡因生产老大的恶名，还哥伦比亚一个美丽的名声。扫毒工作得到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协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历史上，哥伦比亚原为印第安人安居之地，却在1499年遭西班牙人入侵，此后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10年独立。独立后，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直到2000年5月，独立人士乌里韦当选总统，这一格局才得以改变。

       华人在灾难深重的19世纪离开祖国，跋涉到这个美丽的国家，用血汗谱写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故事。

   在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广东台山人飘洋过海，来到了圣安德烈斯岛（San Andres Island），它是哥伦比亚的管辖区。

       第二批移民则是在1870至1890年间到来。那时候，美国正兴起排华浪潮，迫使华人从旧金山等地迁移到墨西哥、巴拿马、秘鲁等国。谁知排华风又蔓延到这些国家，导致华人别无选择，只得再次迁移，因而来到哥伦比亚。

       那时候的哥伦比亚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宝地，空有肥沃土地，却无人力去劳作开垦。大部分为农民出身的华人，正好发挥所长，将本身所熟悉的种植技术引入哥伦比亚。除此之外，辛勤的华人也不畏艰苦地从事采矿工作。因此，早期华人对哥伦比亚的农业及矿业都有不小的贡献。

       当地政府非常欢迎华人的到来，所以在那时期，华人的入境手续非常简单。更多广东台山人纷纷闻风而至，他们从广州乘船出发，历经两个多月的航行，先抵达巴拿马，再辗转到达哥伦比亚。直至1913年，华人人口已从寥寥数十人增至1200人。

       193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陷入萧条的困境，失业率日益飙升。一些别有居心的政客借意在哥伦比亚掀起排华浪潮，试图转移国民对经济问题的视线。大批华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使哥伦比亚的华人锐减至300人不到。直至50年代，哥伦比亚政府重新接纳华人，于是掀起了第三波的移民潮。然而，政策规定，只有与哥伦比亚境内的华人具有父子关系的人才可申请入境，因此当时移入的清一色是男性华人，后来他们大部分与当地妇女通婚。

巴兰基亚的哥伦比亚码头（Puerto Colombia）是当年华人的一个登陆点。

  这批中国大陆移民从家乡前往香港乘坐飞机，先到巴拿马，再转入哥伦比亚。他们在哥伦比亚买地种菜，并以井水灌溉田地。当菜地的经营运作上了轨道之后，他们便开始饲养蛋鸡；后来，由于肉鸡的市场非常好，他们又开始饲养肉鸡。如今，传统的养鸡业已经逐渐没落，目前硕果仅存的3家鸡场分别为“中国第一鸡场”、“中国第二鸡场”以及“富兴鸡场”。随着饲料价格不断上涨，鸡场老板近年来还得自作饲料以减低成本。

       1980年，随着哥伦比亚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华人又陆续前来。源源不绝的移民使华人人口在7年内飙升至将近3600人，当中以广东人居多，台湾人则占了一成左右。到了1998年，华人人数更达到高峰，增至1万5000人。

       2006年1月，哥伦比亚移民局宣布，凡是持有中国护照者，可免签入境证，遂掀起了新一波的移民潮。为了控制移民的人数，哥伦比亚政府不得不在3个月后中止免签条例，但是仍有大批的华人以游客的身份入境，并且逾期逗留。移民众多，良莠不齐，当中有小部分的害群之马在此地干起非法勾当，令华社蒙羞。

*1970年代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华人曾集资百万美金创建占地一万多平方公尺、员工120人的“幸运超级市场”，其附属生意“熊猫面厂”生产的速食面及威化饼畅销全国，风头之健，一时无两，可惜好景只维持了十余年，后因管理方式不合时宜而结业。*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约有新老华人移民两三千人，是华人人数最多的城市。第四大城市巴兰基亚的华人人数则居全国第二，约有1100人。其余华人散布在哥伦比亚27个城市。

       华人主要以开设餐馆谋生。目前，全哥伦比亚一共有400多家中餐馆。以台山人为主的早期移民中，几乎都以开餐馆为业。这种情形在巴兰基亚尤其明显，当地约有400多名台山人，就开了80余家餐馆。巴兰基亚华人社会单纯，人数不多且相互认识，彼此非亲即友。波哥则大约有两三百家中餐馆。

       此外，也有部分华人经营杂货铺。可是，让南美华人赚得盆满钵满的中国商品，在哥伦比亚却不见踪影，华人杂货铺里卖的多是当地货。这是因为当地政府实施严厉的进口条例，例如，单是5个不同品牌的酱油就要5张执照，而且申请手续冗长费时。商家还需交出物品样本供化验，至少需3个月时间等待报告出炉，物品才能上架售卖。再者，哥伦比亚大百货商场遍布，随处可见法国家乐福及哥伦比亚自家品牌EXITO，使中国货品“红”不起来。

   饮食业是哥伦比亚华人的主要行业。中餐馆的店门口往往顶着油漆斑驳的陈旧中文招牌，店内张灯结彩，还供奉着关公神像，有的甚至挂上毛泽东画像，装潢如出一辙。

       按常理说，同行之间势必争个你死我活，但在哥伦比亚却不然。哥伦比亚人爱吃中餐，每家餐馆都有各自的客源。店家无需出奇制胜抢客户，免去了激烈竞争，人人心安理得。

       然而，满街的中餐馆却没能烧出一道原汁原味的正宗菜色，最受当地人欢迎的中式菜肴，就是炒饭。尽管如此，哥伦比亚的中餐厅，仍然高朋满座。

三几张桌椅，简单地布置一番，即能开业。餐馆几乎都是家庭式的小本生意，老板、厨师、收银都是自家人，当地员工只负责招待、切菜等打杂工作。

       在哥伦比亚首都，也有一些富丽堂皇的中餐馆。它们一般设在北部的高级住宅区，开业资本动辄二三十万美金。店里的装饰品，多采用中国味极浓的吊饰、陶瓷与对联，有的更设计成拱桥式的屋顶。不过，许多豪华中餐馆里，却摆着西式餐具，华人亦入乡随俗，吃饭用叉舍筷子。

       除了中餐馆外，巴兰基亚的华人也开西式餐厅，卖红酒、芝士蛋糕等高档西式餐饮。这类餐馆拥有高雅的西洋格调，顾客只能在餐牌上的中式菜肴——炒饭中看出一点中华特色。

* *华人在此地做生意，即使不会说西班牙语中的数字也无甚大碍。华人只要说“广东”二字，手持计算器即可。原因是“广东”二字正巧与西班牙语“多少钱”谐音。当地人相信计算机精准无误，觉得华人使用计算器谈生意是表示基本的尊重。*

 贩毒、抢劫、狙击与杀人等恶行，经过媒体大事渲染，仿佛草木皆兵，使得周边国家的人民对哥伦比亚望而却步。

       哥伦比亚真有那么危险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哥伦比亚华人处变不惊，笑而不语，似乎里头大有玄机。

       以巴兰基亚为例，小镇民风淳朴，华人朴实随和。无论陌生人或熟人，见面都能毫无顾忌地侃侃而谈：“来来来，吃饭，吃饭。”这就是巴兰基亚华人的待客之道。华人习惯晚饭后驱车至中华侨联会会馆，或去同乡家，会会老友、打打麻将，直到深夜才踏上归途，也无需担心安全问题。

       华人勤劳刻苦，大多经营小本生意，积年累月，虽非大富大贵，但总属小康之家。平日省吃俭用，工作之余忙里偷闲，每一年，他们总会抽出时间出国度假、探亲。“通常，我们一行人合资租辆小巴士到处去，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吃也选比较好的餐厅，一趟旅行大概花费数万美金。”哥伦比亚华人说来淡然，绝无炫耀之意。

       在4000多万人口中，哥伦比亚华人属少数民族，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怡然自得、与世无争。“游击队不搞我们，当地人又喜欢华人。”当地华人欣慰地说。

       实际上，在华人眼中，哥伦比亚人民善良好客，也尊重华人，彼此相处融洽。哥伦比亚人，无论平民百姓或军警，文化素养高，待人亦彬彬有礼。满街各色制服的军警，从不会找华人麻烦。在捷运站驻守的实习警察，甚至还会热心地为华人引路，普遍上不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现象。

       总体而言，哥伦比亚人普遍上对华人还是存有好感的，这应归功于当地华团的付出。2006年圣诞节，华团主席徐铭添名下的坚利国际有限公司，赞助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7200件玩具及灯饰等圣诞礼物，并由联谊会副主席扮成圣诞老人，把礼物送给贫穷地区的小孩。哥伦比亚华人取诸社会，亦晓得回馈社会，自然能赢得当地人的尊敬。

  哥伦比亚一共有4个华团，均以地区划分。其中以成立于首都的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最为活跃，会员最多。另外还有巴兰基亚中华侨联会、卡塔赫纳中华会馆及圣马尔塔中华会馆。 老移民大都把孩子送往外地留学，让他们顺理成章在当地落地生根，也为自己将来移居美国铺路。华人新生代大多无兴趣继承父业，父母也不希望孩子步其后尘，一辈子窝在弥漫油烟的厨房里。这里的发展空间有限，而外地则海阔天空，若要大展鸿图，就得冲出哥伦比亚。

       第二代华人无意经商、不从政，对社团也不感兴趣，社团接班人面临青黄不接的危机。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主席的位子也在苦苦寻觅接班人。“第二代人不出来，新来的人不懂，旧人又慢慢老去。”连任两届主席的徐铭添连连感叹。他自2001年起出任主席至今，深知此位的担子不轻，举凡任何筹款，主席必须带头号召身先士卒，而且还要出钱最多。哥伦比亚华人领导不能空有满腔热情，慷慨解囊、树立典范，才是重要的条件。

       在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的支助下，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中文学校终于在2006年6月创立。

       联谊会腾出会馆的空间，花了8个月的时间填平鱼池，兴建校舍，耗费甚巨。此外，校园内的一景一物，包括桌椅、校铃、饮水机，甚至学生的书包文具，都靠华人集资购得。哥伦比亚华人社群小，但对华教事业却不遗余力。

       中文学校聘请波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来教华文，教科书则采用暨南大学专为海外华人撰写的华文课本。为了学生安全，学校亦安排了4辆专车载送学生往返学校。

       办校不易，更何况身在异国。“我是打杂的，也没有办公室，是校长也是校工。”校长卢钟泓说道。为了开源节流，校长管理校务之余，也毫不计较地打点学校的一切，上至编班，下至敲校钟，卢校长都亲力亲为。

 1985年7月1日问世的《哥侨周报》，每逢周一出版，20多年来风雨不改。“我只想为华人服务，让他们了解哥伦比亚的政策及动向。”发行人周成德秉持最初的理念，坚持到现在。

       《哥侨周报》的创办人兼主编徐延树为旅居哥伦比亚的台湾人。他热爱写作，亦写得一手好文章，所以在朋友的鼓励下策划办报。这一办就不曾停歇，直到逝世为止，而遗孀周成德依旧为报纸默默耕耘。她每周不计成本影印200份《哥侨周报》寄给分布在哥伦比亚各地的订户，却不向他们追讨邮费。

       《哥侨周报》创刊号以手写形式问世，后发展至电脑打字。这份报章如A4纸张一般大，共5页，并以复印形式发行。报章的重点新闻以台湾新闻为主，内页则有哥伦比亚及国际新闻。

       周成德表示：“每个月开销，单是邮费就花去了600美金，其他开销还需千余美金。”然而，《哥侨周报》却没有固定的津贴，一切费用全由周成德负责。“我有商铺及餐厅等收入做后盾，能为华人奉献，小小付出算不了什么。”

       除此之外，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亦在每个月出版《旅哥侨讯》派发给当地华人。这本厚达50页的刊物，以当地华人动向、中国大陆及国际新闻为主。近年来，哥伦比亚华人可以付费收看华文卫星电视，获取华文资讯的管道越来越多元。

《哥侨周报》发行人周成德

 “主席，您在就好，您在我就放心了。”“主席，您回来啦，今天到我家吃饭吧。”

       哥伦比亚华人口中的主席正是徐铭添。华人在哥伦比亚遇到麻烦或遭到不公平对待时，只要徐铭添一出马，问题马上就能得到妥善解决。他曾经放下手头上的生意，大老远从国外飞回哥伦比亚，为的就是保护华人，维护他们的权益。

       “华人在此安居乐业，没干坏事，是好人，我一定帮忙。”好几回，有华人因无居留证而被逮个正着，在送往机场被遣返之际，徐铭添靠着与官方良好的关系，让他们得以长居此地。他后来还将这些人安置在自己的餐馆工作，以防他们再遭逮捕。如今，徐铭添更着手为哥伦比亚华人争取大赦。他说：“这是我退位前必须完成的事。”秉持着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信念，身为广东中山人的他不只为哥伦比亚华人付出，亦热心服务社会。

       徐铭添自小在哥伦比亚成长、受教育，然后到香港念了几年书，再负笈美国接受大专教育。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与哥伦比亚政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标准的华语让他能与中国大使亲切地以母语交谈；而流利的粤语更是他与华人移民之间的沟通工具；英语则让他在生意上无往不利。

       “语言就是条件，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一份优势。”身为广东中山人的徐铭添，却能在台山人为主的哥伦比亚当了8年的华团主席，且备受华人尊重。任职主席一职不易，徐铭添一来不推卸，不畏麻烦；二是他好学不倦；三是他幽默豁达，行事作风明快，因此广结善缘。

       徐铭添也是名成功商人，曾登上香港商业杂志的封面。他从事的生意非常多元化，其中包括餐饮业、珠宝业、进出口贸易、礼品连锁店、旅行社等。

  哥伦比亚华人历经风风雨雨，终于在多年后的今天，享有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

       老移民对哥伦比亚产生了感情，但为了替孩子寻觅更光明的前程，他们仍不停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一幕幕「孟母三迁」的故事。然而，每当一批老移民离去，必有一批新移民涌入填补他们遗下的空间。哥伦比亚华人社会，就在这种迎新去旧的循环中，生生不息。

逾百年历史的巴兰基亚中华义山，埋葬着许多早期华人的身躯及他们的美国梦，如今只供举目无亲的华人长眠。

 委内瑞拉在西班牙语意为“小威尼斯”，来源于早期原住民在湖边盖房子的生活景观。1498年，哥伦布登陆委内瑞拉，眼前尽是阿拉瓦族和加勒比族印第安人。1567年，它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来在民族解放英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殖民统治，1811年宣告独立。

       当全世界因油价高而鼓噪时，委内瑞拉华人却笑说：“委内瑞拉的油比水便宜。”的确，石油为该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但其多变的局势，令未来发展蒙上阴影。自1999年执政以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推动一系列变革。

       新政策纷纷出台，委内瑞拉华人难以适应，但凭着坚毅刚强和灵活变通的民族特性，时间久了，相信一切均能迎刃而解。

   根据记载，第一批抵达委内瑞拉的华人，是在1836年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拿马等邻国，辗转来到这里的广东恩平人。

       另一种说法是，一艘开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轮船，因为发生故障而停泊在委内瑞拉，船上的数十名恩平人被迫滞留在当地，结果便阴差阳错地成了首批踏足委内瑞拉的华人。

       第一批华人移民多数从事耕种或洗衣等行业。他们不辞劳苦，挨家挨户地收集脏衣服，一双手不停地洗刷粗厚的衣物，然后送到家家户户去，以换取极为微薄的报酬。另有一些华人则在餐馆当杂工，或售卖香烟和食物。

       1920年代，终于有了第二批华人抵境，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在中国染上了恶习或触犯法律，如吸鸦片、赌博、偷窃等，以致亲友迫不得已把他们送到委内瑞拉来。

       1930年代，委内瑞拉迎来了第三批华人。这群华人大多是从邻近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入境。他们十分勤奋，一般从事咖啡馆以及酒馆生意。

       身在他乡的华人，日子好坏与当地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息息相关。委内瑞拉的历届总统当中，胡安·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最为厚待华人，所以华人经济发展顺遂。到了1935年，拉斐尔·卡尔德拉·罗德里格斯（Rafael Caldera Rodríguez）继任总统，3年后即发生排华事件。

       当时委国政府限制华人入境，关闭华人所经营的店铺，并且还准备了3艘邮轮，打算将华人遣送回国，只是适逢中日战争爆发，导致航路不通而作罢。可是，无法离开的华人，依然被迫将利润丰厚的酒馆生意转让给欧裔移民。

       由于委内瑞拉宪法的限制，华人也无法取得当地的国籍，华人移民入境更是难上加难。

       直至1974年委内瑞拉与中国建交，情况才稍有所好转。此后，只要持有中国护照和身份证，华人便可申请合法入境，这个转变导致华人移民人数与日俱增。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中国再次掀起移民热潮，当时至少有一万多名华人从中国涌入委内瑞拉，其中以恩平人最多。

       2004年，查韦斯总统决定给予外国侨民大赦，大批华人获得了正式的居留身份，而且申请的手续极为简易，许多华人因此陆续移居到委内瑞拉。华人大都以“乡亲投靠乡亲”的方式到来，因此，恩平人的人数始终居高不下。

 “一元人民币的商品，在这里能卖上一美元。委内瑞拉满街都是钱，就看你怎么捡。”许多华商如是表示。

       外来商品一入“委门”，则身价十倍，委内瑞拉百货店铺多不胜数，不无道理。因此，局势再动荡险峻，老华人仍然不离不弃，新移民来了一批又一批。

       新移民的创业首选为开设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其次是经营餐饮业。

   这里的百货商店与超级市场外观相似，出售的商品却大不相同。百货商店一般销售日常用品、装饰品、礼品、文具等，而超级市场则主要摆卖食材干粮等。两者多为小本经营，虽不见连锁形式，但有些店铺的商品种类达千种之多。也有些华人在家中腾出小小的空间，然后向亲友取货，即能开业。“就算是街坊买卖，也稳赚不赔。”华人异口同声地表示。

       华人餐馆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设计简单的快餐店，主要做当地人的生意；第二类是装潢讲究的中餐厅，客源以华人为主。首都加拉加斯有3万多华人，就有多达800家中餐厅。

       华人开设的快餐店，经营方式与西式快餐店无异，大多设在商场里，菜单以当地人喜欢的烤鸡、炒饭等为主。不过，从店面外观来看，难以辨别老板是华人抑或是当地人。

       想在委内瑞拉品尝正宗的粤菜，绝对没问题。中餐厅大部分开在首都的高级住宅区内，且毗邻而建。门外不见大红灯笼，反而以利落的西式建筑风格为主，内里又是一片古色古香的氛围。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与华人不同，但中餐对他们而言，却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近年来，尽管政局不稳、市道不景，但生产及制造业前景备受看好，发展空间极大，不少华商蠢蠢欲动，筹备设厂，以便在这块经济蛋糕上分一杯羹。华商纷纷收购意大利及西班牙人在马拉凯工业区留下的中小型工厂，再从中国购入机器，生产自家品牌的塑料袋、塑料容器、衣架、纸箱等等，盈利据说比批发零售更高且快。

        83岁的冯雪茂可算华人商界的佼佼者。他早期从餐饮业转战杂货业，还涉足房地产、塑料制造、媒体等生意，如今仅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就有十多家。

        委内瑞拉资源丰富，肥沃的土地尚待开发，丰富的矿物只等人挖掘，发展潜能无限。华人一方面感叹当地人不会善用，一方面则不得不等待时机。

     华人在委内瑞拉耕耘了百余年，尽管曾有华裔当过部长，但社会与经济地位并不高。再者，政局动荡，治安欠佳，更使华人吃尽苦头。

        治安较差的华恋社中区，白天黑夜，两幅景致。天色渐沉，白天的车龙与人群，瞬间被黑夜吞噬，在橙黄街灯的照映下，独留破砖烂瓦的倒影，形同一座荒废已久的死城。当地人于傍晚6点关店乃习惯使然，而华人在7点锁上大门，以策安全。

        华人到餐馆用餐，随时会碰上枪指太阳穴的惊悚场面；即使待在高级酒店，匪徒一样有本事破门行窃。尽管如此，委内瑞拉华人大多逆来顺受，既没佩戴枪械，也不聘请保镖，唯有家里的保安做得最足。

踏入华人家门，总得先解开外锁，再开旁锁，门的下方还有个内锁，好不容易开了铁匣，内里还有一个暗门，进门后又得重复刚才的步骤把门锁上，整个过程需时至少15分钟。

        无奈的华人没法改变整个大环境，但也懂得见招拆招，部分华商靠着与警长的私交而获得“警察顾问”、“警察特派员”等证件，一旦被军警刁难，就能派上用场。

        近几年，“快餐式”绑架取代了哄抢，这边绑架恐吓，那边收钱放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人始料不及。有鉴于此，华恋社中华会馆及华人商会联合成立护侨小组，与警方密切配合，成功倾覆几个匪巢，解救多名人质。此护侨小组也附设护侨基金会，以便向有需要的华人提供经济援助。

  委内瑞拉华社结构复杂。

        不同语言使用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迁。过去，非恩平人到此做生意，必须入乡随俗学习恩平话，否则难以融入当地华社，即使能说得一口标准的广州话，一样没辙。倘若口操普通话，即被贴上“北佬”的标签。

        如今，情况稍有改变。华商若能说普通话，将有利于生意上的交往。与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沟通，也需要讲普通话。十字港（Puerto La Cruz）的华侨福利会也在近年开设普通话班（华文会话班），让华商在周末上课学华文。

* *委内瑞拉的恩平人占八成，因此出现西班牙语“恩平化”的情况。有些华人会把百货商店称为“经解野”（西班牙语Quincalleria的译音），中文报章一般选择以恩平话译音，如把“巴伦西亚”（Valencia）写成“华恋社”、“玻利瓦尔”（Bolivar）写成“保利华”等，规范的中文译名反而少用。*

        委内瑞拉华人之间的人情味，建立在彼此的信任程度及相识时间的长短。华商征聘员工，一般优先考虑华人，倘若员工肯做肯学，雇主还会大方地出钱出力协助员工当老板。据悉，冯雪茂就曾帮助至少100名华人创业。

        政府明文规定雇主必须聘请当地人工作，但一些华人存有“老番为人信不过”的想法，表面上关系和谐，实际上日夜防范员工监守自盗。近年来，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已稍有改善。

        委内瑞拉的华人是矛盾的，尽管对当地人有所抱怨，却又希望他们不思长进，原地踏步。如此一来，华人少了竞争对手，生意就会越做越旺。

    近几年，委内瑞拉各大华团纷纷在会馆内开设华文班，使用暨南大学出版的海外教材，部分学生完成小学一到四年级的课程后，还会到中国继续升学。

        “希望孩子们毕业时已能阅中文报。”中文教育宗旨明确，而部分华文班亦设有“祖根课”，学校不时举办“回国寻根”之类的课外活动，让学生放松身心的同时，也借此多认识中华文化。

        全委内瑞拉中文教育体系最完整的，要数华恋社中华会馆所设立的中文学校。它拥有8名专业华文教师，6个班级，一星期上5天课，每天5小时。大部分学生早上在当地学校上课，下午就到中文学校学习母语。

* *委内瑞拉全国华人文学艺术爱好者联合会（简称“全委华人文联”）于2008年1月成立，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宗旨，凝聚华人文化力量。*
* 华人虽然仍受歧视，但倘若华人子弟表现优异，进入国立大学并不成问题。西蒙·玻利瓦尔大学及中央大学为当地著名的大专学府，学费廉宜，学位亦受美国和加拿大承认，毕业后许多工作机会都会主动找上门。
* 华人在异国赚钱，依旧不忘捐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冯雪茂就曾于1986年捐献300多万人民币，在恩平县建立了雪茂学校。

目前，委内瑞拉的中文报章有《委国侨报》以及《委华报》等。《委国侨报》是委内瑞拉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仅比第二份中文报刊《委华报》早出版3个月，至今已有十年历史。目前《委国侨报》报社全职员工有十余人，而业务和发行人员则遍布委内瑞拉各省市，基本上都是兼职性质。报纸的销售量为4000份左右，主要在委内瑞拉几个华人偏多的大城市销售。

     2009年，《委国侨报》报社创办了另外一份西班牙语报纸《CHINA EN ESPANOL》，读者群面向委内瑞拉人，以及不懂中文的委国土生华人，以让他们多些了解中国，宣扬中华文化。这份报纸也受到了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支持，目前已发展为中委文化、商务交流的平台之一。

        《委华报》主要报道中国和世界新闻，而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曾转载该报的新闻报导，销量约4000份，旗下还出版《委华博览》杂志。

        委内瑞拉屡屡在世界选美赛中荣摘桂冠，中文媒体也顺应华社及当地人对选美的兴趣，《委华报》于2005年首开先河，举办全委华人选美小姐比赛，而2007年3月创刊的《南美新知》中西双语杂志也以华裔美少女为封面。

        目前，中文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各中文报馆规模甚小，员工只有十余人左右。报章每周出版一期，交由会馆及通讯员派发。读者投稿纯属兴趣，并没有稿费。

《南美新知》以中西双语出击，争取华人及当地读者群。

    每逢星期天，早晨7时至下午1时，委京中华会馆摇身一变成了唐人市集，聚集了大批华人。约60个大小不一的华人档口在这里摆摊营业，所出售的装饰品、糕点、影碟等大部分来自中国，而蔬果则为当地产物。

        这个唐人市集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原先在委京中华会馆对面的中餐馆外摆摊做生意，但附近居民投诉唐人市集制造噪音及污染环境，当局遂展开扫荡。当时，摊主做不成生意，华人也少了一个购物集中地，后来经由委京中华会馆主席梅其羡医生以私人交情与当局协调，摊主获准继续摆卖，但只限于委京中华会馆内。

唐人市集每周开放一次，售卖各类蔬果、日常用品和家乡美食。

委内瑞拉内忧外患不断，但华人移民毫不退缩，依然纷至沓来，而华人经济发展也日趋多元。

        然而，即使拥有百余年的移民历史，委内瑞拉华人社会地位却未见提升。他们始终还是弱势的一群。华社尚未成功，华人仍须努力。

 南美洲北部大西洋沿岸，曾经有过3个圭亚那，从西向东依次为英属、荷属和法属圭亚那，即如今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苏里南共和国和法属圭亚那。这里森林密布，河流纵横，在印第安语上，有“多水之乡”之称。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这里却有世界最高的木质白教堂、世界最长的浮桥。它曾被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占领过，183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66年宣布独立，是南美大陆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因为历史渊源，圭亚那种族结构复杂，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

       独立后的圭亚那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种族关系紧张。如今，政府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解决种族冲突，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仍不断上升，这一切都让人望而生畏，前来冒险闯荡的华人人数也一年比一年少。

       大部分华人都把这里当成歇脚点，一赚到钱，便纷纷移民海外。但是，也有华人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园，说是习惯了这里悠闲的生活，哪里都不想去了。

从早期的契约华工直至后来的新移民，华人在这个国家落脚的时间已经有近160年。

       1834年，英属圭亚那废除奴隶制度，黑奴离开了种植园。为了补充廉价的劳动力，英国人便从中国及印度招募苦力，以解决甘蔗园劳工短缺的问题。

       1853年，首批来自中国沿海的契约华工乘风破浪而至，掀开了华人在圭亚那生存和发展的序幕。

       据说那时的契约华工价格比印度劳工还高。在合同期内，华工的劳动力价格是25英镑，印度劳工则只有15英镑。为了降低成本，种植园主都比较偏向于聘请印度劳工，不过，由于种植园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加上华工勤劳卖力，工作认真负责，且奉公守法，得到英国人极大的信任，故此，越来越多契约华工涌入圭亚那。

       根据统计，到1912年为止，圭亚那共有约1万5000名契约华工。后来，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被转送到加勒比海一带的国家，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牙买加等地，也有一些华人在合约期间由于工作操劳过度而丧命。

       逐渐地，也开始有华人女性进入圭亚那，不过人数不多。1861年，玛格丽（Margery）的曾祖母来到了圭亚那。“听说她是第一个到达圭亚那的中国女人，她的脚板只有5寸长。”玛格丽是圭亚那第四代华人，她家的柜橱里珍藏者祖辈们从中国带来的“宝贝”：5对金莲鞋、茶壶、玻璃碗筷、福禄寿瓷器、煤油灯等，保存得完好如初。“这些‘古董’，都是长辈从中国随身带来的，意欲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与光明。”玛格丽这样解释。

       一般来说，华人的契约期为5年，期满之后，华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已的去留。想返回中国的，雇主会付每人50英镑的路费，愿意留下来的，则可以得到补助金。

       回乡对当时的华人而言，是一个极其冒险、九死一生的旅程。他们至少需在海上航行半年时间，才能抵达中国沿海地区。船上的卫生条件恶劣，还得提心吊胆地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那时侯，华人在海上的死亡率高达40%。

       故此，一些华人选择了续约，继续留在种植园里工作。不过，大多数华人不为土地或补助金所诱惑，他们决定离开种植园，在城镇定居并转行经商，有的开食品店、洗衣馆、餐馆，有的当了理发师、铁匠、裁缝师、木匠等。也有华人选择去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巴西等地谋生。

       1966年，圭亚那宣布独立，社会秩序曾经有过一段混乱期，导致人心惶惶。“那是圭亚那最苦的时候，没有面包没有米饭，人们只能自己耕种。”华人回忆说。

 因此，华人纷纷移民他国。“那个年代，只要到了英国就可以拿到合法居留证，要办理加拿大居留也很容易。华人手中只要有机票的，都会选择离开。”老华侨说。

       那些走不了的华人唯有听天由命，继续经营伙食店或餐馆。“虽然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做生意就很不错，至少市场竞争力不强，成本低，赚钱容易。”所谓富贵险中求，留下来的这一些人，希望能在这里创一番事业，日后才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由于早期华人移民当中，女性的数量非常少，所以，大部分的男性移民都和当地其他种族通婚。而他们所生下的混血后代虽然大部分保留着华人的姓氏，但是却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了。

       华人非常重视教育，父辈们总是宁愿自己吃苦受罪，也要设法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所以，大部分圭亚那的混血华人都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多数是社会上有地位的成功人士。

       虽然不论样貌还是肤色方面，都很难让人将他们和华人联系起来，但是，传承下来的家庭格训，让他们认定中国人就是他们的祖先。

  目前，不包括混血华人在内，圭亚那华人只有约2000人，多数集中住在首都乔治敦。

       华人新移民大部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来自广州白云区，数量超过1000人。由于不谙英语，他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大多数人都在餐馆里找生活。

       成立于20世纪初期的中华会馆联系着整个华人社会，但因为种种原因，它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附属的中文学校时办时停，常常有学生却没有老师。

       这里的每个华人都想要把华社做好，只是群龙无首，长期处于松散状态。

 圭亚那资源丰富，却穷得不可思议，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在这里，华人凭借餐饮业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华人在圭亚那百多年，做得最多的就是餐饮业。这里有200多家不大不小的中餐馆，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市中心或郊区。

       圭亚那中餐馆主要分成3种。家庭式餐馆最普遍也最简陋，一般多为夫妻俩或一个人在经营，卖些炒饭炒面和简单的热食，价钱也最便宜。普通的中餐馆有冷气设备，除了炒饭炒面外，热炒的种类丰富些，有些也承包宴会用餐。另外，这里还有几间大酒家，集中在乔治敦，店内宽敞洁净、菜色选择多样，用餐环境与菜肴口味都令人满意，但价钱比较高。

       在圭亚那开一家普通的餐馆，成本不高，平均1万5000美金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家庭式餐馆的资金，更是低于这个价钱。华人说：“圭亚那人口少，失业率高，他们对中餐的要求不高，装潢费人工费都可以省下来，剩下的就是租金而已。”

       大部分的家庭式餐馆都用木板搭成，光线穿过板与板之间的缝隙透进来，阴凉的感觉与外头强烈的阳光形成对比。小小的楼面仅仅简单地摆了些桌椅，连电风扇也没有，更别说其他的摆设或点缀。

       家庭式餐馆的柜台上方，写着简单的菜单。为了安全考虑，柜台外围上栅栏，将老板与顾客隔开，栏杆底部空出约30厘米左右的空间，以方便老板与顾客沟通，与旧式银行的柜台设计一样。在圭亚那点餐，好像去银行取钱一样，老板与客人之间永远隔着一些距离。

    “这里治安欠佳，凡事都要小心谨慎，凡事都要考虑安全。营业时间不要太长，门窗要锁好，不要让别人有机会对你下手。”华人都知道若没做好基本安全措施，就等于送羊入虎口。

       尽管有诸多风险，华人还是很享受自己当老板的感觉。中午没客人的时候，老板可以借机睡午觉，客人来点餐，只要在柜台外大喊几声就可以了。

       “相较于经营百货店生意，开餐馆最轻松不过了，至于安全问题，只要低调、不张扬，时刻提高警惕就行了。”和妻子一起经营家庭餐馆的朱构雄如是指出。朱家的店就在郊区大路旁，每天平均可卖四五十碟炒饭炒面，一天约有100至250美元的收入。

       圭亚那的中餐馆已有100余年的历史，深受当地人欢迎。在乔治敦外的郊区，有一家非常受当地人欢迎的中餐馆。老板自豪地说：“这里很多人都是吃我的饭长大的。”

       小小的中餐馆，虽千篇一律，但却是大部分华人在当地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华人说，在圭亚那做生意最自由。“只要照章纳税，遵守法律，你开什么店，营业到几点都可以，没人会刻意刁难你。”华人在这里做生意如鱼得水。

       近年来，廉价的中国百货风靡全球。乔治敦的大街上也出现了几家华人百货店和衣饰店。百货商品一般是从苏里南进口，华人在圭亚那开店售卖。

* *连任两届圭亚那总统及国家元首（1970-1980年）是名叫阿瑟钟（Raymond Arthur Chung）的华人。他的父亲是来自广东的客家籍契约华工。阿瑟钟曾留学英国，返回圭亚那后，担任律师及高等法院法官。1977年，他曾经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中国。他在圭亚那享有崇高的威望，2008年辞世时，举国放假一天来悼念他。*

       苏里南华人也因此过来做生意。“苏里南百货店已达到饱和状态，竞争激烈。听说圭亚那华人不多，还是片处女地，便过来尝试一下。”苏锐辉是浙江人，在苏里南住了几年，累积了闯天下的经验后，就单枪匹马地来到圭亚那发展。

       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进入圭亚那，从大型的拖拉机到小巧的打火机，都是“中国制造”。华人说，圭亚那人对中国商品非常喜爱。圭亚那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雨量充沛。当地人一出门，至少会带一把伞。有些当地人对设计精美的中国雨伞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会拿在手里，边亲吻伞边说：“我喜欢中国伞。”

       “在圭亚那做生意，竞争小，利润多，但是员工薪水比较高。”苏锐辉说。以前，聘请一个当地人每个月要100美元，现在则是每个月350到450美元不等。星期天还要付双倍工钱。因此，华人商店最多聘请一至两个当地人，其余都是亲戚朋友来帮忙打理。哥哥放假去旅行了，就请弟弟到店里来坐镇；弟弟到国外进货，哥哥就会到店里帮忙打理。

       圭亚那贫穷，但物价却出奇的高。“这里的人口不多，薄利多销是行不通的，每样商品的顾客群都不多，只能提高商品价格销售，否则成本压力会很大。”华人说。

       虽然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华人商店的销售量还不错。华人透露：“当地人消费观念和华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非常乐观，只要身上有钱，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把它花光。”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的钱好像永远也花不完。

       原来，这个国家70万总人口中，竟然有50万人长期定居在发达国家，留在圭亚那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在海外，他们的家人会定期给他们汇款，因此当地人每个月都会有不菲的收入。

       “加上他们天性乐观，真的没钱了，也会卷起裤脚到河边抓鱼虾去卖。或者到深山去采金，只要在山里待上半个月，就会有钱了。”华人说，“他们有钱，我们的口袋就有钱。”

       因此，这个国家看起来很贫穷，但生活消费一点也不便宜。

     圭亚那有些华人从事伐木业。

       这里超过85%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着。“圭亚那的每一片森林都是宝藏，埋藏着无尽的宝物，等着伯乐来发掘。”华人如此形容。听说在这里伐木也能赚到钱后、华人、外资公司便陆续前来投资，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

       巴拿马伐木集团、长青集团、中国木业资源集团是这里数一数二的大型华人伐木公司，其中，巴拿马伐木集团在香港上市，掌舵的是马来西亚华人。这几家公司在圭亚那有好几个规模非常大的林区，虽然政府批准他们伐木，但也规定他们注意保护生态平衡，不能过度开采资源。

       森林里蕴藏着无限资源，同时也潜藏着无限危机，特别是蚊虫带来的危害。“圭亚那森林里有超过十种毒蚊，有些毒蚊的潜伏期是十天，被叮着的人一定要留在圭亚那，因为只有圭亚那才有药医。”华人说，“一般人不能被两种以上的蚊子叮到，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很多人以为只要上山把树锯断，再运下山就可以换取一桶桶的金币了。殊不知，他们贸然上山，往往会走上黄泉路。”

       “然而，有些林区很安全，他们会先‘消毒’林区，然后再进行伐木工作。”华人说。比起一般小规模的伐木发展商，大型的伐木公司会更注重伐木工人的安全，他们的林区还有医疗所。

       圭亚那交通不发达，从市中心到林区路程遥远，一般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车程。人们到了林区边缘的小码头，还得乘坐小船才能去到目的地。这对于每天往返奔波的人来说，实在是浪费时间。

       于是，有些华人干脆就住在林区。他们有来出差的、伐木的、在伙食店打工的，也有参与新建食堂的华人等。他们生活简单，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后，就和朋友踢踢球，6点半天黑了就吃晚餐。天黑以后，林区野兽出没频繁，华人只能待在宿舍，避免野兽攻击。“无聊时可以上网，想不到吧，在林区还可以无线上网。”华人说。

   随着时代的进步，林区的物品供应也渐渐地丰富起来。有华人在这里开伙食店。小小的伙食店，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毛巾、床褥、煤油灯等应有尽有。雪柜里还有冰冻肉类、水饺、汤圆等。

       伙食店老板知道林区的员工多来自东南亚，就卖东南亚的罐头、干粮等食品。“马来西亚的美禄、炒面特别受欢迎。”老板说。每隔3天，他就把新鲜的蔬果、干粮送到林区去卖。

       华人一般不会在林区待很久，有些华人3个月或半年就回家一趟。他们说，他们的家不在圭亚那。

    尽管圭亚那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物资匮乏，物价奇高，但还是有华人留在这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治安不好，医疗设备不齐全，消费又高，生活很不方便。”华人希望退休后可以到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养老。“至少可以吃得到宵夜的地方。”华人要的其实不多。

       然而，留下来的华人也多了份圭亚那人对生活安闲的态度。

       乔治敦是个宽敞且悠闲的城市，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一排排的平房散布在随风摇曳的椰树间。宽敞的街道一览无遗，载货的马车与汽车并行，简单的4轮马车功能大，有的装载几根木头或水管，有的则载满了一笼笼小鸡。

       车夫戴着草帽随意地坐在货物上控制马匹，马儿一步一步地走，身旁的车辆一辆一辆地滑过，车上的人则一边悠闲地抽烟一边哼歌。红灯一亮，车夫悠悠地拉拉绳子，马儿渐渐放慢脚步停下来，不缓不急。“当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赶时间。”华人说。

       华人既来之则安之，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也渐渐敞开胸怀，学习享受人生。

当地人对物质也没什么奢求，工作效率慢吞吞，常常领了薪水就不去上班，“你和他们发脾气也没用。他们自有道理，说什么今天有钱不花，万一明天死了怎么办？”华人无可奈何，只能调整自己来适应他们。

       圭亚那人热爱生活，摇床是他们家里的“标志”，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两张摇床。下午时，把摇床悬挂在椰树之间，躺在摇床上，享受着徐徐的大西洋海风，看着椰树和芭蕉树在风中起舞，很是惬意。华人有样学样，也把摇床悬挂在屋外的柱子上。

     很多理由，让华人迟迟不想离开圭亚那。

       每个华人都说，圭亚那人情味特别浓。“老华侨都很乐意帮助新移民。新来的华人如果无依无靠，到各中餐馆，大家都会请你吃饭。”来自广东的黄埔源指出。甚至有些已经移民到欧美的老华侨，因为习惯了圭亚那的人情味，还特别折返回来。家人都在美国的周绍良说：“我去那么多地方，还是觉得圭亚那的人情味浓。虽然我已经拿到了美国居留权，但我还是比较喜欢留在这里，哪里都不想去。”

       华人还说，圭亚那森林多、河流多，不仅空气异常清新，就连蓝天白云看起来都比别处近，感觉自己靠近大自然，心情常常会感到特别的舒畅。“心情郁闷时，也可以租条小船到河上去兜风，让大风把烦恼吹走，很过瘾的。”经营中餐馆的萍姨说。

## 

   中华会馆是当地唯一华人社团。早在19世纪中期，圭亚那华人就组建了自己的社团，但没有注册。直到20世纪初，才正式注册成立了圭亚那中华会馆。

       早期的会馆为华人提供了大量的服务。老华侨说：“那时候，凡是无家可归的老人都可以免费住在会馆。没有华人流落街头。”

   只是，在80年代，圭亚那华人大规模地迁徙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后，会馆的会员人数逐日减少，会馆的凝聚力也渐渐转弱。大家走的走，留下来的华人也忙于打理自己的生意，会馆的事情，也就很少参与，有些新移民甚至不知道有中华会馆的存在。

       “会馆还是正常运作，只是犹如一盘散沙，大家都没时间帮忙处理华人事务。”中华会馆会长黄埔源很无奈地说。就连他自己，也常常周旋于自己的生意，对会馆的事情上难以兼顾。

       “会长的事情很繁杂，新移民一有状况就会找你，你可能要去法庭帮他们做翻译；中国大使馆有时候也会请你过去帮忙。”华人的事情，大部分都是黄埔源一个人在做，他相信如果有更多人热心参与，会馆可以发挥更大的功效。

       华人希望圭亚那能早日出现一个健全的华人社团，把背景不同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大家在这片土地上，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比起大多简陋的中餐馆，新隆酒家在圭亚那可谓赫赫有名。

       刚开始，老板车剑萍和丈夫肖广钊用了4000美元来创业。“1989年，我们到圭亚那旅游，发现这里没有好吃的食物。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发展餐饮业肯定有前景。”车剑萍和丈夫拖着两个行李箱就过来了。

       车剑萍是女中豪杰，肖广钊是细心老板，夫妻俩双剑合壁，在圭亚那闯天下。大家都以“萍姨、钊叔”来称呼他们。

       夫妻俩初到圭亚那时，人生地不熟，到超市买菜、订货、下订单、洗厨房等都自己做。“早期做餐饮业很辛苦，但是赚钱容易，只用了3个月时间，我们就已经赚回本了。”他们越做越开心，越做越有心得。

       “中餐馆的炒饭炒面份量大，口味好，此外，到中餐馆聚餐也是一种娱乐。”萍姨分析着华人餐馆兴隆的原因。

   1995年，她把赚来的好几万美元投资在新餐馆，还特地从美国订了4台冷气机，也开始聘请员工。因为不懂英语，她半开放厨房，在橱窗上挂着猪肉、鸡肉、鸡蛋、青菜等，让客人点菜。“他们只要指着那些食材，我就知道要怎么炒菜了。”

       没想到，透明厨房的创意，吸引了大批客人。“他们一方面觉得很新奇，另一方面也觉得卫生，看得见厨师在炒菜，大家吃得放心。”于是，店里客似云来，2000年萍姨的事业达到高峰。

       华人说，是圭亚那人就必定会到新隆酒家用餐。无论是商人要招待朋友、官员要请客、外资公司办聚餐、侨乡团聚吃饭等，都会想到新隆。“这里人来人往，可以认识很多人。”因此，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政府官员，萍姨钊叔和他们多少有点交情。

       可惜，因为一把火，一夜间，他们的餐馆化成一堆灰烬。

       那次的意外事故，让萍姨的心情跌到谷底。过后，她重新振作起来，决心要在圭亚那打造一个当地最大的中餐馆。她在中国订做餐桌餐椅桌布，还特别在中国大陆聘请了专业设计师和建筑工人来圭亚那为他们装修新店，共投资了350万美元。

       新的新隆酒家有3层楼高。3楼隔作厢房，有好几间包厢，也包括可容下30多人，结合开会与用餐的大会议室。2楼的露天餐厅，场地宽敞，客人可以迎着海风品尝佳肴。楼下的自助餐品种繁多，更是让人垂涎欲滴。

       圭亚那是多元种族聚居的国家。为了满足多个族群的需要，新隆酒家还提供印度餐、黑人餐、素食等。它就像一个小联合国，随处可见各种肤色的人种，无论是谁，都能在此享受到居家一样的温馨服务。

  玛格丽是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混血儿，她既过印度人的节日，也过中国的传统节庆，如中秋节与春节。每年华人的农历新年，她都在家里办聚会，并规定亲戚朋友须穿旗袍或唐装才能出席。

       圭亚那买不到华人传统服饰，他们就上网订购。“农历新年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订购了，有些人还特别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去购买唐装。”她说，“除了服装，还得购买一些红色的、喜气的小饰品来搭配。”

       “我的孩子取笑我，一个不会说中文的人，竟然坚持过华人节日。”玛格丽的用心，其实也感动了很多的华人。出席盛会的多是土生土长的混血华人。“他们不会说中文，但可以感受华人新年气氛。”玛格丽还会准备一些简单的表演节目娱乐大家。

       熟悉的中国曲风加上华人的热情表演，往往都能感染当地人，让他们也融入其中，与华人一起欢度新年。

       那一天，圭亚那华人会互给红包。玛格丽说，早期华人踏海而来，身上没多少钱，新年时，他们在红包里放着一大一小的鸳鸯八卦铜板代替零钱，表示祝福的意思。“如果每天都把红包携带身上的话，那就表示你一整年都有钱用。”玛格丽就随身携带丈夫给她的红包，希望好运天天来。

       玛格丽有个心愿，她花了十多年时间收集资料，访问老人家，记录整理了几近完整的圭亚那华人族谱，希望为自己的下一代留一些线索，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圭亚那华人不多，大部分更是与异族通婚了，有了族谱后，华人才不会误和自己的家人结为夫妻。”族谱很厚，其中一份副本被保存在圭亚那国家图书馆。

华人踏足圭亚那已近一百六十年。不喜欢这里的华人，早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留下来的华人，已经与当地人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留恋的是这里的悠闲生活和浓浓的人情味。

       华人在这片土地，留下了一路走来的汗水与泪水，以及脚踏实地、辛勤劳作的成果。他们也在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洒下了永不熄灭的民族之光，提醒新一代华人，不要忘却自己的根。

    法属圭亚那，本是不为人知的法国海外领地，随着1964年法国在这里建造航天中心，一支支火箭腾空而起，渐渐远近闻名。

       这里也曾经是法国的流放营。1973年，好莱坞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经典越狱电影《巴比笼》（Papillon），就是描写当地一个因沉冤入狱的囚犯为了自由而越狱的故事。百年来，岛上留下的种种传奇故事，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法属圭亚那森林密布，景色优美；加勒比海人用他们天生的率真，热情地拥抱着远道而来的华人。渐渐地，华人对这片土地产生了眷恋之情，留下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如今在法属圭亚那生活的华人，起初都来自英属圭亚那（即今圭亚那合作共和国）。1870年，有十名契约期满的华人，因为不愿意续约，又不想就此回国，于是便抱着拓荒的精神，带着本身仅有的积蓄，从乔治敦（Georgetown）跋山涉水步行至苏里南，再由苏里南的日计里（Nickerie）辗转抵达法属圭亚那。

       后来的华人都称他们为“十杰”。这十人大多数为广东客家人，初来乍到时，语言不通，在沟通方面也成问题。起初他们仅能以面包或杂粮充饥，并睡在公车站廊。后来，他们慢慢与当地人混熟了，开始跟随他们到海边捕鱼、到森林中伐木、到山上去狩猎，有些甚至还到荒岗掘金。

       任谁也没料到，华人竟能如此快速地融入当地社会。当地华人说：“那些老前辈们为了生活，有的仅仅花了3天的时间就能和当地人聊起来。”

       日子一久，“十杰”攒积了一点钱，便开始转而从事商业活动，这地方也自此有了华人杂货店、中餐店、面包坊和洗衣店等。老华人回忆道：“虽然那些店面非常简单粗陋，可是这对当时落后的法属圭亚那来说，已经算是创新的行业了。”而今，接下“十杰”棒子传薪的后代们，有些还留在此处，有些则已经移民到其他国家去了。

       到了1950年代，移居过来的华人日益增加，他们大多数是广东惠阳、宝安和东莞的客家人，并以“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的方式，逐步将家乡的眷属申请过来团聚。华人拎着两个皮箱乘船而来，一艘艘渡船承载着的都是他们满满的梦想。他们之中，有的是过埠新娘，有一些是年轻小伙子，更多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被迫离乡背井的中年人。

       1951年，法属圭亚那已经有60名华人，其中女性有6名。

       当时的华人非常团结，又相互关怀照应。“我们客家人是很好客的，一有新的华人移民过来，每家人都会轮流请他们吃饭，以表示欢迎。”法属圭亚那的华人每每提起50多年前家家户户轮流请客的情景，就好像饭局才刚刚结束一样，那热情的余温犹在。

       当时这里也来了一户以修理钟表为生的郭姓人家，他们是第一户居住在法属圭亚那的浙江青田人。

       70年代的法属圭亚那还没有完全开发，人口的增长率也非常缓慢，土地更是一片荒芜。一名华人妇女回忆道：“听别人说我老爸在这里开餐馆，我便想过来帮忙。哪里知道飞机落地之后，看见那简陋的机场，和没有路灯的黄泥路，四周都是黑人的影子，我的心就一直往下沉。”眼见这里比自己的国家还要落后，她真的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可是想转头离开也来不及了，唯有留下来努力挣钱。

       两手空空而至的华人，通常来到这里就会先替亲戚打工，让亲戚将他们的工钱存下来，几年过后再把积蓄拿来开店做生意。此处的华人，几乎皆是这样起家立业的。

       早期华人大部分经营伙食店，客家人称这种伙食店为“咸头店”，是属于家庭式的小店铺，专卖日常用品及食品等，只要手头上有2500至4000法郎的资金就可开张营业了。

       来自香港的何广富是首名经营“咸头店”的华人。1907年，他抵达法属圭亚那，听说这里有金子，就做起了“淘金梦”。哪知上山掘金比他想像的还要困难得多，只有少数的当地人才能忍受那种艰苦。于是，他只好转行，在圣罗兰（St. Laurent）开了一家伙食店，没料到居然会门庭若市，客人源源不绝。

       当地人的性情单纯友善，他们到“咸头店”买货时，若是身上没钱，就会用金块来换取日用品。华人说：“他们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就把金块放在柜台上，任由我们来估算。”

       当地人每次在店里买了饮料之后，就会坐在店外，三五成群地边喝边聊。如此一来，华人和当地人就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多一些和他们闲聊，学讲土话也学得比较快。”

       “咸头店”的面积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多为夫妻俩一起打理，工作时间长，而且相当辛苦。店里卖的多是柴米油盐、蒜头、酒、豆类、也卖些腌制食物如咸猪尾和腌牛肉等。“当地人很喜欢吃腌制的食品。小小的伙食店一星期就可卖掉25公斤的咸猪尾，利润非常可观。”老华人回忆说。

       每一家“咸头店”的前头都有一个柜台，客人把棍子握在手里，要买什么就指什么，老板再把货物拿给客人。老华人说：“当时的货品完全没有包装可言，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秤量。有的客人要半公斤的盐、有的要一公斤的油、有的要两公斤的面粉……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爬上爬下地拿货给客人，一天忙下来，把人累得够呛。”

       那时候的法属圭亚那基础设施落后，居民的生活既贫困也简单。他们经常到华人伙食店赊购食物，待发薪时再慢慢地付还欠款。当地人几乎都没有储蓄的习惯，为了生意着想，华人只好让他们赊账。他们说：“宁可大家做个朋友，让他们慢慢还钱，也总比他们到店里偷东西来得好。”

       客家人说，这也叫做生意，常做常有。

       虽然华人在法属圭亚那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收获丰厚。

       在80年代初期，浙江青田籍的华人才开始小规模地踏上这片土地，他们虽然来得比较迟，但是却发展得最快。而他们今日的成就，都得归功于郭胜华这一名令浙江人在当地站稳脚跟的核心人物。

     法属圭亚那目前共有华人6000人。其中广东客家人约有4000人；其次是浙江青田人，约有2000人，首府卡宴一直都是华人最密集的小城，罗兰这个与邻国苏里南一河之隔的小镇，也是华人的聚集地。至于太空城市库鲁（Kourou），也有约400名华人定居。

       在这片土地上，华人人数虽只占总人口的3%，但华人店铺却占了商铺总数的70%.可以说，华人对该地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随着时代改变，华人逐渐走出咸头店，进军各行各业。他们有的开旅馆，有的经营精品店，但更多的还是从事百货超市、餐馆、服装等行业。据估计，现有的华人店铺有600多家，其中有400多家集中在卡宴市。

       其中，备受欢迎的中餐馆成为继咸头店后，法属圭亚那华人引以为荣的另一行业。

       相较于其他南美各国，这里最大的中餐馆只能容纳百余人。华人说：“法国是万税之国，什么都要抽税，地方大一点就要多缴一点钱。”小小的中餐馆，装潢也简单，却能聚集多方客人。

       这里中餐馆受欢迎的程度让人惊讶。每家新开的餐馆必定门庭若市。百多年来，客家、粤菜让法属圭亚那的人们回味无穷。餐馆老板谈起成功原因时说：“主要也是因为价钱合理，一个人吃饭的话，估计十欧元就很够了，若点菜则大概就要15至20欧元。”相比之下，吃西餐若点一个主菜、一杯红酒再加甜点咖啡，至少也要花上30至40欧元。

位于卡宴市的喜宝茶楼，算是华人的主要饭堂。每天清晨，那里必定人潮汹涌。华人喜欢到那里吃点心，喝茶聊天。“每天最新的新闻、八卦是非、各路消息等，都可以在那里打听得到。”他们说：“别说华人，就连当地人也爱去那里吃午餐。若没预先订位，搞不好会等待很久。”

       当地人爱吃面包，喜欢把面包当早餐。于是华人就卖面包、批发面包。“早市的中餐馆要卖牛油面包、牛角包，超市也要卖法国面包，所以每天清晨5点多我就得去送面包了。”27岁的曾启文（Jean Tsang）说。他在这里土生土长，曾到巴黎留学，现继承父业，与弟弟一起经营面包坊生意。他说：“这地方小，面包生意竞争大，大家各凭创意，看谁能在这小小的圈子里赚得到钱。”

       法国政府在库鲁市建设太空城后，引进了许多欧美专业人员，爱吃面包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市场也就越来越大。来自上海的老谢，就在那时候看见商机，买了德意法兰西（Delifrance）的经营权，如今他每个早上就可卖掉200多条面包。

       面包房的烤炉温度很高，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即使高薪聘请华人，他们也不太愿意从事这份工作。于是大部分的店主只好聘请当地人。“但他们没有责任心，上班聊天喝咖啡，请假没有理由，心情不好就不来上班，让人头疼。”店主如是道。

       尽管对当地人有诸多不满，但私下里，华人还是认为他们个性单纯、热情，如果不是因为双方的雇佣关系，他们会成为华人很好的朋友。

据华人说，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是华人在法属圭亚那做生意的黄金时期。那时期姗姗来迟的浙江人，却正好赶上了好时机。他们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创造出自己的春天，在短短几年间就把法国与犹太人的百货商店挤向了边缘，让中国百货和服装称霸整个法属圭亚那的市场。

 他们经营的百货店遍布整个卡宴。在卡宴大街，甚至有条“青田街”，街上的华人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店外高挂着用汉字或汉语拼音译成的招牌，如DaDi、DaDu、东方、FaFaFa等。

       华人商店的门面有大有小，店铺内出售的货品多达千种，但店里没有什么装潢设计可言，几乎每家百货店都呈现一个模样，琳琅满目地摆满了“中国制造”的廉价电器、塑胶用品、门帘挂饰等——华人费尽心思地将有限的空间充分利用，到处都挂满、塞满了货品。

       当地人不像华人那样省吃俭用。“他们刚领了薪水，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把钱花光。我们哪能这么潇洒？”华人说。另外，当地人过节时，会大量购买礼物及添置新衣。特别是复活节、母亲节、圣诞节等节日，他们都会买礼物送人。华人从中发现了商机。

       可以说，这个市场需要什么，华人就会提供什么。遇上开学日，店外两旁挂满了书包、衣服鞋子，走廊边也摆着地摊，上面堆满了颜色鲜艳的文具、日用品等。有的华人还为客人提供制作名片、设计菜单、打字、婚礼拍照等服务。华人充分地把握了当地的每一个商机。

       虽说早期来的广东客家人已经够勤奋了，但后到的浙江新移民比他们更为拼搏。别人早上8点开门，新移民则清晨6点不到，肯定就会打开百货商店大门开始营业。别人晚上7点关门，他们则坚持到9点才打样。有人笑说，要和华人比勤劳，连下田耕种的牛都会认输。

       “初到的华人，个个都拼命工作。我们华人‘会走路哪有慢吞吞的’？只要大货柜一到，大家都是以赛跑的方式来搬货，22分钟内一定会搬完。”华人颇为自豪地回忆当初他们工作的情况。

法属圭亚那发展缓慢，然而，到来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不想再离开。原来，这里有比香港、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加拿大温哥华更吸引人的地方。

       当飞机徐徐降落在卡宴国际机场，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虽然南美的热带阳光火辣辣地照在身上，但透过百叶窗徐徐溜进来的清风，却让人感到有一丝丝凉意。走在身旁的当地黑人，会亲切地给你声声问候：“Bonjour”（你好）、“Ca Va Bien?”（你过得好吗？）面对着那份笑容那份真诚，即使再冷漠的心也会融化。

       遇见当地朋友，一句“我的孩子，来抱一下”，他们就会热情地把人拥进怀里。要不，就来个南美式的亲吻，脸颊碰脸颊，碰了右脸再碰左脸。南美人的热情，总在相见的第一刻，就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华人与当地人也因此结下了百多年的情感。

       “许多大城市的华人，赚到了钱，自我优越感就会很强，但是这里的华人不会。华人和我们的感情很好，他们没有架子。早期的客家人还和当地人通婚呢。”佐治曾是圣兰玛莉（Sinnamary）的市长，他说，法属圭亚那华人礼貌至上，即使法语说得不好，但见了人，不管认不认识都会先说一声“Bonjour”。

       在法属圭亚那，不管白天的天气有多热，到了晚上，一定是凉风习习。“这里空气很清新，深深吸上一大口气，你一定会爱上这片土地。”华人说。

       这里民风淳朴，生活简单，节奏也慢，工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当地人做事效率很低，想急也急不来，但好在大家都很遵守秩序。”经营礼品店的老板邹素怀（Nathalie Zou）似乎已经习惯了卡宴的慢步调，她说：“回到深圳，我发现那里的人步伐太快了，好像没有休息时间似的，感觉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

       虽然很多华人常说自己无法接受当地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然而，他们在这里生活久了，多多少少也受到一些感染。例如，华人喜欢吃的咸猪尾巴，就是一道典型的当地菜肴，用番茄酱、香料等煮成，口感酸酸的，足以增加食欲。此外，大部分的华人吃饭，也喜欢搭配葡萄酒，因此饭桌上总少不了一支酒精度在7至14度之间的葡萄酒，又称Table Wine（桌上酒）。饭后，华人也会喝杯咖啡或吃点甜点。

香浓醇厚的咖啡让华人体验了生活的悠闲与轻松。“不止咖啡，还有吊床！”华人补充说：“下午躺在吊床上，看着报纸，吹着凉风，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在这里，可以花钱的机会不多。法属圭亚那吃的、用的、穿的几乎都从国外进口，物价高而选择少，所以华人一般都到国外去购物。华人说：“很多时候你有钱也未必买到东西。”因此，这里没人在乎潮流这回事。

       他们也说：“这里四季如夏，一件衣服穿个十年，也不会有人笑你。”这里生活随性自在，穿着也不需要太拘束。“穿着短裤凉鞋就可以出门了，舒服又自在！”太过整齐，反而让人觉得受约束。

       看来，华人似乎很享受这里的南美法式生活。

以前，法属圭亚那人只说法语或者当地的土话，现在英语也能用得上了。接受法国教育的华人新生代，一般至少都能说上5种语言——粤语、华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日语等。华人说：“孩子懂多种语言，对他们的前景会好一些。”

       华人重视孩子的学习，也欣赏法国的教育制度。“这里重视通识、外语教育，除了教给学生书本知识外，也努力拓宽孩子的视野，增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尽管法式教育在孩子群中深受欢迎，家长也乐意看到孩子们学习法语和英语，然而，在他们的心里深处，还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懂中文。因此，近年到中文学校学习的小孩越来越多。

       法属圭亚那的中文学校就设在华侨公所（Association Fa Kiao Kon So）里。学校课程以前受台湾影响较大，后来则由中国大陆机构资助，由北京方面的侨务机构和中国驻苏里南大使馆负责为学校提供教材。学校从早前的两个班级，增加到现在的5个班级，学生估计共有250人。学费是每人150欧元；除了春节与圣诞节放假外，学校每个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都要上课。

       “我们的师资充裕，都是有经验的中文老师，他们有的在国内还当过校长。”冼慧贤校长说。她希望孩子学好中文之余，也能明白华人传统道德。“小孩除了功课好，了解中华文化传统也是必要的。”

       中文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令华人感到欣慰，但遗憾的是，中文媒体仍是一片空白。

       冼校长曾试过开办华人电台，好不容易向政府电台争取了一个小时中文广播时间，但华人听众甚少，最后只能黯然收场。她也办过中文报纸，但是找不到有热诚或有志投身此行业的工作人员，华人社会对报纸的发行也反应冷淡，所以在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就关门大吉。

       有华人分析中文媒体失败的原因说：“这地方小，华人居住集中且彼此认识，消息在华人圈里传播得特别快，信息一点都不闭塞，也就很少有人去关注华文媒体了。”另外，这里上网方便，更有华商代理了欧洲版的《星岛日报》、《欧洲时报》等内容更丰富多彩的中文报，当日的报纸当天就能在大街小巷的任何一家超市中买到。

 老华人说，早期的华人少，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当地人在我们店外喝酒，大家认识了，周末就到俱乐部跳舞狂欢，华人的舞艺高超，连当地人也自叹不如。”已经80多岁的何子良陶醉在年轻时代的美好回忆中。

       渐渐地华人越来越多，大家需要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共同认可的组织，华侨公所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时候法属圭亚那贫穷落后，华人不过200人。但大家都同心协力，竭尽所能地凑钱修建大楼。年长的华人回忆道：“大家省吃俭用，一些打工仔更是把数个月的工资都拿出来。”为了公所，华人想尽办法筹措资金。当时苏里南的华人发展比这里先进，华人数量也比较多，于是法属圭亚那的华人还专程到帕拉马里博找当地华人帮忙捐款。或许因为苏里南华人几乎都是客家人的缘故，慷慨解囊的也特别多。

* *早期法属圭亚那的华人，大部分都姓何。由于姓何的华人不能与同姓结婚，因此很多人都出嫁到苏里南，或到那里娶亲。*

       经过一番努力，法属圭亚那华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华侨公所大楼，建筑面积达数千平方尺。这座凝聚着无数华人心血的公所，是法属圭亚那华人的共同产业，因此卡宴市的每一家华人店铺都是华侨公所的会员。

       后来，华人越来越多，圣罗兰同乡会、广东同乡会、江浙沪同乡会也相继成立。然而，华侨公所仍是当地华人社会的核心组织。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江浙沪同乡会，不少会员也加入了华侨公所。华社的团结，让法属圭亚那华人的整体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妇女会的诞生，更为公所锦上添花。它虽是公所的附属组织，但女将们协助公所打理会务，可说是细心周到。隶属于公所的中文学校在她们的管理下，学生的中文水平日渐提高。

       华人尽心尽力地为社团付出，努力在这片土地上编织绚丽美梦的同时，也散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郭胜华的爷爷是第一个来到法属圭亚那的浙江人。郭胜华出生在青田县农村，1976年他来到法属圭亚那，是这里的第八个浙江人。

       那时他早晨在父亲的钟表店工作，晚上就骑着自行车踏遍卡宴的大街小巷，考察这个市场还能有些什么发展。他发现，当时由法国人或犹太人经营的百货超市，货源大多从欧美国家进口，所以价格昂贵。在充分调查后，他动起了经营中国百货公司的念头。

       “那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华人多经营伙食店，百货业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他说。1977年，他开始进口中国百货，从代销开始，逐渐过渡到批发贸易，生意越做越兴旺。

       1981年，他在法属圭亚那开设了第一家专营中国商品的“友谊百货商场”。他在店里示范使用高压锅烹煮中国菜，吸引无数当地人困观。“我记得营业第一天，店内就人头汹涌，大家都排队来买货。”这时期中国货大受欢迎，商品往往供不应求。

       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商品迅速占领了整个法属圭亚那的百货市场。“以前卖的电饭锅一个要接近100欧元（约五六百法郎），价钱贵得让人吃不消。现在只要15至20欧元就可以买到。”郭胜华骄傲地说。

       3年后，他陆续把家乡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带出来，还特别聘请法语老师来给他们上课。“唯有克服语言障碍，才能创造出自己的事业。”他从过来人的经验出发，为后到的人设想周全。

       此外，郭胜华也为他们安排工作，或借钱给他们创业成家。几乎每一个浙江人都曾得到他的帮助。“我们过来的时候，身上没带一分钱，他就是我们的老板。没有他，我们也不会来。”说起郭胜华，新移民都满怀尊敬与感恩之情。

       郭胜华是新移民心中的领袖。不管谁遇上什么问题，一定都会找他。就连婚丧嫁娶，也会请他来主持大局，或作见证。在他们每个人心中，郭胜华犹如他们的大家长。

       “相较早期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法属圭亚那的新移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郭胜华，省下了漫长和艰辛的创业路程。”这里的老华人说：“几乎每个新移民都听他的。”

       郭胜华也扮演了桥梁角色，不管是新移民还是老华人，他都吃得开。身为江浙沪同乡会会长兼华侨公所副主席的他，左手牵着新移民，右手领着广东老华人，一同踏着和谐安乐的步伐，一步一脚印地构建法属圭亚那华人的大家庭。

法属圭亚那华人与邻国苏里南华人来往密切，基于大家都是客家人，所以感觉就像亲戚一样。苏里南的广义堂和法属圭亚那华侨公所每年都会以运动会友，两国华人轮流举办运动会，比赛项目只设篮球、乒乓球和足球。只要赢了两种球赛，就是年度冠军，但还需得连续3年蝉联冠军，才可以把奖杯带回去。

       每一年两国华人都会相聚一起，除了打球，还有说不完的话题以及吃不完的饭局。华人在一起会相互取经，例如广义堂中文学校第一次办夏令营，就曾虚心地请教华侨公所的负责人。每一年，广义堂中文学校也会替法属圭亚那中文学校向中国驻苏里南大使馆申请中文教材。它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亲密。

       2008年，轮到法属圭亚那主办运动会，苏里南五六十名华人浩浩荡荡前往赛场。队伍中有老有少，有运动员，也有专程赶来加油打气的家长。两队参赛的几乎都是“泥鸭“——客家人把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喻为”泥鸭“，即不会游泳的鸭子，意指他们对中华文化已很陌生。

       运动会作为两国华人加强沟通的桥梁，扩大了华人特别是新移民和新生代的交际圈子，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结识不同的人，同时把苏里南与法属圭亚那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片土地或许并不富裕，甚至有点破落，然而对于许多华人来说，这里却富有人情味。

       迎着卡宴的海风，伴着热带雨林的景色，法属圭亚那华人生活悠闲而安逸。他们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多少融入了些法国特色。华人笑言，喝红酒、咖啡，已经成为日常习惯。

       法属圭亚那华人辛勤工作，所得到的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初来乍到的华人，或许还有想走的念头，但是，留下来的老华人，早已把这里当成家了。

苏里南旧称荷属圭亚那，是荷兰王国在南美洲的殖民遗迹，1954年成为荷兰海外自治省，1975年独立。

       有“森林之国”美称的苏里南，国土面积的95%为森林所覆盖，空气异常清新。这是个美丽的国度，境内河流纵横，土壤肥沃，只是懂得弯腰捡枝耕耘沃土的人不多。因为历史渊源，这里还有“小联合国”之称，黄、白、黑、棕，各色皮肤应有尽有。漫步在首都帕拉马里博街头，映入眼帘的是欧洲式、印度式、非洲式等各种风格的建筑，宛如置身于国际建筑博览会。

       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各种机缘巧合留了下来，没有疙瘩，没有仇恨，大家和乐融融地相处。多年来，这些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族群通婚率极高。混血后裔代代相传，使苏里南的多种族色彩更显浓厚。

       苏里南人一般都能说上几种语言，因此这里也被公认为语言天堂。

       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人到苏里南。他们说，这片土地得天独厚，易于谋生，连种菜都可以发达，于是，后期抵步的华人绝大部分都留了下来。

早期的苏里南华人大多是来自中国广东省的惠阳、东莞、宝安一带的客家人。那时期，客家话是华人较主要的沟通语言。

       1853年，第一批抵达苏里南的华人共有14人。他们都来自印尼，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在苏里南的农庄、甘蔗园工作，其中3人在合约期间去世。契约期满之后，共有8人返回爪哇，其余3人则自愿留下，被聘为下一批500多名华工的翻译员。

       从1858年到1874年，有2500多名来自印尼、澳门、香港等地的契约劳工抵达苏里南。华人踏海而来，乘风破浪数个月，经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吃尽各种苦头才抵达苏里南。翻开老华人悲惨的回忆录：“那时船上完全没有任何医药设备，旅途上一旦有人染病死了，就像死猪一样被残忍地丢进海中，葬身鱼腹，华人的性命犹如蟑螂一般低贱。1864年，一艘载了475名华人的船只上，就有197人因死于疾病而被丢进大海。”

       历经九死一生，这些华人的双脚终于踏上了苏里南的土地，但是创巨痛深的经历，让他们感觉双脚犹如踩在甲板上，四面仍是汹涌的浪涛。

       对于在海上飘荡的际遇，老华人始终不堪回首。“那是切肤之痛，现代人是不会明白的。现在搭乘飞机从东南亚一带来这里，只需要27个小时。以前坐船，至少要3个月才能到达苏里南。”年事已高的苏里南老华人这么说。

       苏里南地处热带，登革热（热带传染病）流行，华工生活条件极度恶劣，雇主苛虐华工如同对待奴隶一般。华人好不容易才抵达苏里南，又因为被欺压虐待及水土不服等问题，而丧失了性命。苏里南契约华工的情形甚至引起欧美舆论的谴责。之后，中国政府也颁布禁令，不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境内招募华工，只允许华人以移民的身份自由出入。此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华人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进入苏里南。

       华工对被欺压的经历心有余悸，所以契约期满后全都不愿意续约。因此，大家渐渐地从种植园里走出来，有些华人选择了回国，有些则决定留下来。

       “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艰苦，华人都只能够靠廉价的劳力糊口，衣锦还乡这回事，连做梦都不敢想。”老华侨这么说。

       留下的华人有了积蓄，就开始经营起小本生意来。苏里南的老华侨基本上都是靠伙食店起家的，客家人称之为“咸头店”。伙食店售卖咸牛肉、火柴及煤油等用品，赚取蝇头小利。

       一般由夫妻俩所经营的伙食店，就只有两个人打理整间店铺的大小事务，从早忙到晚，生活的担子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

       苏里南华人辛苦耕耘，颇见成效，由华人所经营的店铺，不久之后已遍布城郊的每一个角落。

有了扎实的经济基础之后，华人开始将亲朋戚友们一个个接过来。

       苏里南流传着一句话：“来了一个华人，就多了一家店。”华人认为，只有做生意，才能够有出头天，因此，即使当初只是来打工的华人，两三年内也必定会自立门户，自己开店当老板。

       苏里南这片土地得天独厚，风调雨顺，很少发生天然灾害。随便丢下一颗种子，都能在这片绿油油的沃土上长出丰硕的蔬菜水果。“只要够勤俭，做生意就一定能赚到钱。虽然称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肯定不愁吃穿。”老华侨说，在这里的竞争并不激烈，华人做生意，极少会蒙受亏损。

       大家都说：“这里赚钱容易，治安也很好。”华人的前景，必定是无限美好的。

       就这样，华人的经济发展日益蓬勃。街上的华人店铺逐渐增多，有金店、洋货店、钟表店、摄影店、鞋店等等。旧式的伙食店则被较具规模的百货店、超级市场所取代。

       中餐馆赚钱快速，利润又高，所以华人都乐意经营，因此也越开越多，生意极好。

 苏里南现有4万多名华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然而，他们在经济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近十年是苏里南华人的全盛时期，浙江和福建人风闻这里赚钱容易，也纷至沓来。廉价的百货店、超市和服装精品店开了一家又一家，大街小巷的中文招牌随处可见，华人商店无处不在，约占了全国商店总数的70%以上。

       最热闹的帕拉马里博是大部分华人的聚集地，而少数华人则散居在郊区，如日计里（Nickerie）、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等地。

       客家人来得最早，他们多半生活稳定，事业有成。他们的行业包括：金饰、五金、批发、汽车维修、汽车零件、建筑、餐饮等。

       华人人数多了，华人社会也日趋成熟。在这里，华人社团林立；中文学校建在首都市中心，各种设施比公立学校还要好；中文报、中文电视台都应运而生。

 华人多从商，生意越做越大，成功的因素很多，通过“月会”筹资，就是其中之一。

       当地华人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几个好朋友想要做生意，大家就互筹资金，把一定数额的钱集合在一起，每个月每人轮流领一次，以备急用。”这就是“月会”的起源。它像小型投资，也像分期供房子一样，如果每人每月要交1000元，那十个人就有一万元，十个月内，大家轮流领钱。“不等钱用的，最后会得到比较多的利息。”因此，华人不必向银行贷款，不借高利贷，个个可当老板。

       “月会”最讲求信用。由于曾经有人领到钱后就远走高飞。为杜绝后患，因此华团后来索性当起号召人，通过“月会”制度解决华人财政问题。广义堂是苏里南最有名望的华人团体之一，它每次从“月会”中抽取会首金，作为堂内重要的经济来源。

       “月会”虽是华人民间的一种筹措资金方式，但所有的缴钱手续、审核一点都不马虎。为了预防有人拿钱潜逃，会员至少要有5个值得信赖的担保人。“万一有人拿了钱逃走，至少还有担保人要负责，其他人也不至于亏了血汗钱，这对大家都公平。”

       苏里南华人的“月会”办得非常成功，有些华人甚至一个月供好几份“月会”作为短暂投资。华人拿这笔钱去创业，或解决家庭经济危机，也有人用来扩展生意，或者让小孩到国外留学等。华人不愁资金运转，因此当上老板的特别多，单单在帕拉马里博就有5000多家华人店铺。

由于苏里南生活日用品十分匮乏，许多华人新移民便从中国浙江义乌等地办货。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廉价货品，如小型家电、服装、化妆品等，迅速充斥了苏里南的百货市场。

       这些货柜一到苏里南，华人就在当地报纸或中文报刊上登广告，招聘当地的经销人员。华人说，早前市场走俏时，成本20万人民币的货柜，估计可净赚50万人民币左右。

       华人卖的货品价廉物美，就连当地擅长经营生意的印度人都不是华人的对手。原先由印度人垄断的小超市，渐渐被华人取代。华人超市的数量成倍增加，十家有九家是华人经营。虽然也有一些印度人直接到中国批货，但华人懂门路，所以卖的东西还是最便宜。

    天还未亮，华人就起床开门营业；下午4点半大家关门下班，华人店铺都坚持晚上十点才打烊，即使是公共假日、农历新年，他们店铺也照开不误。华人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让印度人自叹不如。

       华人商家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但他们脸上却都挂着亲切的笑容。“我们属良性竞争，不会随意调低货品价格，也不刻意薄利多销，因为大家心里明白，那是个恶性循环。”浙江同乡会会长郑国庆说。苏里南华人以和为贵，绝不为了一己之利而搞砸整个市场。

       小小的百货店铺，应有尽有，华人什么都卖，包括衣服、鞋子、参考书、纪念品、化妆品、电器、饮料、零食、柴米油盐醋等。店里内堆满了各样货物，而值钱的小玩意就摆在透明的橱柜里。天花板上还有勾子，挂满各种款式的包包、帽子和玩具等，琳琅满目。

 当地人喜欢购物。苏里南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存钱。“他们好像和钱有仇，手上一有钱就迫不及待地花掉，特别是在圣诞节与元旦，他们都喜欢到百货店来买礼物。因此年底一到，华人的生意总是特别好。”

       华人赚了钱，大部分都会买地皮盖房子。刚开始，大部分华人都租房子来做生意，一楼经商，二楼住人。一些华人会扩展业务，甚至干脆把百货店扩充成贸易公司，从零售转到批发业。

       在首都郊区的飞龙摩托综合商城（Filong Trading Center N.V.）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里占地6000平方公尺，是苏里南最大的华人店铺。原本只卖摩托车的老板郑国庆，在赚钱后便把店面扩充，卖起脚踏车、婴儿手推车、电器、吊灯雕饰等，零售兼批发。飞龙生意不错，曾经在一年内卖掉6000台摩托车，老板的秘诀就是增加售后服务项目。苏里南有60多家摩托车行，只有飞龙提供售后服务。

老板郑国庆在商城一侧盖了自己的房子，与妻小一同居住。他说：“这里地方大，人口不多，只要一切符合政府规定，华人可自由地在自家土地上盖房子做生意。”

       近年来，苏里南基础建设热火朝天，房子、商场与大楼越建越多。华人看准房地产热，从中国运来大量建筑材料。许多原本开中餐馆、金饰店的华人也纷纷转行经营五金店，有些则经营贸易公司，专门批发建筑材料，或者开设建筑公司，直接承包建筑工程。

       华人盖房子讲求效率，收费便宜。不管日晒雨淋，工作有多辛苦，从不抱怨。因此，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都喜欢找华人承包工程，让华人替他们盖房子和维修大厦。

       苏里南最大的良友商场（Maretraite Mall）就是华人建的。它有两层楼，算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大型购物商场，而规模较大的中餐馆龙凤酒楼就设在二楼。龙凤酒楼可容纳2000多人，华人一般都会选择在此宴客聚餐。

       首都唯一的汉堡王快餐店（Burger King）也是由华人承建。从建设到开张，不用40天就搞定了。“这里的娱乐活动其实不多，只能寄情于工作，快速地把工作做完，才能有更多的工作，多赚一点钱。“一名华人边喝冰汽水边说。

       苏里南中餐馆林立，每条大街几乎都有吃饭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中餐馆的菜色也变得多样化。从单一的广东菜、客家菜，慢慢增加了四川菜、北京菜、上海菜等，华人的选择渐渐丰富。

       中餐馆宽敞又干净，各有特色，菜色口味不一，老板的经营手法也大不相同。有的华人会把源自印尼的马来餐编进食谱里，华人炒马来菜，口感特别，当地人也爱吃。早在荷兰殖民时期，一些华人与印尼人从爪哇远渡而来，他们的食物与文化也成为苏里南的特色之一。

       当地茶楼每到星期天的清晨，便人满之患。在茶楼，华人喝茶吃点心，顺便见见朋友，聊聊天、谈谈新闻。话题聊开了，屁股就粘在板凳上起不来。直至上午11点，茶楼一直座无虚席，人声鼎沸。

 很久以前，有人在苏里南山区发现了金矿。华人听说在这里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大大的天然金块，于是千里迢迢赶来，想要分一杯羹。

       事实上，上山淘金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如果不慎被山中巨大的毒蚊叮咬，很容易丧命。一般上，当地人都是固定一两个月在山里工作，然后再把黄金拿到市中心去卖。华人没有挖金经验，一些人遇上危险而丢了性命。后来，华人不再挖金，开始经营起金饰生意，有些则拜师学艺，学习分辨金饰真伪，研炼金饰等。

       苏里南华人的金饰店多集中在首都市中心的马登大街（Maagdenstraat），华人把这条街称作“唐人街“。整条街上几乎都是华人店铺，包括鞋店、服装店、家具店、贸易公司等，但还是以金饰店居多。

       这个国家产黄金，人民对金饰也情有独钟。“当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习惯把金饰往身上挂，他们一天不穿金戴银，就全身不自在似的。”金饰店老板钟晓舒还有过一大早就被地人电话吵醒，催他开门营业的经历。

       华人说：“苏里南的天然金块非常独特，自然形成各种抽象造型，只需稍微加工就可以做成项坠、耳环等，当地人叫PP金。周边的委内瑞拉人、圭亚那人会定期到苏里南收购，然后作为天然艺术品，卖到美国和欧洲去。”每逢旅游旺季，华人金饰店特别忙。由于苏里南的金饰便宜，所以很多游客或者回家探亲的华人都会买金首饰送人。

       苏里南金饰店不赶时髦，一种款式过了十几年仍然流行。当地人对旧款的手链、戒指情有独钟，那些刻着传统图案的金戒指售卖了40多年，至今还有人问津。如今，华人金饰店追求时尚设计的同时，也保留了传统设计，以迎合不同顾客的需求。

       苏里南一度抢劫猖獗，华人金饰店几乎都有警卫坐镇。打开大门，一整排透明的橱窗陈列着各种款式的金饰。展示柜外隔着栅栏，栅栏与展示柜之间有十公分的空隙，方便客人看首饰，作交易。为了店面美观，一些华人也把监狱式的栅栏改成大片玻璃，用玻璃隔开客人与店家的距离。凡此种种，华人不过希望把意外的发生几率减到最低。

     在苏里南，客家人几乎占了华人总数的一半。俗话说：“客家好客，好客之家”，苏里南华人确实热情好客，又富有人情味。

       苏里南华人都是通过亲戚关系到来的。华人见华人，分外亲热，再听到熟悉的客家话，心里就认定对方是自家人。华人与人相遇，必定会主动问好，即使在路上看见陌生长辈，也会用客家话问安：“好没？”客家人注重礼仪，筵席上看见长辈，也一定主动过去打招呼。

       华人如此亲切又热情，一声招呼，一句问候，一个点头微笑，双手紧握，不管认识与否，一见面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轻易地化解了人与人之间初相识的拘束。在这里，想到华人家串门子，都不需要预约，主人家随时打开大门欢迎，还会用最好的茶水招待客人。

       “我们客家人见人第一句话，就是问别人吃饱了没。没吃饱，就带你去喝茶吃饭，吃饭比见皇帝还要重要。”《洵南日报》社长兼苏里南中文电视台副台长陈舜军笑说。

       中华会馆会长张秋源指出，大家初来乍到，寄人篱下，如果不团结不相爱，就很容易遭欺负。他觉得，苏里南的华人特别团结。“一个华人有事，大家都会挺身帮忙。有时候出国旅行，我也会因为挂念着这里的人情味而提早回来。”

       这里地方小，华人彼此认识，下班或下课后，都会相约到白莲花俱乐部踢足球、打篮球或打兵乓球，流一身汗，顺便舒展筋骨。它是早期华人社团广义堂隶属的机构，也是华人平日的好去处。

       周末或假日，许多华人也爱在白莲花俱乐部打发时间。年轻男女活跃在各个竞技场上，小朋友们则在游泳池里嬉戏，或在娱乐场上荡秋千、玩捉迷藏。妈妈们坐在休息椅上，一边看顾自家孩子，一边与朋友畅叙家常；老人家则与朋友较量棋艺。

       在苏里南赌博是合法的，赌场开了一家又一家。小小的市中心，就有超过十家赌场。赌场提供啤酒等免费饮料，有人说，就算不赌钱，来赌场也可以喝到饱。

       农历新年，赌场送餐券、礼券，吸引更多华人前来捧场。“华人是赌场的财神爷，新年一到，赌场免费招待吃喝，里里外外都是人。”华人大多图个热闹，至今未有人因赌博而家破人亡。

       华人其他的休闲活动，还包括打猎、钓鱼、唱卡拉OK等。

    苏里南有数十个华人社团，其中广义堂、中华会馆以及华侨商会的历史最悠久。

       华人社团凝聚了华人力量，解决华人问题，政府也透过侨团传上情下达。若华人与当地人发生纠纷，或者华人发生了重大事件，政府一般都会找侨领协商解决。

       苏里南华人社团的活动，常吸引整个华社参与。广义堂堂长池玉基说：“新一辈的侨领思想新颖，办起事情来也比较灵活有系统，他们办的活动庆典，往往吸引了大批华人参与，活跃了整个华社气氛。”每年的中秋节活动就是一例，参加人数就超过3000人。

       华人一有事情，就会找社团帮忙，特别是广义堂。广义堂俨如华人大家庭的家长，为华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由于成立较早，人面广，办起事情也更方便。新移民受伤住院，或出入法院、移民厅、警局，都找广义堂的老华侨帮忙翻译和疏通。

华人说，在苏里南，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环。“在这个国家生活一定要认识人。比方说，华人生病住院，如果认识当地医生或护士，就能得到妥善照料，否则就像弃婴一样，搁在病房外，好几天没人理。这是苏里南的‘文化’，大家都靠人际关系办事，我们也只能有样学样。”华人无奈地说。

       隶属广义堂的苏里南中文学校，是当地唯一的中文学校。它成立于1986年，拥有自己的校舍，占地超过2000平方公尺。学校里有图书馆、室内篮球场、舞蹈室和教师宿舍，基本设施比公立学校还要完善。

       华人说：“中文学校的教室有冷气，窗口、铁架都完好无缺。但公立学校连电风扇也没有，窗口也是铁丝网构成，太阳晒起来的话，会要人命。”中文学校的主要开支由广义堂负责，其他的华人团体也会赞助。

初创时，这里只有两个班级，50个学生。“20年后，学生已有280人，老师8人。这里提供完整的6年制中文教育，学生每星期上课两次，每次上两堂课。”校长林少波说。

       苏里南华人有个共识，即把小孩送到中文学校。每个周末，家长会自动送孩子上学，除学习中文之外，也让他们参加学校活动。

       广义堂的《洵南日报》是华人自创的第一份报纸，从采访、编辑、排版到印刷，都由华人一手包办，每天印刷1100份。《中华日报》则是由中华会馆出版，对华社的影响也大。

       中文报是华人的精神粮食，特别是对不懂荷兰文的华人来说，它似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将每日的新闻娓娓道来。

《洵南日报》是苏里南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黑白印刷，每日发行1100份。

   2008年2月，苏里南中文电视台正式开播。“要在这个落后的国家创建自己的电视台，预算很高，估计需要400万美元。光是安装一个电视发射塔，就要150万美元的安装费。广义堂投资了70万美元，每个月还要支付员工薪水，其余的数额只能向银行贷款了。”台长张志和说。

       免收费的中文电视台是华人的骄傲，它代表着华人的呼声，也显示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身份和地位。社团若有任何节目或讯息公告，它就是最好的广告栏，只要在苏里南境内都能收看得到。

       “电视台会播放很多港台的连续剧，我们试着和香港的无线电视台联络，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播放版权。然而，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传了无数次电邮，对方都不理我们。”华人努力和“外界”联系，却不得要领。

       然而，他们并不因此打退堂鼓，反而积极通过多种管道，尽量满足华人观众的需求。“2008年中国奥运开幕典礼的DVD一推出，我们就迫不及待在电视台上播放，让全苏里南的人都可以收看。”一名电视台工作人员兴奋地说。

 这里很难找到大众传播的人才。“这个国家小，专业人才不易找。翻开华人的履历表，都和大众传播没有关系，而之前的主播也毫无上镜经验。全靠一位来自帕拉马里博的老师，以本身在中国当过主播的经验，给予一些技术指导。”台长张志和淡然地说，电视台也请了两个新人负责摄影，广义堂出资送他们到国营电视台学习操作录制器材。

       电视台的目标虽然很远大，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起事情来还需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目前，他们与中文报纸合作，自行录制每天傍晚6点和晚间9点的新闻。晚间9点新闻一般会先预录，后再播放，以减低播报错误的几率。

       平时，中文电视台会播放一些英语或荷语卡通片，让小朋友观看。为了迎合不同观众的口味，电视台也会播放粤语与华语的港台连续剧和综艺节目。晚上没人值班，就直接转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苏里南华人勤奋工作，店铺越开越多、越开越大，在商场上游刃有余。但若只有经济上的成功，而无法在政治上立足，华人的诸多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更不可能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华人也开始参政。

       杨进华是苏里南第四代华人，也是目前唯一的纯华人血统部长。

       杨进华的曾祖父17岁来到苏里南。“为了生活，我爷爷什么行业都试做过。”杨家是客家人，特别注重下一代的教育。“那时候，爷爷赚到了钱，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我父亲就曾在美国纽约念新闻系。”

       17岁那年，杨进华到加拿大多伦多念书。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之后回到苏里南接管父亲的生意，曾从事过汽车销售、报业、旅游、贸易等方面的工作。

       后来，他弃商从政，阔步踏入政坛，为的就是希望苏里南华社更加壮大。“毕竟我在这里长大，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这里就是我的家。”

       2002至2004年间，他担任苏里南贸易部长。“在政府部门打工，薪资不高，华人忙于生意，很多人都不愿意参政。我要代表华人发出声音。”他把印尼排华事件当作借镜，认为华人不能只在经济上独当一面，还要懂得参与政治。“华人应该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习俗与经济背景，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

       他是个很好的“外交官”，精通多国语言，如荷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也懂一点巴西土语，就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没他厉害，唯独中文无法掌握。他说：“没办法，我爸爸连方块字都看不懂，全家说英语。”身为一个不会说中文的华人，他深觉惋惜，所以特地到台湾辅仁大学报读两个月的中文课程，但他的中文程度还是不足以用来沟通。

       1980年代，苏里南政局动荡，大批华人往外迁移，让当地经济受到重创。为了挽回华人对苏里南的信心，杨进华曾积极推动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当上部长后，他甚至到访中国与当地官员交流。

       “要振兴苏里南的经济，就必须招揽更多生意人过来投资，而中国人就是最佳选择。”令他欣慰的是，经他一宣传，短短几年间，苏里南就来了几千名华人。

       2005年，杨进华转任环境规划与土地森林政策部长。他在政治上站稳阵脚，华人也受益良多。“苏里南是个多元种族国家，主要由印度人、黑人和印尼人执政，在福利争取上，他们都会帮自己人。华人若不帮华人，就不会受到尊重，也就没人理你了。”对于华人的事，他往往多留一分心。

       杨进华与华人社团关系良好。很多华人虽然对政治不热衷，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华人只占总人口的10%，但一经凝聚就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杨进华扮演桥梁的角色，一方面把华人的声音反映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意见转达予华人社团，协调着彼此的关系。

       因此，华人参政，不管对苏里南，还是对华人群体来说，是双赢的。

华人笑看人生，在乎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他们之间的和谐相处。虽然苏里南华人只有区区四万人，但他们却异常活跃，生活充实忙碌，每天仿佛有忙不完的事情，包括工作、家庭、社团等。他们倾力传承文化、推广教育，事业有成的新生代，都尽力回馈社会。

       苏里南华人努力耕耘，享受人生，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华人要的不多，天堂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巴西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这片土地原是印第安人的家园，直到16世纪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才掀开了它被殖民统治的序幕。葡萄牙国王后来开放门户，允许外国人移民，为巴西日后成为世界移民大国奠下了基础。如今，这个南美洲人口最多、最富有的国家，集合了200多个民族，流通100多种语言，但彼此之间相处融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年均增长10.1%，创造了“巴西奇迹”，全国欣欣向荣。此后20年间，因受区域和内部因素影响，经济波动不断，近年才逐步恢复元气。如今，巴西咖啡、足球和桑巴舞闻名于世，不过，严重的贫富悬殊现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治安状况令人担忧。

       自200年前第一批带着茶苗来试种茶树的华工开始，巴西华人就一直与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华人移民故事大抵滥觞于1810年。

       当时，统治巴西的葡萄牙帝国试图拓展种植茶业，于是派人到中国的广东及澳门一带招募了400名华工前来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简称里约）。茶叶试种的计划虽然成功，但是很多华工却因过度操劳，及无法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而客死异乡。

       后来，又来了两批为数600人的契约华工，负责到农场种植茶叶、甘蔗和咖啡。他们每日工作9小时，月薪仅得4至5美元，每周可领取十磅米或面粉，3磅半牛肉、咸鱼或猪肉，一磅糖以及3盎司茶，此外，每年还有棉布上衣两件、长裤两条、毛毯一条；同时，雇主也必须负责他们的医药费。总体而言，巴西华工的待遇比其他国家的契约华工稍好。

       20世纪初，巴西的种植园发展日益蓬勃，劳工短缺的问题却依然严重，于是便计划从中国引入100万名华工。当时，中国政府并不鼓励人民移居海外，因而拒绝了这项建议。后来，巴西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配合，输入了20万日本劳工，当年的日本劳工，今天已发展为100多万人的巴西日裔群体。

       一战结束后，一部分欧洲华人离开了荷兰、法国等地，辗转抵达巴西，导致当地华人的人数增加到1000人。他们大多数经营酒吧、洗衣店、餐馆、有的则当裁缝、或贩卖手提包和小礼品等。当时，洗衣业也几乎由华人垄断，在东北部的许多城市，人们甚至称洗衣店为“中国”。

* *在里约热内卢蒂如卡国家公园内有一座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凉亭，据说是葡王若奥六世（D. João VI）时期所建，以表彰华人茶农的贡献。*

       华人大批地移居巴西是二战以后的事。自1950年代开始，广东人便陆续抵达巴西。接着，香港的浙江籍企业家和退伍军人，以及台湾的企业家也相继入境。他们的到来，正赶上了巴西1960及70年代的经济巅峰期。港台企业家带来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管理技术，给巴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70年代末，印度支那发生了排华事件，迫使“船民”投奔怒海，部分印支难民为巴西政府收容，他们大多加入行商行列，靠售卖角仔或提包为生，过着清苦的生活。而手上有点资金的港台新移民则经营加油站、停车场和洗车中心，财力雄厚的则往农产品出入口、农牧、食品加工、纺织或化工等领域发展。例如：华人企业家林训明旗下的公司就一度高踞巴西黄豆出口之首，使他赢得了“黄豆大王”的称号。

       从1980年代，大批中国大陆与其他地区移民不断涌进，使华人人口不断膨胀。到了1998年，巴西已有10万名华人；近年来已有超过20万人在这里生活。

   走过近200年漫长的移民岁月，华人如今在巴西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

       现在的巴西华人约有25万人，主要来自广东、台湾、福建、浙江等地。80%居住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Sn Palo），其他则散居在里约热内卢、首都巴西利亚以及福斯市（Foz）等地。

       华人之中，有的是白手起家的商业巨子，有的是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也有贩卖走私冒牌货的市井小民。他们吃中餐、看中文报、看中文频道、到佛堂上香。新生代则在专业领域工作，完全融入巴西社会。尽管如此，传统佳节气氛比其他南美国家浓厚的巴西华社，中文教育却不够普及。一个家庭里通用葡语、华语和方言是常见的事。

       人们称巴西是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体。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唯一让大家人心惶惶的是治安问题。这里可以赚大钱，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这个华人视为冒险天堂的国度，让人欲走还留。斟酌间，华人已成为巴西多元社会的一分子。

圣保罗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街道纵横交错，形形色色的人群擦肩而过。华人在这里经营百货店、进出口贸易公司、超级市场、中餐馆，也有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工矿业等领域寻找机会。他们累积着经验和资金，蓄势待发。当地华人季友益的“季家电话”（Teleji）和尹霄敏的“尹氏箱包”（Yin's），已是巴西家喻户晓的品牌。

       华人小贩、企业家、专业人士，在巴西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但当地轻工业产品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很多民生用品都得依靠进口，其中又以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独占鳌头。角仔店、提包业和跑单帮已经被时代淘汰，小资本的百货业却迅速崛起。

       这些以批发零售杂货为主的华人小店和地摊，集中在圣保罗25街、巴拉伊斯区（Prais）和里约热内卢沙拉区。多年来，不少新移民以25街为起点，开始在巴西创业。岁月悠悠，这条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街，见证了成功的华人发迹，也目睹了落魄的华人三餐不继。

       春去秋来，这些生活故事还在不断延续着。

       25街一带的廉价公寓住着很多华人，每天清晨6点，天刚刚破晓，他们已推着载满货物的小车子来摆地摊。他们多数是浙江青田、温州及福建的新移民。他们曾经听人天花乱坠地叙述这里遍地黄金，于是交上至少3000美金，向蛇头换取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们或是夫妻俩，或是单枪匹马，向早来的同乡批一些小百货，比如墨镜、文具、发夹、帽子、手提袋、围巾、手帕，什么都好，反正什么都卖得出去。商贩在晨曦中摆摊，转眼就把冷清的街道挤得密密麻麻。后来的人没有位子，必须向“前辈”租摊位。据说，现在一个小摊位已经炒到每年一万雷亚尔以上，令人咋舌。

       当城市慢慢苏醒，路上行人来往匆匆，和着小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使25街进发出勃勃生机。华人商贩在充满朝气的喧哗中，利落地摆货、收钱。他们只有区区两个小时，因为得赶在警察上班以前收档。要不然随便一个理由——贩卖走私货、无执照营业、没有居留身份，都会让他们惹上很大的麻烦。

       收档后，他们不是去批货，就是提着黑胶袋，搭上公车到郊外沿街叫卖。存到钱，就和别人合伙在25街的百货商场里租店做生意。商店抵押金就一万，每月还要交几千租金。开销这么大，华人商贩根本不敢休假，每天8点准时开店，傍晚6点打烊。不过，也有人选择继续摆地摊。摆地摊不用执照，不用交税，可以省下好多钱。

       新移民见缝插针地摆地摊、开店铺，25街逐渐饱和后，大家又往附近的巴拉伊斯区涌去。现在，25街和巴拉伊斯的华人店铺、摊位加起来有3000间，占了这两个地区商店总数的四分之一。

       巴西人喜欢穿戴名牌，但很多人买不起名牌货。25街华人从中国进口的膺品销路特别好，但也引来警察和关税局人员，三天两头就来取缔。一有风吹草动，地摊小贩马上落荒而逃；店主也拉下铁闸挡灾。迟一步的人一见到警察就先给钱疏通，谈不拢货物统统充公，或连人带货一起抓。再把货要回来，最少三千，多者几万，数目不小。

       每天诚惶诚恐，华人埋怨“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却没有要马上离开的意思。赚不到钱自然不能回去，赚到钱更加不可能一走了之。每天在这座城市隙缝中挣扎求存，既不能休息，也不容放弃。他们欠了债，没有身份，教育程度又不高，继续打拼是唯一的出路。

       看着早来的同乡不但赚到房子车子，还赚到让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他们只好咬紧牙关，继续撑下去。

  巴西宜人的气候和景色，令许多华人流连忘返。圣保罗处于丘陵地带，地势较高，平常天气凉爽，一热就下雨；里约则是背山面海的城市，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海滩。虽然这两座大城市日常消费高，但庆幸巴西物产丰富，蔬菜水果和牛肉特别便宜。蔬果市场每到中午12点就大平卖，一堆新鲜青菜只要一元。据说，早期穷困华人都是吃这些菜挨过来的。

       当地人总觉得上帝一定是巴西人，其实不无道理，他们说：“从古至今，巴西只有人战死、病死，从没听说过有人饿死。”

       丰衣足食的社会，养出了乐天知命的子民。巴西人赚多少花多少，凡是随性而为，不会未雨绸缪。华人雇主总要好一段时间才能明白，当地员工不愿加班，原来只为了去海滩晒太阳或游泳。

       相对地，25街华人新移民的生活显得单调。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回到租来的小房间，胡乱煮些东西吃，七八点就累极睡着了。很多人一天只睡四五小时，不过年也不过节。对自己最大的奖励，就是到中餐馆点一桌吃不完的菜，仿佛这样可以弥补一切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

       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认识巴西。

       反观1970、80年代的华人移民，他们多数事业有成，消遣活动丰富，包括参加华团开办的合唱团、拉丁舞培训班、开车去体验各个小镇风情、到私人农场休闲等等。圣保罗还有华人的高尔夫球协会、网球协会、保龄球协会以及篮球协会。第二代华人经常和巴西或日本人后代混在一起，多少沾到当地人喜欢享乐的个性，工作和学习之余，最爱泡酒吧和舞厅。

       巴西人性格开放，女人穿着暴露，好象永远嫌布料太多似的，华人常说：“在巴西卖布肯定亏钱。”这当然只是玩笑。巴西人异常热情却是事实。

       老华侨说：“如果向当地人问路，对方不理你，他肯定是个哑巴。”这个乐于助人的族群，帮助很多华人适应新环境。住下来，华人又发现他们容易相处，脾气温和，不记仇。今天和人闹意见，明天见面又可以勾肩搭背。你还在为昨天的事耿耿于怀，他们早忘了这回事。有人移居巴西20多年，竟没看过当地人吵架。当地人很有礼貌，华人入乡随俗，也爱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

       巴西景色优美，资源丰富，人民热情，本来是个近乎完美的定居地。奈何随着贫富悬殊日益增大，当地治安每况愈下，谋杀案发生率高居世界第四，又以圣保罗和里约最恶名远扬。一位里约华人说：“我认识的朋友都被打劫过。”还有华人调侃：“里约好山好水，好危险。”

       在巴西，买枪就像到市场买根葱那么方便，许多劫匪都是持枪抢劫。当地华人不管贫富，都尽量低调行事。他们住在保安森严的公寓，穿最不起眼的衣服出门，经常更换上下班路线。此外，买车得买路上出现最频密的那款，豪华房车则安装防弹玻璃。万一遇上劫匪，要保持镇定，只要不反抗，最多伤财，不会丢命。虽然当地夜生活精彩，很多华人却宁愿躲在家看电视节目、玩扑克牌、打麻将。

 套一句巴西华人的话：“巴西不打仗，只打球，如果没有治安问题，就是人间天堂”。小部分人因治安不靖而萌生去意，开始往中国投资，送孩子回去念书，为日后回归故里铺路。

       巴西人吃中餐、学汉语，但在他们心目中，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武术。巴西人因李小龙电影，开始向往神秘的功夫世界。当中国武术专家移居巴西收徒授艺后，学武之风马上席卷巴西。

       今天，巴西人已了解到武术是一门结合健康、自卫和管理的艺术。中国武术成了巴西的全民运动。鹰爪功夫总会的李荣基师傅透露：“1970年代初巴西只有4名中国武术师傅。今天加上巴西人，武术师傅可能有几十万人。”拥有80多间武馆的李师傅，徒弟已传到第四代，学生数以万计，当中不乏警员、军人和专业人士，深受当地人敬重。

       除了中华武术之外，中医也风靡巴西。

       基于利益冲突关系，中医师的地位和权利一直受当地西医质疑。不管怎样，在巴西风行了30年的中医因就诊简便、收费廉宜，一直深获大众喜爱。目前华人中医师有4000人，巴西中医师则超过两万名，还创立了中医学会。

   在刘之明中医师眼中，巴西是发展中医医学的好地方：“全世界80%的中草药可以在这里找到。”除了看诊，他还开办针灸班、气功班、中草药班、推拿班以及风水班。风水是近来巴西人的热门话题，当地华人苏成皿还以葡文撰写了《吉祥风水》。

       圣保罗大学自1968年开设东方文学中国语文组后，报名就读的都是巴西人。倒是华裔子弟不太热衷学习华语，估计只有30%华裔子弟到中文学校上课，真正看得懂中文、会说华语的不多。

       巴西人正走进中华文化的门槛，探索其中奥妙。

       华人的中文教育始于战后。1970年代，全国中文学校和中文班加起来有100所。纵然众志成城，仍敌不过许多现实问题，至今剩下40多所，主要由宗教团体或华团开办。少数为附属在巴西语言学校的中文班或个人开办的补习班。圣保罗中华会馆中文学校和圣保罗华侨天主堂中文学校的规模最大；而由著名企业家张圣凯赞助的仁德国际学校，则是巴西唯一的葡中双语学校。

 华人孩子自巴西私立学校毕业后，不是到欧美国家深造，就是进入当地名牌大学，如最著名的圣保罗大学升学。

       第二、三代华人俨然已是巴西人。对他们而言，葡萄牙语才是母语。

       因此，当地中文报读者一直是第一代华人和新移民。除了拥有20多年历史的《巴西侨报》和《美洲华报》，如今只要动动鼠标，也可以在《巴西侨网》浏览新闻。

       免费派发的刊物，也是华人的精神粮食，包括《台湾侨报》、中华会馆的《华光报》、圣保罗华天主堂的《心声》、中观寺出版的杂志、里约华人联谊会的《华联报》以及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的《华人报》。南美华人作家协会亦不定期出版《南美文艺》，让文友抒发情感和意见。

       华文文学谈不上普及，却有一群人正努力用方块字记录自己的移民故事，并结集成书。也有人在美术学会、摄影学会、书法学会、唐韵艺术团等找到兴趣归属，水墨画家周毛如珠、圣保罗歌剧院首席女高音陈黄淑英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巴西没有唐人街，圣保罗的东方区（Avenida Liberdade，也称作自由区）是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聚集地。国际青商会巴西协会华侨分会就是在这里举办“新年快乐活动”，欢庆春节。这项活动每年吸引16万巴西观众，不只电视台来报道，市政府也推举它为模范的社区活动。

       中餐馆和中国食品店林立的东方区，也伫立着圣保罗中华会馆、巴西广东同乡会会所、客属宗亲会馆、圣保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巴西华侨教会、弥陀寺、中观寺和观音亭。它们是巴西华人群策群力，团结合作的见证。

       1929年成立的中华会馆是巴西历史最悠久的华团，而1956年创立的华侨天主堂则是最早的华人宗教组织，对华社影响深远。1970、80年代，华人如潮水般涌入圣保罗，这两个团体接济过很多无依无靠的新移民。在圣保罗山度士（Santos）港口，萧金铭和何彦昭神父帮忙填表格、通海关。中华会馆也帮忙找工作、租房子。至今，教会仍跨越宗教，服务当地华人，和医院合作建立惠及群众的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和平公墓，安葬老华人。目前，它正筹建博爱园安老院。

       此外，还有巴西华人协会属下的广东、青田、温州、闽南、北京、上海、东北、江苏、江南、大西南等同乡会，总是及时对受到“老飞”（华人对当地警察的俗称）敲诈或遭到警方扣留的新移民伸出援手。

圣保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拥有40多年历史，设有华语、葡语和闽南语的主日崇拜。

 新旧社团在岁月推移中传承、交接，巴西累积创办的华团超过200个。有联谊同船移民的台湾乘船移民南美联谊会；有引导华人争取政治地位的巴西华人选民联谊总会；有集合退休军人的巴西荣光联谊会和旅巴中国空军联谊会，还有最新成立的杀鸡业公会。

       巴西华人大多数信奉佛道或道教，在家供奉关公或观音。佛教组织、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也有20多个。

       除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聚餐等例常活动，华人组织也不时给当地人捐助，发放金钱、食物、日用品，以及义诊。如来寺发起“如来之子”计划，给贫困儿童布施米粮和用品，教导他们手艺，使他们不致于在街上游荡。巴西华侨慈善基金会多次筹办募捐活动，并亲自前往灾区救助。不管灾难发生在中国大陆、台湾、南亚，甚至是偏远的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都阻挡不了华人奉献爱心。

       可想而知，各种社区活动占据华人不少时间。不过，每到星期四，圣保罗华人就会减少出门。原来，为了缓解堵车问题，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以及傍晚5点到8点，都有指定车牌不能上路。星期四轮到车牌最后一个号码是7和8的车子。华人车牌最后一个号码多数是8，星期四就是他们车子的“禁行日”。

     华人社团把第一代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里有来自同一个家乡的人，有熟悉的华语和方言，有相同背景和文化的朋友。然而，他们不排斥巴西文化，并且愿意入乡随俗。

       他们尝过巴西道地的烩豆饭（Feijoada）、烤肉、橙汁、咖啡和Guarana水果汽水；收到礼物时，当着对方的面把礼物拆开，表示感谢。复活节买巧克力做的彩蛋给孩子；亡人节带鲜花拜访亲人墓地；丰收节（Festa Junina）如来寺会举办玉米庆祝活动，和巴西人一起欢庆农作物丰收。

       即使孩子要和当地人结婚，家长也欣然接受。婚礼中西合璧，早上到教堂完婚，晚上在中餐馆请客。也有人以巴西方式——沙拉、面和烤肉3道菜宴客。主人家通常不收礼金，来宾改为签字或写婚联祝福新人。

       在巴西，一个华人家庭里有韩国、巴西或日本成员，甚至混血后裔都是平常事。

       巴西是个移民大国，种族复杂，混血儿比比皆是。当地人种族观念不强，而且当地反种族歧视法律严厉，让华人觉得更为踏实。当初想把巴西当跳板的华人都说：“现在给我钱，送我到美国，我都不去了。”

       在巴西，外来移民和国民待遇差别不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择业。这么多年，巴西仍是华人心目中的“金矿”。有人通过亲属申请过来，有人和巴西人或是持有身份证的华人假结婚入境，有人则逾期逗留。

如来寺是佛光山在巴西的据点。占地15公顷的如来寺是南美最大的佛教圣地，也是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

 巴西政府几次大赦，允许非法移民申请居留，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大赦时，非法入境或在巴西留下不良记录的移民，都在中文报刊登护照遗失启事，然后到当地中国大使馆拿一本“清白”的新护照，申请居留证就能马到功成。

* *中国画家张大千自1954年起旅居巴西十多年。他在圣保罗郊区兴建有名的八德园，并在这里完成许多画作。张大千仙逝后，政府在该地段修建水坝，八德园从此淹没在水下。*

       有了居留证，只要住上5年，能说葡语，拥有正当职业，且没有犯罪记录，便可申请入籍。居住15年以上的，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即可。子女在巴西出生的，父母自动成为永久居民。巴西地大物博，容纳移民完全不成问题。老华侨大多成了巴西国民，而新移民仍抱着“赚够钱就回去”的想法。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人不但没离开，而且还把家人都接了过去。

       经济基础稳定后，华人开始进入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代表人物有创办巴西第一家加护病房的心脏病专家王昭平、华人法官马劲球等。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社会救济而获颁殊荣的华人也不胜枚举。近几年，不少华人后裔开始在政府、议会、军队及政党中担任要职。2006年，纯华人血统的巫威廉在圣保罗州当选为首位华裔联邦众议员，巴拉那州则由徐敏淦代表华人出任州议员。

       在巴西，真正代表东方文化的是日本人，但华人地位正日益提升。以往华人走在街上，巴西人都这么打招呼：“日本的朋友，你好！”现在巴西人会先问：“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让华人深感欣慰。

角仔店、提包业和跑单帮是很多巴西华人安家立业的起点。

       “角仔”是用面粉裹着肉碎、竹笋和乳酪油炸的点心，巴西人很爱吃。20世纪60、70年代，圣保罗的电影院、车站、每个区域的中心点都有广东人架起来的角仔架，全市约有几百家。角仔现做现卖，一个25分，等于搭一趟电车的车资。穷人点三四个角仔和一杯鲜榨甘蔗汁，就能填饱肚子。“角仔佬”工作辛苦，还必须应付流氓和偷鸡摸狗的顾客，身心俱疲。1980年代初期，巴西大财团开办的角仔连锁店以及国际知名快餐店强攻饮食市场，华人角仔店招架不住，只好收摊转行。如今在里约华人聚集的沙拉（Sara）商业区，还有几间硕果仅存的华人角仔店。

       提包业比角仔业开始得更早。第一批提包人，很可能是20世纪初从欧洲来的华人。当时他们把带来的珠链串满双手，一手提一个包穿街走巷叫卖。后来，提包业进入售卖桌布和黄金珠宝的风光时期。不少青田人，就是这样日晒雨淋存到第一笔钱。1990年代，女性成了提包业主力，她们推一辆小车，沿街挨户兜售家用电器、香水、化妆品、手表之类的小礼品。小孩为了帮补家用，也加入提包行列。

      提包业盛行，需要大量小商品，跑单帮应运而生。以里约华人为主的单帮客每次搭上“野鸡车”（专载单帮客的巴士）到巴拉圭东方市（Ciudad del Este），背回上万美元的走私货，批发给提包人、商店、公司和街边的摊贩。1990年代初期，跑单帮风行一时，引来不少新移民。跑一次有1000美元，代价却很大。野鸡车司机超速，路况又糟，有人因此魂断公路；有人长时间背重物，患上肩膀、脊椎酸痛的毛病。运气不好的话，货物被充公了还得交罚款。后来巴西开放进口，并严厉管制巴拉圭进口货，单帮客逐渐沉寂。

       1990年代末，提包人因常遭土匪和警察敲诈，萌起转行念头。不过，这时候已有许多华人买大车、住大屋，或累积了足够资本往其他领域投资。提包业、角仔店和跑单帮渐渐走入历史，但其中交织的辛酸血泪，却是巴西华人奋斗史上永不磨灭的烙印。

 巴西华人一步一脚印，经历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当地社会取得不俗的成就。

       纵然过程有辛酸有泪水，但巴西美丽的湖光山色、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及巴西人热情的微笑，足以抚慰他们的挫折和失意。

       对喜欢冒险的巴西华人而言，这个梦想之都永远有许多预想不到的惊喜。

  碧波荡漾的加勒比海，点缀着千万个大小岛屿，串成多个小国寡民的岛国。这里的国家大部分都有同一特点，就是主要以农立国，旅游业发达，但工业却尚处于萌芽阶段。此处的华人移民姗姗来迟，人口稀少，多靠经营小本生意为生。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少数港台移民向加勒比海地区进军，投资设厂。而自70年代以后，也有部分中国大陆新移民迁徙到加勒比海地区，使华社的结构起了变化。华人的籍贯更多元，经济范围扩大，社团组织也多了起来。

  介于大西洋南端美国佛罗尼达州（Florida），中美洲东岸及南美洲北岸，是辽阔的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它是因当地原居民加勒比印第安人而得名。在这片辽阔的海域上，有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岛屿，有些是珊瑚岛礁，状呈一大弧形，宛如璀璨的串珠，光彩夺目。这里风光明媚，处处鸟语花香，充满热带情调。

       众多岛屿主要由3组群岛组成，即巴哈马群岛（Bahamas）、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包括古巴、海地（Haiti）等及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包括多米尼克（Dominica）、巴巴多斯（Barbados）、格林纳达（Grenada）等，这些群岛也被统称为西印度群岛。

   远在15世纪末西方列强势力入侵之前，当墨西哥南部中美洲一带的玛雅文化绽放着绚丽的色彩时，加勒比海地区的印第安文明还在萌芽。这里的印地安部族基本上还是处于渔猎或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文明阶段。

       1492年，在西班牙女王的赞助下，哥伦布率领舰队航抵古巴与海地，建立了最早的殖民地据点。到了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经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及牙买加纳为殖民地。

       自16世纪之后，英、法、荷也到新大陆来开拓殖民地，和西班牙展开殖民地争夺战。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间，西班牙国势衰落，英国得以从西班牙手中掠夺其胜利品，同时与法、荷展开的殖民地争夺战中取得上风，而获得加勒比海地区许多国家的宗主权。

       法国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败下阵来，只落得留守住几片残羹，它们是：法属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今海地），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Guadeloupe）等。除了海地于1804年摆脱法国取得独立外，其他仍是法国的“海外省”。

       荷兰实力不如英法，只能在加勒比海地区保住几个小岛，它们是库拉索（Curacao）与阿鲁巴（Aruba）等小岛。

       西方列强近400年来的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生活水深火热，自由受压制，激起人民的怒火，从18世纪末年就爆发了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与牺牲，最终摆脱了列强的桎梏，取得了独立建国的辉煌成就。如海地（1804）、多米尼加（1844）及古巴（1902）都先后成为共和政体的独立国。一般而言，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地政府，历来都是采取高压手段与政策，独立过程比较艰辛与曲折，殖民地人民需经流血与牺牲，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英属殖民地的独立，则多是通过宪制谈判的过程，以避免流血冲突，不过大都是迟至第二次大战后才完成独立，如巴马哈（Bahamas，1973）、巴巴多斯（1966）及特立尼达与多巴哥（1976）。

在西方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下，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缓慢。虽然殖民者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改善了物质文明，但只有少数人受惠，广大的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中。加勒比海地区除了少量的石油外，矿产资源贫乏，但大部分土地肥沃，适合耕种。殖民地政府鉴于甘蔗、香蕉、椰子、棉花、咖啡、可可与烟草等农作物是世界市场最为畅销的产品，除了能够带来庞大的盈利，又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大力发展种植业。为了鼓励外国资本家到来开垦种植，除了给予投资者种种优惠，还协助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效卓著，以致几百年来，农产品成为各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加勒比海地区风光旖旎，引人入胜。近二三十年来，各国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事业，兴建豪华旅馆与赌场，改善机场与市内交通，以吸引各国游客的到来，为国家带来庞大的外汇，成为国家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鉴于这地区的资金不足，人才短缺，政局不稳定，因此能够吸引的外来投资不多。除了巴哈马等少数国家有石油提炼厂外，其他国家也只能发展轻工业，大多集中在纺织业、制衣业、造纸业、电器业、皮革业、塑胶业及食品加工业等领域。

   古巴是华人最早登岸的加勒比海国家。1847年6月3日，一艘英国商船从厦门载来212名华工，在哈瓦那登岸。1859年，法国殖民政府从广州运载华工到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去，这批华工多被派往大农园种植甘蔗。1882年，法国殖民政府从上海又招到2102名华工，这批华工则被运往瓜德罗普。

       在19世纪80年代，即有华人在库拉索开垦耕地。1915年，也有华工和技匠在那里的炼油厂工作。早在1920年，库拉索首都威廉斯塔德（Willemstad）市内就已经出现了小唐人街，并有中国人所开设的餐馆和小商店。

       19世纪末，阿鲁巴发现黄金，吸引了大批华工前来淘金。1924年，阿鲁巴建立炼油厂，厂内也聘用了华工。此外，岛上也有从事种植蔬菜与水果的华人。

       早期的华工都是契约工人。契约华工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自从过去盛行的非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宣告废除后，美洲新大陆就出现严重缺乏劳动力的困境，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资本家于是便从东方寻找新的目标。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天性，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人口贩子便以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及香港等地为中心，利用拐骗与掳掠的卑污手段，将华工运载到美洲各地去，或被分配到大农园种植甘蔗，或派去修筑铁路与运河，或进行挖掘矿产或鸟粪等劳力工作。

       契约华工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与雇主所订的契约，如同卖身，限期5年或8年不等。这期间华工必须从事无补偿的劳动，工作时间长，生活与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又受督工殴打虐杀，死亡率极高。

       1874年以后，契约工人制度便走向衰落，开始有大部分华工的身份变为自由民。

# 

      自由民可以自由迁移，流动性较大；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新移民从中国大陆或美国旧金山迁徙过来，因此扩大了华人分布的区域，过去没有华人的地方，也开始有了华人的足迹。华人的增加，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甘蔗的种植与蔗糖的生产。

       进入20世纪初期，加勒比海地区掀起了一股移民浪潮，流入英荷属地。他们多是自由移民，以手工艺者及小商人居多。1900年至1940年间，超过7000名华人到此地区登陆。移民中有些是从美、加及拉丁美洲来的再移民。华人人数日益增加，许多华人从乡村流入城市，职业也随之改变。他们有了少许的积蓄，便弃农从商，从事餐馆、杂货店、洗衣店等小本生意，经过多年的经营，生意由小而大，有的办工厂或农场，有的经营出入口生意，从而提升了社会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溃败后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了东西两大集团对抗的局面。这些状况的形成，大大遏制了全球华人移民的浪潮。加勒比海国家不与中国来往，中国政府也严格限制人民出境，因此，自1950年后的20年间，除了少数台湾与香港的商人入境外，鲜有中国大陆移民。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70年代以后才改变，随着古巴首先在1960年与中国建交，牙买加、巴巴多斯、安提瓜与巴布达（Antigua and Barbuda）等国也相继与中国来往。另一方面，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掀起了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纷纷涌入美国、加拿大、西欧、澳洲与日本等国家，其中也有少部分流入加勒比海地区，加上1980年以后，从香港和台湾前来的投资移民也激增，这一来，便扩大了这地区的华人人口。

       加勒比海地区的华族群体结构，大致上可分为以下3个群体：一、老华人，为早期移民，多数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四邑（台山、新会、开平与恩平），也有少数的潮州人、福建人及客家人。他们注重传统，沿袭中国习俗，使用中国方言，感情上还是眷念故国；二、年轻的华裔，是属于第二、三或四代具有华人血统的后裔，他们土生土长，接受当地的教育，结交的朋友也大多是本地人或西方人士，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不会说华语或中国方言，更加不懂得书写中文；三、新移民，大都是战后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移民，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学技术，及较多的财富，其中尤以港台人士为甚。他们多是投资移民或技术移民，或投资设厂，或受雇为专才。他们视野广阔，但感情与思维仍然倾向中国，依然遵循中国人的生活习俗。

       这些不同的华人群体，地域观念较浓郁，来自同一地域的人，凝聚力较强，至于不同地域的华人，大都不相往来，鲜少交流。

       华人社区阶级分明，上层的包括企业家、医生、律师以及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中层阶级包括公务员、小商人与小农场主；下层的成员是劳动工人，终日劳作，仅足糊口。然而，这种阶级分化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有些下层阶级的成员因为奋发图强，因而摇身一变，顿成富翁，跻身上层阶级之林；也有少数原是上层阶级的富豪，生意失败，宣告破产，变成一穷二白的穷光蛋。

       有些地区有社团组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缘与血缘性的组织，如会馆及姓氏公会，各地都有。第二种是代表地区的泛华人组织，如巴哈马的华侨联谊会，阿鲁巴的中华公会；第三类则包括一些俱乐部与教会组织。至于华文学校的设立，鉴于财力与师资所限，数量不多，如巴哈马只有一所华校。

       另一个对华人移民人数增减有所影响的因素是外交关系。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圣茨基和尼维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圣卢西亚（Saint Lucia）及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等，台湾政府在这些国家设有大使馆，双方也不时派代表互访。台湾除了派遣农业技术、养猪及竹工专家去协助外，更协助公共工程的建设。而新中国自建国以来，与之有外交关系的则有古巴、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和格林纳达等。中国政府通过大使馆或商务代办机构，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扩大贸易，也承诺给予对方优惠贷款，并派专家协助改善生产技术，修建桥梁、公路等建筑工程。大使馆人员每逢春节或其他良辰佳节，举办联欢招待会，广邀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企业代表、港台同胞及学生参与其盛，场面热闹非凡。

 加勒比海诸岛国，小国寡民，开发较晚，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工业仍是处于萌芽阶段，资本欠足，规模不大，因此对外来移民欠缺吸引力。到这里投资的华人移民稀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多是餐馆饮食业、杂货店与出入口贸易等。近年来，随着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企业家前来投资，制造业日益兴盛，其中尤以成衣业最为发达。兹分国论述如下：荷属安的列斯群岛（Netherlands Antilles）为荷兰海外属地，包括库拉索岛、波力耳（Bonaire）、圣尤斯特歇斯岛（St Eustatius）、荷属圣马丁岛及沙巴岛（Saba），1954年获得内部自治，2010年10月10日将解体，其中库拉索和圣马丁将成为高度自治属地，余者则成为荷兰海外行政区。群岛耕地面积小，土地贫瘠，生产的农产品仅供当地居民消耗。国家收入主要依赖石油出口，促进了海运与空运的发达。近年来观光旅游业也兴盛起来。

       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居住的华人约有5500人。库拉索岛的华人有70%是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早期华人移民多广东籍，新移民主要是80年代移殖过来的港台人士。华人多聚居在首都威廉斯塔德及新港两地，多数经商，经营餐馆业、杂货业、贸易进出口业、洗衣店、超级市场、照相馆、家具业与旅游业等。这里的华人做小生意，容易赚钱，对于生活现状也大多感到满足。

 巴哈马是由700多个小岛及礁岩组成的岛国。其经济以石油出口、金融业及旅游业为主，国民平均收入高，是加勒比海最为发达的国家。当地华人约有500人，以广东籍的第二代华人居多，大多数聚居于首都拿骚（Nassau）。

       这里的华人多经营杂货店以及餐馆业。根据资料统计，1999年由华人开设的杂货店有18家；餐馆约17家；还有华人经营的旅馆5家，金融机构则有香港恒生银行于拿骚所设立的分行。

       此外，有华人的建筑公司一家，还有洗衣店、文具店、书店、美容店、西服店、照相冲洗店等。而中国的齐鲁建设集团公司则承建过巴哈马国家体育场。香港和记黄埔自由港港口公司、自由港集装箱码头公司、大巴哈马岛机场公司是香港和记黄埔公司（Hutchison Whampoa Limited）在大巴马哈岛投资的三大公司，主要经营集装箱运输、客运码头和机场业务。

阿鲁巴位于委内瑞拉北岸，农业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收入依赖石油出口与旅游业。华人约有5000人，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占了80%，他们多已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不会说华话或方言。老一辈华人多属粤籍，以鹤山、恩平人居多，新移民则多来自港台，大部分华人聚居在首都奥拉涅斯塔德（Oranjestad）。

       这里的华人多数经营杂货店、餐馆业、旅馆、超级市场、药房、五金店、家私店及洗衣店，都是小本生意。一般华人工作勤奋，稍有积蓄，就拥有自己的房屋汽车，属中产阶级，生活过得安逸舒适。

## 

位于加勒比海岛屿的最东端，人口约26万，为世界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国内盛产甘蔗，富石油资源，加上旅游业发达，三者成为国家主要外汇来源。

       岛上华人只有区区600人左右，多聚居在首都布里奇敦（Bridgetown）。大部分当地华人都经营餐馆业与加工业。餐馆多属小规模，业者多为中国大陆与香港移民。另有杂货店、裁缝店及塑胶加工厂。

       巴巴多斯于1977年与中国建交，中国多次给巴国援助贷款，并于1993年援建体育馆。中国在巴国设有大使馆，常在佳节举办招待会款待当地华人代表，联络彼此的感情。有两家中国建筑公司进入巴国承建庞大建筑工程，它们是中国建筑总公司巴巴多斯分公司和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业绩卓著，声誉良好。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南端，盛产香料，其豆蔻、丁香、肉桂之产量，居世界之冠。由于风光明媚，气候宜人，旅游观光业相当发达，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

       该国的华人大概只有100人左右，大多是广东籍，多数从事餐饮业、百货商店、商贸、食品加工及建材加工等行业。

       格林纳达与中国大陆建交后，中国多次派遣农业、医药与体育的专才予以协助发展。同时也有数家中资机构在此承包庞大的工程建设。为了配合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也投入兴建三星级酒店。

位于加勒比海东部，以观光、农业（盛产甘蔗）为经济基础。这里的华人只有近100人，多从事观光、农业相关产业。该岛国与台湾建交至今，两方常派代表互访。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南端。以农立国，大量生产与出口香蕉、椰子、甘薯及香料。旅游业是另一庞大收入来源。

       华人在这里所开设的，都是小规模的餐馆，以赚取薄利为生。该国与台湾建交，台湾也派遣农技团协助该国改善农业生产、养猪及植树等技术。

   位于加勒比海海地岛西部，由于长期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农业产量不高；工业以制造业为主，也仅供国内消费；交通运输设备欠完善，致使旅游业难以发展，因而成为中美洲生活水准最低，文盲比率最高的国家。

       由于华人的经济活动范围受限，仅有一家餐馆，一家成衣厂以及一家农场。自1956年以来，海地与台湾便开始建交。除了经常互访，双方更订立了文化、科学与农业等合作协定。

 多米尼克以农立国，尤以香蕉的出口，占全国外汇收入的50%。工业基础薄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小。

       据2001年的资料显示，当地华人仅43人，其中20人来自台湾。由于多米尼克给予中国人落地签证的待遇，近年来大陆移民较多，目前华人已有大约200人，而且超过半数已入籍。他们多经营小型杂货店或餐馆为生，规模不大，且发展有限。

       华人经营的小型杂货店以及现代超市，单单在首都罗索就有13家，均由大陆移民经营，货物多半由中国进口。罗索也有十余家中餐馆，其中以中华阁与古都的规模较大。也有专营外卖的，不过多是家庭式的小生意。另外，这里也有华人所开设的旅馆、礼品店、洗衣店等。至于在该国栖身的台湾移民，他们主要在经营洗衣厂、中医、小型餐馆及礼品店。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向风群岛中部，以农业占主导地位，尤以香蕉及可可种植业为主。圣卢西亚山明水秀，有利于发展旅游业，成为第二经济支柱；不过，工业基础却尚处于薄弱的阶段。

       岛上华人人口很少，大约只有百余人，主要从事餐馆业与杂货业。值得一提的是岛上有个“中国城”，那里有3家中国美食城、4家中国商店、一家批发中心，还有一家水上运动公司。

       圣卢西亚于1984年与台湾建交，接受台湾的援助，但到了1997年双方中止关系，转而跟中国建交，中国曾援助圣卢西亚建体育馆及精神病院。但是到了2007年，却与台湾复交，引起中国的抗议，中国中止与圣卢西亚一切外交关系，包括各项签订的协议均告失效。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北，经济以农业与旅游业为主，盛产甘蔗、棉花及葛薯，旅游收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工业方面则有制糖、炼油及水泥等领域。

       这里的华人主要从事中餐馆、小商品零售店以及超市，都是小本经营。

       该国之前曾与台湾建交，1983年双方断交之后，便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跟据资料，中资在该国有两家大企业，一家是中国进出口集团，另一家则是合资的安提瓜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在加勒比海一带的海岛国家，山青水秀、风光旖旎，旅游观光业的无限潜能，确实是吸引华人前来这里的重要因素。比起北美以及南美，加勒比海的华人移民历史短浅，人口稀少。早期的华人以广东籍人士居多，华社也比较单纯。这地区的华人，大多是小康之家，生活还算安逸。有的人安于现状，打算长期居留；有的则以此为跳板，希望有朝一日，累积了足够财富，再移民美、加等先进国家，追求更美好的明天。